

206页。

43 同上，第192—195页。

4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94年，第678页。

45 2002年4月19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46 鲍蔚文是《文汇报》评论组的集体笔名。

4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701页。

4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62页。

49 三支两军，对文革期间解放军支左（支援左派群众）、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的简称。“三支两军”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使军队过多介入政治，损害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 第十七章



1972年9月周恩来（左）和张春桥（右）等  
在上海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送行

## 第十七章

# 管好自家的后院

### 写作组：不是宣传部的宣传部

1971年林立果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在军队内广为流传，一开始张春桥并不知道。后来别人给了他一份，他读了之后，7月初就在康平路找徐景贤，指着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说：人家在抓舆论，我们也要抓舆论，是否考虑把写作组重新建立起来。

7月7日，徐景贤起草了一个通知，以中共上海市委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建立市委写作组的通知》。上海要不要建立市委宣传部，徐景贤为此事请示张春桥。张春桥说：“不，我们就搞写作组，这样主动。”当时人们就称市委写作组为“不是宣传部的宣传部”。

朱永嘉当时对张春桥这一决定的理解是，党委宣传部几乎都没有好的结果，所以宁愿搞写作组。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曾被毛泽东批之为“阎王殿”，毛来个“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首先打倒的就是中宣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就没有宣传部。每次政治运动都是宣传部首当其冲，张春桥不愿把自己的人放在炉子上烤。写作组目标小，不引人注意，既可对全市宣传系统起指导监督作用，而宣传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又不用承担责任，因为写作组与宣传单位之间名义上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它的权力可大可小，可进可退，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张春桥赋予写作组莫大的权力。它不但抓写作，也抓理论队伍，也管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各个系统，还可以以调查研究为名插手各行各业，发现问题直接向张春桥报告。写作组名义上属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实际上除了张春桥、姚文元，谁也无权过问。张、姚在北京，用热线直接指挥，或通过秘书传达他们的指示。张、姚到上海，单独接见写作组头头，布置任务，有些内容不向市委通气。张、姚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量批件，一般也不告诉市委，只有需要用作令箭时，朱永嘉才给市委主要领导人看一看。写作组重要稿件和报告都上报张春桥、姚文元。张、姚对写作组报告信件的批示有400余件。徐景贤虽然此时已身为市委副书记，主管市委写作组，却也还要经常要向朱永嘉打听张、姚的旨意。朱永嘉也说：“写作组复建之后，张春桥对我完全信任了，信任的程度有时要超过徐景贤。”<sup>1</sup>张春桥实际上是用写作组控制上海市委，市委的领导对写作组的头头也是敬而远之，因为它使他们不安，隐隐地感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写作组正式成员只有40余人。后来以借调使用、办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式建立外围组织，层层向外扩展。每个层次的政治待遇和所知道的信息各不相同，只有写作组本部成员才真正了解内幕。写作组内设了许多小组，分散在《解放日报》社、上海图书馆、市委党校等几个地方。自然辩证法组就常设在文汇报社，《文汇报》要给他们提供各种方便。《文汇报》在工厂和农村培养的通讯员及作者，有不少人都调进了写作组。张春桥强调：至少要培养一支200人左右的理论写作队伍。到1976年，写作组本部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300人左右，参加过培训的有800多名。写作组成员的人事编制都在原单位，工资也是原单位发放，他们都是带着工资为写作组工作。核心组发现写作人员有不满意的，即退回原单位。看上去写作组是世外桃源，又不搞运动，也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形式主义的作法，风平浪静，是一块没有矛盾的净土，但实际上却和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经过写作组培训的人员分布在上海新闻、出版、文化系统，王知常戏称：“写作班是当年的黄埔军校。”

从此，上海市委写作组进入第四阶段，即建立舆论阵地、办组与办刊物并重的阶段。写作组办的杂志有政治理论杂志《学习与批判》，哲

学自然科学杂志《自然辩证法》、文艺杂志《朝霞》、教育革命杂志《教育实践》和翻译杂志《摘译》，还编写了教科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史》、《七一人民公社史》、《鲁迅传》、《文学概论》、《哲学小辞典》、《虹南作战史》等书，并编辑、翻译、注释了一系列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古今中外书籍。供毛泽东晚年阅读的“大字本”，都是毛泽东圈定，由写作组负责注释编校的。朱永嘉还曾计划把写作组外围组织固定下来，像商务印书馆一样成立一个“编译馆”，或是社会科学院。1974年6月1日，朱永嘉为此写了一份《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请示报告给张春桥，建议恢复上海社会科学院。6月3日，张春桥批复：“上海培养理论队伍是有成绩的。还要继续努力。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于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行政问题，忙于应付。希望总结一下八年的经验，怎样保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培养干部。为什么那么喜欢在市中心，不喜欢到郊区五七干校或者到工厂去呢？我已经长久不在上海，提不出具体意见，发表一点感想，供参考。”王洪文批示“完全同意春桥同志意见”。姚文元批示：“我觉得写作组或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不一定不好听，中央文革也叫小组。”“不在乎名称，而在于实际。”“写作组要保留评论权。”

写作组在短时间里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和影响，是与雄心勃勃的朱永嘉分不开的。他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张元济那样的出版家”，“办一个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的出版机构”，“我还想把写作组办成社科院，因为写作组有许多青年，还没有成家，没有编制，没法分配到房子，不能结婚。我想恢复社科院，把社科院的房子拿下来，为青年人解决编制、房子和结婚的问题，报给张春桥，他不同意，就没能办成”。<sup>2</sup>朱永嘉是一个有学术理想的人。

1972年10月20至21日，朱永嘉从“五七干校”、高等学校、机关抽调了搞自然科学的专家教授20位，在康平路写作组会议室举行理科座谈会，讨论各个学科中不同学派在其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数学、地质学和天文学。后来，写作组整理了两天研讨会原始记录，上报给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10月26日，在北京的张春桥即作批示：“可以开座谈会，出刊物，在报

上发表文章，同不同观点的人百家争鸣。”11月7日，姚文元批示：“同意春桥同志意见。”<sup>3</sup>

朱永嘉得到“尚方宝剑”，喜不自胜，于是就由王绍玺负责，有纪树立、邓伟志、孙克强等人参加，紧锣密鼓地找人座谈，出题目，组织稿件。1973年5月，《自然辩证法》杂志出版。该杂志有两个版本，一本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32开本，另一本是给中央领导和上海市领导阅读的大字本。当时无书可读，《自然辩证法》以清新的面貌出现，深受读者欢迎。朱德委员长有一期没有收到，还专门让秘书打电话到上海索要。第一期、第二期发行量都在20万份以上。《自然辩证法》杂志从1973年出版，到1976年停刊，共13期，发表各类文章294篇。

科学批判可以说是《自然辩证法》杂志的最为突出的特色。这些科学批判文章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大爆炸宇宙学、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天体物理学中的黑洞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脑生理学、遗传学、细胞病理学、分子生物和基因学说、土壤学、光合作用理论、能源科学中的西方某些观点，数学中的“唯心主义”，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作者中有不少是科技界的权威人士，如苏步青、谷超豪、方励之等。<sup>4</sup>这些文章有着“穿靴戴帽”的时代特色，即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要引用一段马克思、毛泽东语录，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学阵地，或者把本来不属于哪个阶级的自然科学也附之阶级性。如《评爱因斯坦》一文中这样一段：爱因斯坦的政治观点，反映了资产阶级缅怀往昔的无可奈何的没落心情，因此，爱因斯坦在晚年既孤独又凄凉，既看不到任何政治上的前途与出路，又希望复辟倒退，使资产阶级返老还童，恢复青春，但是，他那全部自由、博爱、人道、和平的说教，不过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一曲“过去的回音”，不过是资产阶级已经逝去的青春时代的幽灵，通过爱因斯坦重演它的悲剧。

硬装“斧头柄”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文章的一大特色，如吴晗的《论海瑞》的末段是胡乔木给他装上的“斧头柄”，姚文元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也有一段硬装“斧头柄”，那么，《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文章也装上“斧头柄”，就毫不奇怪了。但如果我们剥去这个革命的外壳，这些文章还是不错的科普读物，文字优美，写得通俗

易懂。其中有不少文章是介绍世界上的新兴科学，在当时封闭的中国，令人大开眼界。

《自然辩证法》杂志还用不少篇幅介绍马克思数学手稿、中国古代文献，如明代宋应星的《论气》、战国时墨子的后学发展墨子思想的著作《墨经》、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宋沈括《梦溪笔谈》以及《黄帝内经》的科学内容和经验之谈，介绍中国针灸、针刺麻醉及经络学说，也总结了群众中的科学实践的经验。<sup>5</sup>在当时否定传统、否定中国文化的潮流中，他们能这样做，对引导人们认识中国文化，不能说没有作用。

## 《宇宙之谜》和《朝霞》

《自然辩证法》杂志还发表了《评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探索毛泽东不断革命思想的来源。1972年，市委写作组朱永嘉把袁志英、陈少新、汪小令、马静珠等人调到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翻译十九至二十世纪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的著作《宇宙之谜》。这部书曾受到很多人的称许。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多次对它进行赞扬，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它更是大量引用，鲁迅也曾在1907年发表了论述海克尔一元论生物发生规律的专论《人的历史》。

袁志英说：“那时林彪虽已‘折戟沉沙’，可‘文革’干将风头尚健，‘批林批孔’杀声震天，偏偏这时翻译一个洋人、古人的书，真是匪夷所思，但又不敢问个究竟，只知道翻译任务是‘上头来的’。”<sup>6</sup>后来袁志英才知道，1975年10月，联邦德国（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谈话时，毛泽东说：“我本人是马克思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不喜欢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马哈、对海克尔感兴趣。”<sup>7</sup>后来，毛泽东还和德国政治家施特劳斯谈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施氏没有读过，无法接毛泽东的话茬。这时，袁志英才恍然大悟，那个“上头来的”原来是毛泽东，他们译的《宇宙之谜》是给毛泽东看的，由张春桥从毛泽东那里接受重译出版的任务，又转托朱永嘉，组织了他们几个人进行翻译。袁志英等译《宇宙之谜》被印成大字本，当

时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毛泽东还赞扬文笔流畅。当时笔者也获得该书一套上下两册，如获至宝。

毛泽东对《宇宙之谜》的接受有其独到之处，他的着眼点，在梅奈特看来，是其反映出的“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一切处于变动状态的思想。<sup>8</sup>毛泽东在其晚年也是时时处处强调运动、变化、转化、革命。“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暂时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革命”。“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会灭亡”；“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相互斗争，相互转化”；“有问题才有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毛泽东不断强调革命，强调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梅奈特大胆假设，将毛泽东不断革命和海克尔的反对任何“最终状态”联系起来，毛从“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中得出重大结论。<sup>9</sup>

萧木原本是工人作家，他想办一个文学刊物，曾向上海老作家、老编辑萧岱、王道乾、茹志鹃、菡子、郭卓、彭新琪等征求意见，并请他们参加编辑工作。这几位老作家、老编辑对要办文艺刊物都非常赞成，但是谈到来参加工作，则或以思想、业务跟不上为由婉辞，或干脆说已吃足了“文艺黑线”的苦头，不想再干这一行。但萧木还是跃跃欲试。然而一向支持扩展业务的朱永嘉，这回却很不赞成。他说：萧木啊，这事做不得呀。这不是抢着给人当靶子吗？写小说，能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但是在萧木的坚持下，1972年还是办了一个《上海文艺丛刊》。

丛刊是不定期的，每辑选其中质量较好的作品名作为书名，《朝霞》便是第一辑中由史汉富创作的小说的篇名。年内又陆续出版了《金钟长鸣》、《钢铁洪流》和《珍泉》等三辑，其中以《珍泉》为名的这一辑，是电影、话剧剧本专辑。《珍泉》是反映地质水文工作者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由写作组文艺组、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班和上海地质水文大队共同创作。萧木在向张春桥寄送这一辑时，特地介绍了《珍泉》的创作过程，希望张能作些指示。张看了之后，1972年11月12日在《珍泉》剧本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我抽空翻了翻。支持你们把这个本子搞出来。我初步感觉是：主题、题材都是好的。本子也有许多感人的地方。但是，人物似乎多了些，情节也不够集中，因而矛盾不尖锐。可能没有考虑到电影的长处和短处，可否同电影厂的有经验的同志商量一下，把人物、矛盾更集中，在主要人物上多花些工夫，次要人物的戏删去一些，同时要考虑到电影主要是视觉艺术，不要过多的对话，可能更感人些。以上只是粗略的想法，供参考。<sup>10</sup>

萧木还想办一个文学月刊，带着自己写的小说《初春的早晨》去找徐景贤。徐景贤花了几天时间，认真看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对办刊物却不作正面回答。经过萧木再三追逼，他才说：萧木啊，你政治上总是太天真，有些事可以做，不可以做的呀！徐景贤的不回答就是回答，意思是你们可以先做起来呀！萧木把徐景贤的话向朱永嘉说了，朱永嘉还是比较谨慎，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提出办文艺期刊的事。1973年9月13日，张春桥批示：“请文元同志阅批。拟同意他们的计划，出一个文艺期刊。”同一天姚文元批示：“同意。”并批曰：“文学月刊、丛刊的编辑可多培养一点新人，不必每一篇都看过。”<sup>11</sup>

1974年《朝霞》文学月刊第一期应运而生。《上海文艺丛刊》改名为《朝霞丛刊》，仍为不定期出版，主要发表中篇小说和长篇连载，以及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等。

《朝霞》第一期出版后，送张春桥、姚文元及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人手一册，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如果遭到批评就马上停刊。姚文元看后，不但没有批评，而且很高兴，特地去写作组说：“朝霞是一种高卷云，它能吸收阳光中的红色，并把它反射出来，所以是红色的。”在北京的萧木也向上海反馈信息：张春桥对《朝霞》每期必看。到文革结束，《朝霞》丛刊共出14辑，每辑发行18万到40万册。《朝霞》月刊共出34期，每期发行30万册左右。

谁是《朝霞》的主编，这是一个很长时间没有答案的问题。编辑室有一个临时编辑小组，行使编委的职权。编辑小组的带头人先是欧阳文彬，后来是施燕平，施燕平调往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后，就由任大

霖领导。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空四军的林正义，来自工厂的段瑞夏，来自中百一店的朱敏慎和知识青年姚真等。但真正决策当家的人不在编辑室，而在康平路，甚至在北京钓鱼台，具体地说是康平路市委写作组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她的背后即是萧木。他们负责政治把关，还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他们还在写作组内部组织了一个自愿参加的业余创作队，取名“苦斗”。写作组工作原本任务就很重，还要挤出业余时间来创作，必须苦斗。苦斗创作组提倡集体创作，笔名用中国农历的24个节气，用完再从头开始，以示生生不息之意。萧木喜欢这些名字，觉得充满大自然气息，又富有诗意。不过，创作队里写小说的只有萧木和陈冀德。萧木以“清明”为笔名写了小说《初春的早晨》，又以“立夏”为笔名写了《警钟长鸣》。陈冀德写了《第一课》，署名“谷雨”。然而萧木、陈冀德都是谦逊的人，从来不表明自己在《朝霞》中的地位。

按照张春桥“办刊物，出人才”的旨意，从《朝霞》里的确走出了许多人才。有的是文革之前已经小有名气的，如江苏的陆文夫、天津的蒋子龙、上海的胡万春；更多的是初试锋芒的青年，后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成为一代名家，如陕西的老蓬、贾平凹、路遥，上海作家如赵丽宏、孙颙、王晓鹰、王周生、罗达成以及活跃在文坛上的刘心武、古华、叶蔚林、陆天明、黄蓓佳等许多作家。作者来自五湖四海，题材也多种多样。发表的作品当然政治第一，但也很看重作品的艺术性。

萧木自己也是文革前走上创作道路的，他写的短篇小说在1958年就得到茅盾的赞扬，因而颇受《朝霞》一些初学创作的年轻作者敬重。笔者与萧木交谈中，也曾谈到他与《朝霞》编辑部那些青年作家、编辑的关系。萧木说那时之所以“处心积虑”想办个刊物，就因为爱好文艺，通过办刊物可以结识好多同样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一起“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后来这个愿望部分地实现了。萧木与他们相处尽管时间不长，但很融洽，很快乐，萧木奉调北京后，他们的关系也一直很好。其中有几位，在萧木成为“反革命要犯”后，尽管自己也因《朝霞》的事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审查，却毫不在意，对萧木反而更加亲近了。

## 《学习与批判》、党史及其他

社会科学刊物《学习与批判》是朱永嘉见机而行、先斩后奏的第三个刊物，于1973年9月第一期出版，月发行量高峰时达到95万份。关于如何创办《学习与批判》，朱永嘉有一段陈述：

毛泽东批示北京大学可以办校刊，这个禁区打破了。我思考如何办一份社会科学杂志，认为不如办一个学报刊物更容易些。由于我和复旦大学的关系，想挂着复旦大学的名义创办学报，不会引起争议，毕竟是毛泽东同意开了这个口子。没有请示张春桥和姚文元，先试办静看各方面的反应，大不了停办。当然，此事后来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终于使我松了一口气。

由于创办《学习与批判》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审批，我们处理稿件也没有送市委负责人包括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审查。觉得自找麻烦，因为这方面审批程序太复杂了，谁都害怕承担责任，互相推诿，弄不好这份刊物就不能正常出版了。想不到推到社会以后，反应不错，北京方面没有什么批评意见，我们就坚持把它办下去。<sup>12</sup>

《学习与批判》的选题计划是朱永嘉亲自抓的，然后分头组稿。主持日常编辑工作的是王知常，有一个编辑小组，成员有魏永征、徐缉西、高志仁、郭朝绪、余秋雨等人，他们轮流负责稿件的初审，最后由朱永嘉定稿。

《学习与批判》的主要栏目包括“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经济问题研究”、“文艺评论”、“人物传记”、“教育随笔”、“批林批孔防修反修”、“儒法斗争史研究”、“社会调查”、“用《水浒》作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投降派”、“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反击右倾翻案”、“杂文”等，这些栏目都是做了题头的，其他还有许多临时性的小专栏，刊登了一期或两期就结束了。社会上对这本刊物极其关注，连封面题签字体的更换都引起猜测和议论。封面上的“学习与批判”本是由书法家费新我题

写，用了三期，有人觉得费新我的左笔写得生硬，改由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题写。顾廷龙写的是馆阁体，深受日本人的欢迎。然而这次刊名题签字体的改变，却令香港报纸作出反应：从刊名字体的变化看出张春桥等失宠。为此，张春桥特别关照朱永嘉：“为什么要改字体呢？不要随便换字体，免得外界猜测议论。”<sup>13</sup>

《学习与批判》杂志的作者群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写作组的成员，是杂志的主流作者；其次是来自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文章多带有学术气息；第三类是写作组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发掘出来的青年作者，他们来自工厂或农村，这些人成长很快，稿件占的比重不小；第四类是社会来稿。

写作组的文章多是集体写作，用写作组的笔名。这类文章多是根据主流舆论导向演绎和生发之作，是栏目的主打之作，在立论上不代表个人观点。一般而言，根据作者的构成和文章内容，分别使用罗思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康立（康平路历史组）、方泽生（毛泽东的好学生）、任犊（初生牛犊不怕虎）、方岩梁（风物长宜放眼量）、石伦（历史组十人）、戚承楼（“七层楼”的谐音，历史组在上海图书馆七楼办公）、梁凌益（201办公室）、伍丁（历史组五个男性的合称）、吴耕畔（五人耕耘在黄浦江畔）、石一歌（文艺组下属鲁迅传记小组的十一人）、瞿青（哲学组小青年），如此等等，带点文人机巧和谐趣。

对市委写作组的文章用笔名，张春桥曾提出不同看法。1974年12月，他在朱永嘉给他的信上批示：

如何培养新作者问题，应当进一步研究。我有一个要求：现在报刊上，包括你们的刊物，作者的署名，真名也有，笔名更多，笔名中集体笔名更多，使我这样一个希望发现一些新作者，或者老作者的新成就的人，变得困难。老实说，我关心作者，多于关心作品（奇怪吗？）特别是想研究一点什么“班子”之类的问题，就更感到提不出名字来。<sup>14</sup>

张春桥仍不失文化官员的特色，他习惯于从作者中发现他所需要的人才。可能是由于张春桥的意见，写作组的人也有被允许用真名的，如

余秋雨写文章多用真名，其他如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等，也用真名写作。<sup>15</sup>当时斗私批修、破除名利思想的调子唱得很高，报纸通讯报道的后面只能写“本报记者”，连记者的名字也不用了。用真名写作，在其他报刊上是不多见的。

写作组还出版了翻译类不定期刊《摘译》，有文艺卷、哲学、历史、经济和自然科学卷。《摘译》的文艺卷共出了31期，发表文学作品102篇，其中苏联文学70篇，美国文学14篇，日本文学17篇，澳大利亚文学1篇。该刊是内部发行，每期发行量最多5万份，军以上干部才有资格订阅，翻译人员都是用集体笔名。上海的一些著名翻译家都参加了翻译工作，如巴金、萧岱、朱雯、包文棣等。张春桥、姚文元对《摘译》的文艺卷很有兴趣，几乎对每期都会谈一些感想和意见。姚文元要求每期前面都要撰写导读，他的意思很清楚，所谓导读就是批判文章，没有导读，“等于放毒”。戴厚英对外国文学很熟悉，导读文章多是由她执笔撰写。

写作组除了编辑出版杂志，还翻译了一些资料。朱永嘉对翻译书籍出版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人物传记；二、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主要是美、苏关系，第二世界国家政治动向和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及重要财团、财阀和跨国公司的历史；三、外国党政史；四、世界现代史和军事史。萧木也提出：中美、中日建交后，天下大势已定，以后翻译工作还是多搞些思潮、学术一类的书。为配合外国首脑访华，由朱永嘉统筹，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外国人物传记：1972年的《田中角荣传》、1973年的《蓬皮杜传》和《爱德华·希思》、1974年的《基辛格传》，还出版了前法国总统戴高乐著的《论中苏问题》、历史文献《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开罗文件》、《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等。写作组成员主持《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翻译的姚家华对笔者说：“这些书出版都送中央，周总理看了《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很称赞，要求以后这类书只要出版，都送他一套。这套书原计划编到七十年代，每编若干册，十年出齐。到文革结束时，已经出版第一编的第一、二册，即1945年和1946年。后来就不能再编下去了。”<sup>16</sup>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参加当年的翻译工作多年，他对笔者说：“当年要我

参加翻译工作，我就提出要给我们订阅外国报纸和杂志，这样，可以看到外国新的东西。我主编的《英汉大字典》里，有许多当时出现的新的词汇，别人都感到奇怪，没有到国外去，怎么能掌握那样多的新的词汇，我就告诉他们这和当时搞翻译有关系。”<sup>17</sup>

写作组接到上面布置的任务，就以此为尚方宝剑，从五七干校把一些专家学者调上来，让他们参加编书、翻译工作，包括巴金夫妇也被工作组从干校抽调回来。巴金调回来后遇到工作安排问题。那时作家协会面临着解散，批判他的人又很多，他无法回去，总要有个落脚点，就把他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张春桥的意见不要给巴金安排具体工作，他想干嘛就让他干嘛。巴金自己提出他对赫尔岑有兴趣，他和夫人就翻译赫尔岑的代表作。<sup>18</sup>这样，老先生们可以天天回家，能吃一顿可口的饭菜，洗一个热水澡。然而除了巴金夫妇外，其他老先生都要做出成果来，否则没法向上面交待。如编历史地图，朱永嘉和谭其骧先生就产生了矛盾，谭的学风很精细，做事慢慢来，朱永嘉希望谭先生能做快一些，向毛主席有个交待，但对方认真精细，快不了。写作组有数百人，摊子铺得很大，能做多少事情且不说，通过这种方法把人才都调了出来。做这些事情，都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只要他们不反对，不批评，写作组就认为他们是持以默认态度。<sup>19</sup>

市委写作组还为知识青年编辑出版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共分二十多类，有数学、物理、化学、语法修辞、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农业技术、医学、军事技术、天文学、鲁迅著作等，畅销多年，影响很大，周恩来也向上海要这套书。这套丛书源于马天水和朱永嘉的讨论，朱永嘉告诉马天水，知识青年是上海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这关系到千家万户：青年到农村去，谁来关心他们？马天水接受了朱永嘉的意见，在其权力范围内，从经济上帮助知识青年解决一些问题，写作组则通过编书来解决知识青年在农村无书可读的问题。写作组办的几种刊物，都深受知识青年的欢迎，这些杂志一出版，一些知识青年的家长就立刻买了寄去。后来，知识青年可以被选拔上大学了，写作组又立刻组织力量，编写数理化“自学丛书”。他们还送书下乡，朱永嘉说：“我那时带着余秋雨到江西、安徽给知识青年送书，每

到一个地方，我就让余读地方志，所以他后来写的文化散文，应当说从这时就有了积累了。”<sup>20</sup>写作组还组织大学教师去生产建设兵团搞函授教育，知识青年来信说函授教育是“雪中送炭”，为他们“红在农村，专在农村”提供了帮助。写作组还派人负责去江西、安徽、云南联络函授教育的事情，在《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教师的函授《日记摘抄》、《赣南记行》、《西双版纳来信》、《灵璧夜话》单篇或长篇连载文章，都反映了函授教育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史讲义》是作为上海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的。1971年5月，写作组为张春桥写了《纪念中国共产党50周年》，朱永嘉就向张春桥提出是否要编中共党史？张春桥说：毛主席对写中共党史没有兴趣，说写了以后人家还会改的，斯大林搞的《苏联共产党（布）党史简明教程》，还不是被赫鲁晓夫反了，另搞了本《苏联共产党历史》。而且中央暂不会编写党史，因为原来负责此事的董必武、康生，如今年纪都大了。但张春桥又认为，有一部党史比没有好，即使以后被反掉，毕竟也还是留下了文字。张春桥还说，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地方先搞起来的，以后斯大林过问了，这本书就成为苏共党的历史了，所以要搞你们自己搞，地方先搞起来，将来中央再搞。中央搞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各地编的党史挑选一本最好的；二是从各地党史班子中选人到中央来编。<sup>21</sup>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地方可以先编写党史教材的意见。7月21日，上海市委写作组在历史组下成立党史组。朱永嘉是研究历史的，他的愿望是上海能编写一本被中央选中的中共党史。1973年，写作组完成了第一版党史书稿，张春桥看后，认为没有摆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从概念到概念，理论到理论，枯燥乏味。他建议写党史也要向《史记》学习，要写得生动具体，有情有景，引人入胜。<sup>22</sup>朱永嘉于是决定先按人物、事件、类型写，编写通俗小册子，待成规模后，再回过头写党史。就这样，他们先后编写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方志敏》、《五次反围剿》、《蒋经国在赣南》、《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陕北“蘑菇战”》等通俗小册子，作为“中国现代史丛书”出版。与其他地方史不同的是，上海的写作组利用独特的资源，开辟了

过去没有涉及的领域，如研究汪伪时期的历史。此时上海监狱还关押着一批汪伪时期的当事人，写作组便与监狱联系，希望让这些人写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中的一些历史细节后来被写进党史中。

在文革批判一切、独尊毛泽东的语境中，写作组的这本党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只见毛泽东不见其他领导人。大批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功臣宿将甚至朱德的名字都被抹去，相反，名不见经传的张春桥、江青却都作为功臣写进了党史。

朱永嘉给姚文元送去《党史》初稿五部，给张春桥送去三部，并讲了编写的情况。张春桥看了后，前后几次发表了意见。1973年1月6日，姚文元在朱永嘉给他的信上批示说：“未看。建议谨慎从事，征求意见，不要发出。若有提到我的名字处一律删去。”朱永嘉在信中说：“特别最后一章，最少把握。”姚文元在“最少把握”下划了一道杠，并批注：“如无把握可以暂不印。”从中可以看出，朱永嘉急于出书，而姚文元则采取谨慎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报刊上的文章批判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御用工具”。对此，朱永嘉回应说：“写作组是被御用的，这非常明确，我们是赤胆忠心为毛泽东服务的；但它还是个学术团体，我们在思考问题。有些选题是从毛泽东那里通过张、姚布置下来的，有些选题是我们自己讨论、分析、思考后形成的。我们这样做了，至于上边怎么用，能用多少，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sup>23</sup>

### 张春桥、王洪文之间的裂痕：“《朝霞》事件”

1974年的“《朝霞》事件”，是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王秀珍与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场火并。1974年，《朝霞》第一期发表了夏兴的《初试锋芒》和姚真的《红卫兵战旗》。《初试锋芒》批判文革前的民兵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形同虚设；歌颂今天的民兵，活跃在街道里弄，配合公安局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成为公安局的好帮手。《红卫兵战旗》写了一个红卫兵头头，为了庆祝自己领导的一派成立半周年，差一点影响了大联合。

工总司头头戴立清读了这期《朝霞丛刊》后，就拿着杂志去找工总司核心成员之一的黄金海，说《红卫兵战旗》这篇小说有问题，里面重提半周年纪念这件事。半周年纪念和工总司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篇小说会触动他们的神经？在一月革命期间，工总司曾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有60万人参加，受到张春桥批评。事隔7年，《红卫兵战旗》虽然写的是红卫兵一个组织搞半周年纪念活动，却揭了工总司的疮疤，他们能不恼火吗？

黄金海看了小说后，拍着桌子说：“这是影射攻击我们工总司，这不是揭疮疤算老帐吗？”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等工总司成员拿着这一期的《朝霞》去找市委书记马天水和王秀珍，提出要批判《朝霞》。后来，他们还向上海市委写了报告，要求对《朝霞》进行全面调查。

王秀珍首先批示：“《朝霞》的问题很严重，要好好清查，停刊整顿。”马天水看到王秀珍态度强硬，便签字表示“同意”。写作组是徐景贤造反起家的地方，写作组的成员把他当作兄弟，按理说，他应该对《朝霞》拉一把，起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徐知道工总司不是好惹的，于是就签字：“同意秀珍同志意见。”

朱永嘉此时很紧张，他跑到王秀珍那里打招呼，一切责任由他负责，但王秀珍不理他这位臭老九，<sup>24</sup>气呼呼地说：你们这些摇笔头的人，写个检查，还不是家常便饭，想就此了事，不行！朱永嘉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他指定专人每天写一份简报，向张、姚报告事件进展的状况，又要王知常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反映写作组成员对此事件的看法。但是接连几天，发往北京的信件和简报，张、姚都没有反应。这使朱永嘉感到脚跟不稳，他们虽然是臭老九造反派，却还是斗不过工人造反派，就和《朝霞》主编陈冀德商量向工人造反派让步，争取妥协。可陈冀德是位外柔内刚的人，她不接受朱永嘉的让步政策，不肯向工人造反派低头。陈冀德以市委写作组和徐景贤的老关系，找到徐景贤的家里，徐和她打哈哈：有些事情，我不便对你说，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不管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朝霞》的停刊整顿势在必行。这件事恐怕还不仅仅是王秀珍的意思。陈冀德当时骂徐景贤是叛徒。

徐景贤虽然没有把背后的事情和盘托出，但陈冀德听懂了，王秀珍

背后还有王洪文，《朝霞》停刊整顿是王洪文的意见。王洪文此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陈冀德坚持不检讨，朱永嘉拿她没有办法，只有让她暂时回避，而派余秋雨去主持《朝霞》的工作。几十年后，余秋雨提到这事件还有些怨气，说朱永嘉要他去那里顶住，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朱永嘉说：哪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只是让他临时去主持一下工作，我们都顶不住，他哪里能顶得住？

陈冀德想起在北京的萧木。她给萧木写了一封长信，只想将心中的愤懑之气一吐为快，并不是要萧木帮助解决什么问题。萧木这个时候正辅导王洪文读书，此外还要辅导陈永贵、吴桂贤读书，实际上又兼着王、张、姚三人的秘书工作，即使不告诉他，他也不可能一无所闻吧？<sup>25</sup>

最早批评工总司搞半周年纪念的是张春桥，现在王洪文、王秀珍要批《朝霞》发表的《红卫兵战旗》，不是批到张春桥头上去了吗？但是开始时张春桥并没有表态，他是担心陈冀德反映的是片面之词。后来姚文元的秘书胡鼎钧搞到工总司批判《朝霞》大会的入场券，何秀文把这张入场券连同这期《朝霞》杂志一起送往北京。张春桥看后认为事情的原委已经搞清楚，他已经摸准了王洪文对《朝霞》停刊整顿的态度，才把萧木找去。

深夜，萧木从张春桥处打来电话，陈冀德接电话。平时讲话温和的萧木在电话中以生硬而又严厉的口气说：叫朱永嘉听电话。朱永嘉接了电话，萧木在电话中传达了张春桥关于《朝霞》的意见：陈冀德不用检讨，他看那两篇小说也没有什么问题。有关《朝霞》的问题他已经给市委写了信，以市委第一书记的身份表态了。过了两天，张春桥写给马天水的信传到上海。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一)《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二)如果要批，需要请示市委。

(三)这期《朝霞》准备批解放军文艺文章，不要发表。

(四)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不要推给写作组。

如同意，请转朱永嘉同志。

张春桥

1974年4月12日<sup>26</sup>

张春桥又说：

我是市委第一书记，责令《朝霞》停刊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以后凡属工作上的差错，不要把责任推给下面，责任应在市委，首先在我。<sup>27</sup>

张春桥在给马天水的信中又附了一张条子：

天水同志：

此件本想答复朱永嘉同志，现在考虑还是寄给你，请你给秀珍、景贤、朱永嘉三同志一谈，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春桥

1974年4月9日<sup>28</sup>

按规定，萧木辅导王洪文读书，和王洪文接触的时间最多，而《朝霞》和萧木的关系又极为密切，其停刊整顿一事却让萧木知道，可能是因为萧木和张春桥很接近，所以不让他看工总司有关《朝霞》发表两篇小说的材料。这表明王洪文对张春桥心存戒备。再说张春桥在信中写了“我是市委第一书记”这样很有分量的话，意思也在告诉王洪文，上海的事还应当由我张春桥说了算。

张春桥的信写于4月9日，发出的时间是4月12日。发信时，他又附了一张条子：

何秀文同志：

材料收到，请你把工总司的刊物从创刊号给我找一份。团市委那个简报也找一份，如果能找到有关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来龙去

脉打听一下。老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然，你要谨慎，只听不说。

张春桥

1974年4月12日  
又是这个日子<sup>29</sup>

4月12日是张春桥最为忌讳的日子。1968年4月12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炮打张春桥事件，他至今记忆犹新。张春桥之所以说“又是这个日子”，是因为当时社会上传出工总司要用“《朝霞》事件”再次炮打张春桥，或许他也感到工总司对《朝霞》的批判会给他带来不利。

工总司的头头们听到把《朝霞》的事和炮打联系起来，一下子掉进冰窟里。王秀珍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解释：“我们怎么会‘炮打’张春桥同志？！”本来准备走马上任接管《朝霞》编辑部的工总司成员，顿时解散，市委写作组的臭老九们马上又神气起来，得理不让人，说什么：这纯粹是一场夺权的政治事件，打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旗号，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而进行的一次前哨战。这场后院起火，很快就被张春桥摆平了。

就“《朝霞》事件”，马天水、徐景贤等曾与朱永嘉谈过一次话。朱永嘉在给张春桥的信中汇报了这件事，并表示自己无法工作了，要求辞职。张即要朱将谈话情况寄给他看，并在朱永嘉的信上作了批语。

在朱写的“市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分别找我谈了话”一句旁，张春桥批语：“我需要了解谁找你的，谈了一些什么。自我批评的内容。”在朱写的“外贸如何支援国内工农业生产的问题”一句旁，张批：“这个题目，我有兴趣。”在朱写的“有关工人队伍调查的基本情况，我们也想重新作一次调查”一句旁，张批：“同意。”在朱写的“深感要真正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很不容易的”一句旁，张批：“本来就不容易。”在朱写的“有些同志评价或处理问题的标准往往不是凭是非，而凭势力”一句旁，张批：“不一定是这样。”

张春桥收到朱永嘉的情况汇报后，于1974年11月1日批曰：“谈话

情况已阅。此事也就告一段落，你们不必再催问他们了。如有新情况，可告我。希望你们团结起来。”<sup>30</sup>张春桥不但没有同意朱永嘉辞职，反而给朱永嘉加了一级，让他成为市委列席常委。

从张春桥的批语中，我们可看出“《朝霞》事件”在他心中留下的影响，以及他对上海市委那些人的警惕；从中也可看出，朱永嘉在张春桥心中的重要性，以及张对市委写作组在思想上管理的严谨，并不像朱永嘉说的那样，张春桥对他们放手，不大过问写作的具体事宜。

“《朝霞》事件”后的第二年春天，工人造反派感到写作组办的刊物他们插不上手，就自己搞了一本文艺杂志，取名为《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第一期就送到张春桥的手里。他看了之后，于1975年5月19日给王秀珍写了一封信，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刊物是什么时候筹备的？上海总工会讨论过没有？报告过市委没有？主要编辑人员是什么人？他们有些什么打算？这个刊物出版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总之，我有些想法，等你调查清楚后再说，免得犯杞人忧天的错误。<sup>31</sup>王洪文的小兄弟们想不到他们的小小刊物一问世，就被张春桥盯住，几个问题一提，就决定了刊物的命运，立即停刊了。

张春桥在处理“《朝霞》事件”时，尽量缩小触及范围，没有进一步深入追查，算是给王洪文留下面子；王洪文开始时只是没有政治经验，知道利害关系后立即改正过来，也算是做了让步。这样“《朝霞》事件”算是平息下去了，但实际上双方心中都留下阴影，隔阂难以消除。此时已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不能不感到张春桥的厉害，今后如何摆脱张的影响和控制？已经读了一点史书的张春桥也可能会想到吕不韦的教训，王洪文一旦成为当今的秦始皇，说不定会像秦始皇对吕不韦那样，把自己逼上绝路。<sup>32</sup>

## 从毛泽东要求注释的古文中学到了什么（上）

“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走向失败。毛泽东认为他一生中做的第二件大事，竟然留下了一副烂摊子。与此同时，中苏

危机也在加深，内忧外患。毛泽东痛定思痛，要调整策略，收拾旧山河。

毛泽东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有所偏爱的人，他一生之中，每遇到重大问题时，除了讲马克思，更多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吸取智慧，走出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然而文化大革命及最高领导人钦定的接班人的出逃，在马克思著作中也找不到论述。而且他也老了，再也不能思绪奋发，指点江山，化险为夷，只有从中国古书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启发诱导他身边的功臣宿将和造反新贵，让他们把人们混乱的思想、可能发生的动乱局面稳定下来。然而，手不释卷的毛泽东，这时患了白内障，书橱中那些线装书更是字迹昏黄不清，无法阅读，于是就出现了新编的注释大字本。所谓大字本，就是比一般书籍的字体大一些的本子。

为毛泽东注释古籍大字本，这可是举旗子的工作。北京是近水楼台，人才济济，但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个机会交给江青控制的“梁效”，而是交给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张、姚把这个任务直接交给了朱永嘉，连市委主管文教的徐景贤都不知情。具体选择哪些篇章，都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交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然后再由姚文元负责交给朱永嘉承办。说得具体些，毛泽东随时需要的篇章，姚文元会直接迅速地通知朱永嘉，或者在朱永嘉向姚文元汇报工作的信件上批示给他。然后朱永嘉再将注释和重印好的大字本，以及自己的附信，通过机要交通专程送到北京钓鱼台姚文元处。最后，由姚文元呈送给毛泽东。这正是张春桥在“后院”为毛泽东做的最体面的事情，对提高和稳定“后院”的地位，有着积极作用。

为毛泽东注释古典诗文，具体工作是写作组历史组王守稼负责的，他去组织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者谭其骧、陈守实、杨宽、王运熙、章培恒、胡裕树、顾易生、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等教师，这时章培恒还因受“胡风分子”贾植芳的牵连在资料室坐冷板凳。写作组历史组的许道勋、董进泉、吴乾兑、刘修明等人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主要是奔走于这些教师和印刷厂之间，组织校对工作。最后由朱永嘉和王知常审定文稿正式付印，再送给姚文元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选择哪一篇古文来读，为什么要读，从未透露过其用意。朱

永嘉注释的古典诗文毛读后有什么说法，姚文元也从未向他们说起。后来，张春桥、姚文元来上海，偶然向朱永嘉等透露：他们注释的古典诗文大字本，毛已批示让政治局成员阅读。朱永嘉认为他们直接为毛服务，还是很自豪的。但他们不一定理解毛运用古文攻守自如的策略。

以《毛泽东年谱》为根据，结合这些古文的注释时间来看，大致可以猜出毛泽东当时的心态。据《毛泽东年谱》所记，毛泽东指示注释古文最早的时间是1972年9月，即《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诸传。晋室南渡后，北方前秦皇帝苻坚的入侵成为最大的威胁，晋室处于危机之中，谢氏叔侄及桓伊受命抗击，淝水一战使晋室转危为安。这是小学生读历史都熟知的故事。如果毛泽东本人阅读这些古文，是不需要注释的。他是让周恩来和政治局的人读这些传记。“九·一三”事件过去不久，国内局势很不稳定，北边又有苏联大军压境，毛泽东感到中国局势处于危机之中。如果根据这样的社会背景来解读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就不太难理解了：他应该是希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能像谢安、谢玄叔侄一样胸怀大局，共渡难关。

此外毛泽东还让周恩来读《傅奕传》、《汲郑列传》，要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让姚文元读《李袭吉传》，唯独没有指定张春桥读哪一篇古文。<sup>33</sup>其实，张春桥古文水平不高，当年他初到上海时是文学青年，搞新文学，还为注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闹了笑话。<sup>34</sup>去了延安之后，就精心读马列及毛泽东的著作，对中国史书读得不多，对中国历史也没有深入的了解。但至今还没有看到毛泽东让他读古书的记载。

张春桥参加了毛泽东安排的政治局的活动，也听到毛泽东运用古人的经验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案例。他也会根据毛泽东选择某篇、某组古文的时间，并结合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以及自身的处境，大体可以知道毛泽东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想些什么，要处理和解决什么问题，要借助这些古文宣泄内心的什么感情。

毛泽东晚年读的86篇古诗文，大体可以分为历史故事（包括人物和事件）、策论、哲学及诗赋。从其作用来说，那些历史故事在理解当时人事关系的调整方面有重要启示。林彪事件把毛泽东的部署全部打乱

了，需要来一番大洗牌。策论是讲权术的，主要是法家的权术，讲古代安邦治国的道理。哲学主要是“问天”、“天对”，无法求得证实与解答，有利于根据政治需要作出解释。这三者都是毛要求添加注释后要其他领导人看的，毛自感运筹帷幄的旺盛劲头已去，要从历史的经验中求得权力的稳定结构。

从《毛泽东年谱》可以看出，随着毛泽东一天天衰老，他读书的兴趣也在发生变化。1972年读《晋书》中的几家传记，1973年他读书的注意力即转向《史记》和《三国志》的列传，关心秦汉之际及三国争雄时的社会变化，可能是想从以历史上的分裂到统一，从乱到治的经验中汲取一些教训。1974年他的注意力又转向先秦诸子，尤其是法家著作。

其实，以读史论政治国，这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他把一些大字本批示要政治局成员阅读，然而真正按照他的意见去读书的没有几个人，也没有几个人能领会那些古书所讲的策略对现实的政治有什么用处。对这些古书的选择中，能明显表现出毛泽东意图的还是为秦始皇正名。毛泽东一向推崇秦始皇，称他为千古一帝。而真正把他刺痛的还是林彪事件之后，他发现林彪在台上呼他为英明领袖，而私下里则把他比作秦始皇，尤其是《“571工程”纪要》称他为“秦始皇式的暴君”。他要为秦始皇正名，除了赠诗郭沫若“劝君莫骂秦始皇”，还要朱永嘉他们注释柳宗元的《封建论》、《咏荆轲》，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sup>35</sup>毛泽东这样集中地要求注释这些肯定和赞扬秦始皇的著作，一方面是对林彪的回答，另一方面是要更多人的了解他心目中的秦始皇，接受他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混合式的政治体系。

1974年至1975年，毛泽东的阅读兴趣完全转向六朝赋及宋词。可以这样认为，唯独诗词歌赋是毛泽东留给自己看的，而这一部分又恰恰是他心境的真实反映。先说毛泽东选的词，多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作品，他认为自己就是豪放派词人，这时他对北宋豪放派的词选得不多，而是偏爱南宋豪放派的词。他最欣赏洪皓的《江梅引》。洪皓是写《容斋随笔》的洪迈的父亲，出使北国，作为人质被扣留下来，其词中虽有“使南来”、“思故里”的思乡情怀，但整个词情绪低迷，有着失意人的“哀

怨泪沾衣”。<sup>36</sup>其他如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虽然都是主战派，经历了靖康之难、汴京和中原的沦陷，然而主和派秦桧当道，在主战的问题上，他们都是失败者，心情是失意而忧郁的。<sup>37</sup>即使像辛弃疾以豪放为主调的《破阵子》词，也是梦中豪情，醒来时无限伤感，“可怜白发生”。这些词都抒发爱国情怀，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从当时的世界格局来看，美、苏主宰世界，中国的处境是否类似于偏安的南宋呢？张元干的《贺新郎》词，本是为“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而作，“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读起来够伤感的了。董必武去世，毛泽东将词中“举大白，听《金缕》”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他反复吟咏，热泪盈眶，既是惜别，更多的是伤感。元代诗人萨都刺的词选了三首，对《木兰花慢·彭城怀古》一阙，毛泽东评论说：“萨都刺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思故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sup>38</sup>说明萨都刺的伤感情调和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是脉脉相通的。

## 从毛泽东要求注释的古文中学到了什么（下）

在毛泽东要求选注的古典诗文中，六朝的赋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些赋对人生感怀、睹物伤神的情调比宋词更为明显。毛泽东要标点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恨赋》和《别赋》。这五篇古文标注在时间上要求很紧，要一周内即送上。于是，朱永嘉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章培恒、顾易生等几位老师加班标点注释。根据张贻玖的说法，毛泽东的卧室里有两本大字排印的江淹的《恨赋》和《别赋》。<sup>39</sup>封面都是红笔划的大圈。这是毛泽东在病重时常读的书，有时还在背书。这几篇赋陪伴着毛泽东走到生命尽头。

《月赋》是谢庄的代表作。赋的主题讲的是陈王曹植和游子王粲，他们的地位、生活及境遇虽然不同，而在“凉夜自凄”、“微露沾衣”的月夜，都有“亲懿莫从，羁孤递进”的孤独感。<sup>40</sup>毛泽东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个垂暮的老人，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一生做的第二件大事又接连失

败，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读《月赋》产生共鸣，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江淹是南朝跨宋、齐、梁三朝的文学家，《恨赋》和《别赋》是姊妹篇。《恨赋》写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衍、嵇康等六人对生死的感慨。<sup>41</sup>这些恨之所以为恨，是由于各类人平生夙愿得不到实现而抱恨，最后只能是“自由皆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这话应该是打动了毛泽东，江淹《别赋》的名句是“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和《恨赋》相比，《别赋》写得更加细腻，委婉动人。人总是贪生而怕死，喜聚而悲别，毛泽东也是这样，他预感到来日无多，生命将走到尽头时，瞻前顾后，感到“人生到此，天道宁论”，除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给毛泽东留下印象最深的要算庾信的《枯树赋》了。庾信，字子山，与同时代的文人徐陵齐名，诗文艳丽，开宫体诗的先河，故世称“徐、庾体”，当时学子竞相模仿。庾信在南朝梁元帝时期任御史中丞，奉命出使西魏，由于他有才气，即被留在西魏都城长安，虽然位望显通，但常作乡关之思，《哀江南赋》和《枯树赋》都是庾信赋中的名篇。《枯树赋》通篇是讲树的由生而死。树为什么会死呢？前人的解释是，人们把桂和桐从河东、河内、河南的旷野之中，移栽于洛阳的建始殿及皇帝的御苑之中，伤了它的根须，所以要枯死。朱永嘉他们从传统的“移植说”作了注释，根据庾信原作意译为“树木被移植，和原产地区隔绝，移植时被拔本伤根，因之垂泪沥血”，很符合庾信《枯树赋》的原意。毛泽东读了这个注释的本子，不同意移植说，而认为是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和移植无关。<sup>42</sup>毛泽东的这种解释和庾信的原意有些不符，这完全是从他个人的斗争经历中得到的感受来作解释，这叫文为所用，意由己出。在注释中本来就有这种学术流派。

江青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将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几篇赋交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梁效大批判组。该组写了《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认为《枯树赋》注文与原意有不合之处，《恨赋》和《别赋》个别注释较简单。江青将这些材料写了报告给毛泽东，不久，毛泽东作了批注，曰：

此注释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芦荻。<sup>43</sup>

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地研究。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sup>44</sup>

1975年9月，上海市委写作组为此写了一份报告，对《枯树赋》等注文与毛意不合之错误的原由和有关问题，作了详细分析和自我批评。由于江青的插手，上海市委写作组也不敢与梁效大批判组争短长。自此以后，上海市委写作组没有再接毛泽东布置的注释古文的任务。

毛泽东对庾信的《枯树赋》情有独钟，这首赋他早已熟读过。1976年，毛泽东又要秘书张玉凤把《枯树赋》找出来，他躺在床上，让张玉凤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闭着双目，似乎在体会着《枯树赋》的情景。之后，他自己背诵，都能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地背诵全篇。<sup>45</sup>《枯树赋》最后一段文字，才是作者对自己身世的感慨，也是对毛泽东触动最深之所在。赋文曰：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乃为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毛泽东读古典诗文也不都是有什么政治喻意的，他懂古典文学的艺术性，有时也带着欣赏的心情去阅读，为作品的艺术魅力所打动。他让人选注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南宋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用词很普通，把少年什么都不怕的心气写出来了；“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江阔”活动的天地大了，“云低”非奋斗不可，表达了壮年的担子重，责任感。毛泽东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词句，显然是受“断雁叫西风”之句的影响，都是写自己的情感。词的下半阙“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即一切要解脱，要放下。像毛泽东这样以斗争

为乐的人，到了晚年也要落在中国传统的情怀里，“悲欢离合总无情”了。蒋捷的此词形体粗大，但在质地上写得很细腻，而且是越到后面越细腻，艺术性极高，可谓是前无古人之作。毛泽东欣赏蒋词也是从此处着眼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选的古诗文，不但词中有“铁甲重瞳，乌骓汗血”项羽的事，而且还专门选《史记·项羽本纪》让政治局的人读。毛泽东不止一次叫干部读《项羽本纪》了，而此时读项羽的故事，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可不可以这样说，项羽失败的教训，与毛泽东文革的失败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毛泽东或许是借项羽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来表述他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笔者这个分析是有旁证的。南朝梁武帝利用天时地利之机，始用汤武之师，终成霸业；后来礼佛不理朝政，霸业成空，由自己而得，由自己而丧，史论作者评论说：“岂曰人谋，亦由天命。”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批注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sup>46</sup>

毛泽东曾多次用项羽失败的例子教育干部，说：“不让人讲话，难免自己会垮台，会霸王别姬。”<sup>47</sup>而此时毛泽东让干部读《史记·项羽本纪》，会不会又想到“霸王别姬”的故事？所以他对江青说了“我死后你怎么办”的话，这不是批评，而是作为丈夫对妻子的关心，虽然他们从1966年就开始分居，但他们毕竟还是夫妻。而江青与虞姬的最终命运竟然也惊人地相似，只不过虞姬是在项羽生前于帐中刎剑身亡，江青是作为毛泽东的遗孀，判死刑又减刑后在保外就医期间上吊而死。

毛泽东不仅要人注释古典诗文，他还让人吟唱。张春桥让徐景贤把上海的京昆剧演员俞振飞、岳美缇、蔡瑶铣、计镇华、王芝泉、方传芸、张美娟、方洋、刘异龙等调往北京，为毛泽东录制诗词吟唱，以后又扩展到北京戏曲界，李少春、李金泉、赓金群、高盛麟、洪雪飞等名家都曾参加录音。古典诗词录制好后，除了送给毛泽东一套，还送给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套。

这个工作延续了几年，有的是张春桥亲自主持，有的是交给别人办理，但是没有发现毛泽东要他读这些史书、诗文的资料。虽然如此，张春桥不会不去想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些诗文来读，不会不去理解

毛泽东此时的心态，也不会不从中接受影响。然而他到底接受了哪些影响，他到底有什么想法，的确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也就不能作推理式的猜谜了。

## 萌发中的张春桥思想（上）<sup>48</sup>

张春桥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大秘书，也就把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与阐述当作历史的责任承担了下来。他执笔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阐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阐述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以及今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由他执笔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特别强调了反潮流精神。除此之外，上海市委写作组还遵照张春桥的意旨，作了许多专题的社会调查，朱永嘉还让《文汇报》、《解放日报》组织调查组，赴农村、工厂进行调查。他召集赴农村搞调查的人员说：我们要将两报所发的过渡情况编成一本书，要像毛主席编《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那样，每篇都写个按语，口气要大一点。

农村调查的目的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当时中央规定农村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谓三级所有，即生产资料归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及生产队三级所有。这是1959至1961年大饥荒之后，为了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及农民生活条件，改变大跃进时“一平二调”的状况，生产队提留要多一些。陈永贵的昔阳县大寨大队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及生产大队二级所有，剥夺了生产队的所有权。张春桥也设想在上海郊区试验作二级所有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周丽琴去北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见到张春桥，得知他正和周恩来谈上海搞“过渡”试点。朱永嘉得到这条信息后，即组织“过渡”调查。1975年4月，朱永嘉给张春桥写信，提出打算在上海县搞一个基本调查，如目前农村阶级关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各种表现，基层干部情况，要打击的是哪些，有多大的面等等。张春桥批示：“可以这样调查。萧木回上海前，我同他谈过，我仍然想调查上海工人阶级状况。现在我一时不能回上海。如果你们有余力，

组织几个人作些调查研究也好。还有限制什么、怎么限制，又要限制，又不要弄得太死。”<sup>49</sup>

当时的农村调查都是围绕着张春桥的这个思想进行的，分别在枫泾公社、练塘公社、钱桥公社、安亭公社、徐行公社、山阳公社及马陆公社展开调查，仅上海县农村就有八个专题调查报告：《关于农村各阶级地位的调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经济状况》、《关于农村社队工业问题》、《关于农村私有经济问题》、《关于农村住宅问题》、《关于农村货币管理问题》、《关于农村分配工作的若干问题》、《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调查，报告没有写出，因为“由于将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迟迟搞不出来”。《文汇报》也派记者分兵多路去作调查，笔者参加马陆公社的调查，只《文汇报》就写了40多个调查报告，讨论这种“过渡”的可能性。当时的调查有一个总的名目，称之为“过渡调查”。我们《文汇报》的人在调查中不太守本份，戏称之为“穷过渡”。

5月18日，朱永嘉召开了十一个大队和有关县社座谈会。会后，写作组会同市革会郊区组一起整理了《目前郊区十一个大队过渡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和《关于过渡问题座谈记录》，由朱永嘉于6月2日送给张春桥等。

这两个文件后面还有一个附件，讲了在过渡过程中要注意小杂粮种植和养鱼的问题。当时外地和上海关系紧张，不再供应上海芝麻、绿豆、黄豆等杂粮。上海人早餐常喜食大饼、油条和豆浆，此时不要说豆浆供应紧张，连大饼上撒的一层芝麻也供不应求。过渡调查有一个附件，专门讲利用农村的河边、路边、宅边的空地种芝麻、黄豆等杂粮，当时称之为“十边杂粮”。张春桥对这个附件发生了兴趣，1976年6月5日，他在附件上写下了批示，要朱永嘉“报市委马天水同志”，并写道：

我赞成对过渡问题采取积极态度，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现在是五个县、十个公社、十一个大队，今年秋后可否做到每个县都有试点单位？可否有几个公社全部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只是富社、富队，也要有穷队、穷社的想法如何，值得关心，不要两只眼

睛老是看着富社富队。作规划、试点，不要登报，不吹。我没有直接调查，瞎说一通，供参考。规划有眉目，要报中央。

在附件的另一页上又写下批语：

社队工业要发展，要帮助穷队，这都是对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社队工业，难道就不能过渡吗？这可能是全国性的问题。请考虑一下。<sup>50</sup>

朱永嘉听了这些指示很高兴，整理了三份材料上报，还要编一本如毛泽东写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那样的书，每篇前面都加上按语。这些调查报告都是纸上文章，没有经过实践，为了求得实际效果，6月17日，张春桥在朱永嘉的另一封信上批示：

为了使调查研究能有实际效果，这些材料，不管正确错误都要送市委（送给谁，请示马天水同志），请他们审查，提出意见。我已收到两篇，正在看，我觉得这次调查是有成绩的，比较细致。当然，分析得是否正确，还要进一步研究。

在这些调查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前进农场宣言》。前进农场地处长江口外的崇明岛。1960年至1962年，上海市组织三万多人的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围海造田，其中有机关、大学的干部、劳动锻炼的人以及要到农村务农的工人，在围垦第一线建立了八个国营农场，前进农场只是其中之一。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到来时，崇明岛的国营农场又是收留知青的地方，和去外地农村插队落户的相比，能留在崇明一些农场当一名农业工人，还算是特殊的优待。知识青年连同原来下放农场的工人子弟，使农场成了青年人的世界。但是国营农场办不好，存在着大量的亏损，国家每年要在国营农场花不少钱。当时农场中也流行着“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的说法，对国营农场去留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就在这时候，北京郊区的国营农场解散，变成了人民公社，农场工人变成农民。在这个背景下，上海前进农场发表了《前进农场宣言》。

笔者以往和朱永嘉交谈时，总感到他对《前进农场宣言》有着恋恋不舍的情结。2013年10月9日傍晚，笔者与他相遇，就问起此事，他向笔者道出了来龙去脉：

1974年，张春桥在我报送的一份材料上批示：“马克思主义怎么在国营农场上就失灵了呢？”后来，我们知道，北京郊区的国营农场的管理、种植、经营中的许多问题，年年亏损，农场工人和知识青年在那里生活无着，前途无望，农业部就甩包袱，把农场变成了人民公社。那时张春桥虽然是政治局常委，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北京说话没有人听，只好作些纸上谈兵。我理解他在北京的处境，这些批示，就是要我们在上海做文章。我们到上海郊区农场作了调查，除了调查崇明的农场，也调查了南汇的农场，感到上海郊区的农场也存在着去留的问题。比较下来，前进农场还是比较好的。我就组织人在上面硬做文章，写了《前进农场宣言》。

了解了《前进农场宣言》出笼的背景，笔者对《宣言》中原来不甚理解的一些话也就理解了。如“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农场，到底有没有优越性？这是一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国营农场这个问题上到底灵不灵的重大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这话真有点左派幼稚病的味道。农场办不好，农场工人没饭吃，这是事实。造成这种事实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不灵，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不灵”，而是“刘少奇、林彪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此说就未免有文革教条的味道了。

张春桥曾多次对徐景贤、朱永嘉等人表示，当前社会状况到底怎样，各个阶层、阶级到底想什么，他们与过去相比，到底有什么变化，我们应该心中有数。

## 萌发中的张春桥思想（下）

张春桥要朱永嘉做阶级关系变化调查。写作组遵照张春桥的旨意，先后作了三次调查。第一次是在1973年，由经济组、历史组去上海第

一钢铁厂、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搞工人队伍调查。这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也接到任务，笔者和报社的几位记者曾先后到上海二机床厂、上海元件五厂作工人状况调查。我们调查的主要还是1968年知识青年进厂后的情况。

各个组调查的专题有《老工人的思想政治状况》、《新干部队伍状况》、《工人出身技术员状况》、《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工人状况》、《退休老工人的作用问题》、《青年工人学技术状况》、《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女工健康状况》、《经济困难职工状况》。这些专题写出以后，选了几篇合印成一册上报。张春桥看了不满意，又召集各个调查组及一些工厂负责人开座谈会，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

文革中大量新工人分配进厂，许多出身其他阶级，对工人传统带来哪些有利或不利因素，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总感到各种工作中，没有这样基本调查，心中无底。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这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到底怎样？哪些东西对阶级的影响大，这属于我们工作的基本建设问题，心中要有数。企业管理不研究自己的队伍，不了解思想状况，阶级来源和状况，只能泛泛而谈。请工代会、工交组以及在座各位对本厂做些调查，了解你们一个工厂和一个车间，了解历史和现状。从阶级斗争来看，我们政策路线进行教育，有哪些人我们讲话有用，哪些人不听，都要通过这样的调查才能有数。

老人、青年工人只能说明自然状况，没有说明政治状况。青年要做阶级分析，也不能说所有青年工人都好，都不好；依靠老人，老人中间究竟什么状况，资产阶级思想到底通过哪些渠道影响我们工人阶级队伍？要做周密系统的调查，这种调查也说明对本阶级的认识是不容易的。<sup>51</sup>

张春桥对这次阶级状况的调查超乎寻常地关心。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到上海参加小组会，重提这次调查的事，说调查进度太慢，并说：工人阶级队伍的政治、经济、思想情况怎样？特点和弱点是什么？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是最有远见的，大

公无私的，但作为一个工人来说，只知道自己的工作，也会影响自己的世界观，很有局限性，很狭窄，不过这个问题不能拿到社会上讲。

第二次是1975年2月15日到3月上旬，写作组选择上海机床厂为调查的重点，着重调查工人干部队伍状况。他们把从工人中提拔上来的干部分成三种类型：1952至1957年、1958至1965年、以及文革期间提拔的。说第一类对苏联管理经验熟悉，用“一长制”来管工人，搞“管、卡、压”起劲，喜欢搞物质刺激；第二类干部有旧观念，留恋过去的规章制度，在文革初期站错了队；第三类干部有造反精神，党的观念差，家庭政治历史有问题，少数人没有过好劳动关。材料上报后，张春桥说材料“说明了一个方面的问题”。于是，他们继续深入调查了上海机床厂第二车间工人队伍的状况。调查的材料和观点基本和上次调查相同。这两次阶级状况的调查，都因为计划不周密，调查得不深不细，张春桥认为不能说明问题，就不了了之。

文革期间，上海的花园洋房有的主人被扫地出门，空关着，有的被房主单位的职工抢占，出现“七十二家房客”的状况。<sup>52</sup>对如何处理这些花园洋房问题，市委写作组做了调查，朱永嘉向张春桥、姚文元送了9份调查材料，他们指示：“政策应当如何，值得加以研究。”<sup>53</sup>

到1976年5月3日，张春桥要陈冀德、朱永嘉搞阶级关系变化调查，陈冀德转告朱永嘉，朱马上又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把它当作是张春桥交办的任务。朱永嘉还给张春桥写信，说前两次调查，“都由于没有摸清盘陀路而遭失败，这回决心三打祝家庄，搞好这次调查”。<sup>54</sup>6月12日，张春桥在朱永嘉的原信上作批示，其中说自己在重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状况，真是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当搞清楚。<sup>55</sup>朱永嘉组织调查队伍，确定调查工作的四个步骤：第一步，先调查老资产阶级状况，第二步调查知识分子，第三步调查工人，第四步调查干部中的走资派。有关城市工人队伍及农村阶级关系的调查，张春桥在朱永嘉的信上写了批语：“调查，不要太匆忙，免得搞一些片面的东西。”<sup>56</sup>这是要朱永嘉他们接受前一次调查未能摸清盘陀路而遭失败的教训。

尤其是第四步调查干部队伍状况，张春桥曾提出，毛泽东所认为的

“新生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概念，在现实中指哪种类型的干部，这些都要调查清楚。张春桥希望能写出这样的调查报告。所有调查中，这才是真正切中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命脉。但对这个调查，朱永嘉觉得不好办，因为首先确定调查对象就是个难题，调查那些“革命老干部”很敏感，他有后顾之忧，担心“革命老干部”重新掌权后，他们就会遇到麻烦，所以没有进行。朱永嘉透露，调查到最后，可能由张春桥写成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级分析》。这应该是“张春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1976年9月，第三次调查进入到第二步，即对知识分子的材料的分析，但是不久，北京传来张春桥他们四人被抓的消息，调查也就终止了。

如果说有一个张春桥思想，那么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张春桥思想体系中的理论支持，过渡调查以及阶级关系变化调查都是为证明这个理论的重要性而做的具体工作。1975年，张春桥撰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及姚文元撰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都重点讲了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关系。张春桥在文章中又着重讲“过渡”问题，他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这正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也是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林彪集团正是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他和周恩来长谈至深夜。长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透露，这次长谈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事安排，一个是理论问题。<sup>57</sup>张春桥、姚文元的上述两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仍然是对毛泽东讲话的阐释。张、姚两篇文章的核心都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1976年2月底，在张春桥的授意下，写作组还召开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宣传、文教系统代表以及工农兵业余理论、创作骨干代表120多人，连续座谈了几天，会议主题就是“老干部是如何变为走资派的？”还讨论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在哪里？资产阶级及民主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和文艺路线如何深刻反映社会主义

社会的阶级关系，怎样分析和写好走资派？会议讨论的结果形成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新认识。

此外，在他们主办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上，连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除了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体会文章外，还发表了《论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通信》的长篇连载、《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漫话城乡差别》、《商品自述》长篇连载、《漫话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产生》、《定额制和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阐述“民主派与走资派”的问题。这些文章一时都成了《学习与批判》的重头文章。

张春桥不只是在理论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而且他曾一度想在上海恢复供给制。马天水遵照他的旨意，要计划部门对上海干部实行供给制做一个测算，测算结果是如实行供给制，其开销要超过现行工资制的好多倍。马天水于是回答张春桥说：如果实行供给制，上海养不起这样多的干部。因此，张春桥的想法只好作罢。

所谓“张春桥思想”其实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他要继承毛泽东思想；离开毛泽东思想，看不出他有什么新的理论，更谈不上有什么新的发展。但是，他有时更激进，不只是脱离实际，而且给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张维维对张春桥的评论是：“我爸爸是有想法的，但他的想法不是与时俱进，也不像别人能随机应变，在政治上他不是那种有奶就是娘的人，搞什么供给制，很留恋，几十年不变。我有时说他的思想不变，他回答说为什么要变。可能就是因为他的不变，毛泽东才注意他。”<sup>58</sup>

如果说张春桥有“政治野心”，也是从他要创建“张春桥思想”开始的。玩枪杆子，他玩不过那些元勋，但他可以发挥理论上的专长，通过理论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的想法应该是有的。

1976年10月，苏振华等来上海主持工作，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1977年3月1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奉为“张春桥思想”。他们说“张春桥思想”是对阶级关系变化的“新发现”，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新贡献”，“超过了”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

朱永嘉从监狱里出来之后，笔者曾把苏振华的这段话给他看。他看后说：我们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是很推崇，的确曾为张春桥的一些想法推波助澜，但当时在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张春桥思想”这样明确的概念，而且我们不会说什么“第四个里程碑”这种傻话，这些话在当时也是很犯忌的，什么“新贡献”、“发展了”、“里程碑”，在当时是一种无知的妄言，我们会这样说吗？

## 后院的社会文化生活

“稳定上海，搞乱全国”，这是1976年之后批判张春桥的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他要搞乱全国，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上海对全国的支援仍然是按国家的要求，一点也不能少。主管经济的马天水说：除了国家规定分配给上海的物资，其余的都要按国务院的要求调拨全国，我连支配一根日光灯管的权力都没有。说张春桥“稳定上海”，这话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的确还没有忘记上海市民的生活。前文有述，一次他和姚文元来上海，发现市民的餐桌上没有鱼，经向有关部门了解，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下达指示：渔船不要出海。张春桥不管什么人指示，要求渔船都出海打鱼。后来可能对谭震林提出了批评，所以1967年2月16日在怀仁堂开会时，谭震林说：“捕鱼的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sup>59</sup>这应该是张春桥稳定上海的一例吧。

不管是文化大革命，还是武化大革命，人民还是要生活的，还要吃饭、穿衣、出行，即使在动荡的环境中，还期望着安定的生活。和其他地方相比，上海人生活精致、优雅、闲适又讲求品位，在这样的生活宗旨要求下，常以不变而应万变。他们会将革命浪潮加以改造，既不与革命潮流相对抗，又蕴含上海固有的传统内涵。人们的穿着是最敏感的，常常随着政治变化而变化，“上海人没有不敢穿的衣服”，即使在政治最严峻的革命时期，也还是这样。当时流行的军装、军大衣、军帽、军用挎包等，经过重新设计，都会改头换面变成适合上海人的身材、生活习惯和审美眼光的新样式。

生活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有时并不是随着时代风尚的改变而改变，在文革那样严峻的时期，奇装异服是要受到批判和抵制的，但是上海人仍然是穿着各式各样的裙衫、瘦脚裤，梳着各式烫发头。这样在人民生活中，抵制与反抵制是经常发生的。有这种抵制就说明上海人仍按照生活惯性在生存着，即使革命行动，也难以完全改变这种惯性，无法完全限制人们选择的自由。这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内的一点宽松，给人们一点释放的空间，对稳定上海还是起作用的。

上海不能乱，在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时期，这一点很明确，做法也很坚定。如前文提到的“炮轰南京路”，这是造反派的行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只是可能引起风抢南京路上的商店，而且会把上海的商业结构系统打乱。并不因为是造反派的行动，张春桥和上海市委就支持，而是马上制止，保证了上海商业的稳定。“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一提出，上海市委就马上纠正，阻止这样的宣传，也不许菜农变为种粮食的农民，都是为了保证对上海市民的蔬菜供应。

在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上海译制参考片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1971年开始，上海译制片厂正式从事内部参考片的译制工作，陆续译制了几部日本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如《虎！虎！虎！》、《日本最长的一天》以及《啊，战友》。周恩来说，译制这些影片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做参考的。后来又译制了好莱坞二十世纪三四十代的大量作品，如《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琼宫恨史》、《春闺泪痕》、《农家女》、《巴黎圣母院》、《化身博士》，以及近期拍摄的《音乐之声》、《简·爱》等。其间还有意大利、德国与罗马尼亚合拍的《罗马之战》、墨西哥的《生的权利》、日本的《绝唱》、苏联的《红苔》、英国的《铁道儿童》等。虽然是为政治服务，但也确实译制了一些很有艺术价值的影片。当时，社会上也可偶尔看到个别的参考片，引起赞扬。

毛远新在辽宁搞大学下乡，创造了朝阳经验时，北京及其他省市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都纷纷搬迁下乡。朱永嘉请示张春桥，上海要不要学习朝阳经验，把大学都搬到乡下去，在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上海不宜学习朝阳经验。张春桥同意了朱永嘉的意见，上海的大学及研究机构才没有搬到农村去。

经历了红卫兵大串联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百年历史的上海火车北站已经明显不适应客运的要求了。是扩建老北站，还是重建新车站？在酝酿讨论方案时，张春桥提出要重建新的火车站。新车站的地址原来选在龙华站，报告送给张春桥，他乘车亲自察看，认为如新车站在龙华，南来北往的乘客到老北站去，就得从龙华站转车，背着大包小行李极不方便。经过查看，他提出在上海火车东站建设新车站。火车东站本来是零担货运车，位置恰好在Y形的沪杭沪宁两条线的交汇点上，从南北方向来的客车到了这里，不出站就可以转车换乘，甚为方便。现在的火车新车站就是经张春桥选点定下来的。以后就开始搞车站周围的居民及车站范围内的职工住房拆迁及基础设施建设。

主持这项工作的谢鹏飞至今不无得意地说：“为了拆迁，我们建了铁路新村，居民及铁路职工不但居住环境改变了，居住面积还多于上海市平均居住面积好几倍，尤其对铁路局老干部照顾得特别好。没有遇到钉子户，拆迁很顺利。我坐了八年监狱出来后，想做生意，第一桶金就是在铁路局老干部帮助下赚到的。人的关系很复杂，并不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在上层，邓小平和张春桥的争论很激烈，但上海还是按照邓小平的整顿方针去干的。那时我和铁道部长万里关系很好，他指向哪里，我打到哪里。张春桥他们被抓后，万里马上托人给我带信，要我不要再往康平路跑了。那时不知道他带话背景，我还是往康平路跑。”<sup>60</sup>

现在上海生产制造的大飞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进行了方案论证，飞机发动机已经开始试车。参加设计的一位工程师晚年回忆，他去北京找国家计委顾问薛暮桥“通路子”，想求得支持。<sup>61</sup>薛暮桥去计委时，正好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相遇，谷牧对薛暮桥说：“你真傻，这样做不是往上海的那几个人脸上贴金吗？”发动机试车时没有汽油，还是马天水想办法，用上海生产的轻工业品及家用电器到大庆换回汽油，发动机才试了车。<sup>62</sup>

新车站建设拆迁一事，可能启发了张春桥，他提出对南市区的改造问题。南市区是上海的老城区，居民住宅老房子多，危房多，棚户多，张春桥要当时的市委常委黄涛作调查测算，如果把南市区不合格的房子

全部拆去，盖七层楼住房，需建多少房子，需要多少投资？上海市委写作组经济组的人员大都投入了这项调查工作。经济组的楼乘震当时还是小青年，参加南市区半淞园街道调查，他告诉笔者：当时经济组建了几个调查组，每组两三个人，分头到各个街道逐家调查。调查的项目很多，其中有居民的姓名、职业、年龄、家中人口、居住面积、有什么愿望和要求等。后来，各个小组的调查情况作了汇总，写了一个综合报告。再后来张春桥垮台了，就没有再进行下去。<sup>63</sup>

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张春桥，对上海的环境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那时金山石化总厂是全国引进的四大项目之一，这个项目一开始，他就要主持这个项目的王基明立下军令状，要处理好排放的废水废气，刮东南风时不能让上海市民嗅到气味。上海污水处理、桃浦化工厂的污染情况，他都交待市委写作组及新闻单位派人去做调查。解决上海地面沉降的问题，在文革前已经取得了经验，做出了成绩。文革初期又发现上海地面有沉降现象。张春桥指示启用当时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徐以枋。徐是上海市政设计院院长，他带领技术人员采用夏用冬灌、加固加高江河堤坝、疏通市内排水管道等多种技术，使上海在文革期间，地面不但没有沉降，还回升了两毫米。

张春桥还提出崇明岛开发的问题。他向上海市委提出，并要市委写作组朱永嘉做调查，他说：台湾岛的面积比崇明岛是要大一些，我们不妨想一想，人家台湾为什么能搞得那样好？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台湾的经验，讨论一下崇明岛开发的问题。朱永嘉为此写了有关崇明岛开发问题的报告，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崇明岛的规划，已提请国家计委及上海市委注意了。”<sup>64</sup>

也许，无论谁执政上海，都会考虑解决上海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也是政治的需要，但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不一定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也是为政者的职责。张春桥这样做除了文革的政治需要，更多的是他对上海有一种深情，毕竟他的家就在上海，他的家人还都生活在上海。

## 没有唱成的将相和

上海不只是张春桥的后院，更是毛泽东的后院，只不过他的后院在某种意义上比张春桥的后院范围更大一些，除了上海，还有江苏和浙江两省。这两省一市地处长江下游，从战略上来看，这个区域雄踞东南，有长江天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1949年，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后，毛泽东就非常乐观地宣布，解放全国，胜利在望。更何况，上海有坚强的工人阶级，是毛泽东发迹的地方，他每次出巡，都会盘桓在上海与杭州之间。他以上海、杭州为基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心中，上海、江苏、浙江为一体。特别是军队，上海市委书记一直是南京军区政委，使南京军区受控于上海。所以为了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必须搞好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关系，于是毛导演了一场“将相和”。

毛泽东爱护军队干部，可谓是爱战将如命，对许世友则尤为偏爱、信任。南京是中国南北在长江上的咽喉，南京军区又处在海防前线，所以毛泽东一直把许世友放在南京这个地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取得军队的支持。1964年，毛泽东问许世友：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回答：我就带兵进京保护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路线时，许世友不服对自己的审查，差点被枪毙，是毛泽东救了他一命。许世友认为毛泽东对他有救命之恩，所以他完全臣服，忠贞不二。

江苏省在文革期间有两派——好派（红总）和屁派（8·27），是按对江苏省委夺权的评价来分的。1967年1月26日，红总夺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权，“8·27”被排斥在外，两派分裂。张春桥认为好派和屁派应该联合起来，他和姚文元还去南京介绍上海的夺权经验，想保护许世友。但许世友没有处理好两派的联合。两派都逼着军队表态，弄得南京军区不得安宁。许世友趁着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八条》公布，抓了一批造反派。但没过多久，批判二月逆流，倒许浪潮又起，造反派给他的罪名是“镇压造反派的罪魁祸首”。造反派冲击南京军区，许世友被搞得焦头烂额，带了一团人，干脆躲进大别山。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毛泽东仓惶中离开武汉到了上海。而南京造反派要揪“江苏的陈再道”，在南京空军的煽动下，南京再一次掀起倒许浪潮，成立打许联络站，还要开十万人的批许大会。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未能开成，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被抄。毛泽东的心情稳定下来之后，要杨成武打电话给躲在大别山的许世友，要他出来，并派张春桥乘自己的专机去接许世友。张春桥到了合肥，又乘直升飞机到了大别山，接许世友去上海。开始，许世友认为是张春桥搞的圈套，不愿出山。张春桥向他表示：自己留下来，等许到上海见到毛泽东之后，他再回去。张春桥以自己作人质来担保许的安全，许世友才随张春桥去上海见毛泽东。

毛泽东见到许世友就说：你到哪里去了？谁给你这样大权力，调动部队进山？许世友吓得立刻下跪，说：主席救我！跟着大哭起来。中央早已有明文规定，军队调动一个连队都要向中央军委报告，何况许世友带了警卫团进了大别山，不向军委报告，的确犯忌，有杀头之罪。毛泽东这次接见，谈话的时间较长。谈话内容，许世友没有系统地告诉别人，旁边也没有人记录，不知具体内容。有句话倒是听到过：政委接司令员，在我党历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我毛泽东，“<sup>65</sup>另一次就是张春桥了。许世友回到张春桥为他安排的住地兴国路57号，情绪就好多了。他对杨成武、张春桥说：“我以后弄两个豹子送给你们。”

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姚文元的秘书胡鼎钧和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回忆说：这以后，许世友和张春桥的关系有所改善，他真的送了一只豹子给张春桥。豹子肉送给食堂煮给大家吃了，豹子皮为张春桥做了椅子靠垫。后来，许世友在上海养病期间，他的随从经常到虹桥机场去打猎，几次要带张维维去，都因张春桥不同意没有去成。许世友还送给张春桥几箱茅台酒。张春桥虽然好饮，还是坚持要把酒退回去。大家都劝张春桥，这样做有点驳许世友的面子，不近人情，张春桥才作罢。但那几箱茅台酒一直堆放在墙角。张春桥被捕后，上海警备区来人，把豹子皮椅垫拿走了，堆放在墙角的茅台酒也搬走了。

1967年4月全面夺权的日子里，南京两派的矛盾更加尖锐，一派支持许世友，另一派提出“许世友反对毛主席”，“打倒许世友”。而张春

桥无论是去南京处理江苏问题，或者在北京接见江苏两派代表，都以明确态度表示支持许世友。但在许世友担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件事情上，张春桥把许世友给得罪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准备成立时，江苏省上报成员，提议许世友任省革委会主任。中共中央讨论这个名单时，张春桥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意见：我有些担心，以军队司令员任革委会主任，会不会发生“枪指挥党”的问题？文革期间“三支两军”，各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主任大多数是军代表，张春桥较早地看到军人参政潜伏着的危机，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来。这不但得罪了许世友，也得罪了林彪。5月18日，毛泽东又让张春桥担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出身行伍的许世友是要枪杆子的，认为天下是老子用血汗打下来的，他根本就瞧不起知识分子。像张春桥这样资历不如他的人当他的政委，他从内心里就无法接受。据许世友的老部下，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回忆：张春桥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时，许世友司令曾引用群众批评造反派里的“秀才”的话说：“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思想一团糟。”他在后面加上一句，“打起仗来往后跑”。<sup>66</sup>这虽然是许世友挖苦张春桥，也是部队将领对“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普遍的看法。

许世友和张春桥的关系进入僵持局面，除了他自身瞧不起知识分子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不接受外，还有就是张春桥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关系。前文已述，廖政国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一些会议上，总是和张春桥处于对立的局面。张春桥对廖政国的意见，不让步，不接受，有时批评得也很严厉。而廖政国又是许世友最得力的战将，他在上海市革会的处境，许世友不会不知道。张春桥不大注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整了廖政国，就是不给许世友面子。再就是游雪涛小组，不但搞了上海警备区的材料，而且还搞了南京军区的材料，张春桥看到这些材料，也有些害怕，批评了游雪涛并要求赶快收场。但此事已被上海警备区发现，向上海市革会提出抗议，要市革会表明态度。许世友由此认为张春桥在军队中搞阳一套，阴一套，煽动极左，搞乱军队，很不满意，借着那几句顺口溜给张春桥画像。

1967年国庆节，中央办公厅通知许世友去北京，国庆上天安门观

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许世友谈话半小时。毛泽东谈了视察南方的观感，说7、8、9三个月革命形势很好，过几个月会更好。无非是要许世友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并嘱咐许世友养好身体。国庆后，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又和许世友长谈，这次接见由张春桥陪同。毛泽东要张春桥和许世友搞好关系，还要张春桥保护许司令。事后，许世友不以为然地对秘书说：“我有几十万部队，还要张春桥保护！”毛泽东接见后，张春桥坐许世友的车送他回中南海住处。毛泽东还曾对张春桥说：许世友是个粗人，没有文化，你要帮助他。张春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对许世友一直表现得友善，而且在许多地方不予计较，有所让步。

许世友住在中南海一个多月，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杜平在京西宾馆，带着一个班子修改南京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检讨报告》，这个报告是报呈中央的，已改了几稿，送给许世友过目。许世友对报告中说南京军区“执行了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不满。起草者告诉许世友，不这样写，张春桥那边通不过，因为张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又被惹火了，对张春桥更加不满。后来，还是周恩来出来解围，认为报告不要这样写，不要抓住一点就无限上纲，把一切归到两条路线斗争，也看得太重了。往自己脸上抹黑，丑化军队有什么好处，那不是自毁长城吗？

在等待中央对这份检讨的回音时，张春桥亲自找上门请许世友去上海养病，许世友欣然答应了。张春桥打电话安排许的吃住，并陪送许世友去上海，十分周到。许世友下榻兴国路72号，即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住的兴国路招待所。许世友在上海时，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和第二政委李彬山来向他汇报工作。张宜爱、李彬山和上海市革委会的关系较好，许世友却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这显然是不给张春桥面子。

1970年的庐山会议，许世友也参加了。庐山风波平定后，毛泽东还叮嘱张春桥请许世友吃饭，喝茅台酒。毛泽东的这一次“将相和”唱得还算成功。但张许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这表现在对林彪系统的清查上。林彪案件的清查在浙江、上海一带，主要是针对驻杭州的空五军和驻上海的空四军。毛泽东派许世友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处理空五军的问题。跟随王洪文一同前往的萧木对笔者说：

和许世友接触，感到他的心态很有意思，喝酒时，一定要把对方灌醉才高兴。我不会喝酒，就装醉，许世友看我醉了，哈哈大笑。握手时，他的力气很大，痛得我哇哇叫，他又哈哈大笑，说：怎么样，我还不老吧。我当时就感到他这是做给王洪文看的。王洪文和许世友表面上客气，吃饭、喝酒、打猎，在这方面两人爱好一致，许世友总是陪着王洪文。王洪文是许世友的兵，王洪文到中央工作，许世友很开心，有时也有意喊王洪文为“小王”，以显示他那老首长的架势。到干部处理问题上，矛盾就来了。王洪文认为对空五军的干部应以教育为主，不主张处理，许世友则主张全部撸光。对上海空四军也是这样。还有浙江群众组织问题，许世友主张继续肯定一派，否定一派，王洪文则主张再摆摆平。

给许世友带来麻烦的，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他签发的南京军区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一封信，信中支持林彪提出的“揪坏人”。这封信虽然是写给毛、林两人的，但没有交到毛泽东那里，而交给了林彪。林彪事件后，在林彪住处发现了这封信，此外，还有韩先楚、杨得志的信也在那里。<sup>67</sup>于是就查他们和林彪的关系。

1972年2月25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奉召进京。这次找许世友谈话的恰恰又是王洪文和军委的几位负责人，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信上所点“犯错误”者是指谁？第二、信为什么会到林彪手里？第三、为什么三大军区的信的内容相同，是不是串联好的。每个问题的份量都很重。许世友被他瞧不起的王洪文审查，不由火了起来，坚持自己的信中写的是陈伯达，可是审查他的人认为许世友所说的时间和写信的时间对不起来。许世友被整得心脏病发作。直到1973年，许世友给毛泽东写了检讨，韩先楚也写了检讨信，毛泽东接见了韩先楚，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就算了。

毛泽东费尽心思要在许世友、张春桥之间唱“将相和”，对张春桥作了许多支持，张春桥也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对许世友还是表现出与他性格不合的屈尊迎合的姿态，但都没有成功。

## 注释

- 1 2000年5月16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
- 2 2000年5月16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张元济，出版家，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职务。
- 3 2000年5月16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
- 4 苏步青，数学家、教育家，后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等职。谷超豪，数学家，后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职。方励之，天体物理学家，后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等职，因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开除党籍并撤职，在六四事件中被作为主要的幕后人物，与其妻李淑娴同时被通缉，后去美国。
- 5 《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假托轩辕黄帝所作的一部医书，影响极大，被称作“医之始祖”。
- 6 袁志英：《毛泽东与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2月26日。
- 7 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和中国：施密特回忆录》，海口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黑格尔，19世纪德国哲学家，建立了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极大发展了辩证法。费尔马哈，通常称作费尔巴哈，19世纪德国哲学家，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较大贡献。二者的思想均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来源。
- 8 梅奈特，德国政论家、苏联和中国问题专家，作为施密特的顾问，参加了毛泽东会见施密特的全过程。
- 9 袁志英：《毛泽东与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2月26日。
- 10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 11 同上。
- 12 2000年5月16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
- 13 同上。
- 14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 15 郭绍虞，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王运熙，古典文学及理论研究家。顾易生，古典文学及文学批评史研究家。三人都是复旦大学教授。
- 16 2011年8月18日姚家华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7 2010年2月4日陆谷孙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8 赫尔岑，19世纪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
- 19 2002年4月19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
- 20 2000年5月16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
- 21 吴瑞武：《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1977年3月8日，文汇报总编办公室铅印本。
- 22 同上。
- 23 2002年4月19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
- 24 臭老九：文革时期，极左分子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等专政、改造对象的后面，名列第九，蔑称为臭老九。
- 25 吴桂贤，女，原为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
- 26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 27 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13页。
- 28 同上。
- 29 同上。
- 30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 31 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第517页。
- 32 吕不韦，战国时秦国丞相，一开始专擅朝政，被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尊称为“仲父”，秦王政长大后逐渐大权独揽，吕不韦则不断失势，最后遭罢职流放，忧惧自杀。
- 33 傅奕，唐初学者，以反对佛教而著称。《李固给黄琼书》，李固，东汉大臣，黄琼是他的朋友，李固给他写信，要他出山为国做事，一展抱负。李袭吉，五代时官员，博学多闻，提携后进，有士大夫之风。
- 34 1935年，张春桥工作的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组织了一套《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由阿英、施蛰存主编。张静庐把《柳亭诗话》交给张春桥，让他标点。《柳亭诗话》是清人宋长白撰，成书于乾隆年间，所评之诗上起三代，下至清朝乾隆年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张春桥对经典著作了解得很少，所以他接到标点《柳亭诗话》的任务后，的确有些犯难。他不懂汉魏乐府及古风句式的变化，就按照唐宋的律诗或绝句的句式作标准，去标点乐府、古风及四言诗，无法读通。发现读不通的时候，就在原书的影印本上打了

- 问号，并给老板写了封信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张静庐看了张春桥标点的《柳亭诗话》错误较多，还是发了30元看稿费，就把他辞退了。1935年11月18日的上海《小晨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把张春桥奚落嘲笑一番，一时传遍上海，成为笑谈。
- 35 章炳麟，号太炎，清末民初革命家，学者。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韩愈，唐朝诗人，古文家，思想家。
- 36 《容斋随笔》，古代文言笔记著作小说，南宋洪迈著，其内容涉及涉及经史、文学、人物、掌故等各方面。
- 37 靖康之乱，指北宋钦宗年间，金兵侵入北宋都城东京，烧杀劫掠，并掠走宋钦宗和其父宋徽宗，北宋就此灭亡。
- 38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 39 张贻玖，曾任职于中宣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顾问。
- 40 曹植、王粲，均为汉末三国时人，在文学上均有很大成就，并称“曹王”。曹植为曹操之子，建安“三曹”之一，曹魏时被封为陈王；王粲年纪略长于曹植，为“建安七子”之一。
- 41 赵王迁，战国时赵国最后一位国君。李陵，汉武帝时大将，与匈奴作战时被俘，被迫投降。王昭君，西汉元帝时受命和亲匈奴的女子，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冯衍，东汉辞赋家。嵇康，三国时名士、文学家，因触怒权贵被杀，刑前弹奏古琴曲《广陵散》。
- 42 王守稼等：《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 43 芦荻，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1975年5月至9月，毛泽东因患眼疾，请芦荻为他读书。
- 44 王守稼等：《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4页。
- 45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第317页。
-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读文史古集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时来天力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出自唐代诗人罗隐的《筹笔驿》一诗。
- 47 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霸王别姬，京剧名剧，表现楚汉相争时霸王项羽与刘邦在垓下决战失利，与爱姬虞姬生死诀别的悲剧故事。

- 48 笔者在这里对张春桥思想用“萌发”二字表述，是因为姚文元、朱永嘉等都没有明确提出张春桥思想的概念，或者只在意会不言中。笔者就此问题和朱永嘉讨论过。他说，张春桥要搞农村过渡问题调查，是想编一本书，就像毛泽东当年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那样，每篇调查报告写一篇编者按。张春桥还想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各阶级分析》的书。这两件事我们心中都是清楚的，我们的调查也是为他服务的。在工作的过程中，我是说过“春桥同志的想法”或“春桥同志的说法”之类的话，并没有讲过张春桥思想。至于粉碎“四人帮”后批评我们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吹捧为“超过了”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并不属实。这样的吹捧也恰恰是张春桥讨厌的。
- 49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 50 同上，1976年6月5日。
- 51 摘自笔者1974年11月参加调查的笔记。
- 52 《七十二家房客》，原为上海人民滑稽剧团于1958年创作的滑稽戏，讲述解放前上海底层市民的艰苦生活，后被改编成多种版本的影视剧，广受欢迎。此处借指房屋中住户众多的现象。
- 53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 54 三打祝家庄，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情节。宋江率领梁山好汉攻打祝家庄，前两次没有摸清情况，吃了大亏，第三次做了仔细侦察，并派人里应外合，最后终于将祝家庄打破。
- 55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94年，第976页。
- 56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 57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和周恩来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6日，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13—1714页。
- 58 2011年9月6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的谈话。
- 5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 60 2014年2月23日谢鹏飞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61 薛暮桥，经济学家，著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被誉为市场经济的开拓者。
- 62 2011年5月25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63 2014年夏楼乘震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64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 65 指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迎接朱德一事。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故称“政委接司令员”。
- 66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 67 杨得志，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 第十八章



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会  
(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 第十八章

# 最大的野心：写一部《毛泽东传》

### 执笔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大召开前的筹备阶段组织工作，由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联手进行。6月2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就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决定由张春桥负责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并说：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过的话为证。报告中要指出注意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sup>1</sup>

张春桥在十大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关于九大路线》里，针对广大党员对九大路线的怀疑甚至否定的倾向，指出九大路线是正确的。报告说：“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这个报告还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

论是正确的。毛泽东不愿意批评九大政治报告，张春桥更不愿意批评，那倒不是因为九大政治报告是他执笔的，而是因为批评九大政治报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这样肯定九大路线，不只是肯定毛泽东一贯正确，也是肯定他自己。

张春桥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十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精神。他写道：“当一种错误倾向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当好好的向毛主席学习，坚持这个原则。”毛泽东要把反潮流的精神写进《十大政治报告》及《党章》，是以庐山会议的教训为根据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张耀祠谈话，提到吴法宪说他是伟大谦虚，毛泽东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我在庐山会议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在7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十大政治报告由王洪文宣读。但毛泽东并没有接受张春桥的提议。8月20日，也就是十大召开的前夕，毛泽东审阅十大政治报告稿，批示“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sup>2</sup>在十大开幕时，周恩来宣读张春桥执笔起草的政治报告，当周恩来讲到“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说“不错”。当周恩来讲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毛泽东在会上对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的肯定，说明张春桥执笔时就考虑到要表达出毛泽东的意图，说出毛泽东所要说的话。

政治报告中关于时代的特点，仍然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时代没有变，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没有过时。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毛泽东看不到这一点，思想不变，张春桥的思想更不变。他被捕关进秦城监狱后，仍然在学习列宁论帝国主义的理论，思考当今世界仍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他说：“在当今世界，人民群众的要求往往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资产阶级怎么还能领导群众革命呢？”“资产阶级从

但丁写《神曲》算起，用几百年的时间在全世界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现在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资产阶级面临的问题，他们一个也解决不了。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能力解决。”<sup>3</sup>

8月2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名单。当议到大会主席团副主席时，会上先后提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李德生表示赞同。许世友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很明显，许世友的意见表明了不同意王洪文担任十大主席团的副主席。<sup>4</sup>

8月23日晚，周恩来又主持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不能看不起‘儿童团’”的警示，但许世友等仍然听不进去，公开表示反对，给毛泽东留下了忧虑。8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共十大主席团会议，又传达了毛泽东谈话内容：我们老一辈人是过渡时期的人，不要总出台唱戏呀，我们出台转一转就行了。像《西厢记》上的老夫人，要让红娘去演戏。其意思很清楚，中央政治局的老年人要交班，让青年人去干。尽管这样，许世友还是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毛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sup>5</sup>

周恩来在作报告之前，8月23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机关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会议时，在会上说：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sup>6</sup>周恩来的这番解释可谓意味深长，可能是他不赞成政治报告中的反潮流提法。在会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中专门讲了一段反潮流的问题：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

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报告又说：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敢不敢反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相，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唯物主义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sup>7</sup>

《十大政治报告稿》和《修改党章说明稿》都送给毛泽东审批，而且都有他批示的意见。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只选了毛泽东对《十大政治报告稿》的“原则同意”批语，而对《修改党章说明稿》的批语则没有选入。这两个文件实际上成为十大的主题，即是“反潮流精神”和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的“团结精神”有了很大的距离，潜伏着新的分裂的危机。萧木是《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执笔者，他回忆说：

筹备十大时，毛泽东提议让王洪文负责修改党章的事，后来王洪文就组织了一个修改党章小组，有八九个人，我也参加了，集中在西单中央组织部内。我们当时考虑，七大、八大都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分别是刘少奇、邓小平作的；九大大概是为了突出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没有安排人专门作修改党章报告，只由康生在大会发言时作了个《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据此我们理解“报告”和“说明”是两种不同规格的文体，同时似乎也表明着去执行这一任务的人身份、地位不同。我们起草时，尽管王已得到毛的破格重用，但觉得王与刘、邓还不能相提并论吧？所以，我们起草的文件是《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而不是《报告》。初稿写成后，就通过张春桥往毛那里送。大约写了三四稿，送了三四次。最后回来的一稿上，毛就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那样，用铅笔作了多处修改，

包括标点符号。特别是文稿的标题，我们原来写的《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毛把末尾“说明”二字划去，加上“报告”，改成了与七大、八大一样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同时还在标题下署上了“王洪文”三字。这也就是说，毛用这样一种方式，表明由他亲自决定让王到十大去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从一定意义上似也可以理解为：从这时起，毛可能已在考虑让王做他的接班人。当时我们小组八九个人都感到有些意外，有些吃惊，但又都很兴奋。同在那一稿上，毛还批了一句话：“反潮流也要说说。”这样我们又修改了一稿，加了一段“反潮流”的内容。<sup>8</sup>

## 周、张、王的三角关系

萧木参加起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还写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他回忆说：

十大开幕后，我们修改小组八九个人又全都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的会务工作。张春桥是大会秘书长，接近闭幕时他来找我说，大会要发个《新闻公报》，我想了想，还是由你来起草吧。我大感意外。九大前后发过三份《新闻公报》，都是张、姚写的，十大也应该他们写才对，我毫无思想准备，再说水平也不够呀！可我来自上海市委写作组，张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又说得那样诚恳，实在不便推却，只好说我试试看吧。待到铺开稿纸，才突然发觉这实在是一桩苦差事，碰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公报》中要不要写上王洪文的名字？要写，尺度又怎么掌握？从毛泽东亲笔将《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改为《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署上报告人“王洪文”三字；在大会选举时，又让周恩来宣布“毛主席的票，由王洪文同志代投”这样一些很不寻常的举动来看，毛将培养王为接班人的意图似乎已十分明显。若照此思路，那么《公报》中非但应该写上王的名字，还得出现接班人一类字样。九大就是这样做的。

以九大的第二份《公报》为例，林彪的名字出现了四次，其中之一说：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林彪的“机毁人亡”、“折戟沉沙”，已使得国人对接班人问题讳莫如深，更何况在十大会议期间，许世友等功臣宿将已经公开表示了他们反对王上去，倘若我还要写上，岂非正好踩到地雷区了吗？那不写呢？更不行。伟大领袖既然已有相当明确的表示，如果我还“视而不见”，岂不就有违抗“最高指示”嫌疑了吗？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写。但对写到什么程度，特别是毛让王代为投票的事要不要写，毕竟只是一个含义高深莫测的表示，并没有明说，心里实在毫无把握。到这时，我终于明白了张、姚，特别是张自己不便写这份《公报》的原由了：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呀！试想，张如果自己写，除了同样会有我上面说的那些难题，还会遇到一个更大的麻烦：如何避免引起周恩来的不满以至猜疑？这是因为毛一旦确定王为接班人，那么十大一落幕，周与张的关系立刻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究竟谁是第一辅佐大臣呢？那就说不定还会引发一场或明或暗的角逐“主辅”的斗争。尽管张在资历、声望、能力和经验等方面都还无法与周相比，但周却不可能不想：人家可是从安亭事件起就已经做了王的“老头子”了呀！此外，张的顾忌还有一层，那就是王被定为接班人，纵然可以看作是文革派的一个胜利，但他与王的关系却同样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大凡做过皇帝“师”或“傅”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张不可能想不到，曾经被秦始皇尊为“仲父”的吕不韦，后来不是就“饮鸩而亡”的吗？所以张只要一提起笔，就会在如何表达王洪文地位这个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如果由我写，至少张的那些顾忌可以完全排除。我，一个只会勉强动动笔杆子的小人物，与中央高层不存在任何人事瓜葛和利害关系，即使写得分寸失当，通常也总可以年轻无知、缺乏经验为由获得见谅。这么想时，觉得差使虽苦，还是应当乐意接受，并尽心尽力做好。只是希望十大过后能够太太平平，谢天谢地，我的那些顾虑纯属杞人之忧。

冥思苦想了大半日，总算赶出了一个初稿。毛让王代为投票的事决定不写。有关王洪文则用了明、暗两种方式。明的仅一处，即王洪文的名字只提到一次：“大会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是事实，王确实在大会作了这样一个报告，谁也无法否认或反对。暗的有三处，如果说参加大会的“工农兵代表占总数的67%”；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等，这些都可以看作与王洪文有关，因为王正属于“工农兵”中的“工”、“老中青”中的“青”这个群体。在介绍新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的革命经历时，又特地点出一句：有的经受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炮火考验”。熟悉王洪文的人都知道，他常以16岁参军，第二年便“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而自豪。

我拿着写好的初稿去找张春桥。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修改了几处字句，说基本可以，时间还有，你再去细细磨磨。又笔尖点着“抗美援朝”那句话，微微笑着说：“你的意思我懂。”我听出他这话带点鼓励的意思，就接了句：“你的意思我也懂嘞。”想了想，觉得还可以加一句话。文稿原文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有一段评价性的话，最后一句是：“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兴旺发达，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我又加了“后继有人”四个字，变成：“……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和……坚强团结”。这样整个《公报》的基调，就会给人一种中共领导层正在进入一个更新换代、继往开来的新时期的感觉。当然，“后继有人”并非单指王洪文，但不言而喻，王是一个代表。张拿着笔，对我新加的一句话斟酌了好一会，终于说了句：“就这样吧。”我又去找姚文元。姚倒是很爽快，看过一遍就说：“蛮好嘛。春桥改过了，我就不改了吧。”我又从头至尾修饰了一遍，然后工工整整誊抄在文稿纸上，再去请示周恩来总理。特地说明：这是大会秘书组要我写的，张、姚已经看过，现在请总理审定，如果不行，根据总理指示，我重新再写。周以惯有的长者风度，温和地微微伸了下手，示意我在他一旁的沙发上坐下，戴上老光镜边审阅边说：“这是大事，我不能定，最后还是要提请主席批的。”就这一工夫，又

有好几个人来向总理请示工作，他只好对我说：那就这样吧，你去忙你的。要改，我再通知你。我答应一声，如释重负地站起，转身告退。

这天下午，大会议程已全部结束，大会所有文件，包括那份我小心翼翼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也全都通过并经毛泽东最后审阅同意。傍晚六七点钟了吧，作为大会秘书长一直忙碌着的张春桥，端了个人民大会堂那种专供中央领导人开会进餐用的长方形景泰蓝漆盘，坐到靠窗的一张台子旁开始晚餐。这时记不得是谁跑来说有事要找一下总理，张对他说总理在某个房间，大概在同几位专家商量大会文件翻译的事吧。那人走后，张忽而像是深为感慨地说：“总理懂得多国文字，组织文件翻译这样的事，只有他能做。他的学识，他的经历能力和为人，我这一辈子想学也永远学不到了，你不佩服也不行。”吃了口饭，喝了口汤，停了一会，略微提高了一下嗓音又说：“有人说我张春桥想争这个，又想争那个，好像有什么野心，其实呢，要说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

那天在场的有十几个人，进进出出的就更多。张的这番话显然并非即兴说出的话，至今我还留有相当深的记忆。<sup>9</sup>

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着萧木的话补充说：我爸爸说，十大时，毛泽东决定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曾对周总理说：周公辅成王，功劳都在周公，你就做周公吧。周总理说：我总是要在主席之前走的。我爸爸从秦城出来到江阴之后，又和我们谈起这件事，说：此周公不是那周公。<sup>10</sup>

周公名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孔子推崇他为理想的政治楷模。汉代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根据《诗》、《书》的传说描绘了他的丰功伟业，说他是其兄周武王伐殷的主要辅臣。在武王死后担任年幼的周成王的保护人，他曾告诫他封于鲁的儿子伯禽，说自己辅佐成王是“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尤恐失去天下贤人，希望伯禽谨慎从事，“慎无以国骄人”。他曾背负成王以天子名义处理国政七年，中间平定了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与殷纣王之子武庚

等殷朝遗民发动的武装叛乱，然后还政成王，北面称臣，制定了《周官》、《百姓》，使官民行为有序。成王听信流言，误会周公有篡位的野心，他被迫逃亡。幸好成王发现了此前武王病重时，周公沐浴祈祷祖先允自己代死的誓辞《金縢》，明白了他的心迹，于是迎他回朝，再立新功。他是鲁国诸侯的鼻祖，被孔子钦仰到梦魂萦绕的程度。毛泽东要周恩来做周公，是希望周能像周公一样辅佐王洪文。张春桥说“此周公不是那周公”，是因为十几年来他和王洪文都是阶下囚，别有一番滋味了。

“我要在主席之前走的”，周恩来当着张春桥的面说这样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呢？而张春桥又把这句话放在肚子里，直到从秦城监狱转移到江阴，生病使他感到岁月无多，才对女儿说出来。罗瑞卿之子罗宇在离开总参谋部，移居国外时，在回忆周恩来的一篇文章中，也谈到周恩来在病重期间讲过类似的话。罗宇分析，周恩来心中很清楚，毛泽东知道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他不放心，担心自己去世之后，周恩来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样反过来又增加了周恩来的心理负担，如果他不走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会以某种理由来处理他，使他反而落一个“晚节不忠”的恶名。这很符合周恩来忠于毛泽东的心理，而且是他最为计较的。罗宇对周恩来心思的知晓，肯定不是从张春桥口中得到的，以罗瑞卿和周恩来的关系，罗宇得到周的这个内心信息，也肯定不是猜测，而是有所根据的。再说，周恩来和张春桥的关系是微妙的，从毛泽东一度要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他对张春桥就有所警惕，认为张春桥有野心，一直盯着不放。在十大期间，张春桥当着众多人的面说自己最大的野心就是写一本《毛泽东传》，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等对他不放心的人说的，表明自己不存在非分之想，让他们放心。应该说这是张春桥的退让姿态。周恩来当着张春桥的面说自己总是要走在主席之前，也是一种退让的表示，他深知张春桥得到毛泽东的宠信，他这样说，不只是让张春桥放心，更让毛泽东放心。令人深思的是他们二人说这番话的时间，都是在十大期间。

中共十大闭幕不久，11月21日，上海市崇明县堡镇酱酒二厂一名共产党员的来信到了毛泽东的手边。来信对张春桥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表示怀疑，认为张春桥做一个中央委员基本可以，做一个政治

局委员十分勉强，做一个政治局常委根本不行。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此种攻击不妥，但知有此类意见是必要的。”<sup>11</sup>一叶知秋意，一言知群情，毛泽东的批语颇可玩味。

## 张春桥的《毛泽东传》是怎样一本书

张春桥说他的一生最大野心就是写一部《毛泽东传》，这一想法直到他走进秦城监狱，似乎都没有放弃。前文已经介绍，他曾经要上海市委写作组采集中国共产党历史材料，实际上就是为他写《毛泽东传》做准备。由于条件不成熟，已经写出的党史没有敢出版，只是作为党史资料编了一些小册子。一次，他和女儿谈起，像毛泽东之类的人物可能不会出在中国，但可能会出现在其他地方，如中东、非洲。在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可能会出来。另一次，他又和女儿谈起，说周恩来知道的事情非常多，都是别人和他根本不知道的，很多事情都是他后来才知道，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包括长征、长征之前的事情等，都是毛泽东告诉他的。<sup>12</sup>这些谈话应该可以说明张春桥在监狱中仍然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毛泽东，而且感到他自己掌握的材料不足。毛泽东曾几次向张春桥谈中国共产党及他个人的历史，是不是因为张春桥提出过要为他写传的请求，所以他才谈了这些内容呢？

张春桥在监狱中仍然没有放弃写作《毛泽东传》的思考，1992年12月20日，他写给女儿张维维的一封信，比较集中地谈了这个想法。他从1958年在杭州见到毛泽东，谈到1966年12月25日晚毛泽东73岁生日家宴，带着温馨的心情回忆了和毛泽东相见时的情景。<sup>13</sup>他还讲看到一篇文艺评论，说现在的电影把毛泽东从神变成人，把蒋介石从鬼变成人。这种评论应该说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张春桥却不接受，认为这样的论断同他脑子里的毛、蒋形象根本对不上号。他在信中写道：“毛在我的脑子里从来不是神，蒋在我的脑子里也从来不是鬼，他们从来都是人。但是，人是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毛是人民的领袖，蒋是人民的公敌。”<sup>14</sup>这段话应该是张春桥写作《毛泽东传》的立足点。

他还从报上看到条消息说，在毛泽东一百周年寿辰的时候，要拍一部毛泽东的“三次握手”。一次是和孙中山握手，一次是和蒋介石握手，还有一次是和谁，他记不清了。他在信中说：“看来毛又回到1927年以前跨党分子的地位了。”<sup>15</sup>看来，张春桥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一个分期，在他眼里，1927年前国共合作的毛泽东，和经过蒋介石清党运动以后的毛泽东，是两个不同的毛泽东。张春桥心中是否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第二个、第三个或第四个毛泽东呢？由于张春桥的《毛泽东传》没有写出来，甚至连个写作提纲都没有，我们就很难判断在他笔下不同历史阶段的毛泽东是什么样子。

人民领袖毛泽东，从思想体系来说，是帝制文化和草根文化的混合体，是一位为人们所难理解的极其复杂的人。帝制文化在他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崇拜帝王，他说：“当时我还不是反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sup>16</sup>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他在革命造反时，是否也像中国农民起义领袖人物那样带着当帝王的梦想呢？不只是在窑洞里他不反对帝制，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反对过。这表现在他对中国帝制社会第一个帝王秦始皇的赞美上。受他称赞的还有汉武帝、曹操、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朱元璋，称赞他们对平治天下、统一国家都取得成功。

在夺取政权之后，他的帝王形象越来越鲜明，在治理国家和处理战友的关系中，把帝王的权术与势治发挥得淋漓尽致，也从实际证明他身上融结着帝制文化。林立果在《“571工程”纪要》中攻击他为秦始皇式的暴君，他说自己就是秦始皇。这话有些情绪冲动，也可能他后来觉得此话有些不妥，所以又修改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秦始皇是中国帝制社会第一个皇帝，他也就顺理成章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帝王了。毛远新来到他身边后，叔侄之间谈史，谈到秦始皇，他说得就更加明确了：高明的皇帝一定要控制权力，秦始皇听了丞相李斯的劝告，搞了中央集权制。我们共产党也学秦始皇，搞一党治天下，就是要掌握国家领导权。<sup>17</sup>

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帝王，但他是一位非常任性的领袖，常常胡来的帝王，为国家和民族闯下了许多祸。对他的是非功过，已经有了一些评说。无论是怎样的评说，都无法绕开他的那种帝制文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而且是要进行清除、批判和否定的。帝制文化思想在中国还有生存的土壤，彻底破除很不容易。对这样一个问题，有的批判只是从大的方面认识了，但还没有深入到历史的细微之处；有的还不大清楚或都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更何况带着固有的理念去世的张春桥。如果按照张春桥把毛泽东的发展分成不同时期，流行在民间的评论已经是这样做了：打天下、坐天下的是有功的毛泽东，坐天下之后13年的是有过的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有罪的毛泽东。张春桥能不能按照这三个不同的毛泽东来作分期呢？恐怕不会。张春桥在生前没有能写出《毛泽东传》，即使写出来了，可能也会是一部捍卫毛泽东帝制思想和行为的著作。笔者只能作如是的猜想。

## 毛泽东读史释兵权

在十大会议期间，许世友极力反对王洪文担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又和张春桥以言语相对抗，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更何况第十届党中央副主席中有两位军人——叶剑英、李德生，而李德生又是许世友的老部下。十大之后，毛泽东带着这个沉重的心事召见从江西回来不久的邓小平，谈到他对军队的忧虑，寻找解决的办法。邓小平没有讲出具体的意见，只是把放在桌子上的茶杯位置相互移动对调了一下，毛泽东明白了他的意思。

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商定之后，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对调。12月12日晚8时半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谈八大军区司令对调问题，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12月13日至15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八大军区调动问题会议，多次强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他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

添一个秘书长吧。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你（指邓小平）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sup>18</sup>

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但从组织上着手准备八大军区调动问题，还让政治局委员读《封建论》、《旧唐书·李愬传》、《晋书·刘元海载记》，《史记》中的《陆贾传》、《灌婴传》及《周勃世家》。一般为毛泽东注释的大字本只印三五份，而这几本注释本印数都在15份左右，《封建论》印了23份，可见分发之广。毛泽东是否在以史为鉴，在政治局委员中做思想舆论上的准备？

毛泽东要干部读柳宗元的《封建论》，除了为他这位自称的“当代秦始皇”作辩护外，其中重要的是讲了军队问题。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有一个立论：“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意思很清楚，国家的分裂，不在于地方行政官员，而在于拥有重兵的藩镇；不在文官，而在掌有兵权的军人。毛泽东对军队是既爱护，又有所警惕，所以这次对大军区司令员的调动不是偶然的，他是以史为鉴来处理军队的问题。

《旧唐书·李愬传》是说唐朝大将李愬如何处理军队造反的问题。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威胁到中央集权，李愬领兵雪夜奔袭蔡州，一夜端掉藩镇吴元济的老窝。但除惩办了首恶吴元济外，李愬放了吴的所有手下。许世友在庐山会议期间给林彪写过信，被调查后情绪一直不满，毛泽东让许世友读此传，无非是要告诉他，如果要造反，毛就会像李愬讨伐吴元济那样来收拾他。

《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元海是匈奴人，建立了赵国。他读了《史记》中的《陆贾列传》、《灌婴列传》及《周勃世家》，感慨地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灌”指汉代名将周勃与灌婴，“随、陆”指汉初智囊人物随何与陆贾。刘元海感慨武将没有文化，文官不会打仗，手里没有如意可用的全才。其实，这也是毛泽东的感慨。他既希望许世友这样的军队干部学文化，不要头脑那么简单，又希望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派能让宿将们服气而参与军队领导。特别是许世友，与周勃其人很有点相像。

八大军区调动之前，毛泽东对许世友的问题已经考虑了很久。毛泽东曾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说：“许世友来还是不来，不来就准备打，他们是辫子兵。”毛泽东还说：“我还能带兵，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过辫子兵。”<sup>19</sup>辫子兵是民国初期前清遗老张勋的部队。张勋当时就是从南京率辫子兵北上勤王，拥戴清王室复辟的。过去人们总认为八大军区调动是针对着以前林彪的手下，其实不尽然。毛泽东对辫子兵的讲话，其意在南京军区的许世友。许世友曾多次向毛泽东表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要带兵进京保卫毛主席。毛泽东的这番话充分表明他的担心所在。朱永嘉听了萧木传递的信息后，设法在《学习与批判》刊登关于批判辫子兵的文章。赵清写的《张勋传》中点明“辫子兵在南京负隅顽抗”的情节。

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为了在军队中树立新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威望，毛泽东有意要他对参加会议的人点名。当点到许世友名字的时候，许不但不作回应，反而端起茶杯往茶几上重重一放，随着声响，茶水四溅，使王洪文很尴尬。毛泽东气得脸色都变了，但没有发作。读过《史记·周勃世家》的都还应当记得这样的情节：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和汉景帝在朝中闹得很不愉快，拂袖而去，汉景帝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周勃又是吕后称帝的支持者。毛泽东要许世友读此书，其中有许多当时不为人解的玄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许世友反对王洪文，令毛泽东十分不安。

那天，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是周恩来，一边是叶剑英，还有张春桥和王洪文。这次接见，毛泽东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问许世友现在看《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毛泽东说许世友，你就只讲打仗，以后搞点文字吧。毛泽东给许世友讲了“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的故事后，说：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毛泽东握着许世友的手说：“我送你一本书，这本书比较好，叫《天体运行论》。你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去给我搞一本天文学的书，把字放大一点放大一倍。”<sup>20</sup>八大军区调动的真正对象就是许世友，还有跟着许世友在十大上放炮的李德生。他们两人，一个是南京军区，一个是北京军区，也许毛泽东已经认为这两个军

区对北京有威胁。

会议结束后，陈锡联到北京军区当司令员，李德生去了沈阳军区；许世友去广州军区当司令员，原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去了南京军区；原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原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原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跟原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新疆、成都、昆明几大军区都没动。而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人在庐山会议时都给林彪写过信，丁盛则众所周知曾是林彪的爱将。

这样，十大以后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完成了军事官僚专政向文人官僚专政的转化。其实，这样的转化，在中国帝制历史上曾有多次。汉代刘邦称帝之后，看不起知识分子，被称之为“有口辩士”的陆贾对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由此陆贾向刘邦粗述存亡之征，使刘邦大悦。但汉代由“马上得天下”，中间经过多年的流血或不流血的斗争，才转化为“下马治天下”。唐初、宋初的这种转化的历史短一些，但也是经过文人的诤谏流血才得来的。毛泽东也是“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人物，反右派、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无不是在“马上治天下”上下功夫。但中国共产党十大之后，随着戎马生涯的元勋们渐渐老去，他此时还是希望新的接班人王洪文乃至张春桥能稳定地接班，所以请出邓小平来主持削弱那些悍将们的兵权，使中央领导的权力能有一个平衡过渡期。但他又很矛盾，说：“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sup>21</sup>也就是说军队对新的接班人还要有牵制作用。

## 批经验主义的提出

1975年上半年，姚文元撰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撰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是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意旨，而又得到毛的赞赏，先后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无论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心中都不无得意之处，自认为是对全国群众理论学习运动的指导性的文章。为了让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毛泽东早就作了舆论铺垫。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sup>22</sup>

12月26日，毛泽东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sup>23</sup>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精神。11日，周恩来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及其他有关文件致信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建议先在政治局常委一谈，然后再提政治局讨论。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通知》要求将毛泽东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

为了平衡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武官和文官的关系，更好地掌控军队，毛泽东采取了重要措施，即文官参与军事工作，他让邓小平做总参谋长，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邓小平由武向文，可以说他是文官了，但军队领导干部有不少是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他对军队的影响仍然存在，他出任总参谋长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张春桥就不同了，他一生从未从事过军事工作，在军队中没有战友旧部，即使是毛泽东多次提议他任总政治部主任，也是阻力重重，很长时间决定不下来。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第一次召开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并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张春桥从1959年庐山会议讲起，说毛泽东让大家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词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哲学小词典》中有一部分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到反对经验主义，张春桥

强调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认为，在延安整风中及全国解放后，经验主义都没有批判过。

张春桥讲到最后说：“我个人还有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那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红旗落地。”<sup>24</sup>张春桥被抓以后，批判他“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说法出处即在此。但这话并不能代表他的政治路线。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些话是针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针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但能不能因此就说他反对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呢？

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通过对林彪集团产生的社会阶级基础的分析论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性，论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必要性，把林彪利用文化大革命鼓动的左的思潮，说成是极右的代表。文章还特别强调了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其中写道：“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几十年，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江青更是推波助澜地批判经验主义，她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提出“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对张春桥在总政治部的讲话，她推荐评论说：“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应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风起云涌，全国报纸都发表了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很明显，批判经验主义的提出，不只是针对中共中央的元老派，也是针对全国的老干部。把老干部置诸对立面，结果只能是孤立自己。

从现象上来看，张春桥在总政治部干部会议大讲批判经验主义的同一天，姚文元也发表了大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是两人默契的配合；而实

际上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写的，经毛泽东审阅时划了圈。姚文元曾在《红旗》杂志编辑会议得意地说：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上划了三个圈，在张春桥的文章上划了两个圈。毛泽东划了两个圈和三个圈，这个圈就有特殊意义，表明了他对此赞扬和支持的态度，如果只划一个圈，他的态度就摸不透了，要不要执行，读圈的人就要慎重考虑了。毛泽东划圈的多少，藏着他心机，被他划了圈的人和事，是要冷静分析，慎重对待的。

邓小平非常敏感，注意到了张春桥的讲话，在3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大国。同时他又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sup>25</sup>

4月1日，报纸发表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该文除前面提到他大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外，还重点谈了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文章中说：

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

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张春桥还把“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论”比作“打土围子”，说：“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如果“不是全部打掉资产阶级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

张维维读到她父亲张春桥这篇文章中的论述，对他说：你干嘛要这样提“打土围子”，你知道这样会得罪多少人吗？特别是老干部，都被你得罪光了。张春桥回答：我知道，但是没有办法，最后落得千刀万剐！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一文发表后，朱永嘉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听取对该文的反应，并把听到的意见写信向张春桥汇报。5月3日，张春桥在朱永嘉的信上批示：“你们的几封信，包括对文章的意见，都收到了。谢谢。我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没有写回信。萧木的文章也只是翻了一翻，还来不及想意见。”<sup>26</sup>萧木的文章指的是他撰写的《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

在写文章的同时，张春桥、姚文元还遵照毛泽东的意旨，要朱永嘉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他们编了40多条，最后由张春桥选用了33条。这些语录连同他们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毛泽东批发。

这33条语录，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进行理论论证而摘编的，使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左倾观点显得有理论根据。第1至第10条，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重要性和它的历史任

务。第11至19条，讲按劳分配、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必须对它们加以限制。第20至32条，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不断地、大批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要铲除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第33条，讲学习理论的重要性。

从执笔写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到《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的发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春桥对毛泽东意图的解释阐发都是顺利的，得到毛泽东的赞赏，用“春风得意”的旧句来表现他此时的心情，应该是恰当的。但是，张春桥在得意之中也不无苦涩，因为十大之后不久，周恩来很巧妙地对他敲打了一下。

## 迫于政治压力的离婚

文静，原名李若文，天津人。《直沽李氏家谱》上有李若文的名字。李氏家族中文静这一辈，都是以“若”字排辈，而她的上一辈的女性都是以“淑”字排辈。“淑”字辈有一位名叫李淑芳的，应该是她的姑妈。张春桥在1945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爱人姓名”一栏中，即填写“文静”，文静在1963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曾用名”栏目中写着“李若文、李岩、李淑芳”。文静为什么要用姑妈李淑芳的名字，她又是从何时起用文静这个名字的，这些都无从知道了。中共上海市委原来的老人知道她姓李，有时也称她为李文静。

文静在读中学时，就是进步学生，高中毕业，考进燕京大学新闻系，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1944年，她离开北平，投奔晋察冀边区，被安排在中央晋察冀分局学校学习，第二年毕业后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文静投奔晋察冀边区虽然比张春桥晚，但她参加进步活动的资历要比张春桥早。1933年，张春桥还是做文学青年梦的初中学生时，文静就已经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她生于1916年3月，比张春桥年长一岁。

从家庭出身而论，文静的家庭要比张春桥更现代些。她的父亲是天

津大清银行的下级职员，后来逐步提升，到了民国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时，他已经是天津分行的副经理了。文静的外婆家就更具有现代派的色彩了，外祖父辈有几位留学日本，但是她的外祖父像张春桥父亲青年时代一样浪荡，蓄妓纳妾，她的母亲很讨厌她的外祖父，文静也不喜欢他。

张春桥和文静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除了家庭出身相似外，他们还都是具有儒雅气质的文化人，都有着追求进步、投奔革命的经历，又都共同有着读书和爱好文学写作的兴趣，两人又都做宣传工作，有了更多接近和倾心交谈的机会。文静知道张春桥在上海的卖文生涯，对他的才气更加钦佩。张春桥也感到文静非同寻常，是一位很有才气的知识女性。他们的女儿说：“我妈妈比爸爸更有才气。”他们既不是一见钟情，也没有浪漫幻想，而是在革命战争现实生活中，知人知心，有情人沉入热恋中了。

爱情在战争中萌发，但也会受到战争的灼伤。1943年秋季，张春桥、文静终身大事已定，经组织同意，两人准备结婚。但还未能到揭开红盖头，他们的工作就调动了，文静去了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张春桥被调往晋察冀分局宣传部任副科长。12月8日，日军的大部队包围了郭苏区委所在地，文静和区委宣传部的人未能撤离，被围在一间房子里。日军放火烧房子，文静等被烟火熏得昏迷，被日军俘去并关押。

文静被俘的这段经历，1976年12月26日，王晓初（汪雨菲）写了揭发交待材料。<sup>27</sup>王晓初是河北平山县人，1943年投敌，1944年被押至日军甲第1417部队，与李淑芳（文静）关在同一个木笼里。他交待说：他们一起参加了宣传班，日军宣布李淑芳为班长，为敌搞反共宣传，积极编写宣传材料。李亲自讲演，宣扬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谩骂共产党、八路军。她参加了日寇组织的反共同盟。由于她忠实为日寇效劳，受到日军的称赞。

1945年5月，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失败，日本侵略军的末日也即将来临。6月，文静趁机逃离日军的宣传机构，第二次投奔了边区，和张春桥相聚。文静回来了！在焦急等待中的张春桥，陷入惊喜交集之中。

但当他听到文静变节的经历，也陷入矛盾的痛苦中。从政治上考虑，分手也属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从感情上来说，他与文静难舍难分。最终情感战胜了理智，张春桥接纳了文静。张春桥的这一选择应该是经过反复的考虑和冷静的利害关系分析的。从这时候起，虽然他会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未来，但他已准备和文静一起去跳苦海，也是爱情之海吧。

不过，张春桥虽然有了跳进苦海的思想准备，可是每当写到文静的经历时，却还是用模糊的话语，作模棱两可的回答。从张春桥、文静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来看，文静对自己变节的历史直言不讳，没有隐瞒，张春桥则写得比较含糊，后来经过组织上的多次审查，文静的行为属于变节，历史是有明确结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文静的历史问题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材料。

2011年，笔者和张维维长谈时，也谈到她的父母张春桥和文静的结婚之事，她说：“我爸爸和妈妈结婚前，爸爸也有过矛盾，曾向组织上提出来如何处理这件事，是姚依林找我爸爸谈话。姚依林先问我爸爸的意见，我爸爸表示如果组织上认为可以，他还是愿和我妈妈结婚的，他们毕竟有很好的感情基础。后经姚依林代表组织，批准他们结婚。我妈妈的历史经过组织审查，她在被捕时，虽然承认她的政治身份，但认为她没有出卖组织，也没有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1948年又批准我妈妈重新入党。”

张维维还说：“是我爸爸先去石家庄，我妈妈是后来去的，那时我妈妈已经怀上我，她是和杨沫、梅清三个大肚皮女人，坐着一辆马车进石家庄。”在石家庄生活的日子，给张春桥留下愉快记忆的是大女儿来到人间，直到五十年后，他在秦城监狱给大女儿写信时，还愉快地写道：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

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年，你又去了济南。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sup>28</sup>

1967年1月，上海在酝酿成立新的权力机构时，发生了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文静的变节自首问题成了一颗重磅炸弹，向张春桥扔来，搞得他狼狈不堪。当时正是抓叛徒特务之际，红卫兵小将四处奔波，查档案，搞外调，许多没有历史问题的老干部都蒙冤下狱，何况文静历史上确实有着变节自首的行为，自然是在劫难逃。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干涉，这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被平息下去，文静也相安无事地过关了。

九大以后，随即开展了整党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有确凿证据的叛徒、特务清除出党。文静心中有些紧张。张春桥要她请假休息，不参加运动。王洪文也对文静说：“你的问题拖着吧，反正没有开除党籍。”以后，张春桥提出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不再管康平路办公室的事，不许她抛头露面，不让她参加市里的领导层会议。但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并不慢待文静，让文静长期在家休养，仍旧照发所有的文件。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在王维国设在延安中路的秘密点，发现他们在整理文静的历史材料。张春桥知道在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中，无法绕开文静的历史问题。1972年秋天，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里原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的一座别墅，底层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二楼是套间，里间就是张春桥和文静的卧室。每逢张春桥回到上海，文静就从康平路大院搬到兴国路招待所去

住。张春桥善饮，文静的酒量也不错，有时就陪张春桥喝几杯。张春桥抽烟，文静的烟瘾也不小，在生活上，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很契合。张春桥和文静夫妻关系可谓和谐美满，他们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回上海，也正是合家团聚的时候。张春桥很喜欢小孩，给孩子们以父爱。其实，张春桥和有历史污点的文静生活了几十年，而文静的历史问题已经有组织结论，就这样维持下去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随着张春桥的政治地位的上升，妻子文静的变节自首的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了。

1973年8月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由政治局委员升到常委。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使张春桥感到最触动心悸的事。中共十大召开后的9月，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其夫人邓颖超随同到了上海。她到康平路大院走门串户，先后去了王洪文家、姚文元家、徐景贤家和王少庸家。张春桥的家也在康平路大院，而且和王少庸是邻居，可以说近在咫尺，而文静得知邓颖超要来，便在家等候。但是，邓颖超没有进张春桥的家门。这以后的几天里，文静不敢出门，几天后，她的心脏病发作，住进华东医院。朱永嘉曾去医院探望，遭到徐景贤的一顿严斥：谁让你去看她的？！此后，本来和张春桥亲近的人都和她疏远了。

周恩来曾将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报告了毛泽东，而毛不让查。显然，邓颖超的此次有备而行是经过周恩来深思熟虑的，这对张春桥不啻是一个严重警告。张春桥真正地意识到自己处于政治关键时刻，今后会面临着更加尖锐更加复杂的斗争，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授人以柄。他和文静不能不离婚了。张春桥向中央递交了和文静离婚的报告，中央同意了。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知。考虑到影响，这消息不必对外宣布。”<sup>29</sup>

萧木说，他曾看到过中央批准张春桥与文静离婚的文件，但是谁签字批准的，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他没有看清楚。萧木说：“张春桥和文静离婚，只是中央批准，好像并没有经法院办理离婚手续。我每次从

北京回上海，总是要到文静那里去看看，回到北京后，我也会向张春桥报告见到文静的情况，他总是会问一句：‘他们还好吧？’我听出，这个‘他们’里是包括‘她’的。我感到他们的感情还是很好，迫于政治压力，他不得不和文静离婚。至于说张春桥为了自己高升的政治前途才和文静离婚，我看不一定是这样。”<sup>30</sup>

张维维说，我爸爸和妈妈离婚的事，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爸爸和妈妈离婚，他内心深处是经过反复考虑，也是很痛苦的。他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说，乔冠华妻子龚澎去世之后，才和章含之结婚，他的孩子还都不理他，孩子们在家中挂满了龚澎的照片，乔冠华连家都不能回。爸爸还在我们面前讲了中央其他领导婚变后带来和子女的矛盾。我爸爸和妈妈的感情很纯，婚姻也很稳定。他俩都讨厌在婚姻上三心二意的事，这是因为，我爷爷在外面讨小老婆，我奶奶带着她几岁的儿子，也就是我爸爸，把我爷爷找回。我妈妈的外公在60岁还讨了一个20岁的小妾，我妈妈也很鄙视她的外公。后来我们才知道我爸爸申请和我妈妈离婚的事，我妈妈根本就没同意和爸爸离婚。<sup>31</sup>

张春桥迫于政治压力，向中央写了和文静离婚的申请报告，但是文静不同意。因此，张春桥的离婚申请只是单向的，虽然经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原则同意，但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还是不合法的。所以，后来张春桥被捕进了秦城监狱，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的时候，文静仍然以合法妻子的身份，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张春桥保外就医的申请。

## 注释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2页。
- 2 同上，第486页、492页。
- 3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 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1页。

- 5 同上，第1663页。
- 6 同上，第1661—1663页。
- 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4页。
- 8 2013年10月13日笔者和萧木的谈话。
- 9 同上。
- 10 2013年10月13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08页。
- 12 2013年12月8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3 《毛泽东年谱》第六卷记，毛泽东73岁生日家宴是在12月26日晚举行。
- 14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 15 同上，第138页。
- 1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 17 周儿浮世博客文章《邓小平在1976年》，2013年12月14日，见blog.sina.com.cn/qqzyp网页。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11—512页。
- 19 王洪文把毛泽东的话告诉萧木，萧木又将此话转告朱永嘉。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13页。
- 21 同上，第511页。
- 22 同上，第553页。
- 2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13页。
- 24 新华社记者述评：《“四人帮”上演批经验主义丑剧的前后》，《北京日报》，1977年3月4日。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 26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 27 中共中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1977年，第36页。
- 28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第149—150页。
- 29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96页。
- 30 2014年3月30日萧木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31 2011年9月6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第十九章



1974年4月6日欢送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  
(左起：张春桥、朱德、王洪文、江青)

## 第十九章

# 毛泽东战略调整： 批评“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 上海帮、“四人帮”、广东帮、三人帮

十大之后，毛泽东还在继续关注中共中央人事格局的调整。1974年下半年渐渐定局了：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此时周恩来病情加重，就由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主导国务院事务。军队系统由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主持，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样就形成掌管军事和制造舆论两个系统相互制约。但是，毛泽东也清楚，经过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等一系列运动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在中央委员会内，意识形态的左倾力量已经形成，而将来统率这一思想体系的，就是这个文官系统，处于强势。现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不同于周恩来，有虎性，又是被文革派打倒过的第二号走资派，彼此恩怨较深。猴子和老虎必然会有一番较量，此时需要为邓扫平道路，要把江青等文革派的猴子头关在笼子里，控制他们能量的释放。

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基于以上考虑，他的策略有所调整，为了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对江青等多次进行批评。7月中

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休养，他估计时间不会太短，行前需要向政治局作出一些交代。17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他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又说：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太好呢。<sup>1</sup>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上海帮”的问题，点明批评了江青，没有点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名，这说明毛泽东对江青他们的批评留下了很大的余地。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电话告诉王洪文，要他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将毛的电话内容先告知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了一大段批语：“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消几年，但文革的幽灵还在他们头上盘旋，但这次他们的对手已经不是周恩来，而是邓小平。<sup>2</sup>

围绕“风庆轮事件”，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江青的批示遥相呼应，朱永嘉除了组织写作组的人为《红旗》杂志写文章，在10月25日，他还前往工人文化宫布置歌咏大会，建议群众歌咏大会要组织歌颂风庆轮号的专场演出。风庆号是上海江南造船厂生产的远洋货轮，出厂后首航地中海，历时150天，航程32,000海里，于1974年国庆节前返回上海。风庆轮上所有设备都是中国自己制造，是自力更生的产物。

远航归来时，张春桥正在上海，指示朱永嘉组织报道。在采访报道中介绍了风庆轮生产的过程：这条船开始建造时，就以远洋货轮的标准来要求，是国务院交通部的加工订单。因为是远洋货轮，交通部对质量上有很高的要求，对国产主机及配件有些不放心，提出过意见，甚至要

求用国外产品。但是江南造船厂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坚持不换。轮船造好后，交通部又提出，为了安全起见，先跑近海。江南造船厂认为交通部剥夺了风庆轮的远航权，修船安装车间工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某些人对风庆轮的态度是崇洋媚外思想的表现”。风庆轮船员受到江南造船厂工人大字报的刺激，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们要革命，风庆要远航》。在这种压力下，交通部虽然同意风庆轮远航，还是给风庆轮派了有远航经验的李国堂当政委。李国堂在航行中写了《航海日记》，这是他的职责。日记中记录了风庆轮远航所遇到的问题，还记下了几次机械故障，表明那些自力更生的设备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风庆轮远航归来后，《文汇报》记者登船采访，拿到李国堂的日记，作了摘编，连同记者写的通讯报道送去审查，被张春桥否定了。并说：“风庆轮是个路线问题，即使回到上海沉了，也是一个很大胜利。”“要好好宣传，批判洋奴哲学。”《航海日记》不但没有能发表，还给李国堂带来麻烦，被批判了一通。江青看到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即是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按照张春桥的指示精神写的。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突然又提出风庆轮问题，要邓小平表态，为此会上展开了一场辩论。邓小平原来坐着说话，后来激动地站了起来。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辩论。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离去。这是老虎出山和猴子们进行的第一次较量。邓小平走后，张春桥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sup>3</sup>在会议现场的于会泳告诉朱永嘉：“邓小平讲话不行，在会上根本不是张春桥的对手。”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17号楼商量。江青提议要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

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并告了周恩来的状。王洪文没有中央高层政治生活的经验，不知道未经召见，自己私自去见毛泽东是违规行为。毛泽东听后，当面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sup>4</sup>

10月20日，会见完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风

庆轮事件”的情况，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这么闹。”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还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sup>5</sup>

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毛泽东又批评江青：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毛泽东这次还说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sup>6</sup>这句话后来就成为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一条整治的纲领。

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基本上是个闲人，没有分配她什么工作。20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批道：“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过了好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sup>7</sup>

《李固给黄琼书》载于《后汉书·黄琼传》和《后汉书·李固传》。黄琼是东汉中叶顺帝到桓帝时期的人。这是外戚宦官专权的时期。黄琼有名于时，当时地方官与公卿多荐黄琼，琼皆称疾不进，好友李固遗书黄琼，其书云：“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用这些话告诫江青，不要干政太多。江青趾高气扬，常做一些打乱毛泽东战略部署的事情。她要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做什么，他们是很难抵制的。同样，没有他们三人的配合，江青一时也兴风作浪不起来。所谓“峣峣者易缺”，是指刚直的东西易折损，“皎皎者易污”，指过于皎白的东西易污损。“阳春之曲，和者必寡”，指江青调子唱得太高，只落得孤家寡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指江青名声很大，实际工作能力与名声并不相符。这是告诫她要有自知之明，少干预日常政务。毛泽东虽然是在告诫江青，实际上是要江青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懂得他们目前的处境，形势变了，与前几年不一样。

安定团结，是毛泽东这个时期所考虑的主题。他对江青所提出的一连串的批评，就是为了完美地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他知道江青不识时

务，此时还是冲冲杀杀，不对她进行制约，会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实现。在批评江青的时候，毛泽东几次提到要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要跟着江青跑，不要跟着江青批文件，要他们和她保持距离，减少对立面。并要王洪文回去有事多找周恩来、叶剑英商量，意思是让王洪文向元老们学些虎性，少一些猴性。毛泽东批评江青还有更为重要的深一层意思，是做给邓小平看的，给足了他面子，支持他，也是对他收拾文革残局寄以希望。

12月23日下午，周恩来、王洪文飞抵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事情。毛泽东谈了一些意见，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sup>8</sup>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批评，从上海帮、四人小宗派到“四人帮”，每次批评只点江青一个人的名，对其他三人没有点名，以此来说明“四人帮”是以江青为首的。

毛泽东深知江青的对立面不但多，而且强大，但他们怯于毛泽东的威势，不敢对她公开批评。而此时，毛泽东直接批评，拿自己的妻子开刀，举起安定团结的旗帜，谁还能对江青说三道四？周恩来在汇报时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这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此时，毛泽东早已在考虑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事。可是，周恩来向毛泽东谈到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罗荣桓元帅建国后曾长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早已于1963年去世。毛泽东这么说，可能是周恩来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人选中，没有张春桥，他也没有接毛泽东借江青之口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的话茬，所以毛泽东以开玩笑的方式提出“罗荣桓”，对周恩来表示不满。

张维维对笔者说：爸爸告诉我，毛主席要他当总政治部主任的事，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三人联合反对，搞了很长时间都决定不了。后来毛主席生气了，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爸爸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在毛主席坚持下才决定下来。我对爸爸说，这么多人反对你，你干嘛要当总政治部主任。爸爸说，其实

我也想读书写文章，没有办法，是主席要我当的。<sup>9</sup> 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又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

王洪文告状不但没有告下来，毛泽东反而给了邓小平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周恩来当然感到高兴。毛泽东建议邓小平“找几个帮手”，其中之一就是张春桥，应该说他希望邓小平和张春桥能很好地合作，使文革以来及林彪事件所带来的危机平缓地解决，使中国局势稳定下来，这是他心中的大局，如果能按照他的设想发展，中国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恰如他所说，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王洪文的两次长沙之行，改变了毛泽东原来对他的看法，而把他放回上海，做调查研究工作。王洪文回到上海，对萧木说：“孙悟空回到花果山了！”

高处不胜寒。王洪文虽然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却仍然感到生活在被挤压之中，不如回到造反发迹之地上海，生活在小兄弟之间，占山为王，何等轻松快活。但这只是王洪文的一个方面，他心中还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另一面，就是在等着和邓小平较量。

## 在邓小平整顿的日子里

1975年1月14日，毛泽东圈阅了周恩来、王洪文呈送的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送审报告说：主席提出小平同志除任第一副总理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春桥同志除任第二副总理外，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大家均同意。可见，尽管毛泽东对江青等作了许多批评，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并对周恩来、邓小平作了一些让步，但在他提议要张春桥参加军事工作，任总政治部主任这件事情上决不让步，才使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成为事实。1月5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发出之后，明确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样，邓小平和张春桥合作共事，一武一文，共管军事。

邓小平就此拉开了整顿的序幕。在千头万绪中，他首先抓了铁路的整顿，调谷牧、万里专门研究铁路问题。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于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题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当年的9号文件。文件中除了提建立规章制度，恢复秩序外，还特别强调了：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要及时进行处理。以后对钢铁、军工部门的整顿，也采取整顿铁路“调虎离山”的办法，把主要骨干企业的造反派头头调集北京，开始对他们进行整顿，让技术人员及有管理经验的人抓生产。这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现象暂时有所改变，取得了成果。上海铁路局北联北京，中联华东，南联广州，也是整顿的重点。铁路局负责人谢鹏飞虽是造反派，但积极支持邓小平对铁路整顿的方针，在万里的领导下，配合默契，使上海铁路局所辖的铁路交通迅速有了改变，深得万里的欣赏，两人的私交也不错。

6月，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毛泽东与邓小平谈了话。谈到江青等人的时候，毛泽东说她“过去有功劳，反对刘少奇，反对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找王洪文、江青”。<sup>10</sup> 其中特别谈到：“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你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的，我赞成的。”还对邓小平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要把工作干起来。”<sup>11</sup> 毛泽东这番意味深长的谈话，并没有引起邓小平的注意。还是胡乔木想得较为清楚。

197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邓小平就找胡乔木谈话，提出要他出来担任国务院顾问工作。最后，邓小平还交待说：“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然而，胡乔木对邓小平的约见和工作安排，内心还是有疑虑的。长期在中央工作的他明白，邓小平和周恩来不同，在文革中，周恩来尽量避开和江青等人的正面交锋和斗争，多采取温和迂回的方式；而如今邓小平的工作设想，显然是要与江青等针锋相对。同时，胡乔木又研究了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发现其中并未涉及文革中执行的路线错误，大多是工作作风问题。他担心形势会骤然变化。<sup>12</sup> 还是胡乔木了解毛泽东，对毛泽东批评江青的事看得比较透彻，毛的批评意为“恨铁不成钢”。他虽批评江青政治能力

有所不足，但对江青在革命立场上的坚定性和政治敏感性，还是充分肯定的。

邓小平毕竟是有经验的政治家，他明白要打败江青、张春桥等，光凭他这样的改革是无法达到的，甚至或许有些地方他们还能接受。应该说他认准了真正对手是张春桥，必须要把张春桥所掌握的思想舆论阵地夺到自己的手中，才能打中张春桥的痛处，要达到这一目的，武器只能是接过毛泽东思想。他知道张春桥在上海有一个市委写作组，而他自己就必须有一个对应的文人写作机构，他决定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样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和张春桥唱对台戏。于是他改变了要胡乔木担任国务院顾问的想法，决定由胡乔木负责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但又不能和张春桥的写作组直接论战，要找到一个抓手，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因此，邓小平要胡乔木负责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他对胡乔木说：“毛选的稿子，文字上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再由我送给毛主席审查。”<sup>13</sup>

《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在文革之前一直由刘少奇负责。刘少奇被打倒以后，1967年12月29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毛泽东提出：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并决定这个工作由康生负责，后来康生身体不好，由张春桥管了。1969年8、9月间，张春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四人读书小组，他与朱永嘉、王知常、萧木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朱永嘉告诉笔者：1969年国庆节，我到北京上天安门观礼，观礼结束后，康生要我去钓鱼台，为编《毛选》第五卷的事谈了两个上午。后来，上海带来几本红封面的《毛选》五卷。此时《毛选》五卷的篇目都定了，我们的任务是校对。张春桥严格要求要忠于毛泽东原著，一字也不能改。后来，我们就组织了读《毛选》小组，找了一篇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杨尚昆的批语，因为当时有一个文件，他们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同意”就发出去了，毛泽东为此事写了批语。<sup>14</sup>五卷中没有涉及到林彪的文章，张春桥要我们找，没有找到。我们校对好就送回北京。毛泽东可能没有功夫看，也就没有出版。<sup>15</sup>编辑注释《毛选》是举旗子的事情，谁都想抓到手。

这件事本来是张春桥手中的旗子，邓小平要胡乔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是要把旗子夺过去扛起来。1975年6月15日，邓小平联名康生报告政治局，提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的建议，并正式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小平给当时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洪文写了一封信，说：“康生同志和我建议一件事，提请政治局审议批准。”邓小平的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后，经毛泽东圈阅，不同意成立编委会，而是批准了由胡乔木担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成立了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负责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小组。毛泽东没有提出让张春桥参加这项工作，其用意很明显，是为了防止邓小平和张春桥碰撞而产生矛盾。

针对当时混乱局面及整顿的需要，邓小平首先选了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胡乔木也像张春桥在上海搞的“读毛著小组”一样采取了“读文件”的办法，几乎是每周一次。胡乔木还写了《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说明》，由邓小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个说明上圈阅同意。但第二次审稿时，毛泽东却加上了这样的批语：“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sup>16</sup>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邓小平尽快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愿望。这是邓小平没有想到的。

毛泽东为什么否定了胡乔木的整理稿？当时参加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回忆，在修改补充定稿过程中间争论不小。争论主要在胡乔木和李鑫之间。<sup>17</sup>大致是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得少一点。更主要的，胡乔木主张讲阶级斗争要讲得准确一点，周到一点。李鑫则主张保持原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胡乔木的意见占优势。“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矛盾暴露出来，李批评胡的意见就多了起来，说这里改得不行，那里改得失去原意。邓力群说，李鑫批评胡乔木的话，他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对阶级斗争，胡乔木一窍不通。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被挤出《毛选》编辑班子，理由是他篡改毛主席著作，不宜继续担任这项工作。<sup>18</sup>

很清楚，毛泽东本来划了一个圈，表示同意，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不同意发表《论十大关系》，就是因为胡乔木改得太多，用现在的

话说，对作者不太尊重。而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毛泽东出尔反尔，是邓小平想在毛泽东这篇著作中夹带自己的东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现在公布的毛泽东的指示，都是经过加工的，许多重要的东西都删去了，或者是断章取义。比如华国锋他们公布的所谓毛主席指示，也是经过删改的。而张春桥在引用毛泽东指示或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大致还是能遵照毛泽东原来精神。

在这场政治较量中，邓小平主动求得毛泽东的支持，不断把他们整理的有关“上海帮”的材料送给毛泽东，还向毛泽东转去了一些文艺界的来信。据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一书中记载，经他的手搞了两个材料，一是他们查了十二篇文章，都是把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话中的“百花齐放”删掉了，状告这是“姚文元的主意”。另一个是整理了一份《关于报刊上宣传“三突出”创作原则情况的材料》，状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材料都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另外他们还整理了一份报纸有关反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的材料，也收集了一些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反应的文章。这些都转给邓小平了。邓小平看后说，他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后来也由邓小平送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对这些材料都没有表态。<sup>19</sup>

1973年7月初，毛泽东在与邓小平谈话时说道：“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sup>20</sup>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就对胡乔木说：毛主席开始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我们对这方面情况很不了解，政研室成立以后，你们要注意收集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

当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青年教师李春光在院内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控制文艺的政策。他们将大字报抄录了下来，邓力群在前面加了一个按语，介绍作者，然后把大字报抄件送给胡乔木，后来由邓小平送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sup>21</sup>

经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材料中，有一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1975年2月春节期间，影片《创业》公开放映，可是放映的第二天就停止了。到4月，文化部罗列了《创业》十条罪名，不让影片公开发行。

邓小平把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下了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并说：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蠢事。<sup>22</sup>此事惹恼了江青，她当面斥责张天民：“告老娘的刁状！”张春桥也说：主席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准确的。“此片无大错”，没有大错，还有小错、中错呀！

邓小平还曾转送《海霞》主创人员给毛泽东的信。文艺调整的信息传出后，电影《海霞》导演谢铁骊很兴奋，7月2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邓力群帮助转交。信经胡乔木之手，再由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邓小平专门召集政治局的成员看《海霞》一片，江青称病不参加，张春桥也没有到。一共八位政治局成员看了电影，认为所谓毛病也只是看法不同，建议可以发行。江青就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政治局审看电影。

从上一年7月中旬，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直到此时，“四人帮”，尤其是江青、张春桥，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因为邓小平有毛泽东的支持，所以他们对邓小平采取的措施毫无还手之力。

## 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

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4月18日在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之后，和邓小平谈话，邓小平汇报张春桥等大批经验主义的情况，并向毛泽东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又给了邓小平很大的面子，虽然张、姚的文章虽然是他提议撰写，写完后又经过他批准发表的，但此时他还是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还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

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sup>23</sup>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对江青、张春桥等提出批评，批评江青提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江青作了检讨。会后，王洪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5月初，江青也打电话向毛泽东告状，讲政治局开会的情况，说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再现”。工作人员把江青的电话内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29日，邓小平前往305医院，向正在住院接受治疗的周恩来报告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会议，直接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5月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处，召开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sup>24</sup>他说：

好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的那篇文章，<sup>25</sup>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sup>26</sup>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sup>27</sup>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笔者评析：3月1日，张春桥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到任后的第一次讲话就是批经验主义。同一天发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主要也是批了经验主义。邓小平等意见很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矛盾应该是讨论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已有所考虑，所以会议一开始，他就挑开了这个问题，而且把姚文元的文章说成是张春桥的文章，不知是他记忆错了，还是有意这样说的，并说“对不起春桥”。不管怎样，毛泽东自己承担

了责任，显然也是为张春桥开脱。邓小平等本来要向张春桥发动进攻，这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毛泽东就此把批判经验主义引起的矛盾平息了下去。接下来毛泽东讲了经验主义问题，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他又说：

有经验主义的人很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做手势）

笔者评析：毛泽东首先强调了要安定团结，解决经验主义“要用教育方法”，接着转移了话题，说许多人都犯有经验主义的毛病，这就使人理解，张春桥批经验主义不完全都是针对中央某几位领导人的。经毛泽东这样解释，中央领导人可以减轻思想负担，改变了张春桥批判的经验主义的内涵。毛泽东这样的解释是为了缓解邓小平等人和张春桥对立的矛盾。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要把张春桥解脱出来，他说：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到最后，毛泽东把话说得更彻底了。他说：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sup>28</sup>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共产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周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是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sup>29</sup>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东，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笔者评析：在这里，毛泽东公开点出周恩来就是经验主义者，他曾被教条主义俘虏，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言自明，张春桥批判经验主义的讲话及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重点批判经验主义，都是毛泽东授意的，而且是有历史根源的。毛泽东不但点明周恩来曾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还把邓小平拉到自己这一边，称他是“毛派的代表”。毛泽东这次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主题是解决批经验主义。这个矛盾的由来是因为毛泽东授意张的讲话和姚的文章，引起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派们以保卫周恩来为由所作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考虑到邓小平要整治张春桥，张是无法抵挡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他才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自己承担起批判经验主义的责任，保护了张春桥，同时还婉转地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这次政治局会议已经过去40多年，由于官方舆论一直称这是一次批评“四人帮”的历史性会议，所以毛泽东的真实用意被忽略了。

毛泽东希望不要因为批判经验主义而引起党内的分裂，造成刚刚稳定的政治局面再次出现混乱，所以他才讲了许多安定团结的话。他直接点名批评江青，也是以此求得安定团结。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指出：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

条，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

在重申“三要三不要”原则后，毛泽东说：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就是这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这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帮派，什么广东帮、湖南帮。

笔者评析：后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主要的根据是因为他们违背“三要”“三不要”，抓捕他们是毛泽东早已确定的方针，以后的一些文章也多认为“三要”、“三不要”完全是批判“四人帮”的。其实这是华国锋一方为了证明抓“四人帮”的政治需要作的解释。此后分析5月3日会议的意义，都是沿袭这样的理解和说法，这明显不够全面。“三要”、“三不要”不是什么新的提法，九大、十大都讲过这三条。毛泽东讲话和处理事情，都是两点论，有阴阳正反两个方面，讲要团结不要分裂也是这样，总是双方的，应该包括元老派和文革派两个派系。不要忘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是为了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如今他警告“不要搞修正主义”，其侧重点还应该是元老派，他知道元老派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有人在。

毛泽东在会上主要批评了江青，他说：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名义，不要用个人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笔者评析：毛泽东主要批评的是他的夫人江青，批评的内容都是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的问题。他对江青的批评，实际是带有堵住别人嘴的

示范作用，其用意是：我已经批评她了，希望你们不要在她的问题上再啰嗦。再说，毛泽东自己就是文革派，他主动批评文革派，这样就取得了对元老派批评的发言权。毛泽东提出“四人帮”问题的期限：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笔者评析：这里的“三年”是什么概念？意思很清楚，元老派们不要纠缠在解决江青等四个人的问题上，也不要纠缠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大家都老了，谁知三年后会怎样？把话说明了，就是以安定团结为重，元老派要忍，文革派也要忍，让权力实现稳定的过渡。毛泽东所说的“三年”，大家都听懂了。元老派不能忍三年，要急于解决他们四个人的问题，王洪文的年龄占优势，他能忍，所以他回到上海给他的小兄弟说“十年后再见”。

会后，毛泽东讲起古代东吴孙权的故事，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sup>30</sup>

叶剑英背诵之后，毛泽东指指叶说，此人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孙仲谋即孙权，毛泽东寄意很深，如今找不到孙仲谋这样的人才了。毛泽东是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但他又有些迷茫，接班人在哪里？由谁来接班？

毛泽东谈话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谈话，就如何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贯彻毛泽东讲话。5月21日，周恩来写信致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即将召开批评王、张、江、姚四人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果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在接到退件后，周恩来将5月21日信的原件送毛泽东批阅。

经毛泽东批准，5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5月3日讲话，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邓小平强调要他们讲清楚三件事：一是前年12月会议上提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sup>31</sup>

6月14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检讨。这次会上，张春桥、姚文元作了自我批评，江青除承担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还谈了一下他们四人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6月28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王洪文于6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在这一个回合的斗争中，又以邓小平取胜而暂时告一段落。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退让应该说到了最大限度。其实，邓小平也应该了解毛泽东，这样的退让是会给他带来风险的。有两种可能，一是邓小平根本没有体会到有什么风险，二是他体会到了，但也要冒着风险继续干下去。

## 评《水浒》的连台好戏

1975年8月，毛泽东在杭州，眼睛患白内障，视力不佳，不能看书，就和在他身边读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芦荻讨论关于《水浒》评论的问题。毛泽东发了一通议论，芦荻作了记录整理。8月14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正式印发。经整理正式印发的这篇讲话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三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sup>32</sup>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sup>33</sup>

邓小平看到毛泽东这段指示后，也曾专门向毛泽东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毛泽东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古典文学看法问题，用不着议论了，用不着传达了。”因此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没有传达，就这样轻轻放过去了。

姚文元看到毛泽东对《水浒》的这段议论后，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要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如何进行宣传。据说从收到文件到写信的过程，仅仅用了三个小时。姚文元把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对防修反修，是有积极意义的。姚文元在信中提出：

为执行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情：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市委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报告；二、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上鲁迅评论的工作；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

浒》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一个规划。<sup>34</sup>

对姚文元《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毛泽东。9月2日”。<sup>35</sup>毛泽东几天前还给邓小平关于《水浒》谈话的请示表态说“用不着议论了，用不着传达了”，而此时忽又同意姚文元在报上作宣传，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的想法改变的呢？这里有没有不让邓小平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意思？还是评《水浒》确有所指？

北京的报纸对评《水浒》的确是很热心的，主要表现在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说：“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路线得逞。”8月31日，《人民日报》除了转载这篇评论外，还发表了署名“竺方明”的长文《评〈水浒〉》，提出要“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9月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说评《水浒》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红旗》杂志从第九期到第十二期，四期中共发表文章21篇，都是集中批投降派的。

而从上海市委写作组办的《学习与批判》发表的文章来看，有些文章还近似学术讨论，如罗思鼎《三百年来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余秋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康立《评〈水浒〉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作用》、翟青《评〈水浒〉的人性论》、红宣《〈水浒〉与国防文学》，这些写作组的骨干用笔名或真名写的文章，并没有把小说和现实联系起来。胡乔木倒是写了一篇联系现实的文章《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9月12日，江青跑到大寨，发了一通感想，什么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她认为是有的。胡乔木把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向邓小平作了汇报，认为江青在大寨的讲话是“影射邓小平”的。邓小平听后，说：真的指我，那要把讲话材料送给主席看。不过不能由我送，要通过别的途径。<sup>36</sup>毛果然在她的讲话稿上批语：“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她搞批《水浒》。”<sup>37</sup>江青又提出农业学大寨会议放她讲话的录

音，印她的发言稿。毛泽东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史评家都认为江青、姚文元批投降派就是针对周恩来，江青所说的架空晁盖的宋江就是指邓小平，邓小平也认为江青的话是针对他的。批投降派对周恩来的刺激更大。1973年，由外交部的一份《新情况》引发出来的毛泽东“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批评，周恩来承担了责任，后来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与会者批评周是右倾“投降主义”。“投降主义”本来就是周恩来内心的隐痛，这时江青、姚文元又大肆宣传批“投降主义”，周恩来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了。9月20日，在周恩来进入手术室将要施行癌瘤切除手术时，他大声说：“我不是投降派！”

4月27日和5月27日，也就在5月3日毛泽东谈话的一前一后，由邓小平两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张春桥他们四人提出批评，而且江青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而此时她借着毛泽东有关《水浒》的讲话，以为反击的时机到了，所以她马上跳了出来向邓小平发动进攻，张春桥则处于静观的状态。邓小平除了把江青在大寨的讲话传递给毛泽东外，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动作，应该说也处于静观的状态。看来毛泽东也无意把评《水浒》的问题展开，也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评《水浒》就草草地收场了。<sup>38</sup>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直到这时，处于最高地位的毛泽东，仍然希望双方妥协，进行合作？毛泽东毕竟是82岁的老人了，再也没有精力掀起风浪进行折腾了。在他去见马克思之前有一个稳定局面，算是对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如果他还是在动荡中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那又如何向历史交待呢？但这不过是他的美好愿望，无法实现。

##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在变化

为使中共高层权力能平稳过渡，使中共党内乃至全国能有相对稳定的时期，经过一个时期的思考，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项指示”：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sup>39</sup>同年11月，毛泽东发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sup>40</sup>以及同年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sup>41</sup>

毛泽东这三项指示与十大以后的人事格局有关联：“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派提出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以张春桥为代表的务虚派提出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务实派和务虚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希望双方和舟共济，在坚持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理论的前提下，搞好国民经济。但是务实派和务虚派双方矛盾客观存在，而且很尖锐，双方都没能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去做。这也是“办事权”与“发言权”二权分立的必然结果。

197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讲话，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他强调：毛主席最近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sup>42</sup>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积极行动起来。

时间到了1975年9月，北京的天气已经转凉，而胡乔木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却继续升温，先后出台了以胡耀邦为首撰写的《科学院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胡乔木自己执笔撰写的《工业二十条》及邓力群执笔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全面地、系统地表述了邓小平整顿工作的纲领。

《工业二十条》为曾经被批判的“唯生产力论”、“业务挂帅”正名，进行反批判；《汇报提纲》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总纲》依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概括成“三项指示为纲”，完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胡乔木还想把《论总纲》作为头条文章发表在《思想战线》上。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之始，胡乔木就酝酿，既然张春桥在上海办了《学习与批判》杂志，那么政治研究室也须办一本杂志，取名《思想战线》，放在中国科学院。邓力群说：这个杂志是准备全面反映中央各项指示，各条战线动态。很清楚，邓小平是要把“办事权”及“发言权”统一起来，由他这个系统来掌控。张春桥当然很警惕，这个刊物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他们的写作队伍面临挑战、面临劲敌。他们在内部作酝酿，准备这个杂志的文章出来一篇批一篇。这个刊物从政治研究室成立一开始就筹办了，有一个请示报告，也有第一、二期组稿

方案，但是直到邓小平挨批，刊物也没有出来。

《汇报提纲》写成后，邓小平看了很满意，9月30日即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病中花了二十多天读完了这份《汇报提纲》，退回文件时，告诉邓小平：“我不记得我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sup>43</sup>毛泽东的话，让邓小平碰了一个软钉子，这是他没有想到的。10月4日，邓小平让胡乔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赶快再修改一次。可是还没有修改，又发生了另外的事情。10月13日，邓小平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刘冰的第二封状告迟群、谢静宜的信转呈毛泽东。信中状告迟群因没有当上教育部长，在清华大学装疯卖傻的事。

8月13日，邓小平帮助转交了刘冰的信。前几次转信，邓小平是一路春风，得到支持，而这次转送状告迟群的信，毛泽东却没有立即批复。10月19日，毛泽东在和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谈话时说：

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现在他们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教育。对犯有错误或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先开会研究处理。<sup>44</sup>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sup>45</sup>

11月1日晚上，毛泽东把邓小平找去，批评了他为刘冰转信的事。这是毛泽东自从邓小平复出以后第一次批评他，口气还比较缓和。邓小平问：这一段时期以来中央工作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毛泽东只说了一个字：“对。”<sup>46</sup>

1975年9月，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代替王海容、唐闻生，做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去世后，毛泽东视毛远新如同儿子，比王海容的远亲关系更进了一

层。毛远新是在江青身边长大的，他们的关系也不错，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常在邓小平身边走动。邓小平搬到东交民巷后，这时已经是火山爆发前夕，王、唐仍然常去邓家，一谈半天。毛泽东也觉察到王、唐与邓走得近，起了疑心。用毛远新转述毛泽东的话说：“她们两只耗子，看到我们的船快沉了，急急忙忙跳到邓小平的船上去。”在外交部亚洲司任职的章含之，此前曾做过毛的英文教师，由于王、唐的出现阻隔了她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她一直心有不满，此时她知道毛泽东对王、唐的疏远，便乘机要自己的丈夫乔冠华，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转送了一批反映王、唐的材料。毛泽东发现其“动机不纯”，指责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人们常以为，毛泽东是听信“四人帮”“谎言”做了许多错事。其实毛泽东洞察一切，他不用听信“谎言”，对事情都有自己的独特判断。但是，毛远新来到他身边之后，情况变了，使他原来对邓小平大力支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毛远新在谈到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时说：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又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sup>47</sup>担心中央，怕出现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提议召开小范围会议，当面向邓小平本人谈出以上意见。<sup>48</sup>

11月初，毛泽东派毛远新到东交民巷邓小平的住地找邓小平谈话，一下子就谈崩了。毛远新走的时候，邓小平没有送客。毛远新把和邓小平谈话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又叫毛远新找汪东兴、陈锡联和邓小平一起谈。毛远新发言后，邓小平讲，他是从今年3月的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他和毛远新的看法是不同的。不过邓小平的态度虽然很强硬，但他表示愿意作检讨。

11月3日、4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由毛远新、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等找邓小平谈话。会上，张春桥批评邓小平：刘冰之所以把信寄给你，是由于你与刘冰的立场、感情有某些一致的地方。毛泽东仍然强调对邓小平要帮助，要求会议还要扩大几个人，但是“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sup>49</sup>

毛泽东虽然一直对邓小平大力支持，但邓的一系列整顿，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危险，却又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对邓小平既要使用，又要敲打，便以刘冰这封信为导火索，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邓小平、张春桥之间的根本矛盾

毛泽东怕江青把事情搞坏，怕张春桥树敌太多，不让他们参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直到以后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邓运动，仍然不让他们参与，这是毛泽东对他们的保护。但是邓小平恐怕心中很清楚，张春桥才是他真正的对手。张春桥虽然没有和他面对面的较量，但他绝没有忘记张春桥。11月15日，邓小平向毛泽东致信称：“我觉得以后见主要国宾，由我一个人出面，过于繁重，故拟请春桥出面如何？”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试探毛泽东对他支持的程度，而毛泽东明确表示拒绝，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议，春桥可以参加迎送及宴会。”毛泽东还特别删去了邓小平信中提出的“江青同志会见安排”，并把“由邓小平或张春桥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祝酒”中的三处“或张春桥”圈掉，表示一切仍由邓小平主持。<sup>50</sup>邓小平一直在试探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态度，也许毛泽东心中清楚邓小平此时的想法，对张春桥的事不作明确表态，而且不让邓小平和张春桥有直接碰撞。

11月15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

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语：“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毛泽东11月15日23时”。<sup>51</sup>毛泽东没有利用王洪文回京的机会让邓小平离职，表明他还没有决心抛弃邓，或者他已经了解邓小平的用意，隐而不发。毛也没有让王洪文再主持中央工作，说明他可能不想把权力交给王洪文。把权力交给谁，毛泽东似乎还在观察。

邓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泽东深知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不在少数，更有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因之，他希望中央能有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一个肯定性的结论，写入史册。毛泽东也在考虑，这样一个决议，不能让张春桥他们来做，如果他们做了，会引起更多人不满，说不定哪一天还会被推翻。毛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他是有令必行，但周对文革又持有许多保留的态度。而邓小平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处于冷藏状态，没有做实际工作，和方方面面都没有矛盾；又是他请邓小平出山，授以政权和军权，有恩于邓小平。所以让邓小平主持制定肯定文化大革命成就的决定，是最合适的人选。毛泽东这样考虑的出发点，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做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他改变观点。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sup>52</sup>

邓小平断然拒绝改变观点，毛泽东就要继续给他施压。11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了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其中称：“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

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问题，此后，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

12月20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了检讨发言。在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后，他说：“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会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表示他在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他希望能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12月下旬，由外交部提出、经毛泽东批准，张春桥出访柬埔寨。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曾访问中国，由邓小平陪同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张春桥访问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民主柬埔寨，是要和波尔布特讨论如何安排西哈努克的事。张春桥访问归来的那天，邓小平前往机场迎接。张、邓本是政治上的对手，为什么会是邓去迎接呢？这是因为，邓小平受毛泽东的批评后，曾向中央提出辞去一切职务，但毛没有同意，让他分管外交。

张春桥走下飞机舷梯，他们作了礼节性的握手，就坐进汽车，两人都有些不自然，在沉默中进入市区。邓忽然说：“到大会堂聚一聚吧？”张应答说：“好，聚一聚。”原来这一天恰好是毛泽东82岁生日。往年此日，毛泽东会设便宴，请少数人小聚，或由周恩来发起，请在京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同进一餐寿面。而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医院病床上，已进入弥留之际。聚会时，他们两人谁也找不出有趣的话题，只好同时举杯，说“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闷头吃了一碗寿面，就匆匆分手了。

后来，张春桥和女儿谈起这次柬埔寨之行，认为波尔布特困难太多，可能搞不下去。这次和邓小平单独相处的时间虽短，却在张春桥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92年12月20日，他在秦城监狱给女儿的信中还写道：“1975年，我从柬埔寨回来，邓小平到机场接我，说：‘到大会堂聚一聚。’那一天，北京下雪，我刚刚从热带回来，很不适应。吃饭时更是沉闷。只有我和邓对饮几杯。大家虽然想说几句愉快的话，也难以改换当时的空气了。”从张春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对邓小平并

无恶感。邓小平去机场迎接张春桥一事在《邓小平年谱》中隐去，《年谱》中的这一天只记：“晚，到机场欢迎结束对亚洲、非洲、欧洲一些国家访问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1976年1月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作补充检讨，并致信毛泽东：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sup>53</sup>事情发展到此，也许毛泽东有让邓小平过关的意思。

毛泽东在批评江青等人，支持邓小平的策略转变时，还要上海市委写作组注释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评法批儒”时，把王安石封为法家，改革派，司马光是儒家，保守派。《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对司马光的还击，可谓语句泼辣，高屋建瓴，势不两立，政治阵线分明。毛泽东强调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另一方面，他讲了王安石、司马光两位虽然是政敌，但两人的文学交情不错。他给身边的人讲：“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当身边的人问他：“你现在的对手在哪里？”他说：“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成了对手？”<sup>54</sup>他这样轻轻一拨，把内心的真话搪塞过去了。可惜，邓小平、张春桥没有理会毛泽东真实的用意。

张春桥此时在静观动态。如果把邓小平制定的三个文件和前文所及“张春桥思想”相比较，邓小平和张春桥两人是针锋相对的。他们相对的焦点，即如当时人们所说的，邓小平是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张，来反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的主张。而张春桥所阐发的恰恰是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的政治路线，批评文化大革命前的方针路线，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贯穿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去的。所以邓小平与张春桥之争还是属于价值观、思想认识、政治路线之争。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两人寻求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邓小平属于务实派，中心思想就是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好主意，达到目的就是好办法。他抓整顿工作也正是这样的，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他长期形成的风格。所以毛泽东说他“改也难”。张春桥处处以毛泽东的话为准则，对毛泽

东的理论和社会理想是相信的，甚至是迷信的。当然，他对毛泽东是望尘莫及，但思路是比较接近的，他不相信“唯生产力论”就能推动社会发展，不相信物质充足，人就会变得高尚，处理问题还是沿着毛泽东的思路，防微杜渐地消除一切处于萌芽状态的不稳定因素。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在会上，张春桥和他有过不少争论，他批判过邓小平，邓小平也批评过他，但都是在开会时公开进行，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当张春桥保外就医，从秦城监狱转移江阴之后，有一次，他和女儿维维谈起他和邓争论之事，他说：

我和邓小平没有多少接触，过去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的恩怨，我和他争论都是由于观点的不同，路线的不同引起的。这就当然是不相让了。邓小平是真有才干，脑子清楚，确实会打仗，一个命令下去，谁干什么，怎样干，交待得清清楚楚。文革期间精兵简政取得了成绩，邓小平出来工作后，这个部门要恢复，那个部门要恢复，我就给他讲，当时为什么要精兵简政，机关减下来多不容易，邓小平根本不睬我。邓小平耳背，有一次总理找我们开会，传达毛主席要搞好团结的指示。邓小平问我总理在讲什么？我告诉他：在讲要我们搞好团结。邓小平说：除了这还能干什么？我说：吃喝拉撒睡。邓小平很不高兴。他这个人不读书，不看报，打牌，用专机把牌友接到外地去打牌。河南发大水，水库大坝决堤，驻马店淹死了人，纪登奎请示邓小平，说他在睡觉，实际上他打牌去了。<sup>55</sup>我们打越南进行自卫战时，叶剑英不行，听邓小平的，他拿着小红旗，邓小平说插到哪里他就把旗插到哪里。叶平时工作也不行，开会时做脖子操。<sup>56</sup>

邓小平和张春桥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也都清楚，没有毛泽东的旨意，谁也别想扳倒谁。在整顿的日子里，邓小平是发威的老虎，张春桥只不过是被主人控制住的猴子，主人不让猴子去碰老虎，所以猴子也不敢妄自行动。

## 注释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页。
- 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1页。
- 3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52页。
- 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22页。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56页。
- 7 同上，第557—558页。
- 8 同上，第562页。
- 9 2013年12月8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0 庄则栋，乒乓球运动员，曾连续三届获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时任国家体委主任。
- 11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66页。
- 12 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页。
- 13 同上，第375页。
- 14 1953年5月，中共华南分局报告该局第三书记方方的检讨。5月19日，毛泽东向刘少奇、杨尚昆批示：这个文件要发给参加中央会议的同志，准备讨论。批示中说：“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同天，毛泽东又一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要他们检查有哪些文件没有经他看过就发出去的，批示中还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张春桥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从中央保存的文献中找到毛泽东这两条批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并加了标题：“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1990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将毛的这两条批示同样收入，加了标题：“关于用中央名义发文件、电报问题的信和批评”。在注释中还说：本篇曾节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加拟了服务于当时政治需要的标题和题解，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15 2013年10月17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6 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第375

- 页。
- 17 李鑫，时任康生的秘书，并负责管理毛泽东文稿。
- 18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征求意见稿。
- 19 同上。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第451页。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01页。
- 2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30页。
- 24 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现存中央档案局。1980年对“四人帮”公审时，审判员王文正曾调阅过毛泽东这次讲话记录整理稿，虽然很快就被收回，但这份会议记录整理稿铅印本还是流到社会。笔者即根据此本，引用了其他著作中删去的一部分。
- 25 应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
- 26 指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 27 指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
- 28 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1920年代后期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松散团体。他们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之所以还有“半个”，是因为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后来“二十八个半”被视作教条主义的宗派团体。
- 29 短促突击，即《论短促突击》，林彪在土地革命时期撰写的军事理论文章。华夫，即李德，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后掌握了红军的领导大权，因其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全面失败，不得不进行长征。
- 3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31—1733页。
- 31 张春桥记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
- 32 金圣叹，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评点过《水浒传》、《西厢记》等多部小说、戏曲作品。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57页。
- 34 同上，第462页。
- 35 同上，第459页。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96—97页。
- 3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51页。
- 38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荡》，意思是说没有人不肯善始，但很少有人善终。
-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43页。
- 40 同上，第556页。
- 4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13页。
-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0页。
- 43 丁晓华：《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第376页。
- 44 六人，指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
-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14—615页。
- 4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54页。
- 47 指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对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25页。
- 49 1975年11月4日毛远新笔记。
-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28页。
-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97页。
- 5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26页。
-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 54 郭金荣：《走进毛泽东最后的岁月》，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1页。
- 55 河南发大水，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暴雨洪水成灾，吞没2.6万生命。三门峡要炸坝，三门峡大坝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大坝解决了黄河下游时常泛滥的问题，但因泥沙的大量堆积，又造成了上游渭河的严重水患等一系列问题，故从1960年代中期起，经常出现将三门峡大坝炸掉的建议。
- 56 2011年5月25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第二十章



1976年1月15日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

## 第二十章

# 邓小平下课及四五运动

### 群众不满：毛泽东冷落了周恩来

重病在身，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他时刻在关心着这场斗争的发展趋势。他的注意力随着毛泽东的想法在转。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他就让人找来《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看；毛泽东说《创业》“此片无大错”，他就让人找来江青搞的对《创业》的“十条意见”阅看；毛泽东评论《水浒》，他就让人找来《鲁迅全集》中《谈金圣叹》的文章阅读，对近期报上宣传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他说：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1975年12月8日，王洪文来医院看望，谈话中，周恩来还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12月底，周恩来进入连续昏迷状态，中央领导人来医院和他告别，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他握手的。他用微弱声音对张春桥说：“你和文元要好好帮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他同叶剑英谈话时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sup>1</sup>他读着毛泽东诗词，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关于“伍豪事件”的遗言，高喊着“我不是投降派”，在痛苦的思索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sup>2</sup>

在毛泽东身边，周恩来过的可谓是大管家的生活，一切要看主人的脸色行事。处理一些人和一些事情，他虽然有自己的原则、自己的方法，有时看似是自作主张，但都局限在毛泽东的“法”和“势”之内，不会越雷池一步。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心，不只是表现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更是如此。不仅国家大事，就是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周恩来也要关心照料。毛泽东的住处是周恩来选择的；毛泽东吃的饭菜，周恩来要时时关心，有时还要自己先尝尝，合不合毛泽东的口味；毛泽东出行走的路线，周恩来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坐的沙发，看戏时坐的椅子，周恩来都要先行试坐，看看稳不稳，即使有暗藏的定时炸弹，周恩来也要先以身试之。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同时毛泽东对周呢？尽管毛泽东身边的人也回忆他曾说过几句对周恩来信任的、很关心之类的抽象的话，一些电影和文章也宣传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革命友谊；但我们能听到的称呼多是“恩来同志”或“总理”，这是最亲、最高规格的称呼了，并没有像对林彪那样称之为“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周围的人能被称得上是他的战友的，自始至终只有林彪一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私人情感，没有私人交往。他对身边的警卫人员和几个女孩子，时常常会表现出随意、亲切的人情味，对亲朋、党外人士，也保持着中国传统的礼貌或好客，可是对党内高层领导人物，即便多年合作共事，他的举止也是有着严格分寸的，这是毫不含糊的上下级关系。毛泽东对中国等级制度有着继承和弘扬，他的“法”与“力”使那些高级干部望而生畏。他晚年对妻子江青也是如此，在中共九大时，江青吵着要当政治局委员，他说：你当政治局委员可以，以后见我，要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要先请示报告。

最令人心寒的是毛泽东对周恩来逝世的冷漠。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这之前的十几个小时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不断送到毛泽东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这一份又一份的病危报告，却没有说一句关切的话。周恩来心脏停止跳动，张耀祠把这一

噩耗写了纸条，放在毛泽东卧室外大厅的长几上，毛泽东却一直在卧室里，没有留意到；直到下午3点多钟，身边工作人员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他，他慢慢地闭上眼睛，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但他始终不说一句话。周恩来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毛泽东，服务员孟锦云请示了汪东兴，回答说“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汪东兴深知毛泽东对周恩来态度。<sup>3</sup>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生活秘书张玉凤的叙述则有些不同：

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钟，毛主席几乎一夜未合眼，侧身听着文件，负责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匆匆到游泳池毛主席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主席。

主席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总理逝世，主席早就料到了。……长期的伤感，使他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

在审阅中央开追悼会的规格、参加的负责人数和悼词的报告时，张玉凤脱口而出地问他：“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走不动了。”毛泽东只是在送审的悼词画了一个圆。张玉凤说：“这个圆表示了毛主席对总理的深厚友谊。可是在人民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示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sup>4</sup>

这个悼词中没有说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毛泽东视力不好，一时疏忽漏掉了，悼词他事先是认真审过的。据汪东兴说，毛修改了三次。毛泽东是如何修改周恩来悼词的，至今没有只言片语披露出来。就是这样，没有称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悼词，更没有一字提到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没有一句对周恩来关心的话，也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这种种做法，激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愤怒。

## “相逢拥抱泯恩仇”

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按照有关规格，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参加追悼大会。治丧办公室建议，请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和赛福鼎回京参加吊唁，江青厉声质问：“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还要把京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都叫到北京来啊？”当时治丧办公室提出吊唁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时间安排为五天，人数安排为六万。江青把时间压缩为三天，人数压缩为四万。

接下来，就是谁来主持周恩来追悼会，谁来致悼词的问题。周恩来去世之后，中央领导人的名单排列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张春桥。按这个名单顺序，周恩来的追悼会应由王洪文主持，叶剑英致悼词。但是叶剑英提议由邓小平致悼词，张春桥不同意，但叶剑英坚持，后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这也是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前，最后一次在媒体上公开露面。

周恩来活着的时候，江青等和他较劲，人死了之后还要较劲，群众不能戴黑纱，单位不能设灵堂。1月9日，新华社请示有关周恩来逝世宣传报道的事宜，姚文元表示没有报道的任务，各国唁电不能占太多版面，唁电标题要小，“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1月13日，姚文元还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鲁瑛，提出“国内消息、综合消息，字太大，要缩小，总理不要突出”。“不要登广场群众悼念场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登抓革命促生产的东西”。<sup>5</sup>上海也是如此，徐景贤通知各报注意，对宣传周恩来“只能低、不能高”，其他文章中有“周恩来总理”字句也要删去。<sup>6</sup>

1月26日，《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所编了一辑悼念周恩来的《报刊动向》，专门介绍周恩来的历史功绩，把清样送姚文元审阅。据说在29日，姚文元打电话追问：你们是翻案吗？要反革命吗？并且要鲁瑛追查。

在周恩来追悼会的电视新闻中，有两个花絮镜头值得一提：一个是在江青行礼时不摘帽子，而且左顾右盼，引起群众的愤怒；另一个是张春桥走到邓颖超面前和邓颖超拥抱，群众感到突然和不能理解。周恩来的

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见到大姐的心情好些了，我便在一次闲聊中，向她提起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的那个引人注目的镜头问题。

“那天，我毫无思想准备，张春桥到我跟前伸出胳膊和我拥抱。此人来这一手，可能是一种姿态吧？当时，我很难拒绝他这样做。”邓大姐若有所思，亦觉为难地说。

“大姐，你跟张春桥说了些什么话？这个镜头还蛮长的。”我又问了这么一句。

“还不是去年12月，总理在医院里跟他说的，要他和王洪文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嘛。”<sup>7</sup>

除了张春桥自己，又有谁还能知道他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和邓颖超拥抱的想法呢？这一镜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一直没有人能作出合理的解释。2014年春节之后，笔者和萧木讨论了这个问题。萧木说：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考了多年，把这一镜头解释为“相逢拥抱泯恩仇”。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们的距离比较近，在我眼中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周和张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在张的叛徒问题上，我认为周做得不太妙。还有就是十大之后，周恩来陪外宾去上海，邓颖超随行，还专门到康平路大院看了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贤、王少庸几家，就是不去张春桥家。而且张春桥和王少庸就住在隔壁。邓颖超这样做，当然是周恩来的意思。王洪文到北京，周恩来就表现出对他的关心，叶剑英也拉王，张春桥当然不愿放弃王洪文。随着王洪文接班人地位的确立，周、张的关系就更加紧张了。王洪文接班成功，周恩来就成了辅佐成王的周公，有很大功劳，毛泽东让周恩来当周公，老人家心里是清楚的。王洪文是张春桥一手扶植起来的，张是“教父”角色。为了争这个位子，周、张的关系就紧张起来，虽然没有公开表现出来，我感到他们在肚皮里下功夫，用暗劲。如今周恩来去世了，张春桥的竞争对手没有了，在周恩来追悼会这样特殊的场景、特殊的时刻，

张春桥走上去和邓颖超拥抱，表示过去的恩怨都一笔勾销，双方扯平，谁也不欠谁的了。“相逢拥抱泯恩仇”，对张春桥这个拥抱的内涵，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又是政治家的邓颖超，内心应该是很清楚的，只是她不便说也不愿说罢了。这只是我近距离的感受，将来还要有历史材料来验证。

为了不让周恩来逝世的新闻冲淡批判“右倾翻案风”，或者说企图以批邓来抵消周恩来逝世给群众带来的震撼，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于1月14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清华大学《大辩论带来的大变化》的报道，署名本报记者。开头即写道：“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种宣传导向，与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沉痛气氛极不相谐，当时就遭到群众的责问：“你们对总理是什么感情？”《人民日报》还记录了对方姓名、单位，整理成材料《一些人对十四日〈人民日报〉报道版面的意见和攻击》，编发在《情况汇编特刊》上，上报姚文元。姚文元觉得太引人注目，把标题改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秘密审讯时，审判员曾问他：为什么要在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你急急忙忙地登这篇文章，连一天都等不了，是什么指导思想？

姚文元交待：这个，就是不要在总理逝世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一篇都没有了。我当时觉得前一段追悼总理是很热烈的，报纸、电视等等，效果很好。这一段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点文章，本来群众有抵制，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搞不下去，如果再拖一段时间，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没有了，不想冲淡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所以，就决定14日登在《人民日报》的头条。我没有想到会冲淡第二天的追悼会。

批邓仍在继续。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第三次做检查。政治局会议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sup>8</sup>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说：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sup>9</sup>

周恩来逝世后，中共高层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加快了办事机构的调整，加快了新的务实派代替老的务实派的速度。毛泽东停止了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还停止了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而此时，叶剑英提出请病假。表面上看是以张春桥为代表的务实派占了上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的务实派逐渐到位。其实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元老派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在批邓打招呼会议上说了一段话：<sup>10</sup>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这一段话是对两方面讲的，对文革派说老同志还有点用。更重要的是对元老派说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但毛泽东此时不会想到，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的务实派“下课”之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务实派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务实派的矛盾就上升了。

## 让一下总理位置

国务院总要有一个牵头的人。毛远新向毛泽东提出：在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中指定一个负责人。毛泽东经过考虑，告诉毛远新：“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sup>11</sup>毛泽东终于对总理人选作出了临时决定——华国锋。此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工作。

张春桥对此的态度如何？张玉凤有一段回忆说：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又掰着指头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他把主席的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得准，选得好。主席听毛远新汇报后，很高兴。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

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个决定很满意。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决定，大家都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他事，我们来办。”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经验、省委工作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经验。<sup>12</sup>

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找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后，对他们二人的态度，于1月31日，写有一个谈话情况的报告，和张玉凤“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的说法有些不同。毛远新在报告中说：“我已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并建议向政治局传达后，政治局应指定专人分别向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和军委常委、各总部负责人传达。我个人考虑，确实需要。这样做也等于向下打个招呼，小平同志有错误。”毛泽东批语：“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毛远新的话说得很清楚，也很明确，王、张二人对华国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不但“完全拥护，保证支持”，而且还建议扩大传达范围。笔者猜想，扩大传达的建议，不大可能是王洪文提出的，因为王没有这样的智谋，而应该是张春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以此来证明小平同志有错误，这才是张春桥内心的真实意图。

萧木在同笔者的一次交谈中，也说到了在这种敏感时刻王、张两人的一些情况。萧木说：王洪文是因为毛在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要我为他找点党史上遵义会议的资料，才与我说起毛谈话内容的。王说：“主席的话，我听了两次，一次毛远新传达，一次是主席亲自找我谈的。毛远新传达的比较简单，就说你去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们让一下。我当时就表示，一定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但王洪文并没有告诉我，毛远新是找王、张一起传达的，还是分开来传达的，我自然也不会去问这样的问题。不过依据常理，这在当时属于党和国家最高机密，毛远新应该是分别向王、张传达的，不大可能一起传达，更不可能有第三者在场。所以听过传达后，张究竟是有表示还是没有什么表示，除了张本人和毛远新，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我个人不怎么相信张竟会“没有什么表示”。这除了不符合张的性格，更为主要的是，毛泽东始终拥有“一

言九鼎”的权威，只要毛一发话，在中央，没有一个人会“没有什么表示”。

接着，萧木又说了毛亲自找王的那次谈话。萧木说：王洪文对我说，毛亲自找他谈话是在毛远新传达过了两三天后。王说：“我见到主席，就又说了坚决拥护主席指示的话。主席说了一些话，让我感到很亲切，很温暖。主席说，你还年轻，还有机会。从遵义会议起，我也还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是张闻天嘛。好好学习，增长些才干。”

萧木还谈了打招呼会的一些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张对毛要他们“让一下”究竟持何态度。根据毛的指示，1976年从2月中旬起，中央开过几次打招呼会。参加的对象第一次是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干部，后几次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分几批进行。这些打招呼会，实际上也是华国锋以代总理身份的亮相会。萧木参加的是第一次。会议开始，华、王、张一起出场；就座时华居中，王、张分左右。会议由王主持，华讲话，主要是传达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和部署各地各部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华讲完后，王、张相继简短地讲了对毛指示表示拥护、对华工作表示支持的话。萧木认为王、张在会上的表态是心口一致的。当年，没有发现一个王、张不支持华的事例，其后历经多年的大揭大批，也没有揭发出一个王、张反华的可信案例。

有关张春桥、华国锋的关系，还有一桩公案，即关于《有感》的所指问题，值得在此一提。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关于华国锋、陈锡联任职通知》。2月3日，张春桥写了一篇《有感》，他写道：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sup>13</sup>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写道：“2月3日，张春桥私下写了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

张春桥《有感》所写的“去年1号文件”，是指邓小平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中央文件。时间只隔一年，邓小平下课，华国锋上台，也可以算是“新桃换旧符”。即使只是这样简要的历史背景，再来读此文的意思，人们也会清楚地知道，张春桥在这里是嘲弄邓小平的，把邓小平比作“旧符”，把华国锋上台比作“新桃”，虽然还谈不上歌颂，但对华国锋所采取的认可态度是很明确的。

但是，华国锋把这篇《有感》当作重型炮弹向张春桥打来，作为他的重要罪行把他关进监狱，送上审判台。张春桥刚一落难，华国锋就把马天水找到北京，把张的这篇《有感》作为他的罪行向马出示。马天水看后表示：凭这个材料就向张春桥问罪，恐怕分量不够吧。萧木是第一个读到张春桥《有感》的人，他和笔者像拉家常一样，谈起了这桩几十年前的旧事。萧木说：

张的《有感》原稿是写给我看的，意思就是教育我要乐观。没有题目，有几处涂改，还有一个落款“春桥，又在爆竹声中”。后来作为“罪证”公布的《有感》是誊清稿，那是张被抓起来后，从他办公室那个放文件和文稿的简易保险柜里查抄出来的。内容与原稿一样，只是删去了落款，加上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几个字。那年2月3日是年初四，所以给我看的原稿落款“又在爆竹声中”。为什么“又在”呢？那是因为一年前已“在”过一次，即1975年春节，也是“在爆竹声中”，他曾给我写过一信，同样是教育我不要悲观。我为什么老是悲观呢？文革初期，我积极投身其中，并利用各种机会，调查、收集各种资料和素材，准备创作暂名为《春江潮》的反映文革的长篇小说。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文

革的太多负面的东西，特别是我曾寄予热切期望的新干部（也即掌权后的造反派）的种种弱点以至劣迹以后，我对文革的失望情绪就开始不断积聚起来。调到北京后，主要工作就是辅导王洪文等学马列。应当说，王开头还是学得相当努力的，但后来，不知是叶剑英发出邀请，还是王主动与之相约，总之是，只要中央没有会议一类活动安排，两人就经常出去或是打猎，或是钓鱼，有几次甚至还到中南海去钓。打猎，叶通常自己不去，让他的部下陪王到军用机场去打。此类活动一多，王对学习提不大起劲来。我做什么事都比较认真，可能还有些过分，看到王这样，深感自己没有尽到责任。1975年春节，叶剑英邀王到叶所住的西山去，王再三希望我能一起去，盛情难却，我只好作陪。除夕之夜，酒席之丰盛不必细说，更让我这个乡巴佬大开眼界的，劝酒时，因王的警卫员小常要为王代饮，竟闹得像打起了群架。不一会就有几人发起了酒疯，有的在紫红地毯上学狗爬，有的用茅台酒相互泼来泼去做游戏。后来知道，自己没有出场的叶剑英，那天曾给他的这些部属下达过一个任务：灌醉王洪文！我基本吃素，且滴酒不沾，那夜更是默默地看着眼前这荒唐的一幕，直到拂晓。散席后，我在幼稚可笑的责任心的冲动下，与王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说了如何珍惜时间、如何抓紧学习等一篇大傻话。王倒是很诚恳，说他不是不想学，而是在中央，那些老家伙没有一个肯承认十大路线（指王当选为党的副主席），只有叶帅对新干部是真正关心、爱护的，我不好推辞呀！……不知为什么，王这么说着时，我却想起了穷苦的钱塘江畔老家，想起了幼时跟随父兄在地头捡拾麦穗的情景，想到了茅台酒是用农民血汗酿造出来的，突然一下泪如泉涌，竟再也无法控制。王一看急了，以为我受了什么委屈，连连问我怎么啦。我赶紧笑笑说：没有什么，就是有些头晕。我想春节我还是回钓鱼台去过吧，你这里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马上赶来。王说那也好。马上叫他的司机去备车送我，说回去好好休息。回到钓鱼台，还是不能平静，却又苦于无处诉说。犹豫再三，决定给印象中勤于阅读、思考，生活作风比较严谨的张春桥写封信。信中讲了我对除夕之夜在西山的所遇所

感。信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孩子，我血管里流的永远是农民的血，我无法想象竟然有人拿茅台酒泼来泼去做游戏……”当天张就回了我一信，针对我的悲观情绪说了许多鼓励性的话。至今还记得较为清晰的有这样几句：“我们的革命从1949年到现在，还只有25年，还只有四分之一世纪，确实还有许多问题，我也同你一样有许多不满意。但是我们应当相信主席的那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再过25年，再过四分之一世纪，到本世纪末，各方面肯定会好得多。”落款是“春桥，在爆竹声中”。

以上就是张给我看的1976年2月3日写的《有感》原稿落款“又在爆竹声中”那个“又”字的由来。

当天晚上，我到钓鱼台9号楼去看张，顺便把《有感》的原稿还给了他，谈了点我读后的感想，说但愿随着春回大地，能迎来欣欣向荣的一年。张心情似乎少有的好，问了我正在创作中的《春江潮》的一些情况，说了不少鼓励我的话，还谈了他对形势的一些看法。现在还存有一点记忆的，有这样几句：“邓小平下去后，看来大的斗争已经过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剩下一些斗、批、改未了之事完成后，接下去就是好好建设的问题了。主席作出这样的安排（指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是真正有可能做到团结、胜利的。老马（指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开过‘打招呼’会来看我，我也对他说了，上海应当支持中央，支持国锋同志工作，为中央财政多作点贡献。”

过了半年多的一个冰冷的傍晚，我在北京郊区某炮兵团专门为关押我而装订起来的昏暗的小房间里，因一个偶然的机缘，从监管我的哨兵那里看到了发表在1976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重头文章，标题是：《阴谋篡党夺权的铁证——评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我先是哈哈大笑，继而仰天长叹，在心里大声说：政治这个东西多么可怕啊！<sup>14</sup>

## 处理邓小平问题的连环套

华国锋上任，坐上批邓的战车，标志着批邓再不留情，正式升级。经毛泽东批准，从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即1976年中共中央4号文件），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毛主席重要指示》主要是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之间的讲话，也恰是邓小平主政一年。直接点到涉及邓小平的有：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sup>15</sup>

在一些会议上，张春桥多次发言批评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他的发言很多，也很尖刻。不过张春桥对邓小平的批评，都是在会议上公开讲的，虽然加了“买办”、“垄断”字样，但仍然没有超出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范畴。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前后，“上海帮”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王洪文当了中央副主席之后发生了“《朝霞》事件”，和张春桥就有些疏远了，同时和江青走得也不是太近。姚文元独挡一面管宣传工作，搬出了钓鱼台。张春桥虽然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但在军队里说话没人听；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文化教育工作；政治局常委分工是管党务和《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但《毛选》又被邓小平抓去了。江青虽然没分工具体抓什么，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照样可以横冲直闯。

总的来说，这时候的张春桥有所收敛。毛泽东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任务交给华国锋处理，还说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在批邓时可以发言，但没有点名要张春桥发言，所以除了在批评邓小平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对邓小平当面作了尖锐的批评外，在会外没有发现他搞个人小动作的资料。毛远新在搜集邓小平的材料时，也找过张春桥，但都被张春桥婉言拒绝了，要毛远新去找华国锋。张春桥还是按照毛泽东

对他的要求行事，不直接介入批判邓小平的事。这是给张春桥留有余地，也是给邓小平留有余地，因为毛对邓小平还寄以希望，不希望他们两人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更不希望张春桥因邓小平的问题与元老派的关系恶化。

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了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讲了一番话，除了批评邓小平是“法西斯”、“反革命两面派”、“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还说邓小平要干掉她，是有政治阴谋的。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她，目的是诽谤主席。毛泽东得知江青的讲话后，批评说：江青干涉太多。就江青要求把她的部分讲话内容印发全国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sup>16</sup>

此时的张春桥已经领会毛泽东对邓仍然是“批是要批的，但是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又不点名要他发言批邓，是让他应该自己掌握分寸。张春桥没有参加江青在3月2日召开的大会，当他得知江青的讲话和做法后，对姚文元说：她这样做也会把我们拖进去。对江青的张扬，张春桥则比较谨慎，和江青有些疏远，保持一定的距离。萧木对此也有很深的印象，他告诉笔者，张和江的关系，已经不像文革初期那时的样子了，我和他们有着近距离的接触，明显地感受到张和江保持距离，在许多事情上张不想把自己和江拴在一起，但他又很含蓄，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如江青和叶剑英都在拉王洪文，在江拉王洪文时，张的态度就不甚积极。但是在表面上，张还是维护和江的团结，这是他们的大局，不能不顾。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说：张春桥问我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样了？我说：还好，比较缓和了。张春桥希望我主动去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这说明王、张、江、姚已不是铁板一块了。至少在对江青的态度上，张、姚是一致的。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进行。这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进行追查的所谓《4号文件》，认为毛远新伪造了毛泽东的指示。对此，毛远新说：1976年4号文件，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一些“因此”、“所以”

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送给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sup>17</sup>

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后，张春桥才打电话给朱永嘉，要求他们赶紧行动起来写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朱永嘉说：1976年2月初，张春桥曾通过他的秘书向我们传达：要注意批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我们当时认为这些都是老话，很难做文章，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北京在批判邓小平的整顿，我们写作组也进行了讨论，我和王知常认为邓小平抓整顿见到了效果，抓整顿是对的。我们写了十条意见，谈对邓小平抓整顿的看法，认为邓小平的整顿是对的，上海也是按照邓小平的布置抓整顿工作的。2月底，张春桥又来电话批评我们没有敌情观点，说我们是“桃花源中人”，还说“敌存祸灭，敌去召祸”，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北京都动起来了，要我们组织写文章。这时萧木又从北京给我们带信，说他正在看鲁迅的小说《风波》，说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现在还在活动，他想到阿Q和小D，不应该互相揪辫子，而应该去揪赵七爷的大辫子，是揪张勋的大辫子。<sup>18</sup>恰在这时又听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称自己是维吾尔族小姑娘，头上有许多小辫子。这两者相互启发，组织了一篇《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和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的大辫子》，我们发表在当年《学习与批判》第三期上。这样，在全市就掀起了一股揪辫子风。这是我们写的影射邓小平的第一篇文章。<sup>19</sup>

文章虽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文章写道：“那么，党内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头上到底是一条什么辫子呢？”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从这条辫子的地位来说，则是条辫帅张勋之辫。这条辫子，就是要揪住不放，断而已”。但张春桥看了还不满意，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于那个被废弃了的皇帝和整个旧制度。

组织写那篇“阿Q与小D”不可理喻的长题目的文章的同时，朱永嘉还组织人写了《梯也尔小传》，发表在《学习与批判》同一期上。梯也尔本来是历史学家，后来成了法国总统。1871年5月21日至28日，以他为首的法国资产阶级镇压了巴黎公社，造成了震惊世界的“五月流血周”。这篇文章开头就写道：“当时有一个人晃动着肥大的脑袋，挺胸

鼓腹、迈动着短小的双腿，神气活现地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此人便是对巴黎公社反攻倒算的还乡团头子——侏儒怪物梯也尔。”《学习与批判》刊出此文的同时，还发表了一幅梯也尔的漫画像，很像邓小平。时间过去已近四十年，当笔者找出那本《学习与批判》给朱永嘉看时，他有些歉疚，神情赧然，说：“这篇文章不好，对邓小平有些人身攻击。不好！不好！”

历史越来越清楚，批判邓小平、批判右倾翻案风的主线是毛泽东—毛远新—华国锋这样一个连环套。毛泽东制定方针策略，毛远新穿梭于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华国锋是前线总指挥。张春桥所起的作用只是摇摇笔杆子，耍耍嘴皮子，但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主持实际工作的华国锋。这就造成树大招风的负面效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深入，毛泽东在病中，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群众也不会知道他为周恩来的去世而流泪，一时民怨沸腾。和主流意识相对抗的民间意识日渐兴起，周恩来成为政治斗争的符号，群众逐渐起来，以怀念周恩来方式表现出对批邓的不满，通过小范围相聚、私下议论、手抄本及传单各种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表面上是民间的自发力量，而实际上代表着另一种政治势力。这两种意识、两种情绪所形成的两种力量在对抗中并行发展，最后归罪于张春桥。

我们不妨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寻找张春桥，看看他在干什么。江青擅自召开12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也引起张春桥的不满，但她并没有收敛，又找到毛远新，说政治局会议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两校的人面对面地批评邓小平。毛远新同意。于是3月26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清华、北大汇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说邓小平“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成为邓小平的代名词。

这是江青和毛远新搞的对邓小平批判最凶的会议。张春桥参加了这次会议。从官方权威文献中，说张春桥对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攻击，却没有明确的记录张春桥发言的内容。

## 《文汇报》“三五”和“三·二五”报道风波

与周恩来逝世同时，人民抗议“四人帮”的活动即已揭开序幕。

1月上旬，北京街头出现了批评梁效写作组的大字报，说他们是“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已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2月中旬，在北京街头的传单中直接点了张春桥等人的名，说“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2月到3月，全国有八九个城市先后出现批判“四人帮”的传单和大字报。在群众张贴的大字报中，张春桥的名字频频出现。张春桥已经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在张春桥处于四面楚歌之时，《文汇报》的版面发生了两起惹怒读者的事件，引起了巨大的风波。1976年3月5日凌晨2时，是报纸夜班编辑工作最繁忙也是最紧张的时刻，四块版面已经编好拼成，只要再经一次检校，就要付印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新华通讯社发来两条长长的电讯，是关于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消息和通讯，这对已经拼好的版面是一个冲击，编辑常为此类事头疼。沈阳是雷锋生活过的地方，是雷锋精神的诞生地，新华社的电讯稿不能不用。要用就得把已拼好的版面拆了重拼，但报纸开印的时间不允许重拼版。主持夜班编辑工作的朱文良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沈国祥，他们商量为了不使版面变动太多，这两条电讯可放在国际版，如电讯太长放不下，可做适当删节。朱文良把这两条电讯稿交给编辑任锦和处理。任锦和把两条电讯稿看了几遍，对电讯稿四个地方作了删节，共删去250字，其中一处为：“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段话中包含了周恩来关于学雷锋的题词的内容，但没有明说引用了周恩来的题词，作者经过概括和运用题词内容，报道部队怎样学雷锋。编辑任锦和认为不是周恩来题词的原文，无

关键要，就顺手用红笔划去了。

当时周恩来病逝不久，正值一个敏感时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文汇报》对电讯稿的删节，导致许多读者不满，纷纷给编辑部打电话或写信，指责报纸删去了周恩来的题词，是反对周恩来。编辑部很紧张，谁能承担得了“反对周总理”的罪名，于是赶紧查找周恩来的题词进行核对。编辑徐风吾找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周恩来题词手迹，发现删去的文字和周恩来的题词不是一回事。尽管读者的电话、来信不少，《文汇报》还是耐心地作解释，并把周的题词全文和报纸编辑删去的那段文字同时排印对照，寄给来信的读者，算是回答，风波才渐渐平息。

没想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3月25日，《文汇报》刊登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报纸还没印完，报社内部设的“第一读者”就发现报道中的文字“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一句的语义上出了毛病，找出原稿核对，编辑对通讯员的原稿并没有改动。

报纸和读者见面后，读者立即提出报道中所说“党内那个走资派”指的是周恩来，“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的是邓小平，认定这是张春桥等“反对周总理”的又一信号，于是抗议电话、电报和信件，连珠炮似地投向《文汇报》。几天内，编辑部就收到抗议信件420封，抗议电话上千次。

当时各级党组织都有中心学习组，遇到中央发布“毛主席最新指示”或中央报刊发表重要社论都要进行学习，地方报纸就要报道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情况，以作呼应。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虽然没有点名，实际上是批判邓小平的，“党内那个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成为邓小平的代名词。上海市仪表局党委中心组学习这篇社论，通讯员就把该局党委学习情况写了一篇名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稿件，投给报社。稿件通过文字编辑后刊发。报社的“第一读者”发现问题后，报社立即派人到上海仪表局进行核实调查，通讯员稿件原意“党内那个走资派”是指邓小平，“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是指周荣鑫和胡耀邦，根本没有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真实情况搞

清楚后，《文汇报》内部发了通知，并向上海市委写报告，苦于无法登报声明或作出解释，对读者的批评只好保持沉默。报纸的沉默，使读者沿着“《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的思路继续发展，情绪愈演愈烈，特别是南京读者更是义愤填膺，从北方开往上海的火车，途经南京时，群众就在车厢上刷上大标语：“《文汇报》把矛盾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文汇报》的文章是反党夺权的信号，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把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张春桥揪出来示众！”从上海开往北方的火车经过南京，也会被刷上同样内容的标语，随车拉到北京。群众斗争的矛头直指张春桥。

一位读者嬉笑怒骂地写了一份《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代表了当时读者的心态，抄录于后：

《文汇报》负责人：

读贵报3月25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来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人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神仙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根除，引为下策。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

丙辰清明

形势的发展使上海市委震动，他们担心事情闹大，又怕《文汇报》再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就加强了对《文汇报》的控制。4月1日，徐景贤、朱永嘉来到报社，在干部会上宣布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派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吴瑞武任《文汇报》党委副书记，主管报纸宣传工作；写作组成员郑世瑶来《文汇报》主管评论工作，掌握《文汇报》要害部门评

论组。可能是由于“三五”、“三·二五”风波的教训，在整个天安门事件中，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向《文汇报》下达过什么指示。

在群众心目中，《文汇报》是在张春桥的掌控之中，是他的舆论工具，因此对张春桥不满的情绪也从《文汇报》版面上的一些事情倾发出来。“三五”和“三·二五”两次报道虽然根本没有反对周总理，但是无法改变群众的印象，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群众都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清查小组进驻《文汇报》，首先把“三五”和“三·二五”事件列为清查的重点。其实《文汇报》的编辑、记者对这两个事件的真相都很清楚，他们等待着中央工作组清查的结果。工作组花了很多时间进行内查外调，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认为没有像社会舆论所说有什么“反对周总理”的事情，这和《文汇报》当时的自我清查是一致的。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审查“四人帮”时，《文汇报》新任党委领导人向中央有关机构出示了一份伪证，称《文汇报》的“三五”、“三·二五”事件是遵从张春桥的意旨，“疯狂攻击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刊登在中发〔1977〕37号《中共中央文件》上，并被中央出版机构出版的有关著作引用。此事引起《文汇报》原来的编辑记者不满，质问新的党委，明明已经查清楚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伪证。《文汇报》原负责人沈同祥为此事写了专文刊登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文汇报》报史室也撰文，对那个伪证加以澄清。

《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虽然使群众产生了误解，但充分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像历史上一些因偶发事情而引发出重大的历史事件那样，它们激化了群众愤怒的情绪，致使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当时的舆论说：《文汇报》“三五”和“三·二五”的报道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

3月19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开始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第一个花圈是北京一所小学的红小兵献的。3月20日，

纪念碑南侧出现了第一张公开署名的悼念周恩来的悼词，其中表示：决心继承周总理遗志，“同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这以后，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纪念碑周围放满了花圈、花篮，马路旁的松树上、灯柱上贴着悼念的诗词、悼文和传单。还有不少人在那里传抄、讨论甚至朗诵诗文：“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也于4月1日发出，通知要求：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追查“总理遗言”的制造者；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通知中的“捣乱、破坏”、“别有用心”、“彻底追查”、“反革命谣言”的用语，更加激怒了悼念的群众。

4月1日，在纪念碑上出现了当时广泛流传的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是山西工人王立山写的。

4月2日，中国科学院一〇九厂职工的游行队伍抬着献给周恩来、陈毅、杨开慧的四个大花圈和四幅大诗匾，上面赫然写道：“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4月3日，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对“四人帮”的标语开始在北京街头出现。天安门悼念的人数激增，人们发表演说和高呼反对“四人帮”的口号。

4月4日是清明节，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达到高潮，有关部门统计，花圈在两千个以上。人民已经不满足于用悼念周恩来同情邓小平，用怀念杨开慧来贬低江青的含蓄做法，而是直接写出了嘲弄“四人帮”甚至点名咒骂的诗词，把他们比作豺狼、妖魔、鬼怪、慈禧太后、白骨精。其中有首打油诗曰：“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表现了广大群众对毛泽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决策的不满，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他们总要找一个发泄出气的地方。这样，江、张、姚也就成了“出气筒”。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华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

架。”这天的政治局会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进行了讨论，据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的吴德后来所述：当时政治局的同志没有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张春桥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没说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提出清明节的纪念活动结束了，现在就动手，天亮之前必须把花圈送八宝山。虽然吴德以找不到交通工具为由往下拖，但是华国锋要吴德考虑考虑，动员力量，当天晚上就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撤走。吴德不好再顶了，只好照办。散会后，纪登奎提醒吴德，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4月5日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全部被撤走，这就将他们彻底激怒了。十余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进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了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的情况，吴德当时立即调消防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面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了，这次江青等人让他出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远远看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张春桥对着他大骂：你看看，你就是纳吉！<sup>20</sup>邓小平一言不发，根本不理睬张春桥，更没有与其他人交谈。开会时，毛远新拿着毛泽东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同时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王洪文听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吴德认为，北京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人。会议上有人提出：民兵不行，要调动军队。张春桥坚决不同意调动军队，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他介绍了处理安亭事件的经验，要向群众做宣传教育说服工作，让群众自动离开。

从吴德、吴忠等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的记忆中可以看出，<sup>21</sup>在天安门事件中，张春桥到底在干些什么：一、他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像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用望远镜看了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二、邓小平也用望远镜看了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张春桥在这时骂邓小平是“纳吉”；三、他不主张用暴力驱赶聚集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而是主

张用广播宣传教育的办法，让群众自动撤离；四、他只是参加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这些事情表明指挥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不是张春桥，是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华国锋按照指示进行指挥，由吴德做具体工作。

广场上闹得如火如荼，一街之隔的中南海里，毛泽东的病情却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

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

天安门事件采取镇压群众的行动，毛泽东究竟要负多少责任？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都由毛远新向他汇报。究竟毛远新汇报了多少实情，毛泽东表态前是否政治局已经采取了行动？张玉凤说：

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他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的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

当天，江青来到毛泽东中南海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说：

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不多时，毛远新带着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用红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sup>22</sup>

当毛远新说到张春桥当面骂邓小平是“纳吉”时，毛泽东挥了挥手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毛泽东又亲手写下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

邓小平、张春桥这对政治上的对手各有所长，辩论问题，邓小平不是张春桥的对手，但没有毛泽东的表态，张春桥动不了邓小平一根毫毛。但是掌握实权动真的，张春桥又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一旦被邓小平抓住，会使张春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次他取得了对邓小平批评的主动权。4月18日，张春桥给儿子毛弟写了一封信，一吐胸中的快意：

这个月，我过得相当紧张。从南京到天安门，到处闹。4月5日，我到大会堂，如同亲眼看见匈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当着邓小平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他态度恶劣，但没有讲话，只能点头。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

笔者采访张维维时，她说：1976年天安门事件，他们要调三十九军镇压吊唁群众。我爸爸反对，他说凭我在上海的经验，大喇叭拉起来，广播动员群众离开，再派工人纠察队进去。那天政治局会议，邓小平也参加了，他也看了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我爸爸气得骂他是匈牙利动乱时的纳吉。天安门事件后，张维维去北京出差，见到张春桥时谈到这次事件，张春桥给她看了天安门广场的一些标语照片，里面的内容不仅仅是反对张春桥他们几个人，还有反对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的标语都没有公布。

天安门事件后，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全国范围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各地区举行了拥护党中央决议的游行集会，并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逮捕天安门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幕后策划者”。至6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搜出的诗文、连同原件达583件，强令群众交出悼文、照片10.8万余件。北京共拘捕群众388人，以隔离、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人数以万计。<sup>23</sup>

但人民的反抗没有平息。4月8日这一天，广州半导体材料厂一位青年工人写信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高呼：“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4月12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写着“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sup>24</sup>信中装着4月8日《人民日报》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上面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

4月13日，毛泽东在阅读北京市公安局搜集整理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sup>25</sup>文化大革命之始，天安门广场也热闹过，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红卫兵，后来就发展为全国性的造反夺权。那是造反派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奉召造反”，虽然不合法，但有毛泽东的支持保护，仍然是“造反有理”。而1976年“四五”运动和天安门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反抗当权者的活动，参加人数之多，场面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这次天安门事件的斗争矛头虽然是直指“四人帮”，但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及其发动指挥的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和当权者相对抗的“自发造反”，也就是毛泽东以前曾经说过的“真的反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真造反”就必然要受到打压，参加者必然要受到各式各样的惩罚，“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结果就是这样。

## 《总理遗言》与《于无声处》

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花圈被搬走了，悼念群众被驱散了，有的被抓获了，天安门广场似乎平静了。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并不平静，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说江青等人声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他们还说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要求把邓小平抓起来。毛泽东说：不能冲击，也不能抓人。他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地方。<sup>26</sup>九大以来，特别是1970年的庐山会议，汪东兴一直是江青他们四人的死对头。

4月8日，华国锋向毛泽东送审中共中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电话通知稿，毛泽东批示“照办”。这个电话通知说：“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各地如有反革命的打砸抢者，应坚决实行镇压”。电话通知还特别强调：“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诗词等，应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sup>27</sup>

华国锋制定的电话通知下达后，在全国范围开展大搜捕，特别令人注目的就是对《总理遗言》的大搜捕。《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写给邓颖超的，文字不长，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 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几乎是得者必传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

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

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当年，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很少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这时，民众对毛泽东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顶礼膜拜了。周恩来病逝，毛泽东如此冷漠；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指向邓小平，民众困惑，愤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就在这种时候，人们看到了《总理遗言》，其内容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望，这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有民众希望找到的最熨帖寄托，所以民众对它的真实性没有丝毫怀疑。

《总理遗言》在全国传播了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称：《总理遗言》是伪造，是一份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清查。国家公安部还为此专门发了文件。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就被公安局查了出来，连办案人员也不敢相信，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他从北京天安门广场一路过来，包里还装有悼念周恩来的资料。这位青年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大家都称他为蛐蛐儿，真名李君旭，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儒雅和书卷气。周恩来逝世之

后，李君旭认为：在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时刻，周总理不可能不在自己即将离开人寰之际留下对全国人民的遗言。就是在这种动因下，他把曾经搜集过的周恩来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的关于周恩来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写出了《总理遗言》。有了人证物证，李君旭和他的父亲、好友袁中伟和他的父亲等“涉案人员”一行七人被押解到北京。起初袁中伟听到风声，离开北京后没回杭州，躲到了上海亲戚家，是浙江省的公安人员得知他的行踪，到上海把他抓走。

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的第二天，一位河南客人来到上海，住进了火车北站附近的小招待所，他是来找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的。他受宗福先的朋友钱津的委托，给宗福先带的即是流传在民间的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书，内容是直接指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的。这位陌生的朋友刚在北京参加天安门广场“四五”活动，他给宗福先说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并告诉宗福先，现在不是写东西的时候，是观察人的时候。第二天，传书者即离开上海。宗福先听说了北京天安门“四五”斗争中群众的激情，无比兴奋：原来恨他们的不是我一个人啊！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是他们控制最严的地方。上海也是历来“管人”经验最丰富的地方。上海人受他们的压迫最深，上海人受够了。但上海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远远没有北京人那样充满正义的斗争激情。也许正因为上海人有着敢怒而不敢言的忍耐，处于旋风中心的平静状态，而就给上海人——宗福先思考的空间，使他从上海人的脸上读出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扬眉剑出鞘”的主题也在他心中播种酝酿。“四人帮”垮台不久，他创作的多幕话剧《扬眉剑出鞘》喷薄而出，写的就是参加天安门“四五”活动而被追捕的英雄人物。由工人话剧队在上海工人文化宫演出，边演边修改，最后形成话剧《于无声处》。

《文汇报》把《于无声处》从舞台搬到报纸上，把剧本全文刊出，真可谓声震寰宇。那时，毛泽东钦定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还没有得到改正平反，华国锋搞的“两个凡是”的疑云还笼罩着中国。话剧《于无声处》的演出及剧本的发表，无疑突破了禁区，是无声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 注释

- 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24页。
- 2 伍豪是周恩来用过的化名。1932年，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各大报纸上登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此启事为彻头彻尾的伪造，意在诬陷周恩来，以及离间共产党内部关系。在中共内部，早就有过结论。从文革一开始，江青等就一直利用该事件，对周恩来进行攻击。
- 3 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8页。
- 4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晚年生活情况：毛泽东生活实录1946—1976》，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 5 《人民日报》党组1979年8月揭发鲁瑛的材料。
- 6 《文汇报大事记》，1976年1月，内部出版。
- 7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 9 同上，第145页。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1页。
- 11 同上，第635页。
- 12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
- 13 此诗名为《元日》，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所作。
- 14 2014年2月23日、10月5日，萧木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47页。
- 1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3页。
- 17 阎长贵：《毛远新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 18 阿Q和小D，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人物。赵七爷，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
- 19 2000年5月16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话笔记。
- 20 纳吉指匈牙利政治家纳吉·伊姆雷。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他于10月24日至11月4日任部长会议主席，11月1日兼外交部长。他当时希望改变

社会主义匈牙利现状，实现“非苏联模式化”国家，公开宣布要求苏联红军立即撤退。匈牙利政府撤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在苏联红军主宰下，1956年11月22日，纳吉被捕，1958年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在秘密审判后于6月16日在布达佩斯被处决。

- 21 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 22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逝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 23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481页。
- 24 戈培尔，纳粹德国时期长期担任宣传部长，曾任总理。以擅长使用虚假、编造的宣传手段欺骗、愚弄人民而著称。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48页。
- 26 同上，第647页。
- 27 同上。

## 第二十一章



1976年9月12日凌晨在毛泽东遗体前  
(左起: 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  
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

## 第二十一章

# 一九七六年十月事件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这一事件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如何为这一事件命名，如何评价制造这一事件的人物的功绩，到今天似乎还没有历史性的定论。十月事件期间，不只是激情的人们，历史也在欢呼：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是最为流行的说法。以后华国锋渐渐引退，叶剑英渐渐突现出来，他在这一事件中的历史功绩的宣传也多了起来，说毛泽东在病危期间，握着他的手，似乎有事相嘱托。叶剑英自己也说，在毛泽东生前，他们就准备着手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周恩来不同意。<sup>1</sup>

对这一事件的名称也有多种说法：粉碎“四人帮”、“四人帮”倒台、抓捕“四人帮”、逮捕“四人帮”、伟大节日，还有十月事件，等等。在这诸多的说法中，笔者认为，还是十月事件更有历史的意味。为了求得一个完整的明确的说法，笔者把这一事件称之为“一九七六年十月事件”。

### 批邓，批邓，还是批邓

周恩来病逝，又经过天安门事件，中央政治局力量的组合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三种政治力量处于对峙状态：一是元老派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一是少壮派华国锋、汪东兴、毛远新，一是文革派江青、张春

桥、王洪文、姚文元。邓小平出局后，叶剑英的军权也移到陈锡联的手中，但邓、叶两人影响还在，元老派和少壮派又迅速结合，与文革派相对抗。其实文革派的力量已远不如从前，张春桥担心江青的过分张扬会把自己牵涉进去，和江青有所疏远，他和王洪文也心存芥蒂，和他一息相通的只有姚文元，已经形成不了什么核心力量。但是，在批判邓小平的事情上，他们却有着共识，当然其中各自考虑的政治利益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经毛泽东批准，华国锋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这些负责人分期分批地到北京进行训练，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毛泽东批邓的言论被整理成《毛主席重要指示》，作为1976年的“第4号文件”发往全国。1976年5月16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进一步开展对邓小平的批判，《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永远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五·一六通知〉十周年》的文章，重申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正确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批判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复辟。

批邓的挂帅人物当然是毛泽东，华国锋是扛帅旗的人物。从现象上来看，江青控制的北京梁效写作组和张春桥、姚文元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表现得尤为突出。梁效写作组先后在中央报刊上发表了《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上海市委写作组也遥相呼应，在他们办的刊物《学习与批判》上连续发表了《论走资派》、《要哪个阶级的自由——兼论邓小平的世界观》、《论革命资本——读汪精卫卖国记有感》；邓小平倡议成立的、胡乔木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也发生了大分化，一片混乱，李鑫批判胡乔木篡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领导权，胡乔木也反戈一击，揭发批判邓小平。7月6日至8月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张春桥到会讲话，主题仍然是批判邓小平，提出要揭发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的内幕，追“右倾翻案风风源”。7月28日，唐山、丰南发生大地震，姚文元却仍然说天崩地裂不可怕，不要以救灾冲淡了批邓，而要以批邓推动救灾。

6月下旬，毛泽东和华国锋谈话时，由于言语不清，在纸上写下了“国内问题要注意”。这是毛泽东生前留下的最后的手迹，写下了最后的关照。“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他没有具体说明，中央政治局的人也是各有各的理解。7月下旬，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sup>2</sup>王洪文自作聪明地解释：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王洪文的信，毛泽东没有做任何批示答复。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不应该忘掉，毛泽东在华国锋“打招呼”会议的讲话稿中，已经批示，要求“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账”，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

不仅是王洪文，掌握舆论工具的张春桥、姚文元更是陶醉在批邓的兴奋之中。这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批邓这股风的掩盖下，一场政治力量的角逐新戏即将开锣。张春桥除了批邓，批邓，还是批邓，此时似乎还没有注意到形势的新变化。

毛泽东把最高权力交给华国锋，没有交给时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更没有交给张春桥和江青，成为当时议论最为敏感的问题。张维维倒是敏锐地感到她父亲张春桥面临的问题严峻了。她说：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种种各样的问题。我还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他这么说，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sup>3</sup>

## 如何交接班，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关心的已经不是批判邓小平的事，而是他自己的生死以及他死后如何接班的问题了。按天干地支计算，1976年是丙辰年，在生肖中“辰”是“龙”，龙年主凶。毛泽东有点相信这个中国习俗。1976年4月2日，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本来躺着的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突然坐了起来，脸上出现不安、激动的表情，他走到窗边，望着夕阳渐落的天际。

这种自然现象，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有所表示，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毛泽东列举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死亡时，自然界发生的奇异现象，说：“古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啊！”毛泽东这一年正是83岁，他曾多次念叨“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话。

4月30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来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

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下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从张玉凤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把最高权力交给华国锋，但他对华还在观察中，华能不能顺利接班，毛泽东心中还是未知数。6月初，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6月下旬，他在床边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谈到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sup>4</sup>

毛泽东的这番话，后来被普遍认为是他的“政治遗嘱”。毛泽东考虑在他死后，可能有人会在“血雨腥风”中接班。因此，他曾要姚文元通知朱永嘉，为他注释《晋书·孙恩卢循传》，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的心思。

毛泽东在他阅读的《晋书》上批了“1975.8再阅”这几个大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下达了指示，要求注释《晋书》中的《王敦传》、《桓温传》、《王弥传》、《苏峻传》和《孙恩卢循传》。重读这些传记可以知道东晋末年王朝呈现出来的种种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军队不听朝廷号令，动乱中地方势力兴起；官民对立，形成群体性的对抗；中央政权由于软弱无能而处于瘫痪状态，军队将领反复无常。毛泽东重读这几篇传记，恐怕是他确实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可能在他身后出现。他想告知后来者要有思想准备，才能沉着冷静地应对这种危险，并设法转危为安。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读《晋书》的几种传记，两者是可以互相照应的。华国锋对毛泽东在“血雨腥风”中接班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是

不是另有想法？朱永嘉虽然为这几篇传记作了注释，但他们感到这段历史血腥气太重，又不知道毛泽东所指的是谁，毛一旦去世，他们作注释的人要倒大霉，所以注释的本子没有敢交上去，毛也没有催问。<sup>5</sup>

当时小报流传：邓小平复出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有一次谈话。毛泽东：“洪文，我死后中国前途的吉凶如何？你怎么想就怎么说，但要和我讲真话。”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奋斗到底。”毛泽东苦笑着说：“官腔官调，党八股。”然后，毛泽东又转过头来问邓小平：“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我想听你的爽快话，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说呢？”邓小平回答：“洪文同志讲的，是那么一种可能。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派系林立，左派与右派对立，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全国一片混乱。”毛泽东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直言不讳，我有同感，你算是说准了，儿童团吃惊了吧。盛世危言，振聋发聩。”毛泽东是不是在考虑他逝世后，出现像东晋末年一样的情况？

8月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八大军区调动后，原广州军区司令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上任后来上海拜访上海市委领导人，闲谈中透露一件秘密，即许世友的儿子给他的女友写信说：他父亲说过，老头子（指正在病中的毛泽东）在，不动，老头子死了，准备打仗。这封信被南京情报部门截获了。丁盛立即将这一情报报告了中央军委陈锡联，所以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这封信的内容大意是说，住在医院养病的原总参谋长罗瑞卿、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身上带有手枪，看来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几天前他爸爸对他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他还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全

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王洪文在北京得知这封信，即和毛远新商量。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王洪文还是担忧，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刻还得靠民兵。

这样就发生了上海民兵发枪的事。1976年6月27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向马天水汇报工作，说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发下来，马天水才知道他原来为民兵发枪的批件被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他把办公室的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上海民兵指挥部发枪报告是6月27日，马天水的批复是7月3日，是毛泽东生病时，丁盛来上海之前。毛泽东指示华国锋“国内问题要注意”之后，全国处于战备状态，上海民兵发枪的事即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有关，并报毛泽东备案。

毛泽东曾说“要准备打仗”，上海就进一步加强武装建设。据统计，1974年上海擅自增加武装建设经费718万元，1975年又擅自增加515万元，1976年竟高达2,050万元。兵器生产除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外，超产的兵器都留下自用。他们还私设兵器生产的工厂和车间，从1974年到1976年，共私制了自动步枪三万支。这些武器有一部分已发到民兵手中，有的留在上海小仓库里。<sup>6</sup>中央军委及上海警备区一直认为上海在搞“第二武装”，不但不予承认，还对其有所警惕，加以防范。这次上海民兵发枪，和后来指控的“四人帮”搞武装叛乱没有关系。

毛泽东的病情在日益加重，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由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稿宣称：毛主席的病情已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汪东兴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了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sup>7</sup>陈永贵回忆说：“直到主席逝世前几天，她（江青）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谁知两三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后来，我还为此问过江青，她对我说，党内走资派一直想用主席的身体状态做文章，要是让他们知道主席的身体状态，他们会铤而走险呀！”<sup>8</sup>

华国锋不只是害怕江青他们威胁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对邓小平也是

防一脚的。陈永贵说：“就在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给我打招呼。他悄悄地对我说：老陈，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可能就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他说，那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市场，你也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了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sup>9</sup>

9月8日下午，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以后完全无法说话。深夜，中央政治局分批去向毛泽东告别。叶剑英向毛泽东告别后，刚返身到门口，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毛泽东好像有话要说，但已经说不出来了。这个夜晚，政治局的成员谁也没离开，都在毛泽东房内的走廊上看心电图监视器。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心跳停止。这位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无人匹敌的庞大身影，自建国以来一直担任最高领导人，主宰了亿万人的命运，在文革中曾被狂热的信众高呼“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就此离开了人间，终年83岁。

9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政治局会议结束，张春桥回到钓鱼台，约正在北京开计划会议的黄涛见面，他说：这是我参加的最伤感、最压抑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大家心情都很沉痛，好些人一面发言一面哭。我的头脑还算冷静，我想到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情况。想到了当前国内面临的形势，想得更多的是今后的斗争。我也想到了如何保护好主席的遗体。听说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他的继承者也想为他保留遗体，可因没有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发生腐变，最后只好烧了。万一主席遗体出现差错，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怎么向子孙后代交待？可这么重要的事情，政治局竟没一个人提出。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同志也不讲，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考虑的，有什么具体安排，所以我也不便多说。

张春桥作为毛泽东的追随者和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随着毛泽东逝世，自己的灵魂也就一时无所依傍了。

## 10月6日，逮捕之夜（上）

毛泽东逝世仅仅一个月后的10月6日，“四人帮”即被抓捕。10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并讲了话，对为什么抓捕“四人帮”作了说明，他说：“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是篡党夺权。”<sup>10</sup>公审“四人帮”，核心问题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笔者在写作时，就是沿着这条思路，在文献中寻寻觅觅，想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实证。这样的寻找当然不是单方面的，也包括寻找华国锋为他们论罪的根据，以及采取这一行动的合理合法性。既然抓捕“四人帮”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问题，那他们篡党夺权就应当界定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在毛泽东生前，不存在他们篡党夺权的事。这种寻找只能从毛泽东逝世的那一天作为事件的开端，即从1976年9月9日开始。

9月9日，由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375人组成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成立。其后，华国锋就找到汪东兴，商量解决“四人帮”的事，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sup>11</sup>

9月11日，张春桥、姚文元等还在为毛泽东守灵时，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而他一离开治丧的地方，即给李先念打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5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到李先念家，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sup>12</sup>

9月1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守灵，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和汪东兴谈话，说：“看来，我们与他们这一仗，已经不可避免了。”汪说：“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叶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机会。”<sup>13</sup>

汪东兴所说的“主席逝世后”也就是9月9日到9月12日的三天，既然张春桥已经是“明目张胆”了，却即使经过以后的公审，都没公布他们具体的“活动更加频繁”的材料，是否还有什么没有公开的秘密材

料？同一天，姚文元审查摄影师杜修贤拍摄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守灵照片，发现没有江青守灵的镜头，他问杜修贤，能不能找一张第一天守灵的照片再发一遍？杜修贤认为不合适而作罢。<sup>14</sup>这是公开发布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第一份材料。

9月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去见叶剑英。二人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经过一段交谈后才转入正题。李向叶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sup>15</sup>同一天，上午华国锋、王洪文守灵。下午，姚文元审看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相，没有江青的镜头，他让邓岗补上。<sup>16</sup>姚文元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送给张春桥。他发现张的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sup>17</sup>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话音刚落，纪登奎说，对这四人恐怕还要区别对待。纪这样表态，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下去了。<sup>18</sup>

同一天，江青没有参加接见前来吊唁的各国使节，她提议政治局开会。会议召开后，她在会上因毛泽东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了起来。她的言辞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sup>19</sup>此前的9月9日，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后的当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即在会上大闹起来，说毛泽东是被邓小平害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要求，江青就继续闹。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才没有讨论江青的问题。<sup>20</sup>江青两次闹会，使华国锋感到头痛。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说：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汪东兴同志8341部队有没有把握。<sup>21</sup>

华国锋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抓“四人帮”的原始动机是因为他们“闹会”，闹得他这位接班人无法掌权理政。他要是以“闹会”的罪名抓江青，那倒是成立的，她经常在会上无理取闹。但是，如果仅仅因为闹会就抓

人，是无法说得过去的，从华国锋行动的日程上看来看去，“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罪，是他和元老派几经商量出来的，这样就师出有名，为抓人找到了根据。

如果毛泽东还活着，一定会说：华国锋等人像林彪一样聪明，抓他们四个人是对着我的，他们真正想抓的是我。其实他们四人的错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并执行毛泽东左倾路线犯下的错误，在一些事情上甚至可以说是犯了罪。如果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来抓他们，那倒是成立的，但是这样一来，就要抓到毛泽东的头上。

中央政治局讨论悼词时，汪东兴突然说：“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中适当地方加进毛主席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悼词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重要，很有必要。”华国锋听了汇报，表示同意。叶剑英、李先念表示赞成。王、张、江、姚都不作声。

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以隆重的仪式举行了有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参加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追悼大会前十分钟，华国锋让周启才再讲一下向毛泽东遗像三鞠躬的程序：大家向后转，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sup>22</sup>张春桥突然说：“这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王洪文、姚文元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王洪文、姚文元没吭声。华国锋听说这一情况后，气愤地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不知张春桥是怎么想的，屁股不对着群众，就要对着毛泽东，别无选择。这也应该算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份材料吧。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追悼会上，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背后，贴得非常近，这一场面被摄影师拍了下来。有的作家对这张照片做解释：这是王洪文有意摆出的架势，要篡夺华国锋的最高领导权。萧木说，追悼会结束后，王洪文回到住地就告诉他：华主席太累，又患有糖尿病，毛主席的悼词又很长，华主席已经站立不住了，是他用一只手撑着华主席的腰，华主席才能坚持把悼词念完。

毛泽东追悼大会结束。据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

当天晚上，张春桥找李鑫谈话，提出要某些毛泽东谈话的记录。李鑫不给他，张春桥硬要，两人就吵了起来，吵得很凶，不欢而散。事后，李鑫就骑了个自行车到华国锋家里，汇报了张春桥跟他要毛主席谈话记录的事情。<sup>23</sup>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几次向她要毛泽东几篇文章的手稿，她说：

主席逝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每次要看毛主席的几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能随便给，就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里。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安上一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sup>24</sup>

毛泽东逝世后，控制毛泽东的文件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作了专门讨论，没有结果。9月21日，华国锋决定这些文件由汪东兴保管，汪即在毛泽东的卧室及书房贴上封条。江青无法进去，就打电话给华国锋说，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毛泽东文件是天字第一号机密，内容涉及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检举信。文革期间，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拿到了这些文件，就拿到了制服别人的武器。文件中还可能有毛泽东留下的“最高指示”，控制了“最高指示”，就能掌握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就可以得到继承人的合法性。这反映出残留的封建帝制时代“托遗嘱、争王位”的心态。叶剑英来华国锋住处，商量如何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初步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并决定在可靠者中征询对这个方案的意见。

## 10月6日，逮捕之夜（中）

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此时徐正参加卫生部召开的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会议，张春桥问了上海的情况，六十军领

导人的情况，还问了上海警备区的情况。他对徐景贤说“你们要谨慎小心”，“人家已经叫我们是上海帮了”，“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他还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被杀头了。”<sup>25</sup>徐景贤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告诉他的秘书张家龙：张春桥交待了两件事，现在我们要按照主席的教导支持华国锋同志工作。现在国家财政出现了一个亿的赤字，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要老马（马天水）告诉上海工人阶级，抓紧今年还剩下的几个月，为缩小赤字作一些贡献，争取明年拉上来。大事已经过去，今后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了。<sup>26</sup>

9月26日晚，华国锋约李先念和吴德谈话，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方案，华国锋明确提出“四人帮”的问题是“篡党夺权”。吴德说：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一是开会投票罢免。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开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华国锋这派占有多数；二是开中央全会投票决定。李先念提出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不同意开会解决。<sup>27</sup>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后，华国锋认为，解决“四人帮”问题，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最后，经反复商量，决定“采取隔离审查办法才是上策”。关于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华国锋提出“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在谈话过程中，李先念插话：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吗？吴德说：我知道，赫鲁晓夫是借助朱可夫的支持。<sup>28</sup>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华国锋主持会议，江青质问：“毛主席去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张春桥、王洪文说：“今后要加强集体领导，为了保证不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就在今晚讨论江青同志安排问题。”

王洪文的提议，立即遭到叶剑英等许多同志的反对。华国锋这时候念了毛远新的一封信：我是毛主席的联络员，是从辽宁来的，主席现在去世了，我没有事可做，是留在北京还是返回辽宁？我觉得返回辽宁好。华国锋念完信说：“我同意远新同志回辽宁。”江青认为，毛远新不能回辽宁，要留下来起草报告，还要处理毛泽东的后事。江青以处理家务事为理由，要把毛远新留下，华国锋最后决定：“散会，毛远新回辽宁。”<sup>29</sup>

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提出政治局委员有的戴黑纱，有的不戴，这样不统一，群众看了会有意见。后来，张春桥提议国庆节天安门开座谈会，由吴德准备发言。江青还提议要参加象征性劳动，大家没有同意。江青还讲：大家要团结，要同心协力，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她没有讲完，许世友就站起来质问她：“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江青说：“我并没有说你嘛。”许世友批评了江青一通。有些老同志就劝话。<sup>30</sup>

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座谈会，由吴德主持。参加的中央领导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会议从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主要讲了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发言后，吴德说请中央领导同志讲话。这时，华国锋第一个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吴德意识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吴德就宣布散会，以避免在会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议形势看，张春桥等四个人是准备了要发言的。会后，他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之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又到小礼堂边的小会议室，商谈了解决“四人帮”时可能发生的问题。<sup>31</sup>

10月2日上午，王洪文通知杜修贤到钓鱼台为他拍标准像，说：“开追悼会用。”杜修贤后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知王洪文不惜破釜沉舟而篡党夺权的决心。<sup>32</sup>萧木对笔者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在此之前就决定了，政治局委员每个人都要拍标准像，王一直拖着，被催了多次，实在推不掉才同意这天拍的。

一个人的命运将要发生大的变化时，会有一种特殊心灵上的变化，包括大自然突然发生的重大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天人感应”，他是很相信的。这种情形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生命中也都有所表现。王洪文要在办公室拍照时，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开追悼会用”；张春桥对徐景贤等人包括其家人，频繁地说到“我是准备杀头的”；1975年，姚文元妻子金英和女儿要搬家去北京，在整理东西时，存折上有8,000元存款，金英不经意地对姚文元的秘书胡鼎钧说：“将来垮台时，这些钱够买家具的了。”都反映了他们的灰色心情，也恰巧是一语成谶。

这天，吴德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中南海的办公室，对汪指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不备。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接着，叶剑英马不停蹄地再次造访华国锋，希望华尽快解决“四人帮”。送走叶剑英，汪东兴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建华，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张耀祠、武建华考虑到了一些重要因素，最后决定，利用按惯例在怀仁堂开会，讨论出版《毛选》五卷的问题为借口，迫使王洪文、张春桥不能不到。

当晚9时，汪又到华国锋住处，向华汇报和叶剑英、张耀祠、武建华谈话情况，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10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郊区平谷县讲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10月3日或4日，吴德到华国锋处，华提出，叶剑英告诉他昌平有个坦克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10月4日，在勤政殿召开的毛泽东医疗组总结会议上，张春桥、江青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开除邓小平的党籍。<sup>33</sup>

10月4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江青的写作班梁效的文章《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金光闪闪，字字千钧，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前进的指南，胜利的保证。”“谁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华国锋、叶剑英等在策划如何处理“四人帮”时，特别注意到这篇文章，认为这是“四人帮”放出了第一枪，发出了夺权的信号，是决定提前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一个根据。

华国锋要求吴德安排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调动部队。吴忠提出没有中央军委命令无法调动。华即要吴德去找陈锡联。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已先后四次找陈锡联商量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随即给吴忠打电话“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sup>34</sup>苏振华约吴忠到京郊怀柔见

面，打招呼，苏振华说：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就工作不下去了。但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苏振华没有谈。这天晚上，华国锋把吴德找到他的住处商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此时，汪东兴来电话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华国锋认为，江青可能是试探，要稳住她，同意她去，并将此事交给吴德去安排。<sup>35</sup>

10月5日下午，叶剑英注意到江青要去石家庄的情况，找华国锋紧急磋商，要求提前行动，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十天动手的时间，提前到10月6日。同日，汪东兴和华国锋去检查了准备关押“四人帮”的中南海地下工程。江青则乘专列去石家庄，在车上组织大家学文件，到了保定，专列被甩在一条岔道上，停了一个下午，晚上才返回北京。火车到了丰台，江青要大家学文件。直到她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才笑容满面地下车。<sup>36</sup>

笔者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从官方文献及相关人士的回忆录中寻找，开始时的确是想找到张春桥篡党夺权的资料，找得很苦，也找得很累，但始终未能发现关于张春桥等在此期间有什么违背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特殊异常活动的记载。是否还有至今未被公布的重要材料呢？

## 10月6日，逮捕之夜（下）

10月6日上午8时，汪东兴要求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同志今晚8时整，在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一、研究《毛选》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上午，江青打电话给摄影师杜修贤到毛泽东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她正在这里组织毛泽东和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学《毛选》，说了许多话：“你们知道中央谁反对毛主席？”江青一拍大腿：“万里！”杜修贤摇摇头，江青朝他说：“你不相信？哼！告诉你们，谁反对主席我都知道，这种事休想瞒我！”她一个人谈起中央的局势：“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要

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谁也不能改动……谁要反对你们，不行。你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反对你们就是反对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江青的发泄欲和宣讲欲得到满足，然后坐了大红旗汽车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让杜修贤给她拍了一些照片。<sup>37</sup>

张春桥由秦城监狱转移到江阴时，曾对家人说：“我还准备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有一场辩论呢，即使失败了，也失败得光明磊落。但是华国锋不敢，他知道在中央政治局，我们是多数。”<sup>38</sup>这说明张春桥的心理有准备，华国锋可能要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解决他们的问题，他预感到大势已去，但在会上他还可进行一番申诉或辩论，即使是失败了，也是在合法中失败。

晚7时45分，怀仁堂记下了历史的一页。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一起走进怀仁堂正厅，华在左、叶在右坐下。华把事先准备好的中央决定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叶要汪坐下，汪谦虚地说，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在这里，然后躲到屏风后去指挥了。晚7时55分，先把王洪文抓了起来。7时58分，张春桥跨进怀仁堂的大门，习惯地沿着东侧走廊，由南向北，心事重重地缓步走来。他像往常一样，穿了一件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踩着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右手不时地将文件包向上撮动着。他不苟言笑的面孔，绷得紧紧的。两只阴沉冰冷的眼睛，仍然流露出刚愎自用的神气。鼻梁高处挂近视眼镜，凝视着前方，他没有环顾左右，直蹬蹬地进了正厅。他迎面看到华国锋、叶剑英，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紧锁双眉，躊躇不前。突击队员快速出击，把他扭架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整个被抓过程中，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8时25分，姚文元走了进来，三个突击队员出去扭住他。姚文元被架走，一边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行动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

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审讯中，交待了他在被捕的那天和张春桥见面的情景：10月6日下午，姚文元与张春桥见面，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姚文元问张春桥，你在这一段时候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张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

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当时姚文元对张春桥说，对华国锋还是要帮，这是大局。张冷冷地说了一句：“尽量帮吧。”最后张春桥说：“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姚文元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现在政治局办事的人太少；工农都有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张春桥对姚文元说的两点没有什么反应。<sup>39</sup>有关此事，姚文元的三女儿三三说：

这个记录非常奇怪，因为我确听到父亲说从毛主席逝世到10月6日之间，他没有和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单独见过面，他是很郑重地说的，“我在法庭和给中央的信里提及毛泽东逝世后，除在遗体旁边由杜修贤拍过一张合影外，我不但未同同案的人单独见过一次面，也没有打过一次电话！”这似乎不可思议，但铁的事实就是如此。<sup>40</sup>

关于与张春桥的这次见面，姚文元的两次说法完全不同。在监狱秘密审讯时，姚文元把见面时的情景说得有声有色，而在离开秦城时，却否定有过这样一次单独见面。我们到底该相信姚文元的哪种说法是真话？

还是毛泽东能洞察一切，他多次发表过有关专案组的谈话。1969年5月19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至少有一半材料不可信。1969年5月26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军委办事组工作汇报时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sup>41</sup>以后在武汉视察时他又说：我看专案小组很危险，他们怕右了，就千方百计把人打成反革命，怕思想右倾，宁可左一点。<sup>42</sup>九大之后，在中央落实干部政策时，对一些干部的审查无法作结论，就进行“冷处理”。所以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反复讲专案组的问题。

在审查“四人帮”专案时，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张春桥他们四人是如何在一起商量搞阴谋的。但是笔者查来查去，从官方公布的材料看，只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秘密商量如何抓捕“四人帮”，却查不出张春桥他们四人是如何见面商量“篡党夺权”之事的。江青是有些活动，却也只是到景山公园摘苹果，到保定采野花，让身边的

工作人员学《毛选》，这些无疑和篡党夺权无关。笔者只能妄自猜想：张、姚见面，本无其事，是“四人帮”专案组实在没有办法，就对姚文元“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了。1980年7月17日，在秦城监狱秘密审讯姚文元的记录中，还记有这样一段话：

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多解释。

对这段记录文字，三三回忆说：

10月6日那天晚上，爸爸是不是一起吃饭我记不清了，如果他在家的话，我们是应该一起吃的。但书中所引的他对我说的话，还有我的回答，我一点点也没有印象。以后的岁月里也从没有听到过母亲和父亲谈起过饭桌上的谈话，如果他那天有“恍惚不安”，我妈妈还会带我出去会友吗？

我们回到家，我爸爸正准备出门，他告诉我们，他刚刚接到了华国锋总理的电话，华总理要他去开会。我妈妈还说了一句：“你怎么帽子没戴，我去给你拿帽子。”那时候是10月份，又是晚上，天已经有些凉了。爸爸说：“不用了。”然后就坐车子走了。那之后，爸爸就消失了。<sup>43</sup>

三三谈到父亲姚文元时说：我爸爸是很老实很较真的人，出狱之后，他曾要求和华国锋见一面，他要华国锋还“电话债”，你那天不是叫我来开会的吗？华国锋打电话给他说“文元同志啊，你最近太辛苦了，你的身体怎么样啊？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等等一大堆关心的话。然后说要开会，讨论毛选什么的。我爸爸回答：“我身体很好，我就来。”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华国锋那么温柔关心的声音。他想问问华国锋，你是哪个戏剧学院毕业的？当举起刀要向人头上砍去的时候，竟还能这样说话。你是党的负责人，你难道就不能直接说吗？<sup>44</sup>

当晚，中南海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带人去抓捕毛远新的时候，毛远新愤恨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然后就不再说话了。随后去解决江青。张耀祠对江青说了和对毛远新同样的话，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地听着，表面没有显现慌乱，然后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机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

完成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两名政治局常委和两名政治局委员的逮捕之后，已经是晚9时50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离开怀仁堂去玉泉山，途中，他们去看了毛泽东遗体，并在毛的遗体前，肃立致哀。华国锋喃喃地说：“我们执行了你的遗愿，一举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请主席安息吧。”<sup>45</sup>

华国锋下台之后，和山西老乡陈永贵成了难兄难弟，已经没有尊卑之分了，一天两人在一起闲谈，华国锋对陈永贵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陈永贵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华国锋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以前陈永贵还相信他，后来觉得他也是个鬼。<sup>46</sup>

先前毛泽东对解决“四人帮”的说法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并没有要抓“四人帮”的明确指示。如今你把他的夫人抓了起来，还说是他的遗愿，毛泽东的灵魂怎能安息得了呢，如果此时毛泽东真的醒来，华国锋又会说些什么呢？

“四人帮”的概念，毛泽东生前就提出来了，并说了“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虽然没有明确解决的方法，但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间已经不是秘密了。抓捕“四人帮”之前，华国锋向中央政治局成员通气打招呼，交底的分寸只是把握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时候了。华并没有向他们交待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政治局成员都能接受。这时华国锋已经是党的主席，代表着正统，他的活动就是“党中央”的活动，使抓捕“四人帮”在党内合法化了。以抓捕的方法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还有一个汪东兴，四人合谋而定的。其实参

加合谋此事的还应该有一个人，此人就是陈云。

陈云毕竟有着政治家的胸怀，虽然在党内经受了不少磨难，但他有着解决党内路线斗争的丰富经验，认为和“四人帮”的斗争不能动用军队，不赞成用抓捕的方法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经过叶剑英做工作，陈云最后才明确表示支持用武力解决问题。然而他心中很清楚，用武力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属“宫廷政变”性质，光明磊落的共产党是不能干的，所以他常说：“下不为例。”后来审判“四人帮”时，陈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对江青“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党内斗争。”

## “密信”是怎样写出来的

9月18日晚上，张春桥在天安门参加了追悼大会回到钓鱼台住处时，曾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萧木说“来随便谈谈”。当晚，萧木把张谈话的主要内容写信告诉了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王知常等。此信被称为张春桥篡党夺权的“密信”，并以此对张春桥论罪。以下是朱永嘉向写作组核心成员传达此信时，一位核心组成员章树焜所做的记录：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垮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毛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道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我们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要高得多。<sup>47</sup>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同志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只要把这一段时间渡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经被胡乔木改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先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对我们毛主席的逝世，竟然用了一个中国人非常忌讳的词，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挑衅。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还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后来苏联方面重新发表了一份唁电，就改正过来了。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夜

2014年3月30日，距离萧木写这封信近三十八年了。81岁的萧木，已是满头白发，患重感冒初愈，却还是心静如水，向笔者这位80岁的来访者，讲述这段陈年往事，他说：

9月18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我从钓鱼台步行到天安门广场。那时我还是迷恋于写小说，为了积累素材，我想步行看看老百姓的情景。沿途两边的小院里，有的已经摆好了桌子，桌子上放着矿石收音机，许多人围坐在那里，等待听广播，一切都很静，连小孩子也不跑跳吵闹。也有摆着香火的供桌的，但很少。开完追悼会，我回到钓鱼台以后，心中很忧郁，也很迷茫，以为一个伟人去世了，天要塌下来的样子，今后会怎样，心里很不踏实。

这次是张春桥主动打电话要我去的，电话是他的秘书打给我的。这次谈话时间不短，但并不像别人说的谈了3个小时，没有这样长的时间，两个小时是有的。开始我就谈了从钓鱼台去天安门广场一路上看到的情景，然后就是张春桥谈，主要是他谈。他说他很累，毛逝世前，他们政治局常委要陪着治疗，都住在中南海，毛去世后，又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我看到他很累，看到他的表情有一种沉重感。从张春桥9号楼那里回到我住的16号楼，因想到张讲的有些话可能对写文章有点参考价值，就给上海市委写作组写了封信。信的抬头是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六个人，他们六人是写作组的领导核心。信的内容大体就是章树焜记录的那些，当然不可能一字不漏。

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处处在，张春桥是从列宁逝世讲起，他把毛泽东的逝世和列宁的逝世作了一个比较，斯大林说列宁同志虽然去世了，但列宁同志处处不在处处在。列宁逝世和毛泽东逝世的情景，的确有可比性。我后来查《联共(布)党史》，没有查到斯大林的这个话。

说张春桥感到胸闷，用手摸胸口，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只手抚摸着胸。张说，苏联发来唁电，其中用了一个词，在我们民

族传统里是很忌讳的，是很伤我们感情的，就是有“毛泽东死了”这样的话。张看了这样违反起码外交礼节的话，感到很气愤，为此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发表了表示抗议的电报。张说他是站着匆匆写这个抗议电报的，写的时候胸也很闷。后来苏联方面重新发来唁电。

国庆前先发表毛主席论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是张春桥提出来的。我当时没有多想。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不错的，无论是张还是王洪文都是支持华的。华很听张的话，对张的话可谓言听计从。张提出发表毛泽东论接班人五条标准，是支持华，而不是出华的洋相。现在可以分析一下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三个人的关系。张有自知之明，周恩来不止一次向毛泽东报告张有叛徒历史问题，毛压着不让查，可以说毛忍到极限了，还是提张当总政治部主任，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张的使用也到了极限。尽管毛对张的叛徒问题并没有明确表态，但它总归是个悬案，而毛又明确告诉张当副手，要他支持华国锋。在我的印象中，张对毛和毛的思想，真可说是“忠贞不二”，且尽力践行。在文革中，毛一次次将他从险境中救出，特别是像叛徒问题这样可怕的罪名毛也一直压着不让查，还依然对他颇为信用，更使他感恩戴德，致力于图报。所以毛要他支持华国锋，他定然努力照着去做，不可能再会有非分之想。

再说王洪文，自所谓“长沙告状”之后，毛泽东对王已经有些失望。当然，毛最后选华弃王，应是考虑整个形势以后作出的抉择，主要并非个人原因。即使在毛去世后，没有张的支持，王既不能也不敢爬到华的头上去。我在一旁观察，认为王很可能只是想尽量维持现有的地位，跟着华干。如果叫张春桥选择，他肯定选择支持华，而不会选择王。张和王的矛盾是由《朝霞》事件引起的。

还有就是华国锋。张春桥提出发表毛泽东论接班人五条标准，华国锋会怎样想？<sup>48</sup>我分析华会认为张这样做是对着他来的，用上海话来说，你张春桥不是“触我壁脚”吗？无非就是我华国锋不符合毛主席所说的接班人五项标准。“触”了华国锋“心境”，华当然不高兴。

总之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华国锋搞什么“一举粉碎”，华、张、王三驾马车还是可以拉下去的，起码可以稳定几年，要解决也完全可以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华国锋太急于想“独掌乾坤”了，结果后来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 方针之争和书生入彀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华国锋、叶剑英认为这是“四人帮”放的第一枪，以此为由，把本来预备10月10日对“四人帮”抓捕的时间提前到了10月6日。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把“照过去方针办”变成“按既定方针办”一事，已经给张春桥定下了篡改毛泽东临终指示的罪名。“照过去方针办”是毛泽东在病重期间给华国锋留下的纸上交待。

“照过去方针办”怎么就变成了“按既定方针办”了呢？搞文革史的人对它的演变过程曾作过调查和考证：此说最早出于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会议已经开了二十天，迟迟没有收尾，因为发生了唐山地震，决定立即结束。7月30日晚上，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吴德、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等人接见了会议出席者，为了避震，会议是在京西宾馆院子里举行的。

会上，华国锋作了简短讲话，说：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给大家传达一下，第一句是“不要招（着）急，慢慢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刚说到此，王洪文插话打断说：“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说：对，还有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由于王的这一插话，在场几位记者都没有听清那句“照过去方针办”，当时也没有录音机，于是事后整理稿子时主持者就按照大概回忆，写成“按既定方针办”。整理稿送给计委副主任顾明审阅，还说明，这句话好像是这样的。但顾明也没有改动，便批准发出，文件写道：“毛主席最后指示我们：‘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指示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坚持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中央规定去办。各级领导干部要抓紧学习，深入批邓，把革命搞好……”华国锋看后马上说：不对，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我传达的也是“照过去方针办”，怎么改成“按既定方针办”？但他并没有当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于是，“按既定方针办”的说法不胫而走。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惯例，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错了，马上就会发文件通知，告知全党毛泽东的原来指示是什么，现在错的是什么，而进行更正的。但华国锋就这样草草放过了，是不是也有别的想法？

后来被认为是“四人帮”篡改伪造的毛泽东这一指示，是从9月16日一篇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社论开始广为传播的。这篇社论也是按照文化大革命惯用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的名义写的。社论写道：“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社论发表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姚文元于9月17日、19日、20日、23日连续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电话里特别交代：“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sup>49</sup>

从此以后，“按既定方针办”在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气氛中，在中央报刊全面铺展开来。这样看来，从“照过去方针办”到“按既定方针办”的错误演变过程就不能说是“四人帮”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而是将错就错地利用了。

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由华国锋致悼词，这应该是把“按既定方针办”更正为“照过去方针办”的最好机会，但是华国锋没有这样做，悼词里并没有这句话。他为什么不提出来更正？是不

是他已经决定把此事认作是“四人帮”篡改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作为把柄来向他们发起攻击呢？

9月30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将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用急电送给华国锋审查。10月2日，华国锋看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时，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划了一个大问号，立即批示：“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论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下去，我把它划掉了。”本来乔冠华当天就要在联大发言，因为时间差，才赶上修改。但随后张春桥又批示：“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sup>50</sup>对处理“按既定方针办”的经过，姚文元于1980年7月24日，在秦城监狱秘密审讯中交待：

毛主席逝世以后，除了讨论两个文件，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就是国庆节前一两天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毛主席的病情。因为有一部分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不了解毛主席的病情。以上汇报完了之后，又讨论了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一个发言。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我对这句话，没有提不同意见，我只提出要加告人民书和华主席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也同意，后来就加上了。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这篇稿子是发表前不久给我送来的。事先我没有给《人民日报》传达过这句话，也没有听谁写这句话。但是，看到稿子上有这句话，我是高兴的，我改了以后很快送上了去了。

从“照过去方针办”演变到“按既定方针办”的过程来看，不存在张春桥伪造毛泽东临终遗言的问题。其实“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

方针办”的字面虽有差别，而其含义则没有什么差别，一定要强调它的差别，那完全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可以依此为根据给张春桥定“伪造”毛泽东临终遗言的罪。在当时的语境下，伪造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必然触犯众怒，招致全民共诛之、天下共讨之。

1980年公审“四人帮”时，梁效这篇名为《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仍被作为张春桥篡党夺权放出的第一枪。无论是在监狱预审，或是在公审大会上，都轮番对张春桥提问审讯，但张春桥对这个问题不作任何回答。按照国际法规则，不回答、不反驳就是默认，罪名同样成立，被写在定案书上。

在这条罪证下，张春桥被判刑，梁效写作组的成员也受到牵连。张春桥心中应该很清楚，在这个虚假的罪行下，他还能说什么？梁效成员们心中也会清楚，在当时的审判形势下，他们还敢说什么？但是历史不会沉默，沉淀了三十八年，梁效写作组的人说话了。梁效写作负责人、该文作者之一的范达人说：毛主席逝世后，《光明日报》向梁效组稿，要我们写一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主要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sup>51</sup>李家宽问我们能不能写。<sup>52</sup>给《光明日报》组稿，我的兴趣不大，因为此时，我正准备赴波兰工作，正在学英语。我找了几个人讨论文章如何写法，由何芳川起草初稿。<sup>53</sup>我说：“这不是什么大文章，几千字就行了。”初稿完成后，由我稍作修改，送给迟群。迟群说：“我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位置予以发表。粉碎“四人帮”，工作组及中央报刊都指定这篇文章为“篡党夺权的动员令”，“矛头指向华国锋主席”等等。

今天知道了事实真相，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实际上，华国锋等人只是将《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作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借口，这大概才是历史真相，是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那种情况。<sup>54</sup>

10月7日凌晨3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去北京开会。马天水到北京当天夜晚，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8日凌晨2时左右回到京西宾馆住处，对秘书房佐庭说：“找不到人了（指张、王、姚），人已被人家隔离了。”马天水还说：

“材料不足，江青的材料，生活上的多，王、张、姚没有什么材料。”房佐庭问：“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怎么一下子四人一锅端了？”对这一事件的性质，马天水认为：“这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又说：“我看是先抓起来再搞材料吧。”并要房佐庭转告徐景贤、王秀珍，不要乱来，乱来要受镇压的，要搞合法斗争。<sup>55</sup>得不到马天水在北京的消息，在上海的那些人当时心乱如麻。马天水不在，上海也是一团乱麻，分析北京的形势，讨论对策。在场的人都感到如同世界末日。

10月8日深夜，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及出版《毛选》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上海市根据马天水的指示，向中共中央发去热烈拥护的电报。当晚，徐景贤、王秀珍接到马天水的通知，要他们到北京去开会。把上海市委几位主要领导召到北京，中央对上海仍然不放心，特别是张春桥的嫡系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动静，北京一直在关注着。

10月11日，中央派曹谋到上海了解武装叛乱的情况。此人先找到王一平，王一平说他不了解这方面的动静，就要曹谋到李研吾家会面。曹谋是谷牧派来的，而谷牧、王一平、李研吾都是山东胶东人。他们到了李研吾家，李研吾也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找张敬标。张敬标也是山东人，是王一平的部下，此时是上海市革会的常委，但是他对武装叛乱的事也说不出具体情况。于是就让张敬标出面找朱永嘉。

那天晚上朱永嘉在家已经关灯睡觉，深夜了，突然张敬标打来电话，一定要朱到学习室有事。朱永嘉说已经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吧。张敬标不肯，硬是催他去，并派车来接他。会议由冯国柱主持，他要写作班的几位核心成员一个个表态，下一步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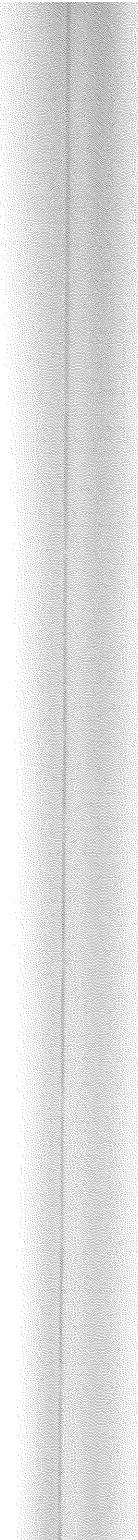
朱永嘉说，张、姚培养他们十年，总得报答二人，坐牢杀头也要下决心干。朱永嘉还提出有针对性地搞一批毛主席语录，编一个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资料，在报上发表。此时朱永嘉愤怒在心，把个人的安危置诸度外，他说：要对着干，力量上他们占上风，即使如此也要干，打它一个星期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打它一个巴黎公社出来！王知常提出四句口号：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

我文元！他们还决定起草一个宣言，也就是所谓《告全市人民书》。当他们在会上群情激愤之时，北京来的曹谋就躲在屏风后，把他们的发言记录了下来，以后也就把这些作为罪行将他们关进了监狱。

设想一下，如果朱永嘉、王知常连这样的表态都没有，而是在没有任何“转化”过程的情况下，就立即表示拥护华主席，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样，他们固然在政治上保持了“绝对正确”、“完全一致”，但是在道德层面上，则就无异于忘恩负义的坏人，见风使舵的小人了。再说，在政治斗争中，用强力迫使人们跟线、站队、表忠心，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把好人炼成坏人，把人炼成鬼。不管这种做法用在什么场合，用在什么时代，用在二十世纪，还是用在二十一世纪，或者更远的未来！

## 注释

- 1 秦楚：《陈永贵谈邓小平、胡耀邦、张春桥、华国锋》，《历史研究》，2006年，第四期。
- 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2页。
- 3 恺蒂：《女儿眼中的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6—277页。
- 4 毛泽东这次谈话，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作了引用（第1781页）。姚文元的女儿三三在阅读本书初稿时，在旁批注说：“我问过父亲这段话，他明确表示他没有听到过主席讲这一段话。”姚文元的秘书胡鼎君批注说：“我也怀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649页“6月”条目中说：“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其中没有姚文元）。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这段话，《毛泽东年谱》编者作了脚注，说：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关于毛泽东说



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流行一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腥风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对上述说法，该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

- 5 2002年4月19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6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21期。
- 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84页。
- 8 秦楚：《陈永贵谈邓小平、胡耀邦、张春桥、华国锋》。
- 9 同上。
- 10 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95页。
- 11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 12 同上，第177页。
- 13 武建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过程》，《中华儿女》，2001年，第10期。
- 14 杜修贤摄、顾保孜撰：《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 15 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 16 邓岗，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
- 17 姚文元9月13日日记。
- 18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236页。
- 19 姚文元9月13日日记。
- 20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173页。
- 21 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 22 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 23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综述·纪坡民发言》，《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纪坡民是纪登奎之子）。

- 24 中发1976(24号)文件，第94页。
- 25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94年，第936页。
- 26 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27 这实际上指的是1957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度过政治危机的事情。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马林科夫等七人要求赫鲁晓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不接受，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体会议来决定他的去留。在全会上，大多数委员表示支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被解除职务。
- 28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179页。朱可夫，苏联元帅，1957年时任国防部长，他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支持赫鲁晓夫，用军用飞机将三百多名苏共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开会，帮助赫鲁晓夫度过了政治难关。
- 29 杜修贤摄、顾保孜撰：《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第294页。
- 30 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秘密审讯中的交待》，1980年7月24日。
- 31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180页。
- 32 杜修贤摄、顾保孜撰：《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第295页。
- 33 同上，第296页。
- 34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183页。
- 35 同上，第185页。
- 36 杜修贤摄、顾保孜撰：《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第296页。
- 37 同上，第300页。
- 38 2011年9月6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的谈话。
- 39 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秘密审讯中的交待》，1980年7月17日。
- 40 2015年11月11日、16日，三三接受恺蒂采访时的谈话。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53页。
- 42 同上，第257页。
- 43 2015年11月11日、16日，三三接受恺蒂采访时的谈话。
- 44 同上。
- 45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
- 46 秦楚：《陈永贵谈邓小平、胡耀邦、张春桥、华国锋》。
- 47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家，苏联十月革命直接领导人，曾任苏联红军总司令等职，和斯大林等同为苏维埃主要领导人。列宁逝世后，他在与斯大林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失利，被开除党籍、国籍，驱逐出境，在境外创立了“第四国际”。1940年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遣的刺客暗杀。

- 48 毛泽东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6月6日公布。摘要如下：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第三条，要能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犯错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85—87页。）
- 49 中发1976(24号)文件。
- 50 武建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过程》，《中华儿女》，2001年，第10期。
- 51 范达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时为梁效写作组组长。
- 52 李家宽，毛泽东警卫部队政治指导员。时为北大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
- 53 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时为梁效写作组成员。
- 54 范达人：《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 55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940页。

## 第二十二章



1981年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一言不发

## 第二十二章

# 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

### 法庭上的沉默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被押送至秦城监狱。至此，王、张、江、姚结束了187天在中南海的监禁，开始了他们漫长的铁窗生活。

为公开审判作准备，他们四人进了秦城监狱以后，每个人都面临着预审问题。预审期间，江青仍是锋芒不减，和预审人员辩论；王洪文则要求法庭给他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姚文元仍然不改书生咬文嚼字的习气，做着解释；唯张春桥沉默以对。一次在提审张春桥时，要朱永嘉去作证，朱永嘉对笔者说：他在秦城监狱，见过一次张春桥，在法庭上要他证明《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和小D的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篇文章是张春桥授意他们写的。朱永嘉说了这篇文章写作的经过，张春桥只是歪着头闭着眼听，没有看他，他当然能听到朱永嘉的说话声，同时知道朱永嘉也被抓了起来，并为调查作证。但对预审人的提问，他没有作任何回答。

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当时是张春桥预审组的组长。1980年6月2日，在秦城监狱的一间预审室里，第一次提审了张春桥。提审时，上首坐着王芳等预审人员，下首落座者即是63岁的张春

桥。他上身穿着中式黑色棉袄，领领的一纽葡萄扣没有扣上，下穿西装裤，脚着棉布鞋。他既不昂首，也不垂头，漠无表情，一声不吭地坐着。审讯必备的录音设备，却录不到他的声音。王芳亲自对张春桥提审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回答问题，不看审判文件，不在审讯笔录及判决书上签字。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为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而是认为他顽固不化，坚持反革命立场。

也有文章记载，张春桥在法庭上零口供。但他还是有两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次是1980年6月2日，王芳提审张春桥时，向他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处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情节或无罪辩解”。这时，张春桥大概是感到不能不说话，不能不表白自己的态度，于是他说话了：“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已经表明过一次态度，但不是用言语，而是用文字。他给中央写信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的有效性。”这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人们也许会猜想，张春桥给中央写的信应该不只是这样几句话，肯定还会有为自己无罪作的辩解，但因为不便公开，一般民众也就无法知道了。

1980年11月20日下午15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正式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次审判，吸引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目光，被称为“中国大审判”。两案主犯共十六人，其中林彪、康生等六人已死亡，出庭受审的有十人。“江青集团”包括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由第一审判庭审理。“林彪集团”成员则包括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六人，由第二审判庭审理。

1980年11月27日上午8时55分，第一审判庭开庭对作为被告的张春桥进行第一次法庭调查，调查的问题是：张春桥当着邓小平的面骂他是纳吉；张春桥说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蒯大富出庭作证，张春桥对他面授机宜，打倒刘少奇。在庭审中，审判员多次提问，张春桥不作回答。

1980年12月4日上午9时，第一审判庭开庭对张春桥进行第二次法庭调查，指出张春桥为了镇压工人赤卫队制造康平路事件，徐景贤出庭作证，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之事。张春桥仍然闭口不作回答。

1980年12月13日上午9时，第一审判庭开庭对张春桥进行第三次法庭调查，调查的主题是：张春桥策划武装叛乱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徐景贤、王秀珍及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出庭作证，供认1976年7月张春桥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张春桥还是闭口不作回答。

徐景贤、王秀珍及施尚英在法庭上作证的是1976年7月向民兵发枪的事。此事前文已有所述，发生在毛泽东生前，是由许世友儿子那封信引起的，后来为防止许世友南京兵变所采取的措施，是经毛泽东同意的。法庭指控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后上海组织民兵搞武装叛乱，本来不是一回事，有点移花接木。

1980年12月20日上午9时，法警把张春桥押上法庭，对张春桥犯罪事实进行辩论。公诉人在法庭上历数张春桥在上海策动夺权，诬陷、迫害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指挥操纵游雪涛小组，武装、改造城市民兵，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罪行，审判长曾汉周告诉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有什么话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辩护。”张春桥仍然像法庭调查时那样缄默不语，一言不发。曾汉周把被告人有权陈述和辩护的权利的话又重复一遍，张春桥仍然是沉默，一声不吭。曾汉周宣布“等你两分钟”。两分钟过后，张春桥仍不讲话，曾汉周说：“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宣布：张春桥犯罪事实审理结束，休庭。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宣布：判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同时与他们在法庭上一同受审、一同宣判的“林彪集团”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均被判处十六至十八年的有期徒刑。同样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康生、谢富治

因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此前已被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党籍，撤销悼词。

此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同党”，工总司和市委写作班的主要成员也都先后被推上审判台，进行了审判和宣判，其中：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陈阿大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朱永嘉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萧木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马天水因在预审期间患上了反应性精神病，被中止预审，送回原籍，由家人赡养，后死于精神病院。“京剧革命”的风云人物于会泳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此外，1967年就已“落马”的前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关押了十四年后，案件被重新审理，其中王力、关锋免予起诉，予以释放，戚本禹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1983年1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两年已满，法院又根据《刑法》第46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可改为无期徒刑”，张春桥和江青均被改为无期徒刑，理由是“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而事实是，江青始终是无法无天，表示抗议；张春桥的沉默就是最大的抗拒，他从根本上就否定对他审判的合法性。

## 为什么不说话

从被隔离审查，关在中南海地下室，到被捕关押秦城监狱；从多次预审，到法庭上公审宣判，张春桥对官方要人始终没有回答过任何问题。对张春桥的沉默，审判人员有一个解释。公诉人王芳指出：张春桥拒不回答问题，是早已做好准备的。他是横下一条狠心，准备杀头的。法庭上，王芳请求传唤马天水、徐景贤作证。马天水揭发：“在1968年至1969年两年中，张春桥在‘市革会’小会上，曾几次讲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徐景贤揭发张春桥曾对他说：“我有什么事的话，总是会连累你们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杀头。”<sup>1</sup>这一讲法，应该是比较接近张春桥当时的想法。他有了被“杀头”的准备，也就是说死都不怕了，对审判也就不存在任何幻想，何必强作无用的回答呢。

另一个是审判员王文正的说法。他说，在一次预审时，审判人员问：你们在搞掉周总理和邓小平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总理的职务？此时张春桥在兴头上，便回答说：“他们的意思是由我来。”张春桥很快发现对答有失，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情况，从此就沉默不语了。这样，张春桥的沉默就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一道令人费解的风景。王文正还说：而我作为当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始终都认为，他是一个在事实面前自认失败的人。<sup>2</sup>此说有些肤浅勉强，也不大符合张春桥平常办事的风格。

张春桥在预审或公审时以无言相抗，应该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保护毛泽东。笔者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对他进行审判之前，对张春桥的所作所为，哪些该论罪，哪些不该论罪，在参加审判的人员中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要搞清哪些事是有毛泽东指示或同意他去做的，哪些事是他个人决定去做的。后来“大家的意见都统一到一点上来，那就是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别法庭，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曾对此有过一个意见，凡是经过毛泽东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关被告罪”。<sup>3</sup>

既然审判人员都想到了这样的问题，难道张春桥想不到吗？他的所作所为与毛泽东是无法分开的。把他送上法庭，无疑也是把毛泽东送上法庭，审判他就是审判毛泽东。难道在审判他的时候，他能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吗？他不是那样的人。他的女儿张维维对他的理解是，关于他的一生，他是不可能后悔的。他不可能反对毛主席，他愿意帮助毛主席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也不会把责任往下推。<sup>4</sup>所以对他的审判，他只能以无言相对。再说，法庭上为他论罪的一些事情与事实真相不符。如上海夺权，倡导者不是张春桥，而是毛泽东。“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是毛泽东责问陈丕显“死了张屠夫，就吃浑猪肉”。在上海夺权的事情上，张春桥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而是相差一大步，处于落后被动状态。赤卫队进驻康平路引起的“康平路”事件，起因是曹荻秋当时困难的处境无法兑现对赤卫队的承诺。而抓赤卫队在上海铁路局的头头王玉玺则是周恩来下令，陈丕显亲自到公安局上海分局坐镇实施的。以这些与事实不相符的事情定罪名，他自会知道在遇到不根据事实的审判之时，辩解也是无用的，他当然也就以沉默对之。

不只是法庭上为张春桥定罪的材料经不起推敲，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华国锋等人的讲话也是如此。在“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华国锋说明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时说：“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流血，使我们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不用分析，华国锋的这个话表明的，就是提前粉碎了“四人帮”要搞政变的计划。汪东兴的发言更加明确，他说：“‘四人帮’在主席逝世后一段时间以来准备发动兵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然而“四人帮”掌握了军权吗？连军权都没掌握的人，怎么可能发动兵变呢？

以后叶剑英也回忆说：“得到我们自己的情报，说上海的红纸已经卖光了。他们在准备庆祝伟大节日。”“对他们的活动我们早有觉察，但没有料到他们要在10号搞政变。”<sup>5</sup>照叶剑英的说法，上海已经知道“四人帮”要搞政变，准备庆祝了。搞政变是绝密的事情，上海人已经把红纸买光准备庆祝了，有这种可能吗？生活在上海的人还应该能回忆得起，当时有没有买红纸庆祝胜利的事情？叶剑英这话说给北京人听，北京人也许会相信，但上海人听了是不会相信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是抓捕王、张、江、姚的最高决策者，他们以这四个人“搞政变”为理由，一方面可以和毛泽东脱离关系，二是可以使政治局成员思想认识统一。当时，如果清算他们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或罪行，势必牵涉到毛泽东，而和政治局的每个成员都脱不了干系，这样在政治局就无法得到统一，他们抓捕这四人的行动就得不到政治局的认可。当时，政治局成员不一定都是相信他们四人有搞政变、篡党夺权的大阴谋的。

时隔近四十年，当人们在审读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留下来的发言、讲话的白纸黑字时，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们不是停留在他们所作的定论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地寻找支撑他们三人的定论的史料根据，结果发现他们的定论没有事实的支撑。当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失去了人心，抓捕他们是得人心的事情。人们在兴奋之中，对华、叶、汪的说法存在的问题，不会去多问一个为什么，但是要寻求历史的真相，就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拷问，而不能再是人云亦云了。

“四人帮”被公审之后，人们对张春桥的一言不发产生了好奇心理。有不少人在寻找答案，也有着各自的回答。有些回答是不真实的，但它还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中就有一份《张春桥辩护词》。<sup>6</sup>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张春桥在法庭应该有这样一番陈述。虽纯系假托之作，但或许研究者也会对这份《辩护词》“合理的猜想”作一番分析，对研究张春桥本人和人们心目中的张春桥，或许也会有一些参考价值。

## 还能说什么

上面已经分析了张春桥为什么沉默不说话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还能说什么？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本来的计划是10月10日动手抓捕张春桥等四个人，后来提前到10月6日。如前所述，这是因为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华、叶、汪认为这是张春桥他们篡党夺权的动员令，是向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挑战：既然张春桥他们篡党夺权的日程提前了，那么抓捕他们也只好提前。无论是在监狱中的秘密审讯，或者在法庭上的公开审判，张春桥都对这个所谓的“篡党夺权”动员令不作回答。他又怎么回答呢？他心里当然清楚，这个“动员令”是子虚乌有的。面对着一个伪证，他还要作回答吗？

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由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写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所提供的上海搞“武装叛乱”的材料影印件之一，是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送口信给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传达“在上海的余党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动员令”，是萧木传达张春桥意见时，徐景贤作的亲笔记录，影印件原文如下：

### 9.28 萧木传达张春桥意见：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

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搞上海，都没有成功。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这件记录着张春桥武装叛乱动员令的影印件，无论是在监狱秘密审讯，或在法庭上公开审判，都被当作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审问张春桥，要他回答是如何要萧木回上海向上海市委传达这一动员令的。而徐景贤也是把它当做武装叛乱动员令供认的。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不能从张春桥这段口信中读出什么要搞武装叛乱的意思，怎么徐景贤却偏偏从中读出这个意思来呢？对这件事最清楚的只有张春桥和萧木。可是张春桥一言不发，那就只好由最清楚事实真相的萧木出庭作证了。但是在公审的法庭上却不见萧木的影子，也没有宣读萧木写的证词。在被告不作回答，也没有宣读证人证词的情况下，法庭仍然认定这是张春桥的重大罪行并作了宣判。是否因为有“要打仗”的字眼就算是“武装叛乱”了呢？这是经过战争年代的人的习惯用语，诸如把搞重点工程称之为“战役”，把协作称之为“联合作战”，还有什么“突击队”、“轻伤不下火线”等等，都是把战争年代的术语沿用到建设年代。而且明明是说如果林彪“搞成”了的话上海要打仗，怎么会牵扯到张春桥自己要“武装叛乱”了呢？

那么萧木为什么没有出庭作证呢？也是事情过去几十年，他才告诉笔者：

毛泽东逝世后，我两次见张春桥。第一次即9月18日那天晚上，是张春桥主动要见我的。第二次是9月27日。根本不是张春桥派我去上海的，张也没有要我传达什么，那时因我的妻子生病，加上想集中一段时间修改快要完成的长篇小说，已向王洪文请假准备回上海。9月27日晚上去向张春桥告别，张这才和我闲聊了两三个小时。主要内容就是谈小说创作，是他听我说。他听了后，同意

我的想法，他说：这样还是好的，希望今后还有一些人专门用心思搞文学创作。张春桥还说：航天事业还没有人写过小说，搞航天的人，或许不懂文学，或许没有兴趣写，或许没有人写，可以花几年时间，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写不出也没有关系。上海嘉定和航天事业有协作部件，你可以先到那里熟悉起来。

我于9月28日中午就回到上海。那时我的宿舍在康平路大院三号楼，我回宿舍必然要经过康平路小礼堂。正好是市委书记、常委们在康平路大院学习室学马列的时间，此前我也当过他们的学习辅导员，我的办公室兼临时宿舍就在离学习室不远的一栋楼里。这天当我路过学习室时，王秀珍从窗口探出头来叫住了我，一定要我进去坐坐。我一进去，书记、常委们问个不休：在北京的几位身体可好吧？最近在做什么又说了些什么呀？被追问得急了，我只好随口说了一点，其中包括去向张春桥告别时张说的一些话。我是东拉西扯随口说的，经徐景贤作了摘要式的记录，就成了上面这个样子。

在张春桥出庭受审时，萧木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可谓是和张春桥同监坐牢，近在咫尺，但是却没有萧木的证词，更不见萧木出庭作证，这是为什么？按照法庭上所说：萧木是张春桥搞武装叛乱动员令的传达者，是第一知情人呀！

法庭的确向萧木进行过调查，要他出庭作证，或者写证词，但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写。萧木对他们说：“张春桥同我说的那些话，能叫反革命武装叛乱动员令吗？就算是，他又不是神仙，怎么能够早在九天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要被抓起来，所以就预先叫我去下达这个动员令呢？再说，如果他真是神仙能够未卜先知，那提前发动叛乱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傻呼呼地等到自己被抓起来了再叫上海去发动叛乱呢？天底下有这样的荒唐事吗？”法庭认为萧木态度恶劣，折腾了他一两个月，终于彻底失望，说“你到里面去顽固吧”，把他重新锁进了大牢。临时又抓了个连旁证也算不上的张春桥的一位秘书，突击提升他为当事人以代替萧木，硬要他写证词。这位秘书实事求是地说：“那天晚上张春桥与萧木

大约谈了三个小时，不过我没有在场，谈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但特别法庭的法官看了这样的证词却偏偏说：“这就清楚了：张春桥这个平时很难开口的军师，这天居然谈了三个多小时，策动武装叛乱肯定是其中一项。”于是就以徐景贤和这位秘书的证词为证据，这么稀里糊涂定了案。那天萧木与笔者谈到这里，笑着说：“你看，特别法庭真是好特别啊！”<sup>7</sup>

材料影印件之二，是《徐景贤的两个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一个手令写着：“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另一则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对徐景贤的这两则“武装暴乱”的手令，徐景贤的好友、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核心人物、能干女将陈冀德有着这样的评论：

我和老徐的分歧扩张至极端的，是1980年底，他在审判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上的证词。其一，他自认是1976年10月“上海武装反革命叛乱”的主要组织者和发动者。而参与者们何在？武装叛乱的现场证据何在？武装叛乱的矛头所向是什么？他都没有说。唯一作证出示的是他当时从手册上撕下一页纸，纸上写着请民兵指挥部集中部分兵力待命，并派人去加强电台、报社的保卫工作。这么严重，甚至有国际反响的重大政治事件，就这么一页纸上写的那几个字，能作为证据的全部？能说明什么？<sup>8</sup>

2004年，徐景贤《十年一梦》出版，又重提上海武装叛乱的事，仍然承认张春桥是策划者，自己是发起者和组织者。对徐景贤的行为表现，陈冀德提出：为什么？他想干什么？他又要干什么？说“隐藏在我个性中的幼稚且固执的疯劲又上来了”，她跑去责问徐景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徐景贤回答说：当年是迫不得已。以为政治运动，思想批判从严，所以上纲上线，拔高主题，一心想争取组织处理从宽。现在，还是迫不得已。内心希望能借此得到领导的认可，允许《十年一梦》能在大陆出版、发行。<sup>9</sup>

徐景贤虽然作了坦率的回答，但仍然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迫使他承认张春桥是武装叛乱的策划者，自己是发起者和组织者。萧木在纪念徐景贤的文章中作了回答：

老徐去世后的头几个月里，我曾到他家去过几次，除了吊唁也向体弱多病、悲恸难已的蕴芳大姐说几句安慰话。一次在回顾老徐的病历时，蕴芳大姐说到1981年年初景贤被押赴北京为特别法庭出庭作证后再回到上海的那段时间里，曾一度严重精神失常，甚至到了胡言乱语、举止怪诞，见到亲人也不再认识的地步。我大为吃惊，问这是怎么回事？大姐说：“那是上面没日没夜软硬兼施逼他做出违心的交待和证词，致使他精神崩溃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遵照张春桥下达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动员令，在上海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我说：“所谓‘张春桥派萧木向上海市委下达武装叛乱动员令’纯属子虚乌有，我被关在秦城那几年里，已先后向中央专案组和特别法庭办案人员作过无数次说明和申辩，最后，连特别法庭法官也认为我的说明和申辩是符合实情的，因而不得不撤回了要我出庭作证的指令。他们怎么可以在没有我这个当事人的任何口头或书面证明的情况下，强令老徐作出那样的交待和证词呢？还有，老徐精神上曾经遭受过那样的创伤，他怎么从未向我说起过呢？”蕴芳大姐说：“不是对你们几个老朋友他没有说起过，对家里子女他也从来没有说起过。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天大的事总是自己一个人扛着，在朋友、亲人面前还表现得那样轻松、开朗，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其实他内心是很沉重、很痛苦的。”到这时候才知道，我所看到的老徐生命最后几年的“轻盈”，多数情况下是强忍着内心的沉重和痛苦有意表现出来的，目的是想以此启发我做到像他常说的那样“放开”，好使我的劫后余生尽可能过得愉快些。所谓“相响以湿，相濡以沫”，这是一种多么珍贵的友情啊！<sup>10</sup>

陈冀德、萧木的文章写得比较婉转含蓄，还是朱永嘉说得最清楚，他说：

法庭要为“四人帮”定“篡党夺权罪”，实是拿不出最有分量的材料，所以就在“上海武装叛乱”上做文章。一方面想从萧木身上找突破口，让萧木作证张春桥向上海下达搞武装叛乱的指令，但萧木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拒不出庭作证，也不写旁证材料。另一方面就从徐景贤身上找突破口。那时徐景贤还被关在上海，公安部长赵苍壁派人找徐景贤，说是华国锋的意见，只要徐景贤承认张春桥向上海下达过武装叛乱指令，对他就免于起诉，当然也不会给他刑事处分。徐景贤对华国锋寄以幻想，就违心地作了假证。这件事一直是徐景贤的一块心病，一直不对我们说。直到2006年，他首次对朱绍君说，以后我们就知道了。他这样做是当时客观形势所迫，大家都谅解了他。但他说这事不到一年，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是很可惜的。<sup>11</sup>

面对自己下属作出的假证，又面对着强加于身的“罪名”，张春桥还能说什么？还需要说什么？

其实，张春桥并不是绝对缄口不言，被捕之后和看守他的小战士及为他治疗的医生还是说话的。刚刚被捕关在中南海的一个地下室时，张春桥一直是沉默的。开始时有几天不吃饭，问他“要绝食吗？”他说：“不绝食，有点感冒。”经部队卫生员治疗，几天后恢复正常。他对卫生员说：“小同志不简单，真把我的病治好了。”他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看《毛选》，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眉批不少，有时也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仰首长思。有几次他往地漏内倒水，问他“为什么？”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有一次刘庆棠无意中碰到了张春桥，看到他的头发脱光了，显得很胖。<sup>12</sup>后来，刘庆棠因病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姓刘的大夫告诉他，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有一次公安部长来医院探望他们这些住院的犯人，张春桥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样？”张不答话。部长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着急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

答，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没趣，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sup>13</sup>

可是等部长出了病房后，张春桥跟大夫们说话，却非常有礼貌。

## 寂寞9号楼

北京钓鱼台是清室皇家的行宫，皇家到西山出游，钓鱼台就是歇脚的第一站。以后的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时期，钓鱼台仍是达官贵人盘桓的地方。但这里毕竟是用以休息玩赏，不是权力的中心，所以在京城的老宅子里也并不怎样特别出名。钓鱼台真正名声显赫还是中央文革小组住进去之后，它不只是用来办公，同时也是中央文革成员居住的地方。16号楼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由王力、戚本禹住在那里守着，康生住8号楼，江青住11号楼，关锋住15号楼，刘志坚和王任重带着夫人和孩子合住2号楼，不过他们的时间不长。张春桥、姚文元合住9号楼。毛泽东对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无鱼可钓，陈永贵就趁机搬走了。恰巧这时姚文元的妻子调往北京工作，他听到毛泽东的话，也很快搬离钓鱼台，到别的地方去住了。铁打的营帐流水的兵，钓鱼台也是，人员的进进出出也显示出它的兴衰变化。只有张春桥住在钓鱼台十年相始终。1976年10月6日晚上，他奉华国锋开会之召，一去就不复回了。

住在钓鱼台，张春桥没有什么朋友相往来。姚文元算是和张春桥最熟的人了，两个人住在同一幢楼里，但除了开会时刻，两人平时也很少往来。姚文元的女儿三三说：“我听那里的服务员说过，他去送水，看到过他们消磨业余时间的办法，张春桥一个人在玩一副牌，我爸爸一个人在下象棋，一个人下两个人的棋。服务员说这两个人真奇怪，干嘛各玩各的，为啥不起下下棋，打打牌呢。服务员这样说，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工作关系。”<sup>14</sup>张春桥一个人在玩游戏消磨的情景，萧木也看到过。1975年秋天某日，萧木去钓鱼台9号楼探望张春桥，楼里的服务员告诉萧木：这段时间首长很少出去开

会，有几次看到他一个人在打扑克，这里的清洁工作都是首长自己做，我们快失业了。萧木走进房间，看到张春桥一个人站在桌子旁“打通关”，也叫“拱猪”，这是一个人玩的扑克游戏。萧木看到这情景，就问：打通没有？张春桥点上一支烟，很高兴地说：“非常难得，这次打通了。”邓小平走红的时候，张春桥已经寂寞了一段时间。这时邓小平因两次转信，引起毛泽东不高兴，风头已过。批邓即将开始，张春桥这次因“打通了”而高兴，或许是一种预兆吧。

张春桥和姚文元不仅是各玩各的，吃饭也是各吃各的。但是，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共同规矩：晚上送夜宵不要女服务员，而让男服务员或警卫员送，不让女同志上楼，在这一点上确实很注意。原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李传俊说：“我接触他们没有乱七八糟的事，两性关系的事一点都没有。”他们吃饭也很简单，三菜一汤，当然做得比较细，肉丝切得比头发丝粗点吧，就这么简单。包括政治局碰头会，吃的也是家常菜。姚文元搬出后，9号楼只有张春桥一个人住，的确是冷清，很寂寞。除了开会，他每天很少说话，早上服务员送早点来，他说一声谢谢。中午送午饭来，他又说一声谢谢。晚上送晚饭来，他还是说一声谢谢。也许在张春桥看来，住在钓鱼台也不一定就是安全的。他的女儿张维维发现他喝茶用的茶杯很清洁干净，他每次开会回来，总是要把原来剩下的茶水倒掉，把杯子洗了又洗，然后再泡上一杯新的茶水。张维维那时就想：他是否担心有人会下毒？不过这个话张维维没有对他说出来。

张维维来钓鱼台小住时饭后陪爸爸散步，看到河里扔了许多箱子和杂草，她觉得很乱，就问：为什么不清理一下？张春桥说：那是养鱼用的，叶帅常来这里钓鱼。维维听说王洪文也常在这里钓鱼，张春桥说：王洪文不知天高地厚，叶帅可以在这里钓鱼，王洪文没有想想，他有什么资格在这里钓鱼。叶帅带王洪文在这里钓鱼，叶帅向主席汇报，所以主席对陈永贵说钓鱼台无鱼可钓，那是借题发挥。张春桥还说：叶帅还带王洪文去打猎，王洪文真傻，怎么能跟着叶帅干这些事情，上这些人的当呢！叶帅这样干没有事，主席也不会批评，王洪文就不能这样干。

他的办公桌也是有条有理，很干净，没有杂乱的东西。有一次，他对张维维说：我这里什么都没有，我批过的东西都交上去了。他拉开保

险柜，说：“你看我的保险柜都是空的。我这里什么都不留。”他又说：“我反正不怕死，但我不找死！”他说得很突然，也很坦然。他那里每天都有许多群众来信。他都不作批语，就转出去让别人去处理了。维维觉得他这样不作处理是对写信的人不负责任，他说：“我不了解情况，如果我批了什么意见，会给写信的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张春桥是个很细致的人，萧木不止一次看到：他拆信时，先拉开抽屉拿出一把剪刀，把信封剪开，又把剪下来的纸条放进字纸篓中，然后才看信，再把剪刀放进抽屉里，把信归类放好。张春桥即使在写文章的时候，桌子上也会收拾得很干净。在李传俊的印象里，张春桥好象城府很深，胸有成竹的样子。他觉得张春桥知识面宽，能力也比较强，写过九大政治报告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写东西有个特点，正好和姚文元相反，他写得从容不迫，草稿干干净净，几乎都不改什么；姚文元写得很快，但是很乱，涂改很多。张春桥写东西的时候，有时打开录音机，听听音乐，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酝酿文章，听完音乐再写。夜里有时写到两三点钟。

在钓鱼台，张春桥虽然孤独，但他并不是生活在寂寞之中，他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港台几家有代表性的报纸。对上海市委写作班办的几种刊物，他看得特别认真，有时还会对其中的某篇文章写下自己的意见。1975年《朝霞》第三期发表了任犊写的《走出“彼德堡”》，赞扬高尔基到群众中体验生活，批评上海工人作家脱离生活实际，写不出作品了。<sup>15</sup>张春桥读后写下批语：“刚才翻了一下任犊的文章。虽然不必在这篇文章中写，但是高尔基这个人，我觉得要分析，不要说得那么好。他为什么犯造神论、召回派之类的错误呢？”<sup>16</sup>说明一个工人，不读马列，不改造思想，必定犯错误。十月革命以后的错误，是以前错误的继续。”张春桥在寂寞中仍在思考。

张春桥虽然和江青一起搞了几个样板戏，但对看戏仍然没有兴趣，更不喜欢看电影，也不大愿意陪江青看电影。江青的秘书每每打电话说江青请他看电影，他就说：哎呀！你看我手上的事还没完呢，半截思路打断了。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刘庆棠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

“第二天（明天）一起床就看。”看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但有时他也会提几个小地方，建议修改。

即使如此，张春桥也忍受不了钓鱼台的孤独，他需要和外界交流，他很不喜欢各地送来的上达天听的报告，他想了解外面世界真实的信息。通过“《朝霞》事件”，他知道写作班的女将陈冀德是性格倔强而又敢于讲真话的人，便主动给她写信，内容很简单：问她愿不愿意给他写信，把她的所见、所思、所闻告诉他？他唯一的要求，是说真话，不要有外交辞令。张春桥对“《朝霞》事件”“富于人性的态度和顽强的责任感”的表态，对《朝霞》编辑部来说，都是性命攸关，使陈冀德激动不已。所以张春桥提出要她写信，她欣然命笔。

陈冀德给张春桥写的第一封信的内容是表达对上海工总司的不满，称工总司搞掉《朝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久，她收到了张春桥的第二封信。张在信中表示，他对她的回信表示赞赏，说很感谢她告诉了他许多闻所未闻的事情。接着，张春桥提出想听听陈冀德对样板戏和电影《创业》的看法，并仍旧再三说，不要外交辞令，要说真话。陈冀德给张春桥写过几封信，每次信都写得很长，在一封信中，她表示自己怕写长信。197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给朱永嘉的批示中有一段话，说：

冀德又写长信，又怕写长信。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你要知道，我是一个每天要看几百份文件的人，其中有许多是一点味道也没有，如果不是政治上要负责，我决不会看的长文件。确切地说，这里说的没有味道不包括“又臭又长”这个臭味。而你们的信，我总是不吃力地看完了，因为你们能够告诉我一些不知道的东西。也许你们很难体会到做老爷的苦恼。特别是我这位老爷的处境所带来的苦恼。再过几个月，我就进驻钓鱼台十周年了，特别是这三年，越住头脑越空，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因此，从你和其他同志的信中知道一些事情总是很高兴的。因此，你就不必多想长了、短了一类的事。至于意见正确与否，更不必多想。这是去年已经说过了的。

我的身体没有全好，但已经恢复得同去年差不多了，工作量已经全部恢复了。谢谢同志们的关心。鲁迅说他为什么吃药，吃鱼肝油的那段话，始终鼓励着我。<sup>17</sup>

信尾落款的时间是1975年12月10日夜。信中所说“特别是这三年”，应该是从1972年到1975年。这期间经历了党的十大，叛徒问题的困扰，邓小平出山后形成的强有力的对立面，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以及向中央申请批准他和文静不情愿的离婚，他所遇到的何止是“越住头脑越空”的问题，而是处境越来越苦恼。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无处倾诉，也无法倾诉，正像张维维对他理解的那样，对别人提出的质疑，“如果他没有表示的话，别人也会说他。所以，组织要求他，他索性就不回上海，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sup>18</sup>所以他只能使自己蜷缩在钓鱼台9号楼内，忍受着寂寞与孤独。

自从毛远新来到毛泽东的身边，毛的一些想法、意图开始直接对毛远新表达了，张春桥就变得更为谨慎，徐景贤也感到他的胆子变小了。他多次关照徐景贤及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今后要少出头，先看辽宁的做法，上海再跟着做。如他本来想让在农村生产大队核算搞过渡的事走在前面，但从1975年底开始他有所改变。这时正是朱永嘉对过渡问题搞得很起劲的时候，他给张春桥送去上海奉贤县钱桥公社16大队实行经济核算情况的调查，然而此时张春桥已改变了以前的想法和计划，他在朱永嘉送来的报告上批示：“材料留下。请你们把注意力放在路线斗争上去，首先是教育，也可能波及其他路线。希望这次能搞得稳妥一些。这方面的意见，头几天已经告诉天水同志了。大队核算可以缓一步。”<sup>19</sup>所谓把“注意力放到路线斗争上去”，那是虚的，即使这样虚的事情，张春桥也希望朱永嘉他们不要捅出漏子来。“大队核算”属于经济体制的改变，那是实的，他不再敢走在前面了。

张春桥在孤独寂寞中，对上海市民的“菜篮子”问题，仍然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给予很多关注。他要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经济组作蔬菜专题调查，提出解决的办法。经济组的姚家华直接主持并参与了这个专题调查。他去小菜场、农村人民公社、商业二局、农业局疏通关系，调解矛盾，最后写出一个总的报告和8个附件，送给张春桥。张春桥作了长达280字的批语，指出上海蔬菜供应靠外地是靠不住的，要自力更生，向国务院申请增加蔬菜种植面积。即使在动乱年代，土地种植面积也是由国务院控制的，地方无权随意改动。经国务院批准，上海蔬菜种植面积

增加了280多亩。还有，上海做糕点、大饼需要的芝麻，文革期间主要是从国外进口。前文有述，姚家华又调查了农民在路边、宅旁和其他农作物间种的经验，写了调查报告，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1976年6月5日他在报告上只批了一个“对”字，<sup>20</sup>上海方面便把农民经验加以推广，解决了芝麻供不应求的问题，市民吃的糕点上可以见到芝麻了。

对于张春桥的孤独，张维维有一种解释：我爸爸的孤独是来自别人的不理解。不是他要求孤独，也不是他自命清高。

## 可以为自己活着了

人对现实不再存幻想，一切利益的锁链被打碎后，即使结怨很深的人，一旦穿上编有号码的囚衣，也就都活得轻松，关系也变得简单了。

“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的几名大政治犯被法庭审判定刑之后，日子比审判前有许多改善。他们混合编入政治学习小组，可以在一起看电影、打牌、交谈，有时也可以集体出来放风，但即使这样，由于监狱还是把他们分帮分派地关押，所以两个“集团”的人彼此也难有机会相遇。有一次，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下楼放风，在走廊里正好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相遇。看守人员马上把黄、吴、李、邱赶进房间里。记者戴晴被关于监狱时，偶然在楼梯的转弯处看到被风衣裹得很紧的姚文元的背影。

朱永嘉在秦城监狱患病，被送往复兴医院治疗，看到一个老头子的背影，医务人员告诉他那位就是陈伯达，但也仅此而已。他在监狱里放风时，倒是和张春桥打了一个照面，张春桥只是愣了一下就一闪而过了。朱永嘉对笔者说，大概张春桥在想朱永嘉怎么也被关进这里了。这在一些人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虽然是零星的，却也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在狱中的生活状况。但是很少能见到关于张春桥在狱中生活的描述。

1991年，张春桥在秦城监狱患了前列腺肥大症，狱方请来了曾经是周恩来治疗组成员，为患膀胱癌的周治疗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为他治疗，手术很成功。秦城监狱的政治犯患了病，大都是派专家来治疗

的。吴法宪患了胆囊结石，住进了北京医院，由吴蔚然、王历耕两位专家为他做手术。这两位都是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以前，这些如今关在监狱的重犯、要犯也都是他们的保健对象。即使在狱牢里，张春桥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沉默寡言，清高孤独。

女儿是父亲的小贴心，小棉袄，按张维维对父亲的理解，父亲被关起来，他反而很坦然了，可以为自己活着了。他住在钓鱼台时就很孤独，后来去坐牢，对孤独已经很习惯了。

中共十大之后，由于叛徒问题和政治离婚的压力，使张春桥三年没有回上海，郁闷之气盘结于胸，身体一天天地坏了下去，然而除了在给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批件中偶尔带上一笔“身体不好”外，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健康情况。为了应付政治上的对手，他要周旋于斗争之中，自认为活着就是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自己的健康受损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无暇照顾自己的健康。

1983年1月，法院将张春桥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到1985年，秦城监狱允许他和家人通信了。他要来纸和笔，给女儿写信。1985年1月25日，在他入狱后写的第一封信中就谈了他自己的健康和疾病，感叹他这个六十几没有住过医院的人，竟自成了医院的长期住户了。1983年一个月，1984年四个月，1985年又已经快一个月了。医生为他顺利地施行了前列腺肥大摘除手术，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但小便中还是带血。从这第一封信开始，一直到1987年的几年时间里，他在信中都是谈自己的疾病。除了前列腺肥大、眼睛白内障、眼底出血、静脉曲张，最令他心烦的是便秘，样样都写得很详细，检查身体的化验报告，也抄了下来寄给家人。总之他是想减轻家人对他健康的忧虑。他还很风趣地写道：“闲着没事，吃点药也算一件事。过去老爷太太们就是这样打发日子的。”<sup>21</sup>还说：“我有幸参加过三个老年人的医疗组，对老人的事，知道得稍微多一些。这些老人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志在千里’的精神，始终鼓舞着我。”<sup>22</sup>

张春桥晚年多病，有不少时间是住在医院里，而且总是喜欢住朝北的房间。他对女儿张维维说：秦城的环境比医院好。秦城有个院子，可以到院子里活动。在医院到楼顶上去晒太阳，只能晒到一个钟头，因为

旁边都是高房子。反正晒不到太阳，朝北的房间能看到更多的天空。张春桥住在木樨地医院里，和王洪文见过一次面。王洪文以为张春桥就住在楼上，他就从窗口冲着上面喊：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原因是后来听叶剑英的，不听张春桥的了。<sup>23</sup>

张春桥的家信都是写在16开的报告纸上，纸的左侧印有装订线，纸面印有红色横线。写信所用信纸都是他向监狱管理人员讨来的，有时给他信纸四张，有时给他五张，无论是四张或五张，他都要写完，信写成后要交给狱方管理人员审查，并由他们寄出。家人写给他的信，当然也要审查后才交给他。

张春桥在狱中生活得很有规律，每天坚持按时作息，不管好坏，按时吃饭。他对狱中的饮食写道：“当前的当家菜是土豆、白菜。每个星期还能吃到荤菜，鸡肉、牛肉、猪肉、鱼都有，以骨头为主，肉为辅。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这是战争时期邱吉尔的配给量，知道吗？）这种水平，比我三十岁以前的要高，比你们也要高。”<sup>24</sup>笔者曾把张春桥在狱中的饮食情况告诉他同在秦城监狱的萧木。萧木说：张春桥是高级特殊犯人，我们这些小犯人苦哉！张春桥自己还编了一套锻炼身体的拳操，坚持体力活动，同时该吃的药按时吃。就这样，体力虽然虚弱，仍然没有病倒，他自认为他的身体，看来还可以维持一阵。

儿女们怕引起张春桥的伤感，无论探监时见面或者写信，对过去的事情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他自己不谈，儿女们也不会主动提问，总是劝他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在给儿女的一封信中也写了他的这种心情：“我确实已经控制住自己，不再多想那些事。想也在想，不多想。具体事情了解得太少。”“你们可以放心：我发现我这个人还是很有自制力的，甚至可以说，形势越紧张，越是冷静，越是从容。几十年的风浪把我锻炼得可以应付它们了。虽然，有时也还会激动，但是，可以很快冷静下来。回想起来，自从1970年庐山会议，对陈伯达拍过一次桌子，二十年来，再也没有这样干过。同样，我也相信你们，经过这些年来 的熬煎，再大的困难也不会压倒你们了。”<sup>25</sup>

这段话的确是张春桥的自画像。他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大概是想到了他顶着压力处理安亭事件的经历，想到了上海一月革命夺权时元老派

在怀仁堂对他群起而攻之的危机，想到了庐山会议上林彪向他发起的攻势，这一次次的坎，大多数是毛泽东扭转了局势，使他转危为安；更为严酷的是1976年10月事件，使他走上离开钓鱼台一去不归之路，从此沉默起来。但他认为自己也有“冷静”、“从容”地“应付”过去的心态与能力。

人的情感是属于自我的，特别是亲情和友情。古训云：人之无情，不可相交。1976年9月13日，姚文元处理完工作回到家，写下了一段日记，倾吐内心的忧虑：“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人之常情，这样不是合情而且合理吗？可是他笔锋一转，写道：“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这样的表述，把姚文元内心那一点做为人的气味全抹杀了，不是姚文元不讲亲情、友情，而是当时的革命者共有的特性。张春桥给人们留下的也是一副“冷酷”的形象。张维维对她父亲的评论是“我爸爸不圆滑，不会跟人玩。我觉得我爸爸的情商可能不是很高。”“我爸爸晚年的時候，我们谈论大事比较多，讲人民的疾苦、国家未来、共产党的未来。儿女情长的小事不太讲。”<sup>26</sup>

可是，当张春桥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可以和家人通信的时候，他最敏感的就是儿女亲情，最需要儿女用亲情来慰抚他那颗寂寞、孤独而近于冷却的心。儿女们在信中给他寄了几张照片，使他精神焕发，说照片的确给他带来了一片江南春色，增加了一些新鲜色彩，增加了不少愉快，在寂寞中看到一点活力，在烦闷时听到孩子们的欢喜声。他对照片中孩子们的形象仔细地端详，并一个个作了评论，小妹胖了，海娃一眼就认得出，三个外孙，各有特色，看到儿子毛弟后边房子很旧了，使他回忆起东庙二村的房子。他还颇有兴味的对照片拍摄技术作了点评，提出改进的意见。东庙二村又叫东安二村，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为了避免干部脱离群众，在上海南郊近龙华的地方建立的新村，一村为工人住宅，二村为干部住宅。张春桥在《龙华集》的《序》中有一段文字，记述的就是这个地方。

在给女儿的信中，张春桥花了不少笔墨写照片的事。当时，亲属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探监，就靠照片传递亲情和信息，他以写信的方式向孩子们传递他从照片中所得到的慰藉。就像住在钓鱼台9号楼那样，张春桥有时是以读书来解除内心的寂寞与孤独，他所读之书也还是住在钓鱼台时读的那些书。他除了反复读毛泽东的著作，还读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如《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还有列宁《论帝国主义》、摩尔根《古代社会》、四卷本《世界通史》及《论语》、《资治通鉴》等许多书籍。他读完了150万字的《世界通史》，好像还了一笔债，心里很痛快。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表示，想读而没有读过的书很多。只要眼睛能担负得起，还准备再读一些，还些书债。

张春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他思想的“常青树”，而他追随毛泽东把理论用到实践中去，出了差错，如今他在狱中仍然用那个理论来观察铁窗外的世界变化，还能得出正确结论吗？但是他认为，世界的变化，更加证明了他的一些想法和判断是对的。他在信中说：“我最近心情比较平静。因为局势的发展，大体和我的估计差不多，而且有些戏剧性的场面很好看。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时间不久，狗咬狗的事一幕又一幕地演出了。看电视《动物世界》，好像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谁该由谁吃，吃剩下的，比如狮子吃剩下的，由狗吃；狗剩下的，由鹰吃，而且吃得干干净净。”张春桥在信中批评赵紫阳的改革是“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sup>27</sup>此信所署日期为“1990年7月27日”，在日期下特地写上“唐山大地震的日子”。<sup>28</sup>

在这期间，张春桥在家信中还批评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亦称之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其见解和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批评意见相一致。细想想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虽然成了共产党的罪犯，但他心中和执政者有着共同党的原则：不同意“资产阶级自由化”。

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他仍然坚持列宁《论帝国主义》一书论述的一些原则，认为当今时代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只能是革命。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有一个问题，都怕

谈，又不能不谈。只好转弯抹角地说一点。这个问题就是革命。我欣赏叶里钦，他比较鲜明。<sup>29</sup>在十月革命节，他以沙皇的口吻说：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早已下了命令，取消了十月革命节，为什么又总念念不忘这个十月革命，年年在这一天骂一番十月革命呢？他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知道。我以为这是一种自我安慰，好像经过他的金口这样一说，革命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我想，把叶里钦的话改一改，可能更接近实际，接近真理。我想应当这样说：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张春桥在信中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当代帝国主义”的特色作了一些分析。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句颇为自我调侃的话：“这几年，每年新年总要写几句，都是老话，没有新意，不过借此祝愿你们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同人民同步前进，在新的一年里，同人民同步前进！”<sup>30</sup>张春桥这封信写得很长，字迹也不如过去流畅，显得有些衰老，但他写得很认真。

张春桥所谈的“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前文已述，在和女儿张维维又一次谈到革命问题时，他说：“像毛泽东之类的人可能不会出在中国，但可能会出在其他地方，中东，非洲。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可能会出来。革命不是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产生的，革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人物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产生的，以统治阶级内部的另一群人代替这群人。”<sup>31</sup>

张春桥思考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压迫与被压迫、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以及继续革命的许多问题，可以看作是他在钓鱼台9号楼思考的继续，并没有因为他从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变成阶下囚，就使他不再坚持原来的政治主张。他的妻子文静初读这些信时，很是加以赞扬。萧木从监狱出来后曾去探望文静，她把张春桥信中写的一些内容告诉萧木之后，欣慰地说：“他没有变，还是有着骨气！”并要把信给萧木看。但萧木不愿看。后来萧木还弄了些宣纸和毛笔，让文静想法带给张春桥，希望他在监狱里写毛笔字，借此调解自己的心态。张春桥的政治观不变，同时坐牢的姚文元的哲学观、朱永嘉的历史观，甚至萧木的文学观也都没有变。可见，人的观念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

进了监狱之后，姚文元留起山羊胡子，外表似乎变了，但内心没有

变。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写科学普及文章，在狱中则仍然保持着这种兴趣。他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本《辩证法宇宙观的发展——对现代天文学成果及其历史前提和认识过程的哲学考察》，初稿完成于1981年，在1985年、1986年的两个春天作了两次修改抄录，重新整理完毕于1998年春夏之间。全书47万字，从古代天文观测资料的综述、《老子》演化论宇宙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日心说、讲到哥白尼和布鲁诺的历史贡献，伽利略发现新宇宙、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机械论的宇宙观，《宇宙发展史概论》的划时代意义，直到黑洞说、哈勃定律和宇宙。

朱永嘉在接受隔离审查时，就知道自己免不了牢狱之灾，他就向母亲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给他买几套羊毛衫裤，以免坐牢时受寒；二是希望母亲要千方百计买一套《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好让他在牢房里安心地读书。这两件事，他的母亲都为他办到了。当他从哈密路看守所转到上海第一拘留所时，别人一部吉普车就够了，他却要两辆吉普车。看守所的人还和他开玩笑：“你呀，真是孔夫子搬家。”后来由上海转到北京秦城监狱时，他也随身带着那批书，结果是专案组的四个人帮他把那些笨重的书籍搬上了飞机。

笔者看到朱永嘉在狱中所读的史籍，尤其是《晋书》和《南史》、《北史》，书页的天顶地脚密密麻麻地写满批注。在他看来，1976年十月事件和晋室南渡前及南北朝的历史有些相似。他仍然沿用毛泽东“古为今用”、“以史鉴事”的史学观，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作了解释。直到今天，他还是认为自己只是治史的方法有所改变，但历史观、世界观都没有因为十月事件或坐牢而有所改变。

萧木是写小说的，进了监狱之后也没有放弃写小说的冲动，他还是把文学看作是现实的反映，在痛苦之中他成天呆想。想什么呢？想自己的一生，想得非常细致，再就是看墙上那些大大小小、歪歪斜斜的斑痕，从中想像出无数男女老少各有性格的人物，想像他们在集市？在迎神赛会？在沙场战斗？最后他写成了以自己家乡浙东为背景，以殖民为题材的小说《咬人的砖头》。萧木除了写小说，还从小监房的空地上的垃圾堆挖了泥巴，捡了几枝破毛笔和几块竹片，为他的母亲塑像，全身像、半身像，坐着的、立着的，老年、中年、青年的。他以后

还塑了一些其他人，包括马、恩、列、斯、毛。

姚文元、朱永嘉、萧木等人的不变，和张春桥的不变当然是不好相比的，但既然他们的改变都是如此困难，更何况是张春桥呢？今天他人已作古，人们更不须为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观念而失望。也许张春桥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没变。1999年2月27日，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批评了“有一位自称是著名作家的人，就自称‘三十年，我没变！’好家伙，比他更伟大的人物多着呢。”<sup>32</sup>他认为，进步是社会发展规律，这个规律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没有改变过。看来他是不赞成“不变”的，但他自己没有改变，或想变而没有变的机会。张春桥狱中家书或者张春桥的不变，作为思想文库的一块化石，很有其存在的价值。

战胜寂寞，告别孤独，没有失语，能以平静的心过着狱中生活，别人无法做到的，张春桥都做到了。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他还有这种不变的理想在支撑着他。正因为还有这种不变的理想，所以他的思考才没有留下空白。

## 回家了

不知不觉中，张春桥被抓已经十年了。他和家人没有向狱方提出过什么要求，还是公安局找了张维维，对她说：你们应该写信了。言下之意，家属可以提出申请，以保释或保外就医的方式，让张春桥走出秦城监狱，享受一下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直到1987年，文静和张维维去北京，找到当年在晋察冀时的老朋友，他们一起商量如何写申请把张春桥放出来。文静仍然以妻子的名义向公安部门递交了申请。说时容易做时难，自文静为张春桥提出保释或保外就医的申请，又过去了一段漫长的时间，终于得到了答复。1998年1月，张春桥走出了秦城监狱。这时他还要讨个说法：到底是保释，还是保外就医？回答是：保外就医。

张春桥没有能回上海，他被安排在江苏江阴，说是在江阴给他安排可居住的家，半年之后才通知家属。张维维说，我妈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弟弟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她，这时她要到江阴去照顾我爸爸了。

可是那里哪里像个家，生活条件太艰苦了。涸辙之鱼，相濡以沫，夫妇相聚，开始了新的生活。文静还是颇感自慰，说她是赵四小姐陪张学良过被监禁的生活。<sup>33</sup>看守部门允许子女每月去看望他们一次。

刚离开秦城监狱到江阴住下来的时候，张春桥已经不大会说话，反应也迟钝了。现在环境变了，他的心情也变了。搬到江阴古镇，他还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对江南的秋色还能领略一二。中秋那天，他看到了月亮，确有故人重逢之感。他真实地感到已经离开了多有风沙的北方，来到久别的江南。在院子里散步，他原来还以为这里空气应当比较清新的，然而越来越多的事情证明，空气很不干净：院子里那两三簇花，叶子上落满灰尘，洗也洗不净；室内的用具也很容易受污染。这里不同于北京，北京是黄沙或者灰沙，容易洗掉，这里好像是油污，大概是附近加油站，特别是汽车尾气造成的。他看《新民晚报》，上海的天空也变坏了，各项指标都在下降。这种趋势，冬季会更严重。

到了江阴，子女虽然可以常去探望，但张春桥仍然要他们写信。除了亲情，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不能到院子里去散步的时候，他就会坐下来写信。每封信都写得很长，中间很少有涂抹，说明信写得很顺畅。张春桥似乎特别喜欢在雨中写信，有好几封信都是在雨中写的，有春雨，有梅雨，也有秋雨，信中也表现出他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他感到不知从何说起。像夏季多雨一样，世界风云也是变化多端，一时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事。他似乎对天气的变化也特别敏感。

他在住的地方养了不少花，在信中描述室内的花卉，有叫不出名字、也不寄托厚望的白花开得很好，山茶的形态不好看，黄杜鹃一蕾未见，石榴长得好，他把希望转向月季。他还养了鱼，都是花钱不多买来的小鱼，水不好，养了几天，小鱼死了，他又买回几条来养。他的外孙的热带鱼养得很好，就给外孙命题作文，写养热带鱼的经验。他在给外孙的信中讨论养热带鱼的事情，说好看的鱼贵，咱们养不起。张春桥的许多精力用在养花和养鱼上。1999年春节之后，他在信中说，我屋里的花随春节而去，现在又盼望米兰、墨兰能再现一次花朵了。又说花浇足水以后，又复活了，鱼也活得不错。他还一再嘱咐，下次来带一吸管来，换水须勤，太费事了。

自1973年张春桥向中共中央写了与文静离婚的申请报告后，张春桥就没有回过上海，也就没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过春节。1999年春节，儿女和孙子辈都分批到江阴去看他和文静。他感到这个春节，对他来说颇有特色。这就是分期分批地见到儿女四家人，其中两个女婿是头一次见面。外孙都成人了，女婿都要做爷爷了，才头一次见到，能说这不是大特色吗？写信对张春桥来说是倾诉的最好方式，似乎也是为了锻炼大脑不使之老化，这也是他的信都写得很长的原因。有时写得眼花了，手累了，还是坚持写完。他在一封信中说：“拉拉杂杂写了五张纸，脑子似乎越来越好用了，笔也一样。”

张春桥很相信老秘书何秀文，曾叫张维维去看看他。何秀文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就到张春桥那里工作。十几年来，除工作上的事，张春桥没有为他办任何一件私人的事情，他没有得到提升，连他们夫妻二人分居的事也没有帮助解决。何秀文是江苏盐城人，妻子就在盐城工作。何秀文不是不想把妻子调来上海，但张春桥认为夫妻分居两地的人太多，怕影响不好，没有帮助他办这件事。何秀文办事认真，守口如瓶，徐景贤等觉得从他这里得不到信息，不大喜欢他，曾一度以“解决夫妻分居”为由，想把他调回盐城。但是没有张春桥的同意，他们不敢这样做。

张春桥虽然没有为何秀文解决过任何困难，但他们的友情很深。何秀文向张维维表示，他今生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和老领导见上一面。在维维的安排下，何秀文带着两个儿子到了江阴。维维向公安局报告她叔叔来了，要看望爸爸。公安局感到有些突兀，说你事先没有打过招呼啊。张维维说：叔叔出差，顺道经过这里。公安局最终还是同意张春桥和何秀文见面了。

和何秀文见面，张春桥的话多了一些，他们都谈到写回忆录的事，谈到许多高层领导人在写回忆录。对陈丕显的回忆录，张春桥有些感慨地说：这样写回忆录很容易，但是他的回忆录怎能这样写呢？再说，没有档案，怎样写！张春桥希望中央能把档案公开，只要把档案公开了，就会知道谁说了什么话，干了什么事，对一些事情是怎样争论的，别人就不会瞎编乱造了。他认为档案公布的时间很重要，如何公布就更重要

了，就看能不能公布了。张春桥表示；反正我不会写什么回忆录。

谈到在北京工作时期的生活，张春桥说：我是个小人物，初到北京，人家哪里把我们这种人放在眼里。我这么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在天安门广场专门为我开了那样大的会议。孩子们说：“那是批判你。”他说：“那不管，反正是那个会是专门为我开的。我还是感到很荣幸。”对自己这样的结局，张春桥对家人和何秀文说：“在毛主席生前，我也想到毛主席逝世之后，我不会有好结果。”“我当时想得较多的是军事政变，没有想到他们会搞政治政变，也没有想到他们动作这样快，总想还有三中全会吧。”最后，张春桥对何秀文等说：“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说了也没用，我不说，你们也少说。”

张春桥认为“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联系到他在监狱中对任何审问不表态，也不向官方提出任何要求，即使是在允许范围的要求，他也不提，表明他还有自知之明，或者说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不存在任何幻想。陈伯达就不同了，邓力群受胡耀邦嘱咐，代表中央找他谈话，要他提出保外就医，他提出了申请，得到批准。邓又代表中央让他写一些文章，他很听话地写了。他关心现实，写了工业方面的问题，还写了农业方面的问题。邓小平看了陈伯达写的有关农业的材料，很生气，认为和当前的形势不符。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书记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时乔石也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sup>34</sup>乔石所说的王力疯狂，大概指的是他写回忆录的事。后来，陈伯达失去了递交材料的权利。在这点上，张春桥要比他们看得透彻。<sup>35</sup>

张春桥和文静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家”里。文静来到江阴本来是为了照顾张春桥，可是时间不长，她就渐渐地患了老年痴呆症，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此时张春桥反而成了文静的护理，学着做家务：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为文静清洁身体，做得有条有理。张维维姐妹兄弟觉得这样下去，父亲的负担太重，他们就把妈妈接回上海，住进中山医院。张春桥又过起了孤独生活。迁移到江阴后，张春桥身上的老年性疾病不但没有好转，进入新世纪后，反而患了致命的胰腺癌，病情发展得很快。本来要把他转移到上海相邻的昆山，房子也准备好了，生活

条件也会有所改善，但疾病不允许他再移居了。

张春桥在病中，给家人讲了两件事。这两件事在他心中应该有着紧密的相联，或许是他的点心事。第一件是他对周恩来的那个小本子有兴趣。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事情的时候，周恩来都会记在一个小本子里面，然后再布置给别人。周告诉大家毛主席说的这个那个，都是经过他自己消化之后的。有的是他理解的，有的是他曲解的，有的是他也搞不明白的，有的是他根本不记得的。现在这个小本子呢？张春桥想知道，许多事情毛泽东到底是怎样说的？这个小本子是怎样记的？有许多事情毛主席也会告诉张春桥的，所以张春桥想作对比。当然，他是不会告诉儿女们的。<sup>36</sup>

第二件事就是张春桥在梦中见到邓小平。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去世，终年93岁，遗嘱中提出捐献眼角膜，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入太平洋。家人依嘱而行。大闹怀仁堂的主将谭震林早已于1983年9月去世；叶剑英去世于1986年10月；李先念去世于1993年6月；陈云去世于1995年4月；彭真则于1997年4月去世，仅比邓小平晚了两个多月。陈丕显文革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于1995年8月去世。这些张春桥政治上的宿敌，均比他年长，也基本上都走在了他的前边。

一天，张春桥又一次从梦中醒来，对守在病床前的孩子们说：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没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张春桥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然后对张维维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sup>37</sup>在张春桥心中，最重要的人，可能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

子女要求把他转到上海医院治疗，但有关方面回答，可以到南京去住院、治疗，但不能回上海。子女考虑到去了南京对他照顾不方便，就

同意就地治疗。好在有关方面从南京、上海请来名医为他会诊，为他治疗，但在癌症面前，医生没有回天之力，无法使病情逆转，挽留他的生命，病情一天天地恶化。但张春桥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对子女说：主席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都88了，还不该走嘛。

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家属和亲友向他的遗体告别，悼念的横幅上还写着他真实的姓名，摆放着插满鲜花的花圈，在迎接他的骨灰的路上，孩子们沿途撒着鲜花，心愿是引领他魂归上海。

这一年年底，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去世，终年74岁。张、姚二人，在“四人帮”中相识最早，相知最笃，同以“笔杆子”著称，又在同一年离开人间。姚文元的去世，标志着“四人帮”的人生全部谢幕，此前，1991年5月14日，江青于保外就医期间在居住地自缢身亡，终年77岁。1992年8月3日，“四人帮”中最年轻，身体最好的王洪文，在北京复兴医院因肝病去世，年仅58岁。

在张春桥之后，2008年8月20日，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华国锋在北京去世，终年87岁。他的家乡山西交城，依山为他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陵墓，被称为“华陵”，一时引发了不少舆论争议。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在北京去世，终年99岁，忌日与华国锋仅差一天。2016年4月20日，戚本禹在上海去世，终年85岁，他是最后一名去世的中央文革成员，其忌日与张春桥，也是只差一天。文革风云人物，至此基本上全部告别了人生舞台。

张春桥的生命结束了，但留下了他一生的荣辱经历，令世人争议不休，也颇有历史的意味！

## 注释

1 谭德山主编：《中国大审判：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图文记实》，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 2 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叶匡政编：《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 3 同上。
- 4 2013年12月8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 5 1982年11月24日纪希晨采访叶剑英谈话记录。
- 6 流传的《张春桥辩护词》内容如下：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瑕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

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

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

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7 根据萧木和笔者谈话写成。

8 陈冀德：《不为纪念的纪念：我与徐景贤》，未刊稿，2007年。

9 同上。

10 萧木：《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未刊稿，2007年。

11 2010年8月16日朱永嘉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12 刘庆棠，原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员，饰演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男主角，文革期间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开除党籍。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13 刘庆棠口述，陈徒手采访：《刘庆棠谈秦城狱中经历》，《信睿》，2012年第12期。

14 2015年11月11日、16日三三接受恺蒂采访时的谈话。

15 高尔基，苏联作家，评论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苏联文学创始人，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16 造神论、召回派，召回派是1906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党内部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高尔基一度受他们的影响，创作了中篇小说《忏悔》，其中流露出唯心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了列宁的严肃批评以及帮助。

17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18 2013年12月8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19 中央清查组编印供批判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部分黑批件》，1976年12月16日。

20 同上。

21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22 同上，第38页。

23 2013年10月13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24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第54页。

25 同上，第65—66页。

26 2011年5月25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27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第78页。

28 唐山大地震实际上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

29 叶里钦，通常译作叶利钦，俄罗斯政治家，推动苏联解体的主要人物，曾任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

30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第167、170页。

31 2013年12月8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32 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第179页。

33 赵四小姐，名一荻，原为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情人，在张学良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扣押、判刑后，来到张的身边，陪其度过了五十年的幽禁生活，并在晚年与其正式结婚。

34 乔石，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5 王文耀、王保春：《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第22—23页。

36 2011年9月6日张维维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37 恺蒂：《女儿眼中的张春桥》，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第315—316页。

代  
跋



1973年5月于上海植物园  
(左起: 萧木、朱永嘉、陈冀德、王知常)

代跋

## 海燕与太阳—— 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

萧木

题记 文革前我也是做新闻工作的，与郑重兄可说是同行，只是久闻大名却无缘结识。进入新世纪，我从“一城二桥”——秦城监狱、提篮桥监狱、六里桥劳改厂——兜过一大圈出来，已是垂垂老矣，还套着“反革命要犯”的帽子，常人避之犹恐不及，偏偏是郑重兄却盛情邀我同游杭州西湖，其后多次交往和畅谈，遂成知交。今年(2014)中秋，他抱着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来让我先读为快，并热忱希望我能写篇序，还预先把退路也堵死了：“要不然，你就随便写点什么也可以。”我读后除了钦佩作者采集材料之丰富翔实，思考之独到深刻，文笔之隽永流畅，却又着实为难起来。因我从来不敢也不会为人作序，但这回是老友相邀，却之何其无礼！犹豫再三，只好勉为其难，偷个懒，选择郑重兄“要不然”那句话中的“随便写点什么也可以”，拉杂敷衍了这篇东西，还请读者诸君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和公开出版物对张春桥的评价大体是一致的，不妨归结为一句话：“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狗头军师。近些年来，民间和网上文革研究者渐渐有了些新的评述，不过大致

还处于众说纷纭阶段，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似乎一时还难有代表性的评价问世。

张春桥无疑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文革自发动至以失败告终，他始终身当万众瞩目之位，通常又总是处于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他直接间接整过不少人，不少人也直接间接整过他。他整过的人和整过他的人有成千成万，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基层群众。在我看来，真要对像张春桥这样的文革中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作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前提条件是先要对毛泽东有一个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晚年病中至少曾对人说过三次，他一生就做了打倒蒋介石和发动文革两件事。很显然，他自己更看重的是文革这件事。这是因为，自1950年代中期以苏共召开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为标志爆发了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危机后，毛泽东这位具有深厚中华历史文化修养却也颇受古老帝制思想传统影响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按照他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设想，对危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拯救，发动文革是总结此前十年经验教训后的最后一次被他认为是根本性的探索和拯救。为达到这次拯救的预设目的，他付出了晚年全部的精力、心力以至生命。因而如果真要对毛泽东作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先要对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空间也不限于中国，还牵涉到总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命运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价。

毛泽东是为着拯救社会主义危机而发动文革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思潮，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先后在苏联、中国等多个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无论社会主义思想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其兴起或衰落，成功或失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有放到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中才能获得说明。人类第一次社会主义制度尝试性的实践，在它既有过辉煌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后，以中国文革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宣告终结，留下的是与整个二十世纪共存的丰富而驳杂的历史文化遗

产，等待着后人去鉴别，去扬弃。所以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研究文革理应有世界性眼光，不能局限于某一党或某一派或一部分人的视野，要努力从中挣脱出来。不过真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那么容易，看来尚待时日。

本人才疏学浅，又长期处于与世隔离状态，这篇文章自然不敢有对张春桥作全面评价的奢望，只是想谈点印象和感想。十年文革，我先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后奉调中央办公厅担任王洪文学马列辅导员，又兼一点《人民日报》工作，多数情况下是张直接领导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因而与他有了较多接触。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张春桥可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毛泽东的一面镜子，他似乎也很愿意做这样一面镜子，力图使自己的思考、行事能够反映出毛泽东的意图、指示和部署，成为毛思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尽管文革后期毛曾一度有过要把张培养为接班人的想法，致使张与一些高层领导的关系显得如此紧张、微妙而又敏感，张的应对有时也难免进退失度，但就我观察所得，以为他在坚定地跟着毛走这一点上，始终如一。拙文就想以张与毛关系为主线，简略追溯一下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寻找与追求，重点选择文革中他先后与林彪，与周恩来、邓小平，和与华国锋的矛盾或较量的若干片断，对他在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认识、理解和追随毛的心路轨迹作一次尝试性的探索。能否探索到一点什么毫无把握，只能说试试看吧！

## 康平路有条T形小弄

不妨就从我最初认识张春桥留下的印象说起，时间是在1960年10月我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工作以后。那时张春桥已是市委专职常委、柯庆施政治秘书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又先后出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等职，而我只是党刊一个小编辑，不在一个档次上，又没有工作上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所以只能说是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巧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

党刊编辑室和市委书记处都在康平路上相距不满百步，二者与对面

马路形成的三角处有一条T形小弄，每天早晨七时半左右——相差不会超过三两分钟，就会在小弄口出现一个气宇清朗、衣著整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从容舒缓地踱着步，抽着烟，向那小弄走去。在他前面跳跳蹦蹦走着的，是一个约莫三两岁的小男孩，时不时回过头来清脆地说几句什么；中年男子间或有所应答，却依旧不改他舒缓的步调和从容的神态。到拐弯处，中年男子站住，转身90度，看着小男孩飞似地奔向T字一竖末端那道半掩着的黑漆大门，不挂牌子，也没有任何标记，但偶或传出天籁般的童声笑语告诉你，大门内该是孩子们的天堂吧？是的，那里是市委机关幼儿园。小男孩跨进黑漆大门，回过头来向这边招招手，中年男子略略抬手一挥示意孩子进去，然后再转身90度，弹去已积得长长的烟灰，再舒缓地从小弄踱出来。

由于这条T形小弄也是我那时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所以几乎天天可以看到这一幕。见面的次数多了，相互似乎都感到得有所表示。于是我向他点个头，微微一笑；他也向我点个头，微微一笑。要到过了大约一两个月后，我才从与一些“老党刊”的闲谈中得知，这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就是张春桥，那男小孩是他的小儿子毛弟。

我之所以花了那么些笔墨来描述“父送子”这么一件小事，是因为根据我在文革期间与张接触中留下的印象，近些年来又读了他我有可能收集到的从少年时代开始的全部作品，对他一生的各个时期作了比较以后，认为我在康平路T形小弄口看到的那一两年里的张春桥，正是他整个人生历程中极为难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身心安适舒畅、胸口鼓满创造活力、眼前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一个时期。而他获得这一切，都与他终生仰慕、崇敬、愿意追随到最后一息的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如果以与毛泽东的关系来梳理张春桥的一生，那么大略可以分为寻找、迷惘、初识、成功、失败和刻骨铭心的自我否定，接着是仰望和奋起追随，然后是在追随中的跌荡起落，一次次受困和一次次获得解救，不断接近和不断加深对领袖的理解这样一些阶段或时期。而出现在T形小弄口的张春桥，正开始进入到最后一个充满着光明和希望的奋起追随的时期。

但就在几年前，他还沉陷在失败的痛苦里。那是他不得不承认的一次严重的失败，对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寻找、追求来说，甚至还是一次颠覆性的失败。事情是1951年新春过后不久突然发生的。这年2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原发表于《人民文艺》的周巍峙的文章《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的创作》。文章称赞陕北农民所作的《东方红》是一支唱出了“人民对领袖无限尊敬与深厚的感情”的好歌，而在批评一些“轻佻肤浅、矫揉造作”的歌曲时，最先举例提到的，就是张春桥在延安时期创作的《毛泽东之歌》。周巍峙认为它所选取的暴风雨和海燕的形象是灰暗、无力的，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沉郁、感伤的，与现在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敬爱和深厚的感情“距离很远”。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周巍峙既是老革命又是资深音乐家，当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如此权威的批评，而批评的又是涉及到对领袖的认识和感情这样严肃而又重大的问题，不难想见，其时正担任着华东军政委员会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会有怎样一种震惊、惶恐、沉痛的心情！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紧接着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又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有的说《毛泽东之歌》表达的是“小资产阶级趣味”，“个人陈旧的、轻浮的感情”；有的说“把领袖比作海燕孤零零地高翔于群众之上”，“没有写出领袖与群众的正确关系”。上海音乐家协会三十位音乐家一起座谈写出的文章，更认为“这只歌的曲调很凄凉，像一只挽歌”。写颂歌竟然写出了一支挽歌，问题有多严重啊！

与中共干部队伍中极大多数是扛着步枪、大刀、长矛，通过参加“八一起义”、“秋收起义”或在某地暴动，然后建立“根据地”等形式锻炼成长起来的不同，张春桥是拿着一管笔，经由文学的道路去认识、现解和接近革命，然后加入到革命队伍来的。这个14岁从山东巨野县巨野镇一个旧式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主要是从医）走出到济南求学的少年，自幼爱好文学，还似乎有些早熟，读初中时就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他生性内向多愁善感，既敏感于大自然的寒来暑往花开花落，更敏感于故国故乡的内忧外患深重灾难。为了亲身感受底层民众的生活，他经常在课余时间换上破衣褴衫，到车站、码头去与苦力、流浪儿交朋友，体验他

们的痛苦，了解他们的心声。他为被迫卖春的少女向社会呼唤公平，为挣扎在死亡线上失业工人发出呐喊。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这个身在大明湖畔正谊中学读书的少年，迅速创作了以此为题材的小说《为国捐躯》，连载于《山东民国日报》。通过小说主人公惠华壮烈牺牲前给亲人的一封信，向全社会发出呼吁：“我的好朋友，你们努力吧！……我的血，还有点热，不要使它冷了，你们赶快继续这热，使它沸腾。这沸腾的血，洒在黄浦江上，洒在东海、太平洋里，使它成为鲜红的血的海洋，然后才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的开放！”

但写在纸上的慷慨激昂，却正是这个时期的作者内心苦闷和迷惘的一种折射。满目尽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达官贵人灯红酒绿，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却就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之光。他在《诉》等多篇散文中一再倾诉着内心的郁结和寂寞，渴望在“黑茫茫的浓雾笼罩”中能够见到“一丝星光”。1935年，18岁的张春桥，怀着“追求光明、向往革命”的朦胧的憧憬，只身来到上海。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异域他乡，他艰难地寻找着他心目中的光明和革命。在这里，他认识和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人和革命者，还找到了当时上海的地下中共组织，不久便加入了共产党。由党组织安排，他先后到杨树浦工人区、难民收容所等处做文化教员、宣传抗日等工作。与此同时，一面不断在报刊发表战地速写、时政评论，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革命书籍，特别是高尔基的作品，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读了高尔基《海燕之歌》后兴奋激动不已，当即写出《海的渴慕》，一再倾诉跃跃欲试的内心：“我渴慕着看到大海，更渴慕在它胸膛上预言暴风雨来临的海燕底生活。”但他的“渴慕”似乎远在茫茫的彼岸：“啊，我几时才能看到大海呢？它有丰满而宽阔的胸膛，它有有力的臂膀，它有响亮的歌喉。什么时候，它才能用它有力的臂膀把我们拥在它的胸膛上，给我们唱胜利的歌呢？……”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经过两个多月激战，淞沪陷落。一些不得不继续留在上海的文化人，给自己屈辱、艰难的生存环境起了个名字：孤岛。“孤岛”二字深深刺痛了青年张春桥的心。这年年末，他带着这颗被刺伤的心离开了上海，经过一段艰险和曲折，第二年年初来到了被那时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视为圣地的延安。人们都

说，延安之所以成为圣地，因为那里有一位英明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多么幸运啊！张春桥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政治部担任校刊秘书才两个月，就聆听了毛泽东亲自来学校作的报告，而且还不止一次，前后有四次。

多少个日夜的彷徨、寻找，迷惘、求索，然后是仰慕、崇敬，一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就会热血沸腾；而此刻，这位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杰出的英雄，竟然就来到了面前！他那带着湘音的说话声，左膀右推的手势，是那样雄伟有力；间或扳着手指一道来，又是那样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峰回路转过后，忽而柳暗花明，一阵朗朗大笑，整个大地都为之颤抖起来。

正是从这一刻起，这个来自齐鲁大地的热血青年就酝酿着、构思着，要为面前这位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杰出英雄写一支歌，让亿万人民都来高唱由他张春桥创作的《毛泽东之歌》。三年后的1941年7月1日，正是中共创建二十周年，他将这个深深埋在心底却又越来越强烈的愿望，付诸实施。

铺开稿纸时，几乎不假思索，那鲜活矫健的意象便鼓着劲翅迎面飞来。呵，海燕！那不正是高翔在大海上空呼唤着暴风雨到来的海燕，象征着光明和胜利的海燕吗？《毛泽东之歌》很快写成。共21行，以“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总是勇敢地呼唤着暴风雨到来的海燕比喻“敬爱的毛泽东同志”，说“你响亮的声音，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你是“光明的象征”、“胜利的旗帜”，“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毛泽东之歌》由音乐家卢肃谱曲，先是在晋察冀边区，继而在各个解放区，后来又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唱遍了全中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那个年代，“海燕”呀、“旗帜”呀、“火炬”呀，这些通常是在描写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也包括中国五四时期一些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很容易引起他们向往和共鸣。张春桥获得的成功是双重的，除了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更使他兴奋不已的是，《毛泽东之歌》的成功，表明着他已经找到了象征光明和胜利的领袖，并且自以为认识和理解了领袖，还用他的笔唱出了千万万人的心声。

但现在，这支他明明以满怀敬仰和一片赤诚写出的颂歌，却被批评为“像支挽歌”！当然，对中央党报的批评，还是必须虚心接受。张春桥给《人民日报》写了封“完全同意”周巍峙批评的信，编者加了个《毛泽东之歌》作者对批评的答复”的标题，发表于同年3月11日《人民日报》。信中说周“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十年前写这个作品时“就感到了的”，后来整风时“也曾进行过检讨”。“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信末说：“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

这封仅有三百来字的短信，张春桥该是字斟句酌费了好些心思写出来的，我读后却认为没有完全反映他当时真实的内心。要知道这不只是要对一篇自己为之呕心沥血、为之兴奋陶醉过的作品来一个彻底否定，同时还要对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那一段历经苦苦寻求、探索所获得的认识来一个彻底批判，怎么可能像信中说的那样轻松呢？我与张在接触过程中有一个印象十分突出，那就是他的勤于思考，而且几乎一直在思考。通常他公开表达出来的、尤其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往往只是他思考中的极小一部分。所以我大致可以肯定，他在写出这封答复批评信的前前后后，会想到很多很多，这个过程会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以张春桥的敏感，定然会看到那些批评意见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如何正确认识、表达人民与领袖的关系问题。当年高尔基通过自己对所处时代的观察、体验，创造了勇敢而高傲的海燕的形象，用以歌颂面对黑暗和强暴无所畏惧、百折不挠的革命先驱者，称他们为“胜利的预言家”，喊出了为那时亿万热血青年一再引用的警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应当说，张春桥也是通过自己对所处时代的观察、体验，获得了与高尔基相似的感受，以为当时的中国多么需要像暴风雨中的海燕这样的革命先驱者，用他的全部真诚和激情写出了《毛泽东之歌》。但无论《海燕之歌》还是《毛泽东之歌》中的海燕形象，都还蕴含着较多的西方文学中赞美近代革命英雄形象的元素，无法用来歌颂我们东方这

片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受到民众拥戴的革命领袖。张春桥在创作时，也还没有把毛泽东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来歌颂。歌词中称“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是在与黑暗作斗争中“最勇敢的一个”。这样的思想感情，当然要被批评为与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革命圣地延安的人民群众对领袖无限尊敬和深厚的感情“距离很远”。这段“很远”的“距离”，着实令人深思。无独有偶。不仅是明显受到《海燕之歌》启发而写出《毛泽东之歌》的张春桥，就是《海燕之歌》的原创者高尔基，大概思想感情上也曾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以至十月革命后与革命领袖列宁发生了多次争论和冲突，这位曾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大作家因而不得不一度移居国外。

细细想来，这里很可能牵涉到一个学术界已争论了多年的大课题，即产生于资本主义已有相当高度发展、其固有矛盾也已有相当充分暴露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否适应和如何适应资本主义远没有成熟甚或还只是处于萌芽态的东方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适应问题，后来人们发明了一个公式，叫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革命实践，通俗的说法就是“接地气”。因为只有接上地气，才能为本国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但也正是在这个“接地气”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不少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包括领袖观。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只提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至于无产阶级如何实施这种“革命专政”，并没有作出具体论述。1918年4月，列宁在向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提出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中，明确指出：“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两年后，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作了专门论述。列宁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由此得出结论群

众与领袖是一致的，任何将其对立起来的观点“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尽管列宁的这些论述无意间为集权独裁的产生留下了后路，但并不妨碍那时的中国马列主义者把它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

毛泽东对此并未写过专门文章，不过有一首歌所体现出来的领袖观，延安整风后特别1949年以来，几乎已为全党全民所一致认同。这首歌便是周巍峙在批评张春桥的文章中作为歌颂领袖范例推崇的由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先是帝王封建、后是帝王集权专制，使得一直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地位的底层民众萌生出一种对“圣君明主”的企盼。步入近代以来，这种企盼又因饱受内忧外患之苦而更为强烈。李有源识字不多，是他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承载着数千年农耕文化和古老历史的中原大地让他懂得，农民心目中的“圣君明主”决不是他们绝大多数人连看也没有看到过的什么海燕，而是一抬头便能看到、人人蒙受着它恩泽的太阳。这是上了经书的，如《大戴礼》引孔子称颂帝尧语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御览》所录《说文》说得更明白：“日，君象也。”海燕是一个群体，太阳则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大概从没有读过经书的李有源一张口就唱出了经书的精神，同时也唱出了低层民众的心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看来，张春桥来到被称为“革命熔炉”的延安，后来又参加了整风，但对领袖的认识却还没有完成从海燕到太阳的转变，借用延安整风的语言来说，也就是还没有完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英雄观到无产阶级的领袖观的转变，以至与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敬爱和深厚的感情”存在着“很远的距离”。高尔基为缓解这个“思想感情”上的“距离”问题，不得不一度移居国外。张春桥当然既没有高尔基的资格，也决不会那样做。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追求，特别是祖祖辈辈生息着的这片中华大地，决定了他必然会反省自己，改造自己，而且自觉自愿。尽管1951年对《毛泽东之歌》的批评并没有形成太大的风浪，三两个月后也不再有人提起，但按照张春桥的性格，我以为他会自己对自己发起一次延安整风的补课，狠狠地检讨自己因何会在领袖观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犯如此不可原谅的错误，从出身、经历、社会根源一直深究到思想根源，

目的是尽快完成从海燕到太阳的转变与对接。要知道这直接关系到他此生的追求和此后的人生目标。这个转变与对接的过程他从来没有与人说起过，我们当然也无从知晓。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他这段艰苦而漫长的心灵跋涉过程中，1956年以苏共召开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为标志，爆发了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危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奋起应对和拯救，这给正在苦苦阅读和思考着以便重新认识毛泽东这位人民领袖的张春桥，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这样到1950年代中后期，不妨说他已完成了从海燕到太阳的转变与对接，并在领会毛泽东意图、理解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理解毛正开始思考中的后来概括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问题方面，已令人瞩目的速度开始跻身于中共高层前列。其标志性的作品有二：一份报告和一篇文章。报告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是为柯庆施1957年12月下旬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而起草的，全文长三万余字，毛泽东读后大加赞赏，又亲自作了点修改，要《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文章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是根据柯庆施传达的毛泽东一次谈话的主旨写的，发表于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第六期《解放》杂志。毛泽东读了很高兴，亲自写了按语，让《人民日报》转载。

1958年1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柯庆施和张春桥，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支持我呵！”毛说这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央内部在建设社会主义速度问题上有些争论，如周恩来反对“冒进”，毛泽东则反“反冒进”。由张起草的柯的报告，体现了毛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后来在南宁会议上，毛在称赞和推荐了柯的这个报告后，又乘势将了周一军：“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回答说：“我写不出来。”——这是张第一次用他的笔，因毛的推荐，间接地介入了中央高层不同政见的争论。同年10月，毛亲自点将，让张与陈伯达一起，到天津和河南遂平等地去调查大跃进情况，为毛即将主持召开的郑州会议准备意见。——这是张第一次在毛直接领导下工作。对因《毛泽东之歌》问题刚刚经历了一段大挫折的张春桥来说，在同一年里得到最高领导一次接见和一次“点将”，无疑对他此后

的人生具有峰回路转的重要意义。他会对伟大领袖终生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会不由想起一个古老的词：知遇之恩，还有“以国士遇之，必以国士报之”那些更古老的话。

让我们再回到康平路上那条T形小弄，回到那个正跳跳蹦蹦向托儿所走去的小男孩毛弟。巧的是毛弟也是在1958年出生的，而且按照张春桥的说法，毛弟的出生“是在毛主席那里备过案的”。这个“备案”的典故，就出在杭州刘庄毛的那次接见。谈话中，毛提到了人口控制的问题，开玩笑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了。”意思是他们这些人都已上了年纪，不再存在“人口控制”的问题。在座的除了柯、张，还有陈丕显。这时陈指指张插话说：“他今年还要生一个。”这还要生的“一个”，就是1958年4月呱呱垂地的毛弟。这一年，张春桥41岁。他已有三个女儿，年过不惑才又有了这个小儿子，加上孩子又出生在这样一个特别让他怀念的年份里，而且还是“在毛主席那里备过案的”，自然倍加钟爱，接送毛弟上幼儿园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可他毕竟是个不小的革命干部呀，又是在那个大讲革命化的年代里，不能以太多的儿女之情示人，所以他从不跨进那幼儿园黑漆大门一步，通常也不会送到门口，而是到拐弯处就站定，转身90度，隔着约莫二三十米，挥手与刚跨进门又扭过上半身来张着笑脸的爱子告别。

## 七次解救与“别无选择”

在我的记忆中，康平路T形小弄几乎天天要演出的“父送子”那一幕，大约持续了一两年。1963年初，江青通过柯庆施找到了张春桥，江、张合作，先是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样板戏的创作和排演，后是组织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费时八月、九易其稿作为文革序幕的重头文章。江青的这两个动作，贯彻的都应该是毛泽东的意图，特别是后一项更是直接受命于毛。这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毛在运筹帷幄为文革布局中，张已成为他手中的重要一筹。接下去便是就其参加人数之多、触及面之广而言，在中国以至世界历史上不说空前至少

也是罕见的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其后，在这场革命跌宕起落、变化多端的演进过程中，作为毛泽东秘书、参谋班子，一度甚至还代替了书记处、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先后一个个跌下马来。最后剩下的，就是回归到了原先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三个人：江、张、姚。很显然三人中，毛最倚重、最看好的，就是能够按照他的意图、指示始终冲在最前面因而成为矛盾的聚焦点、中枪中箭也最多的张春桥。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文革期间，当张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种种困境或险境时，毛不得不运用他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把张解救出来的，前后至少有七次。一、1966年3月，因抵制《二月提纲》而挨整；二、1966年11月，因对安亭事件的独特处理而陷入彻底孤立；三、1967年1月，上海引发了第一次炮打，即“一·二八事件”；四、1967年2月，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引发的“改名风波”；五、1967年2月，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成为众矢之的；六、1968年4月，上海引发了第二次炮打，即“四·一二事件”；七、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事件”中险遭灭顶。

这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当然也可以从张春桥自身的缺点或错误方面找到某些原因，但文革作为一场规模宏大、斗争尖锐复杂的革命，而张春桥又常常处于矛盾的纠结点上，问题就远不像想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七次陷入困境或险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就不难看到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反张队伍十分庞大。既有中央领导和地方党、政、军领导，也有一般干部和文化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还有成千成万的基层群众，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持保守观点的工人和农民，也包括一部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

第二，核心是一个“权”字。起初，掌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要保卫权，后来失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要夺回权；而夺权者对权力的再分配总有理由认为分配不公，还想夺得更多的权。

第三，作为反对对象的张春桥角色的多重性。这一点是由反对者队伍的庞大和构成的复杂决定的。同是反张，很显然，部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要反的张，与保守派群众要反的张，不可能是一样的，与一些领

导干部，特别是那些已被认为是“走资派”正在被“炮轰”或已经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要反的张，更是大不相同，甚至还很可能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张。不过从总体上说，张一次接一次地遭遇炮打或“围攻”，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追随者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受重用的一个，他自己也是努力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体现出毛的意图和部署。文革中的各项斗、批、改任务，特别是毛作出的夺权决策，从地方到中央反对者甚众。但中国有着数千年帝制文化传统，皇帝从来是不可以反的；1949年以来实施的政治体制差不多也还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提出反毛。不过办法还是有。西汉吴王刘濞不是早就发明过一个叫作“清君侧”的口号，并用以发起了一场“七国之乱”吗？“清君侧”，也即要清除君主身边的乱臣贼子。就这样，总是在执行毛的意图、指示方面冲在最前列的张春桥，就成了现代版“清君侧”要清除的“乱臣贼子”。这一特点，在高层发生的几个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毛泽东也曾不止一次作过说明。如因怀仁堂“大闹”而在1967年2月18日深夜至次日凌晨临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1971年8、9月间的《南巡讲话》说得更加明确：“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对我。”

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七次因毛泽东的强力干预而获解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事人的张春桥曾处于怎样一种心境，尽管不少文革著作和回忆录都有生动形象的描写，如说他在“一·二八事件”中受到红卫兵围攻时脸色由红转黄、转灰，一身冷汗，衣衫都湿透；说他在庐山会议上吓得一脸苍白，想抽支烟，划了两三根火柴也还没有点着等等。但张自己，好像没有直接、公开地对这七次受困或获救说过什么话。我记忆中有一句话，是有关他对一次接一次得救后自己的态度的。他说：“安亭事件后，我已经别无选择。”

张说这话有个特殊背景。那是1975年秋冬，中央内部两派矛盾日趋激烈，张因后文将要说到的妻子文静的历史问题和他自己的“叛徒”问题被人抓住受到强大的压力，一度不得不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与妻子离婚；而原来同住在钓鱼台的姚文元、陈永贵、吴桂贤，听到毛泽东说了

句“钓鱼台无鱼可钓”又相继搬了出去。这一来，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其时约有三两个月，他身体不怎么好，常常低烧。纵然他有较强的自制力，却也难耐古刹老僧般的寂寞吧，有时就打电话来让我去“随便聊聊”。好在我那时住在钓鱼台16号楼，离张住的9号楼五、六分钟便可走到。确实是“随便聊聊”，东拉西扯，什么都谈。一次因我劝他不要过度操劳，又问起低烧情况，于是他由低烧、吃药提到鲁迅。鲁迅说他吃药、治病不止是为了爱他的人，更为了恨他的人；张说他也是这样。接下去便说了这么一句：“自从安亭事件后，我已经别无选择。”

我的理解，这“别无选择”大概有两层意思。首先就是不能再想到自己，只能选择紧跟毛泽东，遵照毛的意图、指示，排除千难万险将文革进行到底。还有一层意思是，安亭事件后，工人造反派以主力军的姿态登上文革舞台，原来还只局限于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的文革，必然将迅速转变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空前激烈的大革命，实际上连毛本人可选择的余地也已不多，只能照着这个路子将文革推进到底。

如果我的理解大致不错，那么“青海事件”就是张遇到的“别无选择”中带有代表性的一例。这一事件不仅牵涉到军队在地方上支一派、压一派，还夹杂着军队内部两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来发展到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调动十三个连的兵力，将进驻《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派红卫兵和造反派围了个水泄不通。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竟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逮捕近万人，甚至还向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了枪。当天，赵永夫就打电话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军委领导的答复，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林彪，一种说是叶剑英，听到报告后大加赞扬，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并当即把赵永夫作为英雄接到了北京。由于事件牵涉到军委领导和正在“支左”的部队，加上此前不久，接连发生了京西宾馆和怀仁堂两次针对几位中央文革大员的“大闹”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处境微妙，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其时张春桥在上海。他是从中央文革寄来的文件中获得青海发生流血事件这一信息的。面对如此尖锐而又棘手的难题，他当然上下左右作过多方面的考虑，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毛决不会容许这样做，所以只能由他来牵头这个头，出面干预。如果中央文革不为被枪

杀、被镇压的造反派说话，各地仿而效之，那就不知会有多少造反派人头落地，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就此夭折，这对中央文革来说不仅是渎职，简直是犯罪！这时恰好北京寄来的文件中有份《简报》登出了一封红卫兵揭露这一流血事件的来信，于是他就给毛写了封要求调查此事的信，附上那位红卫兵的揭发材料。此信后来姚文元和王力、关锋、戚本禹都签了名。毛阅后于1967年3月11日批示：派人调查。经过各方面调查，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同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宣读了这个决定，称这是一起“大规模镇压革命群众的事件”，并当场逮捕了赵永夫。

青海的案子就这样翻过来了，这对各地造反派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但由张牵头的中央文革大员们，却又向悬崖跨上了一大步。此前，与他们对抗的除了各地的保守派，还有从中央到基层的大多数老干部；现在，又加上了一大批支持保守派的解放军——那可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呀！

文革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内心似乎也不怎么乐观。爆发“七·二〇事件”的当天深夜，在周恩来安排下，毛秘密离开事件的中心点——武汉东湖宾馆，于次日凌晨乘专机来到上海，张春桥也特地提前赶到上海来奉陪。在居留上海近两个月时间里，毛曾与张和另外两三位随行负责人有过多次谈话。9月9日那天晚上，在座的除了张，还有杨成武、余立金。毛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他问在座的怎么看，大家认为分裂的可能性不大，提了几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接着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还是较为清醒的。他估计到文革成功的希望颇为渺茫，他死后紧跟他搞文革的人要吃亏。听了这样的话，张春桥不

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知道毛泽东对这场文革是下了大决心的，绝不可能有“回头箭”，他当然也“别无选择”。

## 毛与林、张的苏州谈话

发生在1970年初秋那个“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庐山会议事件”，在张春桥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中无疑是最严重的一次。说它最为严重，不仅指级别高、声势大，还因为事件发起者林彪等是把张春桥作为争夺接班人的对手来打击的，这也就是说在主其事者看来，这是一场牵涉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高潮时，会上不少人大呼要把“这个人”揪出来，光“批倒批臭”不够，还要“千刀万剐”。

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张在林彪眼里只是个“小记者”，根本不在他关注范围之内。据《邱会作回忆录》，林对张引起注意，是在张出任上海市革会主任以后。那也不是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由于其时军队因“支左”而在全国29个省市中有24个即占82%都是由军队干部出任第一把手；还有五个省市即占18%仍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而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却偏偏就在18%之中，而且还是造反派力量最强的一个，简直成了张的基地，这才让林感到头痛起来，想到要对上海市革会“动点手脚”。考虑到“换帅（即把张搞下去）很难，首先毛主席就不会同意”，就另外设想了把王（王洪文）“拉过来”、把张“压下去”或“挤出去”等三个方案，后因被毛识破只好作罢。

林视张为对手因而产生非搞掉不可的想法，我以为很可能与毛的一次谈话有关，时间在庐山会议前四个月，即1970年4月25日。其时张在上海。此前一天，毛从杭州来上海，这一天，带着张到苏州去与林会面，作了著名的“苏州谈话”。

关于这次毛与林、张的谈话，各种文革史和回忆录说法较多，尽管在档案解密前，很难断定哪一种说法确实可信，不过大致可以肯定这次谈话的一个主题，应该就是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此说有一个根据，就是毛本人1971年8月16日南巡至武昌的谈话中就曾说过“我和林彪同

志谈过一次话”，谈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引起争议的是，其中是否提到张春桥的名字。如有的著作载录了毛与林的一段谈话：“毛说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不吭声，又问：你看小张怎么样？”

这段话理解起来颇有些麻烦。说“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这个“以后”是指林接班后的“以后”吗？那已属第三代的接班问题，这恐怕不会是毛的本意。联系到前面有一句“你身体也不好”，又有点像在说第二代的接班问题，即要让林接班，由张接班，一些文革史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段话的。我的看法是，毛一度曾有过培养张为接班人的想法，这很可能；但当面向林彪提出让“小张”来接班，恐怕不可能。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制度史上为皇储废立问题不知演出过多少次悲剧、惨剧，熟读二十五史的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去与一个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商谈让另一个人来接班，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那么毛为什么要在召开庐山会议前，特地带着张到苏州去与林一起谈培养接班人等问题呢？我以为很可能与毛此时准备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作出重大调整的构想有关。毛的这个构想大概起始于党的九大以后。紧接着九大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用幽默风趣的语调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苏联“看到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就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接着又轻松地说：“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

毛泽东作为一位精通南面术的政治家，他的话不仅内容，即连语气，也要联系当时政治环境才能分辨出它的话外音来。“人家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如果真是事实，那就是一个极为严重、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难道能“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吗？当然不能。九届一中全会是一个需要强调团结、胜利的喜庆之会，毛用轻松的语气说出这番很不“喜庆”的话，其真实的内心的隐忧，就潜藏在这二者的反差之中。

从根本上说，所谓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是由作为政治集团的政党却拥有了军队这个固有矛盾引起的。在现代国家，政党是政治集团，不

是军事集团；军队属于国家，不属于某个党派或个人。但中共是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才建立起全国政权来的，这样独特的历史使得党拥有军队似乎成了天经地义。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说过：“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发刊词》）并从而得出了一个认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诚如毛泽东本人一再提醒人们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看来这个“真理”在党执政后也“一分为二”了。军队属于国家，军队的神圣职责是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不应介入国内政治斗争。但党拥有军队，就很容易动辄把军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来使用。时间一长，竟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一开始发动文革，就请出了人民解放军这座“尊神”来压阵。到“一月革命”夺权斗争在全国猛烈掀起，局势几近失控，又来一个“三支两军”。结果不到两年，就闹出了这么一个“军事官僚专政”问题。在庐山会议后1971年的《南巡讲话》中，毛把开过九大就郁积于胸的隐忧用一段充满哲理的话说了出来：

过去我就说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啊！

引起警惕的不仅是“人家讲”的“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更为严重的，还有林彪的“一号令”的问题。九大闭幕五个月后的1969年10月18日，林彪在事先没有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示的情况下，就擅自向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名义迅即下达全军。新近有位原林办工作人员写回忆文章，说当时林彪曾与叶群商定，由叶群打电话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但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叶群没有通过他向毛汇报过，毛看到的是“北京转送到武汉的电话记录传阅件”。这中间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恐怕只有将来档案解密后才能真相大白。无论如何，毛是在事先没有得

到任何请示报告的情况下，看到这个“一号令”或“电话记录传阅件”的，在他看来，林的“擅自”已属确凿无疑。对此，毛作出的反应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动作：他划了根火柴，将这个“一号令”或“电话记录传阅件”化为灰烬。看着熊熊的火光在自己手中升起，这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内心起着怎样的波澜，我们当然谁也无法知道。对经、史、子、集烂熟于胸的毛泽东，很可能此时对自己在同辈共事人中选择、指定接班人这种做法的错误有了一些觉察，并设法加以补救。

从本质上说，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己在同辈共事人中选择、指定接班人这种做法，大体上还是与古代帝王世代传承相类同属“公权私授”范畴，不仅与理应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格格不入，就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落后了好几个世纪。即使不谈“公权私授”，单就权力传承本身来说问题也不少，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与集权体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1961年9月，毛因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很可能要问到接班人的问题，事先与准备接待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有过几次谈话。其中一次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又说：“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也就是早在党的七大就选定了刘少奇为接班人。其实应当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皇帝”还是相当聪明的，至少在选择太子或称皇储也即接班人这一点上，要比“没有王位继承法”的共产党高明得多。为确保集权专制体制永世长存，由历代帝王政治智慧凝结而成的东宫制度，在严防太子僭越皇权方面作出了极其周密精到的设计。第一，被策立为太子的，必须是在位皇帝的下一代，通常多未成年，有的还是儿童。第二，太子所居东宫的职官设置，可说是朝廷的模拟微缩版，但这仅仅只是为了让太子学习如何打理朝政有点感性知识，绝对禁止这个模拟微缩朝廷演变成为与在位皇帝分庭抗礼的第二个朝廷。东宫官属有师、傅、保等等一大套，虽各有分工，其总的职责就是对太子实施道德规范的辅教和经史子集的辅导，包括对不良行为的管束和规谏。第三，太子只要还在东宫，他的任务始终就是学习，此外就是为老皇帝“视膳问安”。太子无权议论、过问朝政，更不

要说干预朝政。有时皇帝为了让太子有个“实习”的机会，有意出巡几天，留下太子“监国”，那就必须作出一系列严格规定以防止太子越权，并举行隆重仪式昭告臣民，说明“监国”是特制，非常态。

1961年9月，当毛泽东通过接见蒙哥马利向国内外宣布刘少奇为接班人时，刘不仅是毛的同辈、同事，同且还是党的副主席，早已独当一面地担负着党政重要职务，并正代替毛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派别，或者按照1949年以来习惯的说法叫另一条路线或另一个司令部是集权政体的天敌。在上述那种情况下，一旦毛、刘发生政见不合，只要刘稍有点独立性言论或行事，毛就会敏感地想到对方是在搞另一条路线、另一个司令部。为了维护集权体制完整统一，就非下决心搞掉不可。

至于林彪，除了独当一面担负着重要领导职务，还有更为特殊的一点。中国历代帝王在严防太子僭越皇权方面除了上文说过的三条以外，还有第四条代代相传的戒律，叫作“君之嫡嗣不可以帅师”。这条戒律是对历史上“太子弄兵”无数血淋淋教训的概括，可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史记·晋世家》、《史记·卫康叔世家》等记载，恕不全录。所谓“君之嫡嗣不可以帅师”就是太子也即接班人决不可以带兵，其中道理一想便可以明白。如果说毛泽东在文革的一些决策中有不少失误或错误的话，那么我以为选择“帅师”的林彪作为接班人并将这个选择写进党章，该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当然客观地说，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关系到整部中共党史，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因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人的错误。无论如何，文革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一错误应该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林彪的“一号令”分明就是对他这一错误发出的警号，而且是一个极危险的警号。

以上我认为就是毛萌发准备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作出重大调整的构想的背景。这一构想主要内容有两项。一项是逐步改变由“三支两军”导致军队在党和国家权力构成中极度膨胀的状况，参加地方党政领导班的军队干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退出。相关的措施，后因接连发生了“庐山会议事件”和“九·一三事件”而不得不推迟到十大前后陆续实施。如“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其主题都是要解决军队问题。还有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大军区司令员一律不再兼任省委书记、撤销军管会

和“支左”领导机构、军宣队也撤回部队，强调地方党委要实行“一元化”领导等。与此同时，还提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除了“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再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又借用《晋书》中刘元海“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的典故，倡导武官要学文、文官要学武等等。

构想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对中央一级权力构成作一次更新，补选若干名中青年力量，对已定的接班人的权力、特别是军权，则要有所制约。实施这一项构想需要按党章和人大章程规定通过相关程序，因而预定在这一年夏秋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后，再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

我认为，1970年4月25日毛与林、张的苏州谈话，应该就是毛在为实施这个布局构想的第一步做准备。让张与林直接见面，毛居中调和，自然带有希望两人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合作共事的含义。而所谈的主题是“培养接班人问题”，我的理解是：

第一、毛这里说的接班人泛指进入中央领导层的接班人，不是专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所以他说的是“培养”，不是“更换”，不是要把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撤下来，另外换某个人譬如张春桥上去。

第二、培养的对象，张春桥应是首选，但不限于张，如毛在《南巡讲话》中还提到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王洪文等人。不仅要充实年轻的，还要有文有武，要提拔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来中央工作。在1971年9月周恩来有关原定国庆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准备“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的请示信上，毛就作过这样批示：“还要补选常委。”1973年8月周恩来在一封致毛的信中还说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事件”和“九·一三事件”后，毛“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

第三、这样做的目的，首先当然是为了适应文革后新的形势，此外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借用毛本人1956年9月党的八大期间说过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起到“防风林”的作用。那时毛建议党中央除设党的主席外，再设四个副主席，一个书记处和一个总书记，他说：“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即使有人“提前

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不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而在毛此时的构想中，不仅要预备有人“提前见马克思”“那一手”，还要预备“另一手”：防止接班人搞自己的“司令部”提前抢班夺权。

由此可见，在毛的构想中，庐山会议前他与林、张的这次苏州谈话，确实是关系到当时大局以至国家未来的极为重要的一次谈话。中共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全国政权的。1949年以来，在一波高过一波的宣传中，枪杆子被神圣化，战争思维大行其道，各级政权的构成实际上也大多是脱去军装的军人，只是还没有像文革中“三支两军”那样军队干部穿着军装直接进入地方各级领导班子，而且多数省市的第一把手也全由现役军人担任。这次苏州谈话终于让人们仿佛看到了逐步从“马上”打天下过渡到“下马”治天下，从而逐步完成用枪杆子或刀把子打造出来的政权都必须完成的从武官政治过渡到文官政治、从重用功臣宿将过渡到启用新兴官僚群体的过程。在毛的构想中，新兴官僚群体是以工农为主的干部群体。

很可惜，林彪却不这样看。作为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他对毛带着一个姓张的“小记者”的到来极度敏感，一听又是要谈接班人问题，自然要起而护卫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当毛问到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林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这样的回答与毛的构想真可谓南辕而北辙：毛要改变“军事官僚专政”，林除了坚决反对张春桥这个“小资产阶级”掌权以外，竟还要搞清一色的“军事专政”！成为疑问的是，我们不知道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张春桥在“苏州谈话”中是如何应对的，这次谈话对他后来的思想和行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后，一次张曾偶尔谈及毛带着他的苏州之行，仅有两三句，有关接班人的事则只字未提，只是说林的态度很生硬，总的印象是“根本谈不拢”。如今“苏州谈话”的直接当事人全已作古，间接看到一点的也只剩下一位，就是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何对我说他没有上毛的专列，是因为要接张回上海，才直接驾车从上海去苏州的。到苏州后，车站上警卫森严，无法接近月台，只好在候车室等候。毛与林、张

谈话是在专列上进行的，何自然一点也不知道。专列开走后，林、张在月台上还站着谈了一两分钟。何秀文说：“我透过候车室玻璃窗往月台望去，见林披着一件黑色大氅——天气已相当暖和，可能是怕风吧？说话时做着手势，好像很不耐烦的样子。张也只是应答了几句。”所以总的印象也是“根本谈不拢”。

按常理，毛有意要培养张为接班人，张该是既意外又高兴吧？不过张从中央高层的两次“大闹”中已有过领教，1949年的全国政权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在战功赫赫的将帅们面前，一个拿笔杆子的“小记者”不能奢望有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的猜想是，张即使曾经有过意外和高兴，一碰上“根本谈不拢”的林彪，很可能瞬间已转化为吉凶莫测的深深忧虑。十大后张当上了政治局常委，他的女儿问他感觉怎么样时，他的回答也是：“没有怎么样。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个战役是我打下来的？我只是主席一个秘书，主席叫我动，我就动；主席没有叫我动，我就不动。”关于培养张为接班人的事后来毛已不再提起，张自然也不可能再有非分之想。

但有一个印象，估计张会特别深刻，那就是毛此前曾经有过的对军队势力在权力构成中过度膨胀的隐忧，经过这次“苏州谈话”更加突现了出来，张对此当然也要更加引起警觉。

因“三支两军”而很有可能会削弱党的统一领导的问题，在那时的中央高层中，张应该是最先提出来的。1968年3月下旬，几经曲折，江苏省革委会终于准备成立，在上报的组织名单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省革委会主任。中央讨论时，张提了个很尖锐的意见。他说：我有些担心，司令员任主任会不会发生“枪指挥党”的问题？由于此前已经成立的各省市革委会除上海等少数几个外，几乎全是军队“支左”领导担任第一把手，张的意见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而没有被采纳，但影响已经产生。他这一提，首先得罪了两个人：直接的是许世友，间接的是林彪；当然，同时也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苏州谈话”后过了两个多月，张又介入了一场争论，更牵涉到军队的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甚至连毛、林都成了直接当事人。争论是在政治局讨论纪念这一年建军节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文稿时发生的。这

篇题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文稿，称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一提法，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多次变化后的结果。文革前只提毛“缔造”或“领导”，从不说还有谁“指挥”。文革中，随着林彪地位的急速上升，在毛“缔造”之后，渐渐有了林“直接领导”或“直接指挥”一类说法。到1967年4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热烈响应拥军爱民号召》社论，才大体定型为一种毛、林并列的表述，社论称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这可说是“67版”，其时主管《红旗》杂志的是陈伯达。

再次出现变化是在1969年九大后。在这一年的中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直接指挥”的林之前加了个毛，即改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可说是“69版”，此时中央分工张春桥、姚文元负责宣传，《红旗》杂志也改由姚主管。这回政治局讨论的纪念建军节社论文稿，采用的是正是“69版”的表述。陈伯达对此大为不满，提出要将“林副主席”前的“毛主席和”四字删去，即改成由林单独“直接指挥”，说“这是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实际也即“67版”的提法。张春桥则认为毛不能只是缔造了解放军而不同时“直接指挥”这支军队，因而坚持保留原状，也即坚持“69版”的提法。两人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感到事关重大，只好用“还是请主席决定吧”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这场争论。毛泽东对此自然极为敏感，但他却说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了，我就不看了，让汪东兴当着周恩来的面代他将文稿中“毛主席和”四字删去。要到过了一年多后的南巡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才将郁结于内心的愤懑宣泄了出来，不止一次地发出追问：“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

在此前后，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还相继发生了要不要设国家主席、要不要称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等两次争论。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且前后还提过三次。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总体上都表示拥护毛的提议，林彪则坚持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关于称不称“天才”的争论，起因于宪法修改草案序言部分表述“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句子中，“发展”前有“天

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此前，毛本人在审阅文件或文稿中已多次删过这三个副词，有次与来访的罗马尼亚客人谈话，提到有人吹捧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还说过那是“讽刺”的话。这回讨论时，张春桥根据毛的意愿提出应删去这三个副词。而吴法宪因为这三个副词的首倡者是林彪，他自己这段时间也正在大捧特捧林彪之子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因而坚决主张保留。这时张又说了句“什么天才地发展，那是对赫鲁晓夫的讽刺”。吴一认为张的矛头是指向林的，情绪更为激愤，说这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据当时在场的陈伯达后来在《狱中自述及其他》中回忆，张、吴争论时“吴拍桌子大骂了张”，两人吵得“声震屋瓦”。

很显然，林彪对公然敢于一次接一次地向他的权威发起挑战的张春桥这个“小记者”，已经忍无可忍啦！

## “庐山会议事件”与“谨慎再谨慎”

林彪决定对张春桥发起攻势，文章就做在三次争论上，时机则利用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来习惯简称为庐山会议。

三次争论究竟选择哪次作为突破口，林彪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选择前两次——即在对军队归属的表述中除了毛领导还要不要再加上林直接指挥这么一句，和关于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仅争权的色彩过于直露，弄得不好，还有可能直接与毛发生冲突，他不会那样傻。选择称“天才”问题，就要讨巧得多。首先张春桥是个软柿子，容易对付；其次“天才”问题有很高的理论含量，容易发挥；第三，称毛为天才绝对不会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更为重要的是，再鼓吹一次称“天才”可以使自己继续拥有毛的最忠实、最积极的颂扬者的荣耀。到1970年8月23日庐山会议一开幕，林彪就发表了一篇与会议原定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战备问题）毫不相干的坚持要称毛主席为“天才”的讲话。由于会上既发了称“天才”的恩、列、毛、林语

录，又有“理论家”和几个“宣讲员”的鼓动，很快掀起了一波高一波的“揪人”浪潮，又用文革中流行的“不点名的点名”的方法，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准备对张来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庐山会议这场突发性的斗争，表现形式是一哄而起。有些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事情原委，听说要揪的那个坏人是“反对毛主席”的，反正以“保毛”的名义既可保证自己安全，又可显示自己革命，也就紧紧跟上。这是集权体制长期影响又在文革中经“大民主”的放大而形成的一种极坏的风气。不过这只是表象。从根本上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大体完成了夺权斗争以后，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一次内讧。

“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由文革派、军官集团派和功臣派三种力量结合而成，或者说是这三者的“临时联盟”。其中军官集团派力量最强，特别是“三支两军”后更可谓一派独大，庐山会议的斗争就是这个派与文革派之间展开的。一个“权”字是这场斗争的总矛盾，接班人问题则是幕后设计时的引爆点，而之所以选择张春桥作为“靶的”，还由于张有两个“软肋”容易引发众怒。一是他的所谓“叛徒”问题已为不少人所知；二是还有一个由历史造成的矛盾。尽管军队内部也存在诸如这个方面军与那个方面军、这个野战军与那个野战军之间的种种矛盾，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武官对文官，或者说枪杆子对笔杆子的根深柢固的轻视。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思想影响，加上1949年以来暴力革命几乎已被图腾化，不仅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甚至还断言“整个世界”也“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在这种氛围下，不是扛着长枪大刀，而是拿着一管笔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就被认为有一种“原罪”式的缺陷。陈伯达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笔杆子，但在1966年11月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面对功臣派的重重压力，还是发出了“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的哀叹。

张春桥的资历与陈伯达还不可比，而九大后就靠这里那里支持造反派乱党、乱军这点“资本”，竟然跃居政治局委员的高位，这让功臣宿将们怎么也无法接受。颇能说明这一点是，张在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委后，毛泽东曾巧为安排，满心希望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能与张春桥这个政

委唱一出《将相和》，其间，还让张到南京去对正在被造反派“炮轰”中的许世友表示支持。开头许也颇为感动，但在他走出困境后，再也不把张放在眼里，还对人说：“笑话！我有几十万军队，还要他张春桥保吗？”许的秘书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说到许世友曾编过一首讽刺张春桥的打油诗，并在华东地区军队干部中广为传播。打油诗开头说：“戴眼镜，夹皮包，会写文章能提高”，最后一句是：“打起仗来向后跑！”

在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中，周恩来的表现颇为特别，不过如果联系一下文革历史也不难理解。周是毛发动和推进文革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功臣派的当然代表。在上面提到的以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功臣派的力量相对较为单薄。周的资历、地位又决定着在思想感情上总是倾向于曾为中共创建政权身经百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官集团派，再加上平日在主持国务院工作中经常受到文革派，特别是江青、张春桥得寸进尺的挤压，他会与军官集团派走得比较近，包括庐山会议上在毛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前对军官集团派“揪张”有所支持，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此类实例，在黄、吴、李、邱等回忆录中多有记述。如《邱会作回忆录》说：军委办事组给中央的有些请示报告，“周能批的则批，不能批的就请示毛主席批，批回来再在政治局传阅，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传阅，因此军队内的许多事情文革派那一边不知道。”又说：“九大后到庐山会议期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表面上对江青一伙和我们是‘公正’的，但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有一次总理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今天晚上你有什么话要同我说的吗？’我懂得总理说话的意思，就把我知道的事（总理不知道的）全部对总理说了。总理很高兴，说：‘你帮我做了心中有数的事。’从此以后，总理对我们的支持直到‘九·一三’基本都没有变。”

当然决定一切的，还是要看毛泽东的态度。虽已年近八旬却依然还能“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对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可谓一清二楚。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同时又是一位垂暮老人，当他目睹这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斗争在面前爆发时，还会有他的独特的观察角度，我们不妨把他的这种独特的观察角度概括为“两条船思维”。两条船也即此前他已说过多次的“两个司令部”，但“两条船”更

人性化，凝结着更多的人世沧桑的苦涩以至血泪。如果我们联系一下中国古代帝王制度的历史，那么不能不承认这个“两条船”的观察是相当深刻的，甚至深刻到了可以映照出一些人隐秘的灵魂深处。

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子既立，皇帝已老，臣子们尤其是近臣们，就会或明或暗争着前去趋附东宫。这几乎成为一个规律，尽管《南齐书》作者萧子显把“君老不事太子”作为历史“遗训”向天下为臣者提出忠告，但愿意照着做的历来寥寥。道理很简单：你不事先多长个心眼，等到老皇帝一“驾崩”，新皇帝一登基，还能有你的位置吗？更不要说如果你与老皇帝走得太近，一旦新皇帝忽而记起恨来，连脑袋也很可能要搬个家呢！

此刻，我们的毛主席老人家，眼看着自己的接班人那种“一呼百应”的景象，就会不由想起两条船：一条是自己的船，另一条是“贼船”；一句俗语：老鼠搬家。看到自己已是一条将沉的船，而船上老鼠们正争先恐后地向那条快要起锚扬帆的“贼船”搬去，就会不由升起一种日薄西山的悲凉。老人家甚至已不掩饰内心的悲凉，见到许世友，伸出手去说：“你摸摸，我手都凉了。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意思是要许去做做工作，把那些“搬家”的“老鼠”劝回来。哪晓得事后一查，才发现其实许世友也是搬过家的，还向林彪写了信。不过经过几天苦苦的观察和思考，毛这位文革统帅还是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至少在文气上已回复到固有的轻松、豁达和幽默。鉴于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而参预“搬家”的队伍又相当庞大，确定应对的策略是偏于保守的：稳住林彪，对带头“搬家”的汪东兴、陈伯达则保一抛一，暂时留下汪东兴以观后效，而将陈伯达作为“反面教员”抛出，以儆效尤。然后设法逐步将众多“搬家”者再或“逼回”或“召回”或“请回”到自己船上来。至于整个处理方针，老人家信手拈来了一句通俗生动的歇后语，叫作“孔夫子打牌——和为贵”。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真可谓“一言九鼎”，按照他自己后来与到访的法国外长舒曼谈话的说法，只用了“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一场翻江倒海的风暴就此平息——当然实际上只是表面的、暂时的平息。

作为事件的“焦点人物”张春桥，在庆幸再次获得解救的同时，又一次面临“别无选择”。应当说他也是很愿意、很积极地去陪孔夫子打一局又一局的牌，遵照总导演的分配，扮演的是一个倡导“和为贵”的角色。于是在下庐山前，他与曾经喊过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以至“千刀万剐”的人们，握手、谈笑。有人说“冒犯了，对不起”时，他赶紧朗朗笑着接一句：“我不在乎！”对许世友，还遵照毛的指示，特地设席宴请，举杯修好。

张按照毛意图扮演的此类“和为贵”的角色，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年4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上海去参加这次会议的是王洪文和徐景贤。通知时原说要他们在会上作批判性重点发言的，因而要我作为工作人员与他们一起去，以便随时按照会议要求为他们起草发言稿。大概在庐山会议那场斗争中上海代表大多“站在正确路线上”多少有点以为“我们胜利了”的自我感觉吧，到北京京西宾馆住下后，王和徐都有点兴奋，也颇为活跃，会议间隙经常到其他省市代表所住房间去串门，还两次到钓鱼台去想拜访康生和张、姚。结果是一些省市的领导人大多还是把他俩视为“造反起家”的小人物，不怎么肯搭理；钓鱼台那边，康生因病不便接见，张、姚也没有见到，未免有点扫兴。

4月29日汇报会结束，周恩来作总结报告。刚讲到“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时，会场上出人意料地有人鼓起了掌，很快热烈的掌声已响成一片。这时鼓着掌的张春桥笑容满面地从座位站起，接着是姚文元、江青也站了起来，主动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一握手，全场一片欢腾。

后来知道，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起初是由会议秘书组起草的，后经政治局讨论，专门成立了一个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纪登奎参加的六人修改小组。秘书组起草的初稿对黄、吴、李、邱等错误的调子定得比较高，写了好些重话、过头话，六人小组修改时将调子降了下来，删去了那些重话和过头话。吴法宪在《回忆录》里也这样说过：“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指重话和过头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原来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有

过指示，说“还是要回到九大路线上来，要团结、胜利。人家已经检讨了，就要鼓掌欢迎。”

这天会议结束时，张春桥手里拿着文件兴冲冲从会场出来，王洪文、徐景贤迎上去问了好，又说了他们准备第二天就回去，问张对上海工作还有什么指示一类话。张突然沉下了脸，皱了一下眉头，说：“你们很活跃嘛。”那语气听来有点像在教训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很明显，张是在对王、徐四处串门，又两次去钓鱼台找人有些不满。接着又换了一种较为缓和的语气说：“我过去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讲过，《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要求杨子荣做到四个字：‘大胆、谨慎’。又大胆，又谨慎，对立、统一，这是符合辩证法的，那时我说我们也要照少剑波说的话做，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但现在我不要你们‘大胆’，只希望你们‘谨慎’，谨慎再谨慎！”

王、徐听了表情也一下沉重起来。因为实际上他们也看到了：这次会议鼓掌、握手的“团结”只是表象，背后反映出来的种种却是吉凶莫测。会前，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带着黄永胜等前往北戴河去看望在那里休养的林彪，实际是希望林能来参加这次汇报会，趁此机会说几句话，让他好有个台阶下来。但尽管周一再委婉表达此意，林却始终避而不谈。后来总算回到了北京，但就是不肯到会场来露面。

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才知道的：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前二十几天，根据林彪要“先搞个计划”的指示，林立果与他的“联合舰队”几个主要成员已制订了一份针对毛泽东、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武装起义”计划，用谐音起名为《“571工程”纪要》。

党的十大后，张也仍然要求上海要谨慎。记忆中，与我有点关系的，就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在某省一个文艺刊物上读到一篇反映文革的小说，觉得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较有普遍性，就向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朝霞》等文艺刊物的陈冀德提了个建议，可否对这篇小说的不良倾向作些评论和批评。《朝霞》发表批评文章后又过了一个多月的1974年4月初，张春桥在给上海市委领导马天水谈工作的一封信中，又谈到要谨慎的问题，特地指出：“《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还有一件是1975年4月下旬，我因有事要回上海去向张告别。闲谈中，张说：“你顺便代我去向市委几位领导说一声，上海不要多出头，让北京、辽宁出头，我们在后面跟着学。”

## “再生”与“野心”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的周恩来对军官集团派的支持，从“九大到庐山会议期间，直到‘九·一三’基本都没有变”，这些情况当时张春桥并不知道；不过也是发生在庐山会议期间的1970年8月25日，有一件事却让张不由得要问个为什么。这事几年后他向他女儿维维说起过。张说那天早晨他看到六号简报（载有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会上提出要把“某个极端反动的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千刀万剐”等信息）大为吃惊，就去找江青；江看了也认为问题很严重，两人就一起去找周恩来。周却让工作人员推说已入睡不便接见，江、张只好直接去找毛泽东，毛接见后，周才叫江、张进去谈。张说：“当时我心里就有些纳闷，不知道总理是怎么回事。”这一节就来侧重谈谈张与周的关系。当然说到底，张、周关系同样也要从两人与毛的关系中去理解。

文革中，稳健持重、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不仅在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得到他们由衷的尊敬；各群众组织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几乎是一致的拥护和爱戴。我本人，十大期间和十大后作为工作人员，与周只能说是稍有接触，也不禁为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还有和蔼慈祥的长者气度，深深受到感动。如果拿周与毛作个比较，那么应当说，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理解以至具体的决策、策略，都与毛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他所处的地位又让他不得不努力跟上毛的思路日以继夜地去尽心尽力工作。他做得确实很辛苦，很困难，有时还很无奈。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这类话。如1966年8月18日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时就说过：“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了‘保守派’。我们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时毛泽东思想举得不高，错误是经常要犯的，当然不是站在对立的立

场上。我们要保持晚节，就要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不妨说周恩来努力想“保持晚节”的晚年，就是整整一部文革史曲折、艰难和复杂的缩影。

文革初起，张与周无论资历、声望还是能力和经验等方面都远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根本不可能在获取毛信任和重用上成为周的竞争对手，加上周一向以温和待人，所以两人关系还应是相当好的。但自张对“安亭事件”作出了违反周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的一致意见的处理，却得到毛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后，周突然感觉到了来自张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胁力。其后，张越来越受到毛的重视，张、周与毛，渐渐地便形成了一种三角式的角逐关系。这一点，可以从比较两份张春桥参与起草的文件中，得到清楚的说明。

一份是《五·一六通知》的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文中四次出现周恩来的名字，都是正面形象。全文留给读者的印象，周是毛发动文革的得力助手。这样写，应该是周希望中的。当然，《大事记》体现的是毛的意图，张春桥和一起参加起草的王力等不会、也不敢自作主张。另一份是准备向毛汇报的大闹怀仁堂的《记录》。“大闹”是1967年2月16日在周主持的碰头会上发生的，《记录》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的话整理得很详细，对作为主持人的周的话却一个字也没有记。实事求是地说，周在会上对正在激战中的元老、文革两派，还是尽量想做到不偏不倚的，有限的几次简短的插话，也是字斟句酌，为保持中立用足了心思。其间有一次插话，似乎稍稍有点“越轨”，后文还将提到。当然从内心说，周不可能不偏向于功臣派。整理这份记录除了张春桥，还有王力、姚文元。他们只字不提周的几次插话，我的理解，不大可能只是一时疏忽，应该是经过反复权衡后的有意省略。这种省略，曲折地反映了他们对周在会上态度的不满。《纪录》在上报毛前，先请周过目审阅。周一看就明白：这不是要用《纪录》这样一种形式，到主席那里去告我的状吗？因为周作为碰头会主持人，如果对功臣派的“大闹”没有明确表示反对，那他不仅要对发生在会上的那种显然为毛所不能容忍的政治倾向负很大的责任，而且很可能还有被划入“大闹”派的危险。

陷入了尴尬的周恩来，肯定会对带头告他这一状的张春桥留下深刻的印象。怎么办？为了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周不得不亲自在这份《纪录》上加了两段文字。一段是在谭震林拿起公文包、披上大衣：“‘让你们这些人去干吧，我不干啦！’说着愤然离场”处，加上：“周恩来狠狠拍了一下台子，大喝一声：‘回来，坐下开会！’”另一段是陈毅在激愤中带出了延安整风旧事，说“总理那时不是也挨整了吗”处，加上：“周恩来插话：‘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是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但周的补充同样也有省略。而且省略的，恰恰就是那几句似乎稍稍有点越轨的话。“大闹”中，当李先念说到《红旗》1966年第十三期批判“资反路线”的社论一发表，“全国老干部被统统打倒”时，周立即接过李的话头，对着康生、陈伯达追问《红旗》社论的事，说：“这样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嘛！”这段明显与功臣派的“大闹”站到了一起的话，周就没有“补充”上去。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大闹”当天晚上，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了“大闹”的整个过程。毛开头还较为平静，后来越听越恼火。偏在这时，张又插话补充了周在“补充”时“省略”了的《红旗》社论那件事，并说：“总理对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这期《红旗》社论是毛审阅后批准发表的，他听了自然大为不满，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嘛！”这不妨理解为毛的一句气话，因为后来事实上并没有形成这样一项制度。毛对周有“气”，大概也不只是周对《红旗》社论没有送给他审查有意见这一件事，主要恐怕还是不满于周作为碰头会的主持人却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大闹”。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毛萌生了一个后来很快实施了的想法：让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毛要张去找周“谈一次话”，说要周“把中央文革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周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作为最有资格代表中共元老的一位老革命家，竟落到了要后生晚辈张春桥手持“最高指示”来“谈一次话”的地步！尽管为了“保持晚节”，他依然会很乐意地接受，并“紧跟毛主席不掉队”，但他内心会对张春桥这个“小记者”作何感想，我们也不难想象到。

1968年4月，上海发生了针对张春桥的第二次全市性的“炮打”事件——“四·一二事件”。对张来说，这次炮打真正具有威胁力的，不是最先发起者《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大多凭猜想提出的“十个为什么”，而是有人出乎意料地揭发出了他的“叛徒”问题。

最先在南京路一带贴出震惊全市的“揪出大叛徒张春桥”这张大幅标语的，是属于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一个叫“红旗”的群众组织。“红旗”在部队属“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保邱会作的，邱很快便拿到了由“红旗”提供的揭发张有叛徒问题的材料。《邱会作回忆录》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拿到这些材料不知怎么处理好，一次利用开会的机会，给总理嘀咕了几句。总理很慎重地说：“这个材料你不要转给我。”稍等片刻总理又说：“群众来信我是可以收到的。”总理的话提醒了我。

“提醒了我”什么呢？邱没有说。不过按照1949年以来政治斗争的惯用招数，人们也不难猜到。由邱送周、周再往毛那里送，那不就有“搞宗派活动”嫌疑了吗？改成“群众来信”，就不必再有任何顾忌。于是，经过邱的一番安排，三两天后，一封由“红旗”署名的揭发材料，作为“群众来信”送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当时在上海，不止是以工总司为代表的大多数造反派和我们这些以市革会工作人员为主的“保张派”不相信，就是一般干部群众也很少有人相信，即使参加炮打的人相信的也不多。最简单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是：张历史上从未被捕过，“叛徒”云云，从何说起。近年来也已有学者经过详尽考证，否定了张是叛徒的说法。以周恩来的睿智和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当不难对这封“群众来信”提供的虚假材料作出否定的判断。但他还是决定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并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上报了毛泽东。

人们自然要问：这是为什么？坦率地说，我在刚听到这些“内情”时，也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问过自己，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样一种有违寻常道德的做法，会与我心目中几近完美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联系在一

起。是后来那十几年的高墙铁窗生活教育了我这个十足的书呆子，让我懂得了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大道理：这就叫“政治”。

与此同时，军队系统也在积极行动中。先是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给叶群送了一份揭发张春桥“叛徒”等问题的材料，叶修改后退回江命他重抄一式两份，然后报林彪批示发出：一份送毛泽东，另一份送陈伯达、康生、江青。

这样，在中央就有了周、林两条线都抓住“叛徒”这个极具杀伤力的问题，对张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后来林立果“小舰队”特地在《“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列上了这样一条：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当然最终还是要看毛泽东怎么表态。毛后来作出的回应只有两个字：“不查。”这“不查”是什么意思？似乎藏着玄机。

我的理解是，毛对揭发张“叛徒”问题的那些材料已大致作出了否定的判断。那又为什么不索性彻底查个清楚明白呢？这是因为自从1967年3月中央下发了有关“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和批示后，“抓叛徒”几乎已成了一项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你一查，不是旷日持久就是越查越复杂，甚至不是叛徒也“查”成了叛徒。而张是毛继续推进文革亟需依靠的助手，在用人问题上，毛采取的是南宋陈亮上书光宗皇帝时说的那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方针，继续坚持要用张，因而回答周两个字：“不查。”

周对毛的指示从来是不折不扣执行的，这次当然也是。他只好对邱会作说：“主席不让查。”不过周自己，对张的这条尽管虚假但威胁力极强的“大辫子”还是紧抓不放的，就我所知至少还抓过三次，后文还将提到。

回过头再来说已被笼罩在“叛徒”问题黑影里的张春桥。尽管“四·一二炮打”因毛让三军领导表态支持张而很快平息了下来，但对张春桥来说，更让他担心的还是那个虚假的所谓“叛徒”问题。在炮打期间，毛曾命吴法宪派飞机将张接到北京，并就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炮打问题谈过一次话。但没有提到张最关切的“叛徒”问题，张自然既不便主动询问，更不敢自行申辩。他急切地企盼着伟大领袖对他的“叛徒”问题最

好也能有个明确的表态。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可真是分分秒秒都关系到政治生命的生死荣辱啊！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整的重点就是“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叛徒”是比“走资派”更严重的罪名，只要一沾边，就成了“彻底打倒”的铁案！

那么周会不会把“主席不让查”的话同时告知一下张呢？大致可以肯定：不会。这样笼罩在张头顶的那个“叛徒”的黑影，便久久无法消散。

在我的印象中，这以后的张曾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沉闷期。尽管在公众场合依旧谈笑风生，但若是小范围开会，譬如与我们几个起草文件的人一起讨论时，忧虑之色总是隐隐挂于眉宇间，说话不多，有时考虑问题也会较多从负面着眼。我印象中的张的这个沉闷期，大约持续有半年多或近一年吧，在这以后的筹备和召开党的九大期间，张从毛那里接连得到了两个让他欣喜和激动不已的信息。先是1969年3月中旬，毛因不满于陈伯达的一再拖延，决定改由张、姚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紧接着在九大闭幕后毛亲自主持召开的一中全会上，张被选举为政治局委员。从这两件事释放出来的信息清楚表明：毛已否定了张的“叛徒”问题。因为很显然，毛决不会让一个叛徒或有叛徒嫌疑的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那些日子里，张会有一种终于摆脱了千斤重负的轻松感，同时对毛油然升起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崇敬和感激之情；特别是当他后来知道毛对他的始终不变的信任是在排除了由周、林两条线组织起来的那个“叛徒”问题“包围圈”的干扰的情况下作出的，这种感情更会无数倍地加深。如果说，1958年的那一次接见和一次点将使张对毛深感知遇之恩的话，那么这一回能够从这个致命的“叛徒”重压下获救，更让他感受到了毛对他有一种再生之恩。他会想起一句古老的话：“士为知己者死。”从此为贯彻执行毛意图、指示，真可以做到万死不辞。

九大后的那年夏天至初秋约有两个多月，张都在上海。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这该是张在文革十年中少有的心情舒畅，甚至还颇有点悠闲自得的一个时期。一回到上海，他就让秘书把朱永嘉、王知常和我（当时我们三人都是《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成员）接到他所住的市委兴国

路招待所，一脸欣喜地说：“这次回上海，是主席那里请了假的，除了工作，就是读书。我特地把你们请来一起读，读的就是主席的书。”

原来这时张领受了一项任务，该是他企盼多年、最希望也最有兴趣做的一项任务：编辑《毛选》五卷。1966年7月中央曾成立过一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委员有李井泉等十四人。张春桥不在其中。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编委会成员不是被打倒，便是被隔离，已所剩无几。1967年12月29日，毛泽东找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开过一次会，讨论了《毛选》五卷编辑问题，没有正式名称，算是编辑小组吧。九大前后，陈伯达不再受毛信用，也不再管事；康生则因病休养，因而这个编辑小组具体做编辑工作的，就只有张春桥一人了。那天张与我们三人约定：每周两到三个下午，或下午再连晚上，一起读《毛选》五卷校样。从头到尾的读，逐字逐句讨论，提出包括文义、字句以至标点符号等各种修改意见。每讨论一次，由我们三人整理成一份记录，再由张自己按选集目录逐篇提出书面意见送康生，康审读后上报毛，张说：“最后还是要由主席自己去定。”

我们三人那时当然非常高兴，且深以为荣。每次讨论，张也都是兴味盎然，常常联系校样内容，谈他亲身经历的一些人和事，用以说明毛看问题确实要比当时任何人都高明、深刻。这样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不够用了，有好几次欲罢不能，只好晚上继续。遇到这种情况，就由张请客，供我们三人各享受一碗赤豆汤或小圆子一类点心。

大约到这一年深秋，《毛选》五卷清样读校完毕，张就回了北京。再来上海已是第二年4月，接下去便是毛带着他到苏州去与林彪作了那样一次“根本谈不拢”的“苏州谈话”，再后来就爆发了“庐山会议”事件。1971年5月初，开完批陈整风汇报会，张又来上海，留给我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印象。不过这一次带回来的也是毛交给他的任务，倒又是他最希望做、也是最感兴趣做的事：为中共创立五十周年写一篇纪念文章。不言而喻，毛的这种安排，已把张作为党内第一枝笔来使用，这正是张深以为荣的事。为收集资料和起草这篇文章，临时搭了个班子，除朱永嘉、王知常和我外，又另找了几位，共七八个人。张与我们一起阅读相

关资料并讨论了多次，心情也似乎越来越舒畅，经常是侃侃而谈、笑声朗朗。三两个星期后，文章已大体完稿，实际上这篇文章主要还是他自己写成的。在这期间，一次讨论完文稿后，张点了根烟，感叹一声说：“文化大革命忙忙碌碌，想读书也没有时间。倒是上次与你们一起读校《毛选》五卷清样，和这次一起写这篇文章，总算静下来读了点书，看了点党史材料。人生易老，时间总是不够用。我这一生有一个‘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

有关这个“野心”的话，张后来还说过一次，那是在十大闭幕当天傍晚在人民大会堂就餐时说的，不过那似乎已有了一种别样的含义。

## “领导危机”与王洪文的人选

张春桥在与我们一起讨论起草上面那篇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文章时，特别强调：“一定要引一段林副主席的语录。”我们当然照办。文章到定稿，林彪的语录引了一段，还有四处提到林的名字。政治局讨论时，周恩来又加了一句称颂林主持编辑出版毛语录的话。这些体现的大概都是毛的意图吧？谁也没有想到，这篇作者署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后过了短短75天，就爆发了林彪“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对这一文革中最为严重的事件的反应，却是一如既往的淡定和风趣。譬如当林彪驾机出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时，他的回答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不要阻拦，让他去吧！”待到又有人来报告，说林的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居然说要感谢林彪帮了大忙，还颇有兴致地举杯庆贺，并随口吟出杜牧七绝《赤壁》，首句就有“折戟沉沙”四字，给林所乘的“三叉戟”飞机折坠于异国沙漠来了个绝妙的写照。但这一切，十有八九都是为了稳定“军心”进而稳定大局做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上了党章的接班人的“自我爆炸”，不仅标志着文革一次很大的失败，还有如何向国内外作出说明的大难题，这给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据一位保健医生回忆，那几天毛服两三次安眠药也睡

不好。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以至到1972年2月2日因肺心病发作而突然休克，经一番紧张抢救才慢慢苏醒过来。同年5月18日，周恩来也被查出患有膀胱癌。真是不幸连着不幸啊！

但凡文革过来人，大都会对1972年及其前后这段时间那种特有的沉重、不安而又敏感留有深刻印象。林彪已“机毁人亡”，而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毛泽东，人们虽依旧在祝愿他“万寿无疆”，他自己却说：“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这么大的一个党、一个国家，谁来接班啊！国人都在翘首企盼着，却又因“九·一三事件”的爆发而对接班人这三个字已讳莫如深。中华大地，一面照样到处红旗飘飘、锣鼓喧天；一面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那时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积极投身文革的人，决不会去想是否1949年以来实行的政治体制出了什么问题，相反，一如既往地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最先进的，多位中央领导人年老多病，那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嘛！还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希望老人家能享有更高的寿数，健在时能把“后事”安排好。

在当时八亿人中忧虑最深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本人。当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者的毛泽东，估计也不大可能从政治体制上去思考面临的问题。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从后来在与来访的越共领导人黎笋谈话中，可以感觉得到这位文革统帅内心深深的忧虑。在介绍了自己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的健康状况后，毛突然说出了一句让客人颇为吃惊的话：“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

正是这个“领导危机”既折磨着伟大领袖，也折磨着当时亿万中国人。

从1970年4月“苏州谈话”等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毛泽东确实很可能曾经属意于张春桥，当然不是马上撤下林来换上张，而是把张培养为相当于党的副主席的位置上，至于以后的事，还要看发展。但“庐山会议事件”的爆发，使毛看到反对张的人太多，至少近几年内很难进入考虑接班人选的范围。这一点，可从《南巡讲话》中谈到培养接班人时，只列举了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王洪文等而没有提到张可以看出。但如果不说张春桥，眼前能够掌控全局的就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持重稳健已担任多年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前些年有的文革著作已提出，毛在病中曾当面向周交代过“后事”，也即一度曾有要周接班的意思。此说虽无可信的文献为据，但在当时，周的人望确实很高，为张所远远不及。有件事我印象很深。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海有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等参加，我作为工作人员也一同前往。会议快结束时，周恩来接连作了三个晚上、长达六个多小时的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详尽地回顾了自己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大概意在此启发教育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迅速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会议发的有关各小组讨论的《简报》，几乎全是由总理的“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所深深感动的信息。马、王、徐等在私下议论时说，他们事先都不知道周要做这么重要的报告，会议作这样安排，很可能表达的是毛的意图，那就是要让周接班。后来徐景贤还告诉我，他到一些省市代表所住的房间去“串联”，他们也在这样私下议论，而且对周接班都很高兴，表示完全拥护。

但毛对周似乎并不怎么满意。认为周不是能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帅才，对共产主义理想又不够积极、坚定，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一句话偏于保守。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领导危机”问题，大约到1972年初，毛在发生一次休克后精力稍有恢复，就开始构想九大后的第二次高层人事布局。与两年前“苏州谈话”前后的那次布局最大的不同是，这一回林彪已经出局，在培养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青年干部问题上，更可以有一些突破性的考虑。这期间，他在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一再提到“要搞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可。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还说了“我们老一辈子人是过渡时期的人，不要总出台唱戏呀，我们出台转一转就行了，像《西厢记》上的老夫人，要让红娘去演戏”这样的话。一度还曾提议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由他当主席。此议因政治局讨论时都不同意，他就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

在这次布局构想中，后来引起国内外特别关注的人物，就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带头人王洪文。毛泽东大概是在1966年11月处理“安亭事件”

中那几天里，第一次听到“王洪文”这个陌生的名字的。从那以后，便通过多种方式对这个“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的年轻人作了多方面的了解和观察，这样在《南巡讲话》中说到培养接班人时就已提到了王洪文，到1972年9月，更正式向政治局提议调王来京“参加中央工作”。在此前后调来参加中央工作的，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围绕着是批判林彪的极右还是极左的问题，张春桥与周恩来发生了一次直接较量：周主张批极左，张主张批极右。这场几近公开的较量，不仅牵涉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还影响到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干部群众也卷入其中。最后自然又是毛泽东不得不出来表态作结。12月17日，毛在与周、张、姚的谈话中指出：“批极左，还是批右？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也就是说，主要不是批林的极左，而是批林的极右。争论双方表面上算是就这样统一了起来。

如何来理解毛的这个表态，不仅几十年后的现在有点摸不着头脑，就是当时也颇费思量。我的看法是，庐山会议后，毛紧抓不放的一件大事，就是要解决他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来的“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啊”，也即要解决军队在国家权力构成中因“三支两军”而空前膨胀起来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更明确提出“批林整风”，“批林”的核心就是解决军队问题。其后采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一系列措施，也都是为了扭转这个“主要倾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周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确实不怎么符合毛的“战略部署”。此其一。其二，批极左，必然会触及到造反派，有的地方还有可能把已经掌权的造反派打下去。这与毛正在构想中的要多培养些经过文革锻炼的年轻人的布局，也是相左的。还有第三。在毛看来，凡是由他和党中央发号召搞起来的群众运动，即使有些做得过火或出现了偏差甚至造成了破坏，也只能在前进中作局部性的调整，不能公开提出批判极左。其实自号召夺权而造成几近失控的局势后，毛自己就相继采取了“三支两军”、“大联合”、“三结合”和“一打三反”等等措施，实际上都是在调整，也即“纠偏”或“纠左”，只是公开决不会这样宣传。不仅文革中的是这样，此前的大跃进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运动中左与右总是紧张地对峙着的，

你作为领导一提出要批左，等于承认发动这场运动是错误的，右的一方必然乘机而起以至压倒左，其结果便是整个运动的失败。当然向干部群众说明时不能用这样的语言，而是要说气可鼓而不可泄呀、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呀等等。大跃进中提出要保卫三面红旗，文革中则是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等等。

周恩来自然也是熟知个中三昧的，但他作为国家总理，在大量的实际工作接触中，深感干扰更直接、更多的还是运动中的那些极左做法和造反派极左行为。因而毛一提出要“批林整风”，就以为遇到了一个批判极左好时机。而张春桥，即使单从自己的地位和遭遇出发，也让他更容易理解毛的意图。在这场较量中，张就这样似乎又一次成了“赢家”。不管怎么说，毛一方面还离不开周恩来这位实干的大管家，另一方面却也对他积聚了更多的不满。

1972年11月11日，保健医生进一步确诊周恩来所患为膀胱癌，且还在发展，不得不正式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建议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采取减少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毛泽东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周膀胱癌的进一步发展，和毛自己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对他这时正在进行中的中央高层人事布局构想，关系极为重大。此前，毛已再次提出要落实干部政策，让一些老干部出来工作。对曾经作为“二月逆流”批判过的“大闹怀仁堂”一事，这时说：“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其时在江西下放的邓小平，当然也是一位精明强干、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家，从上述种种政治信息中读出了两个字：机会。这年8月3日，他向毛写了一封检讨自己文革前、文革中所犯错误并保证“永不翻案”的信，信末希望能分配自己做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毛泽东很快作出批示，说对邓“应当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意思就是可以考虑让邓出来工作。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3月初邓回到北京，几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党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的文件。

与此同时，毛建议提前召开党的十大。按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到1973年初还不满四

年。不过党章同时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很显然，上述种种，都是毛为尽快解决“领导危机”的“特殊情况下”，作出的“特殊”安排。

正是在十大紧张筹备过程中的7月4日，毛对周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更为不寻常的是，毛的这些话不是直接对周说的，而是打个弯，对张春桥和刚参加中央工作的王洪文说的。为筹备十大，张、王分别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这天晚上毛找张、王原是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情况，但后来谈的实际主要就是批评外交工作，其中有几句话似乎还是直接针对周的，如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由于周不在场，而按照惯例，毛如此重要的谈话又是必须向政治局传达的。谁来传达呢？那时王还只是中央委员，当然只能由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张来传达。第二天即7月5日，周主持政治局会议，张传达毛的谈话，实际也即当着周的面批评了周。这不仅使周，也让张十分尴尬。后来周在向毛上送外交部对错误的检查时，附了一信：“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批示说：“检讨不要写了。”总算网开一面。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耐人寻思的事，时间是五天后的7月10日。这天晚上，毛在他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即将召开十大相关事宜。此时由张起草的政治报告政治局已通过毛也审定，留下一个问题：由谁到大会去作这个报告？毛没有表态，只好留下再议。

如果联系一下中共党史惯例，在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的通常总是第二把手，那么这很可能是一道考试题：看你能不能摸准毛正在酝酿中的十大后中央领导层人事格局的心思？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了一个既无人反对也少有人附和的提议：十大政治报告由王洪文来作。张肯定反复思考后才这样提的，但这一回他错了。那时我借调在中央办公厅参加为筹备十大而成立的党章修改小组，要完成两个文件：一是党章修改草案；一是《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一个多月后（确切日子已记不得），毛在我们小组上送的《关于

修改党章的说明》上大笔一挥，将标题中的“说明”改为“报告”，变成了规格大为提高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亲笔署上报告人“王洪文”三个字。毛这一改，至少表达了这样两层含义：一、王洪文已被抬举到了大致相等于接班人的地位；二、既然王已成为修改党章的报告人，不言而喻，周恩来也就成了政治报告报告人的唯一人选。我估计，张春桥会对自己这一错误的提议暗中深深自我检讨一番的。因为他的“冒失”，不仅又一次当面“得罪”了周，更为不该的，还在毛面前暴露出他在与对手较量中有失大度的品格。

随着大会进入选举的议程，毛又做出了一个堪称奥妙无穷的举动：让这一天主持全体会议的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毛主席的票，由王洪文同志代投。”至此，毛选择王为接班人的意图已表达得十分明显。但因上过党章的接班人林彪“自我爆炸”的沉痛教训，参加大会的代表们都忌讳提到“接班人”三个字，这真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 张对周说：“你就做周公吧”

王洪文一旦被定为接班人，在1949年以来那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张春桥与周恩来无论他们各自的主观愿望如何，两人的关系立刻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究竟由谁担任第一“辅佐大臣”？说不定还会由此引发一场或明或暗的角逐“主辅”之争。尽管张在资历、声望、能力和经验等方面都无法与周相比，但周却不可能不想：人家可是从“安亭事件”起就已经做了王洪文的“老头子”了呀！

就在这期间，会上发生了一场颇大的争论。那是在讨论主席团名单的政治局会议上，许世友带头竭力反对王洪文任主席团副主席。实际持反对观点的还不止许一人，党、政、军不少老干部都有类似想法。挺王最力的是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引用三国时期孙权起用年轻的周瑜而程普等老将反对的历史典故，批评许思想落后于时代，没有看到党和国家的未来。周为了“打通思想”，特地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联系党史再三

说明“我们一定要跟上主席思想，人总是要老的，趁现在赶快重视选拔年轻干部，决不能看不起‘儿童团’”。当他说“我们有些老同志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时，噙着泪水，几次哽咽，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这场争论中，与周、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春桥没有说多少话。多数场合，他只是转述周的话，或表示同意周的意见。我理解张的这种“低调”，表明他已经领会了毛的意图，自愿退出“主辅”之争。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张春桥让我写十大“新闻公报”。按九大成例，“新闻公报”应该是张自己或姚文元写，他让我写，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猜测，由我这个与中央领导层毫无瓜葛的小人物来起草这份必然要涉及已经成为高度敏感的政治人物王洪文的公报，或许可以缓解张、周之间的矛盾，避免引起意想不到的种种误解。有关这份公报的起草过程和张、周对此各具特点的应对，我与郑重兄交谈时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本书正文已录，此处不赘。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张春桥又一次说他的“野心”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那是在十大闭幕那天傍晚。作为大会秘书长一直忙碌着的张春桥，端了个人民大会堂那种专供中央领导人开会进餐用的长方形景泰蓝漆盘，坐到靠窗的一张台子旁开始享受晚餐。这时记不得是谁跑来说有事要找一下总理，张对他说总理在某个房间，大概在同几位专家商量大会文件翻译的事吧。那人走后，张忽而深为感慨地说：“总理懂得多国文字，组织文件翻译这样的事，只有他能做。他的学识，他的经历、能力和为人，我这一辈子想学也永远学不到了，你不佩服也不行。”吃了口饭，喝了口汤，停了一会，略微提高了一下嗓音，像是自言自语、其实是当着大家说的：“有人说我张春桥想争这个，又想争那个，好像有什么野心。其实呢，要说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

如果说，两年前张与我们一起讨论文章时说他有这个“野心”还只是抒发一下可能已蓄意多年的心愿的话，那么这一次明显有了别样的含义。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好像他是要向人们表白点什么，或者说是挂起了一块“免战牌”吧？若果如此，我以为张最希望听到他这番话的一个人，应该就是周恩来，“免战牌”也是向周挂的。

在这期间，张还就辅佐王的事与周有过一番对话，我没有直接听到，是多年后，张被软禁在江阴某处与陪伴他的家人偶尔说起，我才辗转听到的。张说：“那天我对总理说，周公辅成王，功劳都在周公，你就做周公吧。总理回答说：我总是在主席之前走的。”

大约也就在十大后的那几天里，毛批给周读一篇古文：《史记·汲郑列传》。这是两个月前毛通过姚文元，让上海市委写作组注释并用三号老宋印刷的，因称“大字本”。题中“汲郑”即汲黯、郑当时，都是西汉武帝时清廉、直言的名臣，郑当时更以善于荐贤举能著闻。周一一看自然懂了，知道毛是希望他爱护、辅助王洪文，多推举年轻干部。他特地写信给毛，谈自己的读后感，其中有两句是：“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从这时起，周凡是向毛上送请示或报告，均与王一起署名。一场“主辅”之争，至此似乎偃旗息鼓了，却不料两人的角逐又陡起波澜。

我因筹备十大借调在北京工作三个多月，深感自己缺少在中央高层应对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再说也不感兴趣，等大会闭幕留下的一些杂务全都做完后，就坚决要求仍回上海。我是这一年9月初回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住进了我在“康办”大院（即市委书记处所在地康平路大院）的办公室兼寝室，日以继夜地一面到基层去做调查收集材料，一面开始着手写“蓄谋”已久的反映文革的长篇小说。

某天下午，一向宁静的大院忽而说笑声、鼓掌声热闹一片。偶尔从窗口往下望望（我住在三楼），更大为意外：与拥在周围的家属和孩子们说话的，竟是邓大姐——邓颖超！后来知道，十大闭幕不久的9月中旬，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其间，随同周前来的夫人邓颖超，出人意料地带着秘书来到了“康办”大院。邓大姐访问了住在大院的市委领导新老干部和已故柯庆施的家以后，这时正在发表她的告别讲话，末了几句似乎是有意大声说出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今天我是特地来拜访大家的。该去拜访的，都拜访过了，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邓没有去的一家，就是张春桥的家。这天张的妻子文静也是高高兴兴做了欢迎的准备，但她等了个空。邓说她不去的原因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这也说得很对。因为除了孩子们，大院里不少人都知道，文静有个历史问题，那就

是1943年在晋察冀边区一次对日寇的反扫荡战役中因受伤被俘曾有过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等变节行为。但叫人生疑的是：这个“历史问题”她不仅早已向党组织作过交待，组织上经过审查也已作出了结论，1949年批准她重新入党了。按说这已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历史问题”了，更何况其时文静已赋闲在家，根本不会影响到上海市委工作，与中央高层更隔着十万八千里，邓颖超何以还要先来这么一番访问，再来一个公开宣布呢？所以如果大家不是“想一想”而是想了又想，那就很快会想到文静背后的张春桥：张本人不也是“叛徒”吗？尽管毛泽东已表态“不查”，但周恩来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还是不肯放过张。

三天后文静病倒了，急送医院抢救。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由打了个寒噤。越发觉得像我这种脆弱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在中央工作，庆幸自己这回总算做出了坚决要求回上海的正确选择。但不久出现的事，却说明我已经没有了这种自由。

这年11月25日，市委书记马天水突然找我谈话，说刚接到北京通知，让我第二天到中央办公厅报到，还说这回是正式调动，不是借调。这样，26日我就来到了当时王洪文所住的钓鱼台16号楼，王热情地接待了我。因此前我曾当过两三年上海市委书记和部分常委每天中午两小时读马列的辅导员，所以王一开头就说：“把你调来，就想请你继续做我的老师。这事我向主席和总理、春桥同志报告过，他们都同意。不过还是要听听你有什么意见？”我当然不敢再有任何意见，只是一再说明做老师不敢当，但我愿意尽自己努力做好工作。

也就在这次交谈中，王洪文说到毛找他谈了一次话，谈对他的工作安排问题。当时我只是从如何做好辅导工作去理解的，但后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我在反复思考了整个文革十年历史以后，觉得毛这次谈话的含义决非只限于要王洪文读马列这样一件具体事，而是在十大完成了中央高层人事布局后，又对这个布局作了整体思考后的结果。王洪文是这样说的：前天，主席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主席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着重就是读马列，有些不好懂，可以找个老师，查查资料。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工作上你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总理，一个是春桥同志。

我个人理解，以为毛这番讲话除了明确选定周为“主辅”、张为“副辅”以外，还透露出这样一些重要的政治信息：

第一，说明毛已吸取了前后两次选择同辈而又是共事者刘、林为接班人的教训。此前，认为“共产党没有王位经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此时则实际上不得不承认还是“中国古代皇帝聪明”，要向他们学习，也选一个小一辈的人做接班人。这一年毛已整80，而王还只有38岁。

第二，像古代深居东宫的皇太子只是学习或偶尔见习朝政而不是实际管理朝政那样，毛明确规定王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王自1972年9月上调“参加中央工作”到1976年10月被抓起来的四年多时间里，除按规定参加各种会议外，受命做过实质性的工作有这样几项：一、先后或分别与许世友、纪登奎一起赴杭州，或由他一人单独前往，协助省委解决浙江问题。二、参加周恩来负责的中央小组，调查、处理南京、福州、济南三军区司令员庐山会议期间给林彪写信的问题，当时也称“解决华东问题”。三、自1974年6月1日至1975年7月1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是主持在这期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并将会议情况向毛上报。四、分管的事只有一项：负责中央读书班。读书班具体由中组部主办，带有当时中央党校性质，参加者大多为各省市推荐的新干部，共办了三、四期。对接班人作如此安排，至少可以确保集权体制的完整统一，杜绝了出现另一个“司令部”的可能，当然更绝不会出现像林彪那样的“带枪的司令部”的危险。

第三，无论当时和现在，我都认为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决非轻率之举，而是经过慎重的观察和思考的。如果我们把自“苏州谈话”以来的毛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前后两次构想的相关史实作一番梳理，就可以清楚看到，老人家是想竭力在他有生之年解决凡是用枪杆子或刀把子建立起来的政权都必须解决的“双重过渡”这个大难题，即如何尽快从武官政治过渡到文官政治，从重用功臣宿将过渡到启用新兴官僚群体。选择王为接班人，同时参加十大的代表67%为工农兵，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都是他这种努力的重要标志。此外，这样做还有体现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含义，更何况让工人、农民直接

来管理国家，这符合马克思、列宁的设想，又正是毛本人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种理想。如能顺利实现，在国际共运中那倒的确算得上是一项创举。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只是毛泽东也包括我们这些积极投身文革的人的一厢情愿。

古代帝王实行私袭制，继位的新皇帝即使还是孩子，有的还在襁褓中，甚或竟是个白痴。在所谓“奉天承运”的光耀下，按照世系承续的皇统，臣民们照样会三跪九叩，山呼万岁。1949年来中国实施的政治体制与古代帝王制度还是有着不少区别，废除了私袭，排除了血缘关系对政治的介入，便是这种区别之一。毛泽东对王洪文上述种种细心的安排固然可以确保不会出现像刘少奇、林彪那样的“司令部”甚至“带枪的司令部”，但真叫作“扶得东来西又歪”，如此安排又带来了一个新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如果王洪文一直没有掌握实权独当一面地工作，没有相应的资历、能力和执政经验，单凭“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这点“资本”，即使勉强接了班，又怎么能获得大多数人、特别是依旧健在的大批功臣宿将的承认呢？不仅是王洪文，不少结合到权力机构的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也大多是这样。十大中委和候补中委确实可说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但“青”包括不少“中”他们所担任的大多是“虚职”，很少有掌握实权的。“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林彪“司令部”的垮台，又有过一次权力再分配，从这时起，毛泽东当然依旧稳稳地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但实际具体地在各部门、各省市掌权的绝大多数是功臣派或称老干部，文革后统一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种格局下，毛泽东的让工人、农民直接来管理国家的是理想，永远只能是理想。

## “批”与“保”：毛泽东背水一战

毛泽东安排邓小平十大前夕复出，大概是曾经作为“走资派”被批判而愿意悔改的一个代表，可能带有示范的含义。但后来形势的发展，

邓成了接替周恩来几乎把文革派击垮的主帅。

1973年4月9日，从下放地江西回到北京不久的邓小平，到西郊玉泉山去看望因病在那里疗养的周恩来。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见面后谈话一开始，周就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因在座还有邓的夫人卓琳，周又特地叮嘱一句：“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此前中央早已把《“571工程”纪要》作为“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材料”发至全国，《纪要》“实施要点”中就有抓到张春桥“立即公布他的叛徒罪行”的话，所以张是“叛徒”的说法已广为人知，不再是秘密；但对此说法中央高层意见不一，周持肯定态度，毛则“不让查”，在当时仍属“极密”级重大政治信息。周在邓刚回到北京即以此党内机密相告，很可能有希望与邓达成某种“默契”，以便联起手来共同对付越来越受到毛信用的张的含义。周与邓历史上颇多矛盾，文革初期周还曾刘、邓并提对邓作过批判，但“九·一三事件”后，当毛开始考虑让邓复出时，周是积极促成的。此时周已查出患有膀胱癌，不难理解，无论从革命经历、政治见解或思想感情，周宁愿让邓来接替他的位置，决不想看到权力落入张之手。

十大后不久，发生了一个政治局内部的“批周事件”。在当时，这一事件本身已让我们这些约略知道一点内情的人感到意外，更大为吃惊的是邓在批周会上的一次发言。

那段时间王洪文已开始协助周恩来主持部分日常工作。据王说主席对批周会议很重视，他要看每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此每次会后，王就把全部会议记录带回钓鱼台16号楼他的办公室来，要他的秘书小沈再端正用相等于一号大小的字体重抄一遍，而且指定要用6B铅笔写，好让患有深度白内障的毛泽东看起来方便些。由于工作量很大，小沈每夜熬通宵也还来不及，我就去帮他抄一部分。在我的印象中，张春桥在批周会上的发言还是比较缓和的，主要是认为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周负有责任；江青则指责周在中美谈判中搞了“投降主义”，是什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真有点像“开帽子工厂”。

但记忆最深的还是邓小平的发言。邓当着周的面说的大意是：你现在的位臵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那时我和小沈对周都十分敬重，对他能抱病参加这些批判他的会议原已很同情，那夜看到这段邓发言的记录就不由议论起来，认为这是无中生有再加无限上纲，很为周感到委屈，为他抱不平。数十年后经过世事人事沧桑几度，如今回过头去再想想，觉得事情恐怕并不像我们当时想象那么简单。很可能邓的话就是说给毛听的，他在这样的场合、用这样一种方式向周发出这样的警告，正由于它没有事实根据，似乎更能显出刚刚复出的他对毛的一片忠诚。周听了是否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委屈、不平，恐怕也不一定。凭周丰富的仕途经验，不难读懂这或许正是刚复出的邓的一种“进身术”，因而他会仍然相信与邓在对付张的问题上曾经有过的“默契”。这也就是说，既然要“联手”，就不能不承受相应的代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邓的批周，就有了“周瑜打黄盖”的某些含义。也许有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一点。1975年5月18日，刚从国外出访回到北京的邓小平顾不得休息，就赶到三〇五医院去看望周恩来，送给周一件不寻常的礼物——当年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经常吃的法式月牙面包。周抚摸着这种独特的面包，一切尽在不言中。

“批周事件”几个月后的1974年4月6日，由毛泽东提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赴美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并作了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长篇讲话，世界各通讯社纷纷报道，让刚复出的邓小平来了个“闪亮登场”。从这时起到第二年8、9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大多就是邓小平。从中央来说，也正是这段时间，是十年文革中最为云谲波诡的一个历史时期，许多史实至今还在云遮雾罩中，有待专家学者去考订、研究，作出合乎实际的说明。

其中特别费人猜思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文革派是一个“四人帮”小宗派，并在1974年7月17日和1975年5月3日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的宗派活动。其实十大后的文革派或者说“四人帮”的几个人，也已经各怀心思、矛盾重重，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铁板一

块。批林批孔一开始，江青就把以为既有党的副主席的职位、又较容易控制的王洪文拉在一起，还成立了一个我也曾参加过的专门处理全国各地主要是造反派写给江或王有关批林批孔大量来信的四人小组，每天要出好几期《要信摘要》，上报毛泽东和分送在京各政治局委员，江青在上面不断有所批示，想用这样一种办法把运动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料此时王洪文背后又出来了叶剑英。叶剑英因十大时支持王洪文而批评了许世友，让王颇为感激。叶与王又是一起钓鱼，又是一起打猎，叶还调拨给王一套在玉泉山的特地经过高规格装修的楼房，大概也是想把王拉过去吧。江青为此大光其火，要张春桥管管王。

偏在这时，上海发生了一个“《朝霞》事件”。其背景是，邓颖超很可能是根据周恩来的主意或意图，用了访问“康办”大院所有上海市委领导住家却偏偏不去张家这么一种巧妙的方式，等于公开宣布：张家问题严重，大家都要离远点！迫于这种无形却强大的压力，张从此不便再回上海，时间一长，对市委工作状况就变得颇为生疏。与此同时，已升任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却经常通过某个市委书记直接向市委发指示。借用文革中的流行语来说，这该是上海市委一个近似“多中心”的时期，从而导致市委几位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之间原已存在的权力斗争进一步激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经王洪文同意、市委三位书记联合批示，对市委写作组主办的文艺刊物《朝霞》发起了群众性的大批判的“《朝霞》事件”，实际上是造反派的又一次“内讧”。三位书记是在没有报告在北京的第一书记张春桥的情况下作出批示的，这种做法不说是反张，也至少是一种擅权行为，更何况发起批判的“罪名”纯属莫须有。尽管事件经张果断而又谨慎的处理和王洪文认识错误后的积极配合，很快平息了下来，但张对王由此留下的戒心，恐怕短时间内很难消除。所以这回江要张“管管王”，张既不便管、不好管，大概也不怎么愿意管吧？除此之外，张对批林批孔中江、王那些明显不符合毛意图的做法和讲话，估计也不会赞同，后来他与姚文元谈起江、王在某次会上的讲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还会讲出什么好话，无非是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

不过文革派在对待功臣派的态度上，大体还是一致的。毛泽东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并批评“四人帮”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文革派与功臣派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1974年3月22日，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内部提议向中央作出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等积极支持，江青激烈反对。张春桥不见有什么表示，从他后来据说是“因病”没有出席讨论邓率团出国相关文件的政治局会议来看，内心大概也是不赞成的。

二是1974年9、10月间，两派对正在筹备中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争论日趋激烈。10月4日，在武汉休养的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10月17日，江青把王、张、姚找到她所在的钓鱼台17号楼一起商量，决定由王去见毛，汇报双方的争论，其中包括周恩来在医院就有关人事安排问题多次找人谈话等情况。因此时毛已转到长沙休养，王此行后来被称为“长沙告状”、“阴谋组阁”。

三是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谈到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时，引了毛泽东1958年8月庐山会议上关于学习理论的一段话，其中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接着说：“据我看，毛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与此同时，姚文元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也引了毛的这段话，认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人民日报》3月21日《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4月23日毛泽东作出表态：“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在紧接着4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对张、姚等反对经验主义作了猛烈的批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毛泽东在相隔近一年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对文革派江、王、张、

姚等人的批评，重点是指出他们在上述三次争论中搞了宗派活动，而不是他们提不同意见的错误。如在前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之间，一次与李先念的谈话中批评了江青，说她“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在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批评文革派搞宗派活动，应是事实。如上面说的“长沙告状”，尽管王洪文当时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完全正常；但他此行是江青事先找了少数几个人商量后决定的，就属宗派活动。不过公平地说，功臣派不仅也搞宗派活动，而且搞得更多更厉害，近年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都有详尽记述。如说经过两次手术的周恩来，依然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接连约人谈话、批阅文件，以至负责治疗的医生不得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减少周的这些活动，以免影响休息和睡眠。

《毛泽东传》中还引录了纪登奎的一段回忆。纪登奎说：“从74年10月下旬起，他（指周恩来）在三〇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过七次。最后提出了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12月20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传记作者都是作为周在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依然念念不忘与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感人事迹来写的，但他们却忘了想一想：像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这样的事，把一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和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委员完全排斥在外，这种做法正常吗？如果“四人帮”反咬一口说周恩来等也是在搞“宗派活动”、“阴谋组阁”，而且比我们搞得还厉害，该怎么回答呢？

不过在这里，我以为更需要也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还不是传记作者观察历史采用了什么视角，而是：此时仍然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不知道功臣派也搞了宗派活动，而且搞得更厉害，王洪文“长沙告状”告的主要也就是这方面内容，但毛却偏偏只批评文革派而不批评功臣派，这是为什么？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得说几句关于“派”的问题。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说过：“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的确如此。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不同生存状态的人，必然会提出不同诉求，因而在现代国家里，众说纷纭，政见杂陈，出现各种派别以至公开的反对派，都是极正常的事。大概由于我们国家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传统太深远了的缘故吧，往往把“交结朋党”视为一种严重的罪名，1949年以来实施的政治体制大体也还是如此。

不过这种情况到文革一开始发生了新奇的变化，不仅群众中出现了各种派，而且大会小会都在呼喊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两个政治派别、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组织策略作个粗浅的概括，那就是：依靠文革派，发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文革派开始主要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那时全国上下都知道中央文革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舆论宣传也是这个基调。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曾宣布过：“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后来，毛领导下的文革派与竭力推崇文革的军官集团派和支持或赞同文革的部分功臣派结成临时同盟，称“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明确“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

在此前后毛的一些重要指示以至重大决策，包括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生日谈话》，不少是只与文革派少数几个人说一下就付诸实施的，要说宗派活动这也是一种宗派活动，只是好像从未有人这样想、当然更没有人这样说过。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夺权斗争的迅猛发展，先是文革派几位大员接连出局，继而军官集团派纷纷落马，七零八落的文革派最后还剩下毛泽东和江、张、姚、王五人。所以国外流行一种说法，叫“五人帮”，不叫“四人帮”。那么毛为什么过去不说、偏偏

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而且还不止一次地批评了他们的宗派活动呢？我的理解是由于形势出现了转折性的大变化。这种大变化了的新形势，已非一般调整性的措施所能挽回，而如果任其发展，极有可能导致文革全面退潮，结果会是颗粒无收。权衡利弊，恐怕只有果断采取根本性的大动作，或许还有可能从被动转为主动，保住文革基本成果，不失时机地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完成。

形势出现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是“九·一三事件”。这个重大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人心和民情以及权力构成两个方面。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的突然“机毁人亡”，大多数人起初震惊，接着惘然，其中不少人转而开始思考。作这样思考的较多是运动中曾受到过批判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保守派群众，但也有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和文革的积极投入者。狂热的激情慢慢趋于冷静，虔诚的信仰渐渐有所疑虑。这种思考虽然还没有公开化，但它汇成的力量不容小觑，更为重要的是队伍还在迅速扩大。广大的基层工农群众，他们的想法则要实际得多。相当普遍的一种看法以为闹腾了这么些年，他们并没有得到些什么。1975年夏秋王洪文与纪登奎一起奉命去杭州“解决浙江问题”，我作为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先后在杭州、萧山、金华、兰溪、宁波等地做调查，多次听到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在当地叫“顺口溜”：“盼过九大盼十大，盼过十大盼人大；人大开过了，还是一点没啥啥！”以上是人心和民情的变化。还有是权力构成的变化。“庐山会议事件”后毛泽东提出要解决的“军队问题”，以十大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为标志已基本完成。其时军队干部因“三支两军”而进入各级权力机构并成为主要领导的，大多已陆续退出。而造反派好些地方因长期打派仗，加上经过此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他们的头头多数在群众中也缺少信任度，实际上很难掌好权。各省市军队干部退出后的那些缺位，几乎全由复出的老干部来接替。与此同时，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运动中曾经受过冲击的老干部，也纷纷复出。如果说九大后是军官集团派一派独大的话，那么此时的功臣派不只是一派独大，甚至可说已颇有“一统天下”之势。

密切关注着这种新形势的文革统帅毛泽东，决定作出新的部署。

1974年8月下旬，一条“最新指示”通过各种宣传工具传遍了大江南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尽管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时似乎还没有达到预期的全部理想目标，但他的这段话，实际上透露了准备“提前”结束文革意欲以此保护已经取得的文革成果的信息。根据这一新的部署，多少有点出于无奈，却也是断然、决然地作出了三项决策，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一次妥协和退让，因而显出几分破釜沉舟式的悲壮，我称它为“背水一战”。

第一，重新构想人事布局。这就是上面已提到过的王洪文赴长沙“告状”，毛泽东批评了文革派的宗派活动，让周恩来、王洪文一起来商谈有关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这已是九大后的第三次布局。与十大的文革派为主、功臣派为辅的布局不同，这次倒过来了：以功臣派为主、文革派为辅。最大的特点是由邓小平接替已患有不治之症的周恩来的位臵。如果与毛发动文革的理想目标作个比较，显然较为接近的是十大的布局而不是四届人大的布局。之所以必须作出这样的改变，就是鉴于出现了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新布局的提出，说明王洪文已失去了“接班人”的资格，毛已承认在安排接班人问题上的又一次也即第三次失败，不得不从理想回到了现实。构想这一布局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要尽可能保住文革的基本成果。基于同一思考，对邓的如此重用也有一前提条件：邓必须实践他给毛的那封要求分配工作的信中作出的保证：对文革初期曾经受到过的批判“永不翻案”。

第二，提出并批评“四人帮”。如果联系一下此前八年文革史，和毛本人曾经宣布过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就可以知道这对毛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出的大动作。张等三人，是毛发动和推进文革的得力助手，王更是毛费尽心思从基层提升上来的体现文革胜利成果的标志。吴德在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中两处提到，十大后毛在他住处中南海游泳池找政治局人谈话时曾指着窗外蔬菜地说，对王、张、江、姚就要像培育蔬菜秧苗那样细心培育他们。而在1949年以来的政治语境中“帮”或“派”都被视为非法的，如今这四个人竟掉到了“帮”的境地，这是何等大的落差啊！而且你仔细想想，“四人帮”这个名称就大有讲究。不称文革派或“极左派”而叫“四人帮”，就是要把人数限

定在“四”上。看来，作为曾经是文革派首领的毛泽东就是想用这样一个行动宣布，他已从文革派退出，与文革派不再有任何联系。如果把文革发展过程中前后的斗争形式作个比较，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集权体制必须严禁派和派别活动，文革派也好，造反派也好，都只有在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某个规定的时间段内，才允许它们出现和存在。它们的使命是两条：消灭“走资派”和消灭自己，从而回复到更加集中统一的政治秩序。尽管毛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始终拥有崇高的威望和至上的权力，但如果不出某个派，从理论上说就不会有高于派别的权威和公信力，就不可能有评判、调解各派的资格。毛带头退出了文革派，就有了这种资格，就可以向各个派别发出警告：现在已是你们“消灭自己”的时候，从此谁也不许再搞派别活动。我的理解是，毛批“四人帮”的宗派运动，不言而喻，也是对功臣派的无声警告：你们也不能搞派别活动。事实上毛对功臣派也曾有过警示，只是不说批评，而是提醒。如提醒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提醒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不要搞‘三人帮’”等。

但要“消灭自己”，对不少曾经在“派”的人来说，可是一大难关。“消灭走资派”，他们可以豪情万丈，到了要消灭“自己”，却是那样勉强以至痛苦，不少省市造反派的“大联合”之所以如此旷日持久甚至派仗连连，不肯爽爽快快“消灭”自己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现在类似的勉强以至痛苦，轮到了曾经风光无限的文革派。

毛泽东在大致有了上述人事布局构想后，第一步就是提议邓小平任团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毛希望文革派能够主动跟上他的思路，但又担心他们很难做到，且先做个测试。他告知周恩来这一提议时特地关照一句：“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所以邓小平任团长一事是外交部向中央请示报告中提出来的。果然，江青一看就坚决反对，还扬言要外交部收回报告。最后毛不得不自己写信告知江：此事“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还有王洪文，甚至到毛已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搞宗派活后的1974年10月，还不知道毛已退出文革派，从此不许再搞宗派活动。王到长沙后写给毛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

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个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你看，在王心目中，毛依然是他们的“派头头”。读着这样的信，毛的感受大概是四个字：啼笑皆非。这段时间里，张春桥的表现是沉默，几乎不说什么话。我的猜想他也是痛苦的：苦于不知如何来重新认识和追上毛的思路。

第三，“批”为了“保”，这是与上面第二项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看得很清楚，在当时形势下，对文革派四个人，只有通过批才能保，“批”正是为了“保”。这一点，从毛整个批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点名批评的只是江青一个，张、姚始终没有提到。这除了江青确实闹得比较厉害，还因为她是毛的夫人。毛这样做对其余三人是一种警策，对功臣派除了慰抚，恐怕还隐含着已经退到底线的一种宣告：我把老婆都批成这样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呢？再如，即使对点了名的江青，也特地说明：“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更能说明“批”为了“保”的，是毛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事。在提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由谁出任时，毛与周有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对话。周接连提出了三个人选，毛显然都不同意，却突然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罗荣桓。”周不由一怔。罗原曾任此职，但此时已作古多年，怎么还要提罗？待周反应过来，毛笑着说：“还是由春桥兼任吧。”周这时再次提出了张的“叛徒”等历史问题，毛的回答是四个字：“已经知道。”后来张不仅兼任总政主任，还出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最后是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后，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还提出了处理的方式：“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

值得特别提一下的是，毛泽东这位兼有哲学家和诗人气质的政治家，在上面提到的5月3日那次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上，还给与会者和后人留下了一个谜，一个充满着东方式政治智慧的谜。

会议临近结束，毛忽而说起了三国孙权的故事。也许是十大期间叶剑英在批评许世友反对王洪文上去时，曾讲过孙权起用周瑜故事的缘故

吧，这时毛又让叶来吟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首脍炙人口的咏史诗直接说到孙权的有这样一些名句：“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还有曹操的一声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会后，王洪文要我找些资料，给他解释一下这首词。当时我的解释只是“就词论词”，肯定远离了毛泽东奥妙的用意。因为我没有说明：为何一个主要是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却要借这首词来做结束语？但我相信，功臣派中总会有人能读懂毛的深意，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愿意真正照着做。

## 邓小平—华国锋—邓小平

邓小平是实干家，一首词就是一首词，何况还是七、八百年前一个古人写的，什么深意浅意，他大概不会有兴趣。接下去他便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并作中心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了猛烈批判。

到这一年7月1日，邓小平正式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把几个月前已经开始的整顿雷厉风行地推向各部门、各系统、各省市，推向高潮。整顿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毋庸讳言，整派性实际上就是整造反派。不过也应当说，其时文革已闹了八、九年，人心思治，所以邓的大搞整顿，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护。与此同时，邓又着手把思想、教育以至文艺等领域的领导权以及编辑《毛选》五卷的任务，也全都抓到自己手上来了。办法是，重新起用胡乔木等党内著名的笔杆子，在国务院成立一个叫“政治研究室”的特别机构，和一个《毛选》整理小组。这两个机构实际是一套班子。再把通常称作“学部”也即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那支人

数众多而又训练有素的理论队伍，也划归这套班子去管。接着又紧锣密鼓地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明显有与此时还由姚文元分管着的《红旗》杂志来一个分庭抗礼的预期。

1974年末，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商谈人事安排时，明确提出：“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以“铁腕”著称的邓小平，通过上述这套措施，短短三两个月就把张、姚挤到了半“靠边”状态。紧接着，又向被认为是张春桥“基地”上海发起了攻势。此前，上海已因“《朝霞》事件”引发了结合在市委的几个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之间的一场“内讧”，这一回邓小平准备再去找市委几个老干部做做工作，从而在张的这个“基地”中打开一个缺口。与周恩来一样，邓也是利用了一次陪外宾到上海访问的机会，时间是1975年6月15日。这天晚上送走外宾后，邓把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马天水叫到他下榻处瑞金花园作了一次长谈。先透露了一点政治局两派斗争和毛批评张、姚在反经验主义问题上的错误等“内部消息”，接着谈了些当前工作，对马说着重要大胆批派性，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最后说：“以后你到北京开会，可以多找找国务院的老同志，先念同志，秋里同志；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谈嘛！”邓与马的这次谈话，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称为“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上述邓小平批判文革派和大搞整顿的整个过程，都在毛泽东密切关注和细心的观察中。6月初，毛与邓曾有过一次很可能是充满着玄机的谈话。毛先称赞邓工作“有成绩”，接着说：文革派“他们几个人不行了”，“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鼓励邓“把工作干起来”。邓说他“有决心”，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笑着突然说出了八个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语出三国李康《运命论》。就看你这位实干家怎么去理解。

现在再来说说张春桥在这段时间的心态。大概是1975年3、4月间吧，张在日趋激烈的中央内部两派斗争中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无奈只好向写报告提出与感情一直很好的妻子文静离婚，已获批准，只是还没有办理法定手续。不仅如此。就像我在第二节中已提到过的那样，原来同住在钓鱼台的姚文元、陈永贵、吴桂贤因毛说了句“钓鱼台无鱼可

钓”的话而相继搬出，这一来，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这年秋冬，约有两三个月身体又不怎么好，低烧老是退不下来，夕阳下，常一个人在钓鱼台中心湖畔散步。这该是张在文革十年中最为艰难、苦闷，却也是相对较为“清闲”的一个时期。

记不清具体日子，北京已经很冷，大概是10月末或11月初吧，一天我看张，见他站在办公桌旁像是很专心的打扑克。这是一个人玩的一种游戏，叫《打通关》。据说很能锻炼智力和耐心。后来楼里服务员对我说：“这段时间首长出去开会比过去少得多，有好几次看到他一个人在打扑克。办公室的清洁工作也是他自己做的，我们都快失业啦！”张看到我就收起了扑克牌。坐下来说话时，我笑着随口问了声：有没有打通？他点了根烟，很高兴地说：“非常难得，这一回打通啦！”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此前对邓小平说过的“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那句话应验了，中国政坛“风向”果然又一次大变。10月19日，毛泽东抓住邓小平两次向他转达清华大学党委一位领导反映学校新干部思想作风等问题的来信作为契机，开始对邓在大搞整顿中反映出来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等问题提出批评。接着，先在政治局内部从四人、八人、十七人的小范围，逐步扩大到先后两次“打招呼”会，继而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再扩展到各个领域，进而又从北京推进到全国，发动了一场以批邓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名称就叫“反击右倾翻案风”。如今人们读这段历史可能会觉得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简直莫名其妙！但毛泽东却以为有充足理由。这是因为当初重新起用邓时就设定了一条底线的，这条底线就是维护文革基本成果，邓也做过“永不翻案”的保证。但邓的大搞整顿冲破了这条底线。所以毛说：“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政治局内部批邓时，开头一段时间王、张、江、姚等几个人都没有正式发言，只是偶或有点插话。毛特地让联络员传达他的意见：“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尽管实际上邓一直是把张作为主要对手来较量的，但毛却偏偏没有提到张也要发言。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这位极富东方式智慧的政治家，总是不断给当时和后人出智力测试题，这里又是一个。

这年12月中旬，由外交部提出、经毛泽东批准，张春桥到柬埔寨出访了一次，是对已经来访过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回访。因属于内部相互访问，不作公开报道。回国那天到机场迎接的中央领导人只有一位，就是正在接受批判的邓小平。在舷梯旁握过手，坐进车子，两人似乎都有些不自然，一路无话。车子进入市区，邓忽然说：“到大会堂聚一聚吧？”张爽朗应答一声：“好，聚一聚。”原来这一天恰好是毛泽东82岁生日。往年此日，大都由周恩来发起，请政治局在京委员到人大会堂同进一餐寿面。而此时周已在医院病床上进入弥留之际。窗外天空彤云密布，大雪纷飞。张与邓落座后，一起举杯说了声：“为主席健康。”似乎都还想说几句舒快一点的话，但终于还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话题，直到各自闷头吃完碗中的面。

再过35天便是1976年春节，农历岁次丙辰，龙年。

1976年2月3日是龙年正月初四，就是在钓鱼台也偶尔可以隐隐听到附近传来的爆竹声。正是在这样喜庆的气氛中，我收到了张春桥写的一篇读中央一号文件感想的文稿，也即后来被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认定为张篡党夺权“铁证”的那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有关张写《有感》的前后经过，本书已录，此处略。有必要重复说一下的是这样一点：《有感》是张为教育、鼓励我而写的，因我在那些年里对形势看法较为悲观，他就用中央前后两个一号文件时间仅隔一年形势已发生了“新桃换旧符”的大转变这一事实，向我说明应当乐观，与什么“反对华国锋”毫不相干。

其实这也用不着我来啰嗦，相信只要不带成见，任何人把这篇不到两百个字的《有感》读一遍，都会认为“来得快，垮得也快”那些话，是对1975年一号文件后出任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说的；任你怎么找，也找不出哪一句话、哪一个字是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有着刻骨仇恨和妄图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相反，文中对1976年一号文件也即新任命为代总理的华国锋的出场，特意铺衬了一个“千门万户曈曈日”的春意盎然的背景，这反映了作者对华莅任新职的一种喜悦之情，只不过用的是文学手法。退一万步说，即使张在《有感》中有对华不敬之词，也只是让我一个人看过，随即锁进了保险柜，最多也只能勉强定个“诽

谤未遂”罪吧？而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先把张抓起来，再破门而入，撬开保险柜抄出了这篇《有感》，便作为唯一“罪证”向世人公布，这叫什么呀？

当然，张春桥是个政治人物，他支持华出任代总理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对他自己政治上升沉进退的考量。当时，有可能竞争此位的，只有三人：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张自己，只会动动笔杆子，并无尺寸战功，在经历了中央高层两次“大闹”、由毛泽东牵头与林彪的“根本谈不拢”的“苏州谈话”和险遭灭顶的“庐山会议事件”等教训，再加上那柄虽然纯属虚构却一样锋利无比的“叛徒”问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还悬在头顶，早该有了自知之明，不可能再有非分之想。剩下的，就是华和王。如果要张在两人之间作个选择，他选择的肯定也是华而不是王。这除了在当时那种功臣派一派独大的形势之下，王上去同样无法稳定局面以外，还有一个属于张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那就是“《朝霞》事件”给他留下的对王的戒心，此时大概还没有完全消除。张一想就容易想到：王一旦接班，历史上吕不韦那个教训会不会重演？而当时，张对华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张在与姚谈话时也说与华“能合作，就是不大交心”。张对华说过：“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我在与张接触中，觉得他还是保留着相当多的文人气质，更愿意自己是毛思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是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由华接班，他在一旁辅佐，不顶在第一线，省却不少麻烦事，或许还有可能抽出时间来完成早有“野心”的《毛泽东传》的写作，大概更符合他对自己的理想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文革十年，张在追随毛和毛的思想、指示行事这一点上，可谓坚定不移，且始终如一。让华出任代总理，从当时的特定意义上说实际上也即让华接班，是毛九大后第四次、十大后第二次人事布局。尽管毛说得仿佛很随便：“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个水平低的。”但张完全能够理解，选择华，是在功臣派一派独大的形势下，毛仍然希望既能保留文革基本成果，又能团结大多数的良苦用心。华在党内属中年，经历兼有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文革初期曾受过一点冲击，后期更多的是受益，可说是典型的中间派，既能获得功臣派的支持，也容易为文革派所接受。更何况，毛还

事先通过联络员分别向张、王打过招呼，要他们“让一让”，张当然要不折不扣坚决执行。所以我以为张支持华确系出自真心，他对因事或因开会来北京的马天水、徐景贤等上海市委领导，也说过“要支持国锋同志工作”一类话。

一些回忆文章大都称华国锋为人厚道，我参加过有限的几次由华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留下的印象也是这样。说话总是面带宽厚的微笑，对与会者包括我这个工作人员都很尊重，对张春桥尤为敬重，逢到某个问题要做结论或决定，总会先问一句：“春桥同志，你看呢？”但华同样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已是接近顶级的政治人物。人，一旦登上了如此高位，大多会处于一种超越常情的精神状态，此时支配他思维和行事的已不是原来的情性譬如厚道，而是那些冷冰冰的政治博弈规则。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时间略有先后。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继位，便可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手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六政变”。

其实毛泽东在世时对此类事早有预警，现在可以查到记录的就有两次。一次是我在前面已提到过的，1967年9月毛在与张等谈话时提醒说：你们不要多讲我个人，讲多了“马克思叫我走了”，你们“要吃亏的”。还有一次就是现在已经流传得很广的毛与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等说的那番话，时间是1976年6月中旬。其时毛病情已相当严重，可能预感到“马克思叫我走”的日子就要到来，所以从谈话中透露出来的警示含义也更为直接和严峻。先说了他一生做了“打倒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又说这两件事都还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说到这里，熟读二十五史

的毛泽东，眼前大概已浮现起历代帝王权力传承之际那惨酷的一幕幕，于是接下去依然用平静口气说出的四个字，却是那样令人不寒而栗：“搞不好，就要血风腥雨了。”最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声长长的喟叹，寄寓着这位病危中的老人和伟人的最后一丝希望——他是多么希望不要出现“血风腥雨”啊！

现在已有学者经考证，认为毛的后一次警示即“血风腥雨”那番话不可采信。主要的、也是相当有力的根据，就是华国锋本人否认毛曾有过这样一次谈话。我的看法可能有点另类。我以为华的否认，恰恰证明毛确实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之所以要否认，就因为毛正是当着华、张、王、汪等人的面，含蓄地警示不要搞“血风腥雨”，而华却偏偏搞了“血风腥雨”。

不过华国锋毕竟是厚道人，他在搞过“一举粉碎”后就不由心虚胆寒起来。为此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场合说明，他这样做是“执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愿”，第一次还是在毛的灵柩前深深鞠了三躬以后说的。但这却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你把包括人家老婆、侄子在内全都“一举粉碎”了，这人世间竟有如此“执行遗愿”的吗？如果那个睡在灵柩里的老人还能开口，你还胆敢说这种话吗？

紧接着，华国锋就让党中央、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署名作出决定，加速出版《毛选》五卷，并以举国之力，大搞遗体保存和修建纪念堂等等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前些年我在写新史话体断代史《大秦帝国》时，又不由想起了文革中这段接近落幕的历史。《大秦帝国》第九章是写平庸无能的二世胡亥是如何通过与赵高、李斯联手用政变方式继位的。胡亥登基后的第一个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就是竭尽天下奇珍异宝和能工巧匠穷奢极侈地为始皇大帝举行葬礼。我把胡亥这种做法概括为“借光术”：他想借用先皇宏大的威光，一夜之间使平庸无能的自己突然广大起来。恕我不敬。我暗自想：华国锋的上述种种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是否也有点像在搞“借光术”呢？他急于想为自己塑造一个最忠实于毛，最坚决执行毛遗愿、遗志，无愧于像毛说的那样“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形象。后来又有人把华的这种策略概括成一句话，叫作“两个凡是”。

但紧接着发生的事却说明，“人一走，茶已凉”，“你办事，我放心”很快过了有效期，“借光术”并不管用，“两个凡是”也失去了号召力。《庄子·山木》中有一则寓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正是抓住华国锋“两个凡是”这件法宝，倒过来把它变成一种罪名，先除去华的“左臂右膀”，再请华国锋本人“自愿”向中央提出辞呈。于是百般无奈的华国锋，只好自己摘下了头上那顶才戴了两年三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的皇冠。

邓小平搞掉华国锋当然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中国，几千年来“打天下，坐天下”有个老规矩，那就是得按照资历和战功来排座次。你华国锋算老几呢，扳扳指头排一下嘛，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坐头把交椅啦？

至此，毛泽东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接班人的安排同样宣告失败，文革这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剧终于降下了大幕。

## 大幕降落，张春桥做了个梦

张春桥先是关在地下防空室，后是囚禁在秦城监狱，看完了文革这部历史大剧的最后一幕。张曾对人说过：“毛主席去世后，我的生命已经终结。”说得准确些，应该是作为政治人物的生命已经终结。此前张还曾不止一次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人，一旦解脱了尘世荣辱升沉以至生老病死的羁绊，回归到一个赤条条的大自然的人，便获得了彻底的自由。被抓了起来的张春桥，面对那些一律拎着黑皮包的，先是中央专案组、接着是中央纪委、最后是特别法庭的大员们，无论是循循善诱的软攻还是疾言厉色的硬逼，他都是一副定格似的表情：微微偏着头，抿着嘴，既不忧伤也不激愤，带着几分自信和自傲，还有几丝不屑，从容自若，淡然自定。这当然要被办案人员斥为“顽抗到底”的恶劣表现。有位著名的漫画家还据以画过一幅同样著名的漫画，题目叫《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却以为“不怕开水烫”的张春桥，倒正是他获得了彻底自由的一种反映。

我猜想，如今的人们更有兴趣的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在高墙铁窗

下度过了那么些年，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被称为“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春桥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否也有一些改变了呢？我手头有一份张的狱中家书复印件，写信的时间是1992年12月20日，再过六天就是毛泽东诞辰99周年，所以信的大部分篇幅是叙述张与毛关系，从1938年在延安第一次听毛报告留下的印象，一直说到文革十年历次与毛接触的感受。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看到一篇文艺评论，说现在的电影“把毛从神变成了人，把蒋从鬼变成了人”，据说这是个伟大的成就。我没有机会看这些伟大的作品，不敢评论。但是，他的这个论断，同我的脑子里的毛、蒋形象就根本对不上号。毛在我脑子里从来不是神，蒋在我脑子里也从来不是鬼，他们从来都是人。但是，人是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毛是人民的领袖，蒋是人民的公敌。不讲这种根本区别，抽象地谈神、鬼、人，只能把读者、观众带到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里。有一条消息说，为纪念毛100寿辰，要拍毛的三次握手：一次同孙中山，一次同蒋介石，还有一次没听清是谁，看来毛又回到1927年以前跨党分子的地位了。革命领袖的形象在这些资产阶级艺术家手里，好像可以任意塑造似的。但是，我相信在人民心里，他们的形象是不可能改变的。

这些话难免会引起不少人批评。真是顽固不化啊！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反思精神”，怎么就不能“与时俱进”一下呢？批评当然很正确，不过我还是稍稍有些担心：要真是那样，这个人还是24岁创作《毛泽东之歌》，50岁过后又立下“野心”要写《毛泽东传》的张春桥吗？

1998年1月，服刑21年后的张春桥，被从囚禁于秦城监狱改为软禁于江苏江阴某地，也即后来新华社公开报道中说的“保外就医”。那是在偏僻乡野的一座三层小楼房，因四周新砌了高高的围墙模样十分奇特，远远望去便可一眼认出。小楼之北隔着一座不高的山，便是昼夜涛声不息的长江。张住的是二楼，安全可以绝对保证：三楼和底楼全是换上了便衣的警卫。正是在这里，经过有关部门先后逐一批准，张终于得以与被迫一度提出过离婚的妻子文静，和三个女儿，还有那个还没有出

生就在“主席那里备过案”的小儿子毛弟，以及女婿、儿媳、孙儿、重孙儿陆续团聚。欢声笑语不时传出，可谓其乐融融。只是毕竟已是垂暮老人，进入新世纪后种种老年性疾病陆续出现，后来更查出了极可怕的胰腺癌，而且发展很快，只好住进了江阴市医院。

在这期间，张曾做过一个梦，醒来后告诉了陪伴着他的家里人，一次张的大女儿来看我，说起了她爸爸的这个梦。我细细想想，以为如此奇特的梦，似乎正反映着张离开这个世界时的一种心境，特转录于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当时张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因剧痛，只好贴止痛膏才得以勉强入睡。这一天是2005年1月27日。清晨，病危中的老人忽而笑着醒来，说他刚才做了个梦，梦见的竟是久违了的大海。是的，他想起来了，他少年时代曾那样向往大海，倾慕大海，还写过题为《海的渴慕》的文章：“我渴慕着看到大海，更渴慕在它胸膛上预言暴风雨来临的海燕的生活……”只是这回梦中见到的大海少了些明丽的色彩，茫茫中只见一团圆盘形的波浪飞速滚来、滚来。忽而波浪中跳出了一个人，定睛看时，竟是邓小平！邓一边走一边说：现在我没有地方去。我去找主席，主席不肯见，说他来有什么好说呢？还不是黑猫、白猫那一套！又去找总理，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这几个人相互斗来斗去，都那么些年了，还是不要再去干扰主席了吧。邓转而对张说：所以我来找你，主席最听你的话，你就帮我到主席那里去说一声，让我去见一次吧，要不然，我怎么能去见马克思呢？张回答说：可主席还没有叫我去，我又不能自己去，怎么给你们去说呀？说着就笑，笑着就醒了过来。

待到清醒过来后再想想，张觉得这梦做得有些蹊跷，很可能是我真的要去见主席了吧？是的，也该走了。主席不是说过吗：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都八十八了，还不该走。但一想到死，就感到惭愧，非常惭愧。已经吹出去了，说是要写一部《毛泽东传》的，也曾构想过几次，但就是没有动笔，哪有脸去见主席呀！唯一直接写主席的，只有年轻时那支《毛泽东之歌》，偏又写得那样幼稚。记得1958年那次随柯老到杭州去见主席，柯老介绍时说：他就是张春桥，《毛泽东之歌》的作者。当时心里很紧张，担心主席会批评。主席倒是没有批评，还笑着说了声：呵，你还会写诗？看样子主席对我写的那支歌还有些喜

欢，至少不反感吧？这么说我还可以说唱着这支歌去见主席？是的，还可以唱……

于是我猜想，这个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老人，便在心里唱着《毛泽东之歌》上了路：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光明的象征，你是胜利的旗帜，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做过这个梦以后又过了84天，即到了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的心脏终于停止了搏动，结束了他注定要被后人争议不休的一生。